

百年嬗蜕

十九世纪初年，中世纪的最后一个盛世刚刚过去。此后的百年，是一个“四海变秋气”的衰世。值此大变局中的人们既为古今中西之争所苦，又不能不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为民族寻路。因而有前后相继的思想潮流和社会变革。这个过程体现了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进化。

中国 近代的 士与社会



这个过程是在逼择之下进行的；逼择之下没有从容。每一代人都推进了近代化，但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愚迫、张皇留下了简约化和片面性。尽管是历史的进化，但也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杨国强 著

科举制度下的功名与富贵，人口迁移与民变，内战造成的土地关系变化，国家权力下移，与儒学相依的士人在中西交冲下一代一代的变异……这些题目的解读，既显示了西潮拍岸的惊涛，也激荡着五千年历史在新陈代谢中的回声。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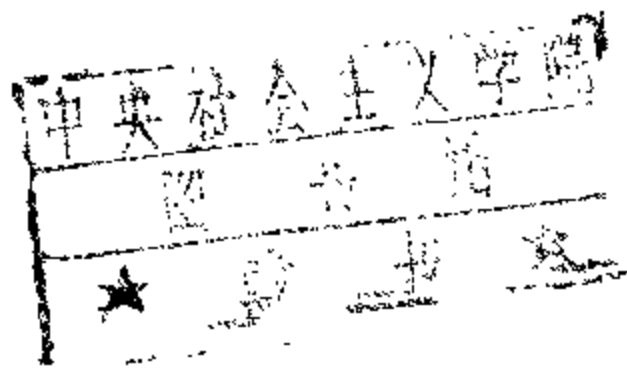
201039474

DH09/07

百年嬗蜕

杨国强 著

中国近代的 士与社会



上海三联书店

百年嬗蜕 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

著 者/杨国强

责任编辑/陈达凯

装帧设计/鲁继德

责任制作/朱美娜

责任校对/顾雅清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020)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制 版/申亚出版发展公司

印 刷/天华印刷厂

装 订/天华印刷厂

版 次/1997年12月第1版

印 次/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40千字

印 张/9.75

印 数/1—8000

ISBN7-5426-1023-6
K·65 定价 15.80 元

D4109/07
目 录

十九世纪中国社会的旧序弛坠

- 科举制度下的功名和生业…………… (3)
二百年人口西迁的历史因果…………… (19)
太平天国起落与土地关系的变化…………… (37)
军功官僚的崛起和轻重之势的消长…………… (50)

中西交冲与士大夫的嬗蜕

- 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 (125)
鸦片战争与儒学…………… (173)
曾国藩论(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188)
曾国藩论(二):在经世之学的延伸中为西学东渐拓开门洞者
…………… (207)
李鸿章论:没有义理之学的洋务巨擘…………… (234)
新学生社会相…………… (253)

新世纪来临之初的知识分子和文化论争

- 西潮与回声…………… (261)

新文化运动：从“美国思想”到“俄国思想”	(268)
历史的矛盾与“社会主义的讨论”	(286)

十 九 世 纪
中国社会的旧序弛坠

科举制度下的功名和生业

嘉庆四年，漫长的乾隆时代刚刚过去，“怙宠贪恣”的和珅即被逮治赐死。从他家中抄出来的巨万财富使人看了目眩，以此律彼，读史之际便常常容易推演。然而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交，和珅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从来罕见罕闻”^①的殊相。以此度量那个时候的功名与富贵，大半不能切中彼界中人的本来面目。

自有科举制度以后，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一群群儒学知识分子通过读书考试脱颖而出，成为不同于编户齐民的官与绅。由此划出来的贵贱高低非常明白地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作为朝廷名器，由考试得来的功名又是一种与人间的生业和经济隔得非常遥远的东西，它们本身并不带有金气和铜气。因此，别尊卑而造成的不平等很难用来辨贫富，名器的价值与界限都在这里。虽说世人憧憬富与贵的同一，然而在近代化剧变来临之前，清代功名社会里的富与贵却往往是不对称的居多。

当北京正在查抄和珅的时候，苏南有过一次“杖责诸生之狱”。起因于债务的纠纷把成群秀才拽入官司，“掌嘴锁项，凌辱不堪”，斯文人剥尽体面，被弄得灰头土脸。于是清议鼓噪而起。一个在籍侍郎说：“诸生寒士居多，求贷于富户，乃事理之常。伊等或以教

^① 嘉庆皇帝语。见《庸庵笔记》三卷，《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

课为业，或以笔墨为生，无力偿还，亦是常分。赖有父母师保之责，正宜加以怜惜，或代为宽解，或再为分限，俾得从容措缴。即使伊等语言粗率，亦何至不能稍贷，乃至责扑寒士，以媚富户，实无情理。”^①这些话意在向杖责诸生的地方官讨公道，而说理之中又提供了一种实录，使人可以大概地了解到：在江南地区的贫富对比中，已从边沿挤入了功名社会的诸生们多数仍在穷窘之中，并因此而常常求贷和欠债，既被蔑视，又被同情。这种矛盾说明，功名是一回事，生计是另一回事。两者的不相吻合，会使朝廷给予绅衿的尊严变得非常脆弱。在那个时候，也有因贫穷而受到赞美的“寒士”。一个叫李巽占的定海诸生“授徒数里外”而“每食必归”，不肯吃东家的饭菜。“主人诘其故，泣不语。久之乃曰：‘家贫，母食蕃薯，何忍独食饭也。’”经学家焦循作《蕃薯吟》记其事，非常感动地说：“母食米，儿食薯，母心不豫；母食薯，儿食米，儿能不涕泣。海水涛涛浪拍天，中有斯人行独贤。”^②孝道自是美德，然而以“母食蕃薯，何忍独食饭也”衬映出来的孝道，终究使人感到凄楚。

从人泮到出仕是一条拥挤的狭路。成千上万的举子士人在这条路上疲惫地走掉了自己的大半生。嘉道年间颇负时誉的包世臣曾“六赴秋闱”而后成举人，继之又既韧且拗地十三次入都会试，等到最后歇手的时候已是六十一岁了，而进士一阶，仍可望而不可及。他后来由大挑试令江西，当过一任县官，但“年余被劾”，就此退出了官场。“六赴秋闱”和十三次入都会试，是数十年漫长而且困顿的岁月。一面是功名的天梯还没有爬到头；一面是“食指日增，世路日窄”，为了爬梯必须觅食。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他先后做过塾师、西席、幕客，佐戎务、佐河工、佐钱谷、佐刑名；常年流转于芜湖、武昌、江宁、扬州、常州、苏州、上海、崇明、淮安、济南、丹

① 《曝亭杂录》，343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 《清诗铎》，下册，697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阳,西面到过四川,南面到过广东,北面到过直隶。他留下了一长串风尘足迹,而在时人眼中却经常显出“自给不足”的憔悴。^①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功名社会里的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生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出入场屋,又一年一年地游学、游幕,劳碌于功名和生业之间。《冷庐杂识》说:“海宁徐楚畹学博善迁,乡荐后,困于公车,家徒壁立,以星命之学游历江湖三十年。”^②比之游学游幕的笔墨生活,一个以星相巫卜谋食的举人无疑更加落魄蹉跎。这个过程造出了成批不断流动的人口,也产生过催人白发的旅愁和乡思。袁枚作《随园诗话》,提到一个多年“作幕”的苏州文人“有得意句云:‘惟有多心消不得,又随一雁落江南’。每旅夜高吟,则声泪俱下。”^③他所说的“得意”,正是心头的一腔酸苦能够转化为文字的意思。显然,这种日子的滋味是非常寡淡的。半生羁旅的包世臣后来以“倦游阁”名居室、名文集,直露出长期漂游之后精神上的劳累和疲倦。他以自己的劳累疲倦憔悴困乏写照了功名社会中的读书人上坡时的沉重和蹒跚。

那些在艰难跋涉之后爬完天梯的人们便由绅而官,成了功名社会中的翘楚。虽说他们的翎顶补服光焰迫人,把朝廷名器之尊贵威荣演绎得非常辉煌,但光焰的背后常常可以看到局促。嘉庆十九年,在翰林院做编修的林则徐致书友朋,自述“近移寓虎坊之东,与浙绍乡祠对宇,鼕鼕戏鼓,终日扑门,而不免有冲途之累。新兼国史馆尚未办过书传。所劳者只此无谓之应酬,不了之笔墨耳。现就一教书馆地,拟到馆后清厘积纸,便当辞绝无益之事。”^④翰林院中的人多闲适,所以能优游于“无谓之应酬”。然而他们的俸

① 《包世臣传》,《包慎伯先生年谱》,《包世臣全集》,201、235、202、223、217页,黄山书社1991年版。

② 《冷庐杂识》,22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③ 《随园诗话》,上册,3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④ 林则徐:《致敬柬函》,转引自《林则徐年谱》,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禄显然经常不够用,因此,已经当官的林则徐还要兼做家庭教师,并在拮据之中天天与令人厌烦的锣鼓声相对峙。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是一个普遍而且长久的难题,一代一代的京官都在它面前显得气弱。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刚刚做了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在家书中禀告说:“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划。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迫强逼耳。”^① 这些父子之间说家常的话头无须矜持作态,也因之而愈能道出真相。后人读史,可以想见众多京官以举债为常态的模样。他们在债务丛中走来走去,“东扯西支”,脚下的路不会越走越宽。^② 所以,京外地方官馈送的冰敬和炭资虽然来路不尽清白,在京官们的眼中却犹如旱境中的云霓,可以寄托一点期望。但来自馈送的东西终究没有十足的可靠性,有时候眼中的云霓老是飘不过来,心头便会悒悒。同年十二月,曾国藩在另一封家书中说:“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③ 从秋天到冬天,落空的冀望化成了一片怅惘。在那个时候,林则徐和曾国藩还都是小京官。与他们相比,嘉庆朝的朱珪晚年做尚书做大学士,已是京官中的巨擘,然而言及生计,他和小京官们的拮据况味正在伯仲之间。一个与他时相过从的人记叙说:

乙丑除夕,余至公家,问公岁事如何,因举胸前荷囊示曰:“可怜此中空空,押岁钱尚无一文也。”有顷,阍人以节仪呈报曰:“门生某爷某爷节仪若干封。”公因谓余曰:“此数人太呆,我从不识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其谐谑如此。^④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10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② 同①书,8页。

③ 同①书,108页。

④ 《榕曝杂记·竹叶亭杂记》,105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这段记叙侧写出一个高官的清贫,以实例抉示了贵与富之间的不相同。这种不相同一使立朝五十年的朱珪身死之日“卧处仅一布被布褥,其别舍则残书数篋而已,见者莫不悲感”。^①他以个人的贫困显出了一种个人的清操,但由此折射出来的却是朝廷养官的吝啬和苛薄。一个不图法外之财的人,即使官居极品,也走不出穷境,其日行起居中的破洞和缺口遂不能不用儒学的道德定力来弥合。世人的起敬和“悲感”都在于此。苛薄能够磨砺道德,然而苛薄也能够消磨道德。嘉道年间,梁壬绍说:“余屡次入都,皆寓京官宅内,亲见诸公窘状,领俸米时,百计请托,出房租日,多方贷质。”^②他以同情的态度为京官们叹苦,但“百计请托”又说明,久处困乏容易使人气短,能够以淡泊从容表现一己之清操的人其实是不多的。因此,京官多穷并不同义于京官多廉。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久作京官的李慈铭曾在日记中因事发议,深致感叹说:“庚午同年来告:十二日方盛馆张乐公宴安徽巡抚裕禄。其弟编修裕德,庚午举人也,故宴之。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先往投谒,继以宴乐,冀获微润。彼外吏者分其峻削所得,以百分之一犖致权要,罄其毫末遍散部院诸司,人得锱铢以为庆幸。于是益冥搜广询,得一因缘,动色相告,趋之若鹜,百余年来成为故事。”他所描画的京城社会相,使人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受穷的京官们心头那一腔熄灭不了的利欲。利欲常常淹没廉耻和自尊,因此,与朱珪的淡泊从容相比,“百余年来”的京官大半都穷得十分猥琐。

在京师之外,数目众多的地方官们汇成了功名社会里的另一个群类。“昔之设官也以抚字,而催科次之;今之课吏也以催科,而抚字不问焉。”^③朝廷以催科为要目,天下的“外吏”便纷纷然以教

① 《郎潜纪闻初笔 笔三笔》,下册,33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两般秋雨庵随笔》,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③ 《守令》,《皇朝经世文编·卷十五·吏政》。

化为轻而以钱粮为重。吏治侵入了经济关系,使地方官经常要与银子打交道,被称作“守令”的州县官们因之而在世人眼中显得面目可憎。而催科衍生的浮收演为常态,又使取自民间的钱粮和运入国库的正供在州县官们的手里老是对不拢,其间被蚀掉的那一部分遂成为长久议论的话题。冯桂芬说:

由来开仓,多派丁壮守护大斛,此古之道也。今则斛不必甚大,公然唱筹计数,七折又八扣(斛自五斗四升起,约六斗止,两次七折八扣,即一石变为三四五斗),而淋尖、踢斛、捉猪(仓役格外任取米数囊入仓,乡民拒之,声如猪,故曰捉猪)、样盘米、贴米(排除米色,不出私费,即讲贴米)等犹在其外。又有水脚费、验米费、灰印费、筛扇费、廩门费,合计约值米一二斗。总须二石五六斗当一石。道光初元,御史王家相疏云:官以其私征米一石当正供七斗,民不堪命。不知三十年间何以遽增至此。^①

这段叙述以具体的细节记录了朝廷的催科演为地方官“私征”的过程。与正课相比,附加于国赋的那个部分显然更多些直露狰狞的勒取性。过手钱粮的州县官们也因此而显出了一脸的齷齪。在一个农业社会里,这种由“私征”而汇集起来的财富远不是个小数,它们应当制造出一个富裕的官僚群体。然而细看历史,由此而成显富的守令似乎并不多。龚自珍作《明良论》,非常明白地说过:“谓外吏富乎?积逋者又十且八九也。”^②“积逋”是一种负数,与富足恰成反义。而“十且八九”所对应的,则是那个时候的多数和普遍。他是一个留心时务的人,其观察所得无疑与冯桂芬的记述具有同样的可信性。然而以“私征”比照“积逋”,又说明了外吏的贫富比京官需要更多的解说。

① 《显志堂稿》,卷五,《与许抚部书》。

② 《龚自珍全集》,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嘉庆初年，洪亮吉说：官大省、据方面者“出巡则有站规、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赠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①可见由州县牧令用私征浮收得来的那些钱粮，其实是不归州县牧令私有的。在人与人之间的重重制约中，它们久已被当作官场的公产，并以种种名目由下而上地一次次分配。由此形成的，是一种俸禄之外的供给关系。而从州县官们手里取得了“包”、“规”、“礼”、“费”的府、道、臬、藩和督抚们，又须分出所得，从别的途径送出去。道光年间，一个由道员升任按察使的地方官进京觐见，花掉了不少银子。他在年谱中记述说：“即日进城拜客，困于酒食，外官之常态也。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尚阿）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②这种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把大块切成小块，从民间勒取的钱粮也随之而由近处流向远处。

以儒学的道理来衡量，私征浮收都是不义之财。局中人未必全无心肝，人人都乐于龌龊狰狞。然而私征浮收又长久地存在于吏治之中，既不为言路的弹劾所动，也不为时论的道德批判所动。做过多年地方官的梁章钜曾以阅历说甘苦曰：

今朝廷所设官司廉俸，一切银两，非扣俸即折捐，百不存一。然而官之室家赖之，亲友赖之，仆从赖之；而又以奉上司，而又以延幕丁，而又以迎宾客，而又有不可计

① 《清史稿》，11313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② 《道咸宦海见闻录》，80-9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度之需。计其所费，何止一端。官司自廉俸以外，如思展拓，何一非侵渔牟利之端？事实出于无可奈何。^①

清代以薄俸养官，又常常喜欢用“扣俸”“折捐”来弥补国库的不足。然而地方官的开支却要兼及公私两面。当两面都顾不过来的时候，局中人另辟蹊径，向廉俸以外“思展拓”便成为一种管不住的事了。因此，“侵渔牟利”大半不是为了致富，而是为了开销；来路不正的银子半耗之于私，半耗之于公。梁章钜自京官外放以后，转辗湖北、江苏、山东、甘肃、广西，由知府做到巡抚，是个饱更世故而熟识外省官场情状的人。他的话虽是一面之辞，但以事理而论，自有许多真实性。与京官相比，外吏以支配人力物力见胜，也以支配人力物力为累。是以私征浮收常常与千疮百孔相表里。嘉庆朝大学士王杰曾上疏论吏治，罗举州县的可恶和可悯。其中驿递一节说得非常具体：“州县管驿，可以调派里民。于是使臣乘骑之数，日增一日”，并“任意随带多人，无可查询”。及“差使一过，自馆舍铺设，以及酒筵种种糜费，并有夤缘馈送之事”。大抵“视气焰之大小，以为应酬之隆杀”。迎送之间，节节破费。“其他如本省上司及邻省大员，往来住宿，亦需供应，其家人借势饱恣，不厌不止。而办差丁胥，浮开冒领，本官亦无可稽核。凡此费用，州县之廉俸断不能支，一皆取之库帑，而亏空之风又以成矣！”^② 这个过程公私轱辘，地方官承当的差遣已辨不清分内分外，到头来只能用银子才能了结。由此造成的支出，最初当然是从浮收来的钱粮里开销的。但州县与州县的肥瘠不同，浮收所入也颇不相同。当这一类支出漫过了浮收所得之后，当差的州县官们便只能“取之库帑”，即侵蚀到归属国库的那些钱粮里去了。于是，普遍的私征浮收与普遍的积逋亏空相映成趣，组成了那个时候奇特的官场景观。嘉庆初期，御史张

① 《退庵随笔》，卷六。转引自《国史旧闻》，第三册，639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 《清史稿》，11088页；《清代通史》，中册，261页，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鹏展说：“州县亏空仓库，挪新掩旧，各省积弊皆然。近年间有督抚实力稽查，设法补缀一二，而一转手又已荡然。各州县见积习相沿，愈生玩狎，终无完补之日。”^① 虽说康乾盛世刚刚过去，而地方的亏空则久已为人熟视惯见。由“玩狎”一词可以想见，亏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之后就会有人在这个题目下做花样，黠者未尝不能脱身而走。然而玩狎只能转嫁亏空，不能消弭亏空。脱身而走之后留下的仍然是一个漏洞。因此，朝廷常常一层一层地追究这种官员与国家之间的债务：“令各督抚于地方官交代（离任），如限内未能交清，应将该员截留，俟款项交清，方准赴任回籍，并禁止私立议单。”^② 许多因公务造成的亏空，在这个时候都要用私产来偿还。官场的交代，往往演为一次次的清查和追赔。其间的愁状，与困于租税的穷民相去并不太远。道光十七年，“宁远通判锡纶病故，亏短仓库四万有奇”，结果在死后“抄家产”赔抵。一个奉命查抄的官员说：“余到宁远，见其门户萧条，孤寡号泣，实惨于心。所抄衣物，半属破烂，估值无几。”^③ 另一则记载说石门秀才赵屏山“精钱谷之学，在某大令幕中数年。某故后，遗孤尚幼，囊橐萧然，且仓库亏短甚多。后来者将以上闻，赵设计弥缝，复为经纪其丧，乞援于其素所识者，俾其妻孥得扶柩以归。”^④ 前一个故事里的“门户萧条”和后一个故事里的“囊橐萧然”，都写照了亏空下的生计破落。因此，旁观的同情常常在他们一边。

亏空和赔累都是吏治中的病象，然而在清代却久被视为官界常态。乾隆年间，湖南人聂继模曾给作外吏的儿子写过一封信，其中一段文字专论“赔垫”：“尔家书屡言办过军需，并未赔垫，此殊可

① 《清麓吏治五事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一·吏政》。

② 《清史稿》，3536～3537页。

③ 《道咸宦海见闻录》，30页。

④ 《冷庐杂识》，187页。

疑。湖南州县,无不赔垫者。况尔初任,几户穷民,额粮不满二万,又适逢荒歉之岁,肯于此时加一分恩,全活实多,兼可不误大件。人笑尔迂,我心弥喜。若云全不赔垫,则将取之谁耶?”^①这段话以仁者襟怀谈论宦途得失,二百多年以后依旧能够使人产生敬意。但若以功名论物利之多寡,则更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却正是他由“湖南州县,无不赔垫”而想见天下牧令,把赔累当作外吏本分的那些议论。从中可以读出一种世象,使人看到做官的不便宜。嘉道两朝的名臣陶澍曾提到过州县牧令易任之际往往有“勒接交代”。接任的新官须把前任的亏空认下来才能够受印。勒接之外,又有分配摊捐,名目有“等补”、“帮助”、“贴赔”等等。就像私征浮收得来的银子被当作官场里的公产一样,地方官为朝廷当差留下的亏空也在“勒”与“摊”之下成了公共的债务。本来应该算得清楚的帐目遂越弄越算不清楚。虽说这些规矩不合国家法度,却在官界通行已久,自成一套是非情理。然而不明不白地为亏空所累的人也随之而越益增多。他们中因赔垫而被抄家产者当然不会占多数,但因赔垫而破财则是题中应有之义。道光初,安徽布政使张师诚作《杜州县交代积弊议》,说到州县钱粮“节次清查案内,竟有以陈设玩器以及衣物等暂行作抵者”。^②“陈设玩器”和“衣物”一起被抵押入库,既说明了地方财政正在变成一本烂帐,也说明了当事人手头的银子太不宽裕。这些人未必没有勒取过不义之财,而悖人悖出之后,留得下来的东西却已经不多了。等而下之的还要靠家财来养功名。《清稗类钞》说,嘉道之际的朝官陈用光甚贫,而“家素封,以诸父仕宦,中落”。^③短短十个字的记述,说出了家族变迁的今昔和因果。从“素封”到“中落”,祖宗的产业多半是沿着赔垫

① 《戒子书》,《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一·吏政》。

② 《杜州县交代积弊议》,《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七·户政》。

③ 《清稗类钞》,第七册,3391页,原文作陈旻,据《清史列传》改,中华书局1986年版。

的窟窿漏掉的。做官做到这个地步,说来也委实有点悲哀。

自有官僚制度之后,清官现象和贪官现象就成为世间熟见的东西。由此引发的抑扬褒贬用人心划出了一种非常古老而又弥久弥新的善恶界限。然而在清代中国,地方官的清浊贪廉大半模糊漫漶,不易辨识。^①一方面,普遍的私征浮收常演为敛剥公行,使他们与经久不息的民间怨愤缠结在一起,在世人的指指点点中洗不掉一身污秽。另一方面,屡见的亏空和赔累又像无底的漏卮,使他们经常要面对公私交绌而不得不挪东补西,挹此注彼。这种矛盾使地方官们自由的人格空间非常狭小。他们当中会有人在取予之际内省良知而踌躇阨隘;也会有人踏着麻木的良知攫获捆载,长袖善舞而去。这两种人对比分明,但大约而论,在当日的官场里这两种人都是少数。嘉庆九年,皇帝与直隶总督对话论官界风气,以为“方今中外吏治,贪墨者少、疲玩者多”。这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人物俯视天下九年的结论。又过了九年,两广总督蒋攸銛应诏陈言,以一个疆吏的眼光言吏治,也说:“臣观近日道、府、州、县,贪酷者少而委靡者多。”^②所见非常相似。嘉庆一朝,国运居盛衰之交,当洪杨之役造出来的大批捐纳人仕者涌入官场以前,这些议论与清代吏治的真相大致相去不远。在上谕与奏疏中,“贪墨者少”和“贪酷者少”本意都是映衬“疲玩”、“委靡”之习久成风,并非旨在表彰。而以此观地方官的众生相,正可以见宦味之淡薄。嘉道之交,以经世之意究天下利弊的人物曾接着嘉庆和蒋攸銛的话头往下讲:“内外大小之臣,具思全躯保室家,不复有所作为,以负圣天子之知遇,抑岂无心,或者贫累之也。”^③“疲玩”和“委靡”因之而与功名社会的生业连在一起,合为一种深深的感慨。

① 清代盐官、河官和关税官多富。但这些都另有因果,此处不论。

② 《清史稿》,11350、11446页。

③ 《龚自珍全集》,30页。

清代中国造出了中世纪的最后—个盛世,不会久匮物力。然而与名器相对的财富却多在功名社会之外。黄钧宰说盐商之利曰:“扬州繁华以盐盛。两淮额引—千六百九万有奇,归商人十数家承办,中盐有期,销引有地,谓之纲盐。以每引三百七十觔计之,场作斛止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至汉口以上,需作五、六十不等。”以此计赢利,则两淮盐商岁入当在二千万两以上。^①这个数目已经超过了盛世期间户部库存银两的四分之一。^②由此孕育出来的是一批巨富。在小农经济的国度里,这些人曾长久地代表了奢汰和侈豪,并以奢汰和侈豪使功名社会的光华相形减色。—段出自诏书的文字说他们“衣物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家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尤甚。”^③财富太过集中,便会衍生出恣肆。能以多金而与盐商相埒的,还有包揽了对外贸易的行商。美国人亨特(W. E. Hunter)1824年来中国,之后,在广州经商近二十年。他所作的《广州番鬼录》—书时常以羡慕之心述及行商和他们的财富。其中—节说:“他们自己的住宅,我们曾去过几处,都是园林深邃,叠石为山,引水为湖,溪上架桥,圆石铺路,奇花异卉,极为幽静。潘启官的住宅,距商馆三四英里,临河而居,盛名尤著。他的私人宫殿中,有大批的仆役,包括侍役、门丁、信差,名厨与轿夫。”人间的春色,都被商人买到自己家里去了。与这种外观的靡丽相比,另—节以货币计家财,说得更为具体:“伍浩官究竟有多少钱,大家常常辩论。但是有—次,因提到他在稻田、住宅、铺店、银号与在英美船上的货物,在1834年,他计算

① 《金瓶浪學·卷—·盐商》。其中“—千六百九万”应为一百六十九万

② 乾隆三十七年,户部存银七千八百余万两。见《清高宗实录》,九—〇卷,23页。

③ 《清朝文献通考》,二八卷。

一下,共约值二千六百万元。当时的购买力约等于现在的两倍,以现在的钱币来说,他拥有五千二百万元。”^① 后来的那场鸦片战争,战败的中国在炮口勒迫下交出二千一百万元的赔款,国库因之而缺了一大块。若亨特的估算与事实相去不远,则伍秉鉴(浩官)一个人的家产就可以打一场鸦片战争。而在当日的行商里,像他那样的人恐怕还算不上首富。^② 盐商和行商都是以垄断致富的财阀。与他们相比,经营典当、票号、钱庄、船运的那些商帮更多些持筹握算的精刻和老辣,其世业也能够绵延得更加长久。在中世纪中国,这些人常常成为功名社会的债主:

古来交通不便,各省士子率由陆路入都会试,沿途川资概由票庄汇兑,然士子未授官以前,川资多不充足,而票庄因以贷付若干以助之,以图巨利。

而后,进入了仕途的功名之上又要继续举债:

按清国定制,凡授外官,国家并不颁给旅费,故有职者一旦外任,非数千金不能敷衍,若款无着,则不能赴辕任事,而票庄因之贷付若干以济其急。该官吏等不惟不计息之轻重,反感荷票庄之厚情。

这种借贷以自愿为前提,而吃亏的总是负债一方。盖“票庄付此等官金之利息,实骇人听闻。例如借金一万两者,仅交现金七千,其余三千作为扣息。日后该官吏偿还之时,仍以万金纳付。如此重利,该官吏等非不知之,盖实出于不得已耳。”^③ 举手投足之间,票庄收到了重利,而背债的朝廷命官们则被割割得体无完肤。嘉庆十四年,有一道上谕说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戴衢亨与京城德泰

① 《广州番鬼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270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② 近人梁嘉彬作《广东十三行考》，提到咸丰十年同孚行商潘绍光家资在一亿法郎以上。其时虽然已无十三行，但潘氏家私由行商一脉传来则是非常明白的。

③ 《中国经济全书》，第八册，101页，1908年版。

钱铺“交易数十余年，现在尚欠伊铺内银六百五十两”，^① 户部尚书管国库，是一个为天下理财的人，而其一身一家却久为钱铺债户，以贵比富，实多调侃。因此，后来魏源作《都中行》十三首，列“山西债”为其中之一，于此深致不平：“山西债，山西债，乘急居奇真市侩。京宦俸苦贫，外宦远选行邈迤。借贷无门典无质，惟汝西侩敢乘急。网罗一人天地窄，蝼蚁反被蛟龙食。”^② 在这种官与商之间的金钱交往中，容或有暂时的“感荷”，而长久留下的却终究是难以泯除的痛恶。

功名社会里的人都有一种守护名器之心，所以，他们大半不愿意用财富淹掉官界与商侩之间的贵贱之分。《履园丛话》说：“吾乡邹晓屏相国归田时，年已七十又四，一裘三十年仅存其鞞，赖门生赠遗以为薪水。其子光骏官徽州司马署府篆，有巨商某尝捐郎中，在刑部行走，其家出丧，以三千金为寿，乞太守一至为荣，往返再三，终不应。笑曰：‘岂能以阿堵物污吾家风耶？’其廉如此。”^③ 从不肯折节的清廉里透露出来的其实是世宦之家对商人的蔑视。在这种蔑视面前，捐来的郎中一点都不济事。然而，累积的财富毕竟是一种经济力量。它们自会推着商人越过贵贱之界。乾隆六次南巡，留下过许多与两淮盐商有关的故事。其中一则说：“某日，高宗幸大虹园。至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荫，惜无塔耳。’江（两淮总商江春）闻之，亟以万金贿近侍，图塔状。既得图，乃鸠工庀材，一夜而成。次日，高宗又幸园，见塔巍然，大异之，以为伪也，叩之，果砖石所成。询知其故，叹曰：‘盐商之财力伟哉！’”^④ 盐商用财力作法以谀帝王，遂使他们在帝王眼中变得妖

① 转引自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150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

② 《魏源集》，下册，679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③ 《履园丛话》，下册，639-640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④ 转引自《徽商研究论文集》，46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媚起来。那个曾一夜之间造出一座塔来的江春后来因“召对称旨”，也因捐输、河工、赈灾，“百万之费，指顾立办”而被赏加布政使衔，成为一个兼有财富和名器的人。^① 乾隆二十二年，“翠华南幸”之后还有过一次普降甘霖，使“承办差务”的“两淮商众”们沾润俱足：“伊等本身原有职衔，如已至三品者，俱著赏其奉宸苑卿衔；其未至三品者，俱各加顶戴一级。”^② 这些用银子巴结来的东西虽是虚衔，却分属名器，它们使本无功名的商界中人能以同样的翎顶补服周旋揖让于功名社会之中，被人尊为缙绅。后人述史，慨乎言之曰：“商为四民之末，盐商特邀圣主之知，或召对，或赐宴赏赉，优厚拟于大僚。盖盐商际遇之隆，至此而极矣；盐商奢侈之弊，亦至此而深矣！”^③ 其言词之中自有一股无可奈何的愤懑。与盐商相仿佛，同时的行商和其他巨商也大半身带道衔、盐运使衔、布政使衔，岸岸然以富致贵。功名社会里长久同一不起来的两种东西，在这些人身上一似乎轻易地联为一体了。

在功名造出来的不平等里，个人的财富本来并不是一种价值。然而财力之歆动人心，又常常使功名造出来的不平等显得非常空泛。道咸间名士金安清说：“乾隆中，江浙殷富至多，拥巨万及一、二十万者更仆难数，且有不为人所知者，惟至百万则始播于人口。”其间有大富王江泾陶氏“偶至苏阅绝秀班，优者厌其村老，戏谓曰：‘尔好观，何不于家中演之？但日需风鱼、火腿方下箸耳！’是时戏价需二百金。陶归，遽定一百本。闭之厅事使其自演，无人阅者，一日两餐，舍风鱼、火腿无他物。十日后，诸伶大窘，乃谢过始罢。”^④ 诸伶以口舌轻薄自取其辱，本无可悯。但陶氏以二万金掷

①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四·人物·才略》。

② 高晋等：《南巡盛典·卷六十九·褒赏》。

③ 王守基：《盐法议略》，《长芦盐务议略》。

④ 《水窗春吃》，卷下，42~4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倒诸伶，洋洋乎以富而傲，表现出来的正是一种自负财力而睥睨一时的气概。另一个江南“富翁”更刻薄，“尝谓人曰：‘钱财，吾役使也；百工技艺，吾子孙也；官吏缙绅，亦吾子孙也。’人有诘之者，富翁答曰：‘吾以钱财役诸子孙，焉有不顺命者乎？’”^①他用钱财评点天下，目中已全无贵贱尊卑之界。时人叹为“语虽刻薄，而切中人情”。^②这些都说明人间的财富能够自造声势。因此，天下财力多归于商，则以士、农、工、商序四民往往会靠不住。

自近代中国的开新之士倡商战以来，贤者多热心为历史上的商人鸣不平，以“抑商”致讨。然而读史至清代的功名与富贵之际，则颇疑过申“抑商”之说，或未尽得真相。^③道光间沈垚作《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说过一番非常醒目的话：“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于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能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④这一套道理里的许多东西都是可议的，但抑士扬商的意思却非常明白。沈垚以经学知名公卿间，是文苑传中的人物，这些话都可以作为思想史上的资料。商人之备受出格恭维，表达了一个文人对富与贵的一种称量。显然，在“天下之势偏重于商”面前，功名社会之尊有时而穷。

①、② 《履园丛话》，上册，197页。

③ 陈长华君作《“抑商”质疑》（《史林》1995年第3期），先揭此意，思而有得。

④ 《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

二百年人口西迁的历史因果

如果在读清史的时候勘对历史地图,那么,很容易发现,出现于乾隆末年至咸丰初年的湘黔苗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与广西金田起义,都集中地崛起于东经 110 度附近的中南山区。这种屡现的历史迭合是一个富有内涵的题目。由此切入,可以见二百年人口西迁的历史因果。

—

清代人口西迁,主要是指金田起义以前的两百年间,中国人口从东南地区向西南地区所作大规模迁移的历史过程。今天被泛称为西南地区的川滇桂黔四省,在明清之交曾长久地延烧过熄灭不了的兵火。自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奢崇明之乱起到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之乱芟平,中经张献忠五次入川与南明军长期抗清,六十年间厮杀、屠戮、践踏、蹂躏连绵不断,成为战乱蔓延之区。当兵燹终于过去之后,这个地区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一片残破。四川汉中一带,在昔“烟户稠密、无地不耕”,此时却“弥望千里,绝无人烟”,^① 四顾荒凉。在那一片广袤的地区里,类似的景象比比皆是。六十年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使川滇桂黔四省人口在全国丁

^① 乾隆《续商州志·卷三·食货志》;刘余洪:《旱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

口总数中由万历六年(1578)的百分之十降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百分之一点六,仅四川一省就由明末六十八万余丁减少到清初的一万八千五百丁。嘉庆《四川通志》追叙当时情景,叹为“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如果把这些直观的描述换算作统计数字,那么,康熙二十四年(1685)时,西南四省的人口密度是东南八省(江浙皖赣闽粤湘鄂)的三十四分之一,是华北六省(冀鲁豫陕甘)的二十四分之一。显然,这种由战事造成的人口凋残将会是社会经济的长久失调。

与此成为尖锐对比的是,三藩之乱结束以后,全国总人口的迅速增加。从康熙二十年(1681)到咸丰初年,中国人口的总数大约增加了三亿一千万。其中,仅东南八省就增加了一亿八千万,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在一百七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地区成为中国人口压力最重的区域。但这一地区的土地资源却自宋明以来已被广泛开发,在几百年时间里一面是人口的日见其多,一面是余地的日见其少。有些地方,《宋史》已称“虽饶确之地,亦耕耨殆尽”。这是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却不能不导致农业人口日益过剩的社会后果。当东南与西南的人口密度存在着一种悬殊落差的时候,过剩的人口由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移动,就会成为不可阻遏的潮流。乾隆年间,由地方官起家的兵部尚书甘汝来曾以广东为例指述说:“潮惠二府,嘉应一州,所属之县或系层岩叠嶂之区,或系海边斥卤之地。此两府一州生齿最繁,田畴甚少,耕佃资生之民,终岁劳苦,止供输租,不敷口食,所以一闻川省田土肥美,欣然欲往。”他所描述的是一种自发趋势。这种自发趋势被拿到朝廷里来讨论,又往往会化作政府的自觉导向,于是而有人口西迁的漫长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最早,持续最久的一次移民高潮后来被称作“湖广填四川”。自顺治十年(1653)战火平息以后,外省人口越来越多地涌入四川盆地,此后绵延不绝,长达半个多世纪。其间,

从康熙三十六年(1697)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仅湖南零陵一县就有十余万人移民入川。^①至雍正五年(1727),一年当中就有“不下数万户”的楚粤移民逃荒入川。^②这是一股寻求生存空间的人流,它们在荒芜的土地上开始了自然经济下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开始了人口的生产 and 再生产过程。迨乾隆八年(1743),原本空旷的川省遂“无荒土可辟”,以至朝廷不得不劝阻外省人口入川。即使如此,在以后的五年里“赴川就食者”仍多达二十四万。当然,这些人已是第一次移民高潮的余波了。

五十多年移民之后,四川盆地已无余田可耕。但相邻的川陕楚山区却仍然地旷人稀,除少数河谷盆地有人移垦外,连片深山老林“实无一人一民出作其间”。虽说山区比不上盆地,但对贫无立锥之地的人们来说,山区毕竟提供了他们所匮乏的生息之地。于是,向川陕楚山区的移民,形成了人口西迁的第二次高潮。乾隆三十八年(1733),湖北巡抚奏告说,鄂西“郧阳、施南二府所属向多荒地,近年户口日繁,流寓人众,所在开垦”。稍后,陕西巡抚也奏报朝廷,乾隆四十三年(1778)和四十四年(1779),因两湖被灾而流入陕南汉中、兴安、商州三府的灾民不下十余万人之多。此后,大批移民不断地西迁,不断地落户,到嘉庆初年,侨寓川陕楚山区的外省移民已达数百万人。与川鄂黔三省交界的湘西地区,本被称作“苗疆”。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废除“苗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以后,苗汉之间的空间界限被撤除了。西迁而来的汉族客民遂纷纷深入当地置业落户,成为这个时期移民潮流的另一个滞留地。其间,仅永绥一厅在乾隆年间就增一千九百多户,大约近万人,以至于有的地方极少土著,人民多为内地迁人者。

①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五册,336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② 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第2分册,2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从嘉道之交起,接纳过大批客民的川陕楚山区也已在土地资源与人口的结合上渐趋饱和,但来自东南的移民却并没有断流,他们只能继续向西迁移,走向云南、广西、贵州。于是而渐渐形成第三次移民高潮。在云南,自嘉庆以后,几乎每天都有湖广川黔等省流民,百十成群地前往偏远的开化、广南二府,靠租种山地谋生。在贵州,时人记叙道光年间由湖南入黔的移民流说:“一路扶老携幼,肩挑背负者,不绝于道”。^①在广西,则有过“乾隆以来,东省潮嘉氓庶挈妻抱子,寄托我疆,布满原野”^②的记载。具体地说,当时粤闽移民多溯西江而上,散居于桂南一带,而湘赣移民多沿湘江,过灵渠,散居于桂北一带。到咸丰初年,客籍已占通省人口的十分之六七。^③东南地区日益沉重的人口压力,使西迁桂滇黔的移民潮一浪接着一浪涌动,直到广西金田起义与云贵少数民族起义相继爆发,才嘎然而止。

由三次移民高潮形成的漫长西迁过程,带来了西南地区人口数量的巨大变动。以四川一省而论,从一六八五年到一八五一年的一百六十多年里,西来的移民与他们的后裔使这个地区的人口增加了二千二百二十万左右^④。在同一时期里,属于川陕楚山地区域的陕南汉中、兴安、商州三府与鄂西郧阳、宜昌、施南三府,约增加了四百六十万余人。^⑤另外,在湘西地区的三府(永顺、辰州、

① 罗绕典:《黔南职方经略》卷一。

② 光绪《贺县志》卷一。

③ 《清吏列传·周大爵传》,孙玉庭:《延厚堂集》,《奏陈地方情形疏》。

④ 对这一数字的精确性是可议的,但它提供了一种大概的规模。参见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分册》,58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28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⑤ 在1820年时共有人口五百七十五万人(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404、4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据史料记载“川陕边绕,土著之民十无一”(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现以外省流民占当地总人口十分之八的比例推算。

沅州)四厅(永绥、乾州、凤凰、晃州)一州(靖州),因移民生聚而增长的人口至少在九十六万以上。处在更加僻远的云贵两省,至金田起义前后其总人口已达一千七百万,其中外省移民要占五分之一,约三百四十万人。^① 同期广西人口为七百八十二万。^② 若以三分之一估算,则因移民而增的人数就有二百六十万。总算起来,到咸丰元年(1851年),包括川滇黔桂四省与陕南、鄂西、湘西三地在内的整个西南地区,因人口西迁而输入的移民及其后裔有三千三百万人左右。

千百万移民涌入西南地区,不能不对西南地区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方面,集群而来的移民以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大大加速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于是出现耕地大面积增加、农业与手工业生产跳跃式发展。西南四省因之而成为全国又一个重要的经济区域。其中,四川一省在雍正年间已妥妥乎成为全国最大的余粮产区。“于是川米贯于东西,视楚米尤多”,遂使“东南各省均赖其利”。^③ 来华的德国旅行家李希霍芬在1870年说:“正常情况下,四川显得处处存在着对生活物资充裕的满足和幸福,这在中国其他省分是不常见的。”^④ 无疑,这些描述反映了一种田园之乐。

但移民的存在是靠胼手胝足来支撑的,其中的艰难困苦远远过于田园之乐,于是便产生了问题的另一方面。

① 李中清:《1750年至1850年中国西南的人口增长粮食和供给》,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研究集刊》1985年第2期,172、180页。

② 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262页。

③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四,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乾隆上谕。

④ 转见何炳棣:《1368—1953 中国人口研究》,143~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二

乾隆年间的《洵阳县志》在评述移民川陕楚山区的客民时说：“舍沃壤而趋饶土，伐木栖山，刀耕火种，岂其情哉？特以生齿日繁，口分之田，豪强兼并”。笔端流露的是一种同情。

东来的移民初入异乡，面对的是“邑境平田无几，又多沙磧石碎，余尽属荒山，土著者不能垦，则课之流寓”^①。他们在异乡能够得到一块上地，但山高土薄，长不出多少稻米菽麦。山地的贫瘠与移民的众多成为一种突出的矛盾。在移民与山地的结合过程中，由异域传入的玉米便在不知不觉中被广泛引入西南的山区。它是五谷之外的第六种粮食作物，高产耐旱，并可以在陡坡生长。这些优点，使它很快成为西南山地的主要农作物。

玉米的广泛种植，一面促成了山区人口容量骤然大增，他们在古木丛篁的深山穷谷中辛劳力作。《栈道山田》一诗说，“山中有客民，乃与造物争。利之所在何轻生，悬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锄，人力所至天无功”。从而“深山遂谷，到处有人，寸土皆耕”。但另一面，越来越多的移民毁林垦荒，又大规模地破坏了自然生态。时人记述说：开荒之初，其“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②。所种包谷“高至一丈许”可谓“种一收千，其利甚大”^③。而“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存石骨”^④。所种玉米高仅二三尺，产量大减。严如煜的《棚民叹》写出了移民们的悲哀和愁苦：“远从楚黔蜀，来垦老林荒”，“指望收成好，满篝歌穰穰”，谁知山地薄，“一年肥于肪，三载五载后，硗确铧刀鋌”；“至黍

① 嘉庆《山阳县志·卷十·物产》。

②、④ 嘉庆《汉中府志·卷二十一·风俗》。

③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

两三尺,荞麦一尺强”;“荞落黍花萎,青风不生浆。磊磊紫洋芋,蒸馍当长皇。籽种不能谷,借债几时量?辛苦开老林,荒垦仍无望。”“地势本如此,丰歉宁能长?”^①

生态环境一旦恶化,所带来的便是一个人口迁移长久不定的过程,处在这个过程中的移民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徙数次。并非他们好动,而是大自然不允许他们不动。千辛万苦垦出的山地,只要“偶被雨水冲刷”,便会一夜之间成为不能再耕的“石田荒山”,迫使人们不得不另寻山地耕种。这种游耕式的生产方式,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快毁林开荒的速度和水土流失的程度,移民者越穷越旱,越垦越穷。

移民背井离乡而来,又在频频的灾难中跌仆起落。背井离乡产生的孤独渴求群体之间的互助;灾难中的跌仆起落又渴求群体之间的精神慰抚。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匮乏为白莲教的传播提供了十分适宜的社会土壤,作为流传于下层社会的秘密教门,白莲教能给人以物质互助,也能给人以精神慰藉。“人彼党伙,不携费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②。“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以行天下”^③。并且“煽惑山民,称将咒念经可免劫余,立登仙佛”^④。对于困苦无靠中的移民来说,这些东西无疑都具有吸引力。由于惯用游耕抛荒的生产方式,山地移民有点近乎游民。与宗法制度下的农民相比,他们“或徙或居,若鸟兽之无羁缚者”^⑤。“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⑥，“呼朋招类,动称盟兄”^⑦,甚至连“姓亦子虚

①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

② 严如煜:同①书,卷十四。

③ 周凯:《内自讼斋文抄·卷一·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④ 同②书。

⑤ 卓秉怡:《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以处》。

⑥ 同②书。

⑦ 同②书。

乌有之类”^①。对于地方当局来说,这些人“转移无定,来去不常,故地日辟而不能升科,民日增而不能编籍”^②,是一批国法难以管辖的人。“保正保甲相距恒数里数十里,詎能朝夕稽查”^③。吏治不到的地方天然地为秘密会社留下了纵横驰骋的场所。从乾隆五十四年(1789)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短短数年之间,白莲教各支派就在川楚陕广大山区获得了成千上万的信徒,可以轻易地一呼百应。

白莲教使散布于满山遍野的移民汇聚为一种组合的社会力量,这个过程又会汇聚移民们在长期困苦中滋生的愤懑和郁怒。当他们在神道的感召下聚为一团的时候,正好面对着乾嘉之交“山内连岁荒旱”的天灾。这次长久持续的灾荒,使开山的移民颗粒无收,又因粮价暴涨,使本来“资木廂、盐井、铁厂、纸厂、煤厂佣工为生”的移民“无资以生,器然不靖”。天灾使他们更紧地集聚起来,而“集聚之众,不能复散,纷纷多事,防范最难”。只要“一二奸民倡之以吃大户”,众多的饥民便会“蚁附蜂起,无所畏忌”。^④另一方面,迁移过程中久已存在着土民和客民的矛盾。土民中的痞棍常与差役勾结,“无风生浪,遇有棚民有事,敲骨吸髓”,而“山民受其凌虐,无可告诉,无为申理”^⑤,怨愤日积。这种矛盾因天灾带来的普遍贫困而激化。加上乾隆五十九年(1794)朝廷以霸道治白莲教,对各地教徒厉行搜捕屠杀,而官吏乘机罗织,“不遂所愿,即诬以邪教治罪”^⑥,使天灾造成的社会动荡因人祸而益趋剧烈,终于逼成了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

①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

② 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六十四。

③ 同①书,卷十二。

④ 同①书,卷十八。

⑤ 同①书,卷九。

⑥ 《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九,梁士国:《论川楚教匪事宜疏》。

历时九年的白莲教起义带有明显的山地特点和山民特点。时人谓之“川楚接壤一带大山，素习邪教之人，处处皆有”。“山僻村庄，邪教尤多”。^①起事之后，“行不必裹粮，住不借棚帐，党羽不待征调”，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有人“为之向导负运”，而且一茬接一茬源源不绝。“此番各股贼匪窜过郧西、商南、商州一带，随人逆伙者不下数千”，^②官兵常常眼睁睁地看着造反的白莲教徒们“倚恃老林无忌惮”，“万山之中任奔走”^③而越趋叹息。

但是，对于转战数省的农民武装来说，山地既提供了屏障，也造成了限制。提供屏障的东西同时也是造成限制的东西。在一个交通闭塞、地瘠物贫的环境里，自然界不可能为那么多武装的人群长期供给生存的物资。当最初的激情过去之后，这种因物资短缺而造成的困乏就会成为时时悬在头上的灾难。嘉庆四年（1799）大巴山区一战，白莲教中的人们饿死的比战死的还多。时人记叙说：“贼深入老林，无从觅食，饥死尤众。时久雨泥泞，老林冬雪未化，贼冻死者与饥死等。”^④这种困境曾把白莲教武装逼出山区，涌向江汉、关中与成都平原。其兵锋一度直指武昌、西安和成都。但在这片开阔的土地上，还没有那么多过剩的人口压力。究其底里，正是西迁的移民把这个地区的压力带到了川陕楚山区，因此当川陕楚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这个地区的社会矛盾却远远没有突破界限。白莲教造反者在这个地区找不到像山地里那么多的响应者，所以他们只能在优势的官军面前迭连失败，终至渐灭。

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川陕楚山区的大规模移民也从此日渐低

① 《军机处录付奏折》革命运动类，秘密结社，卷号 1989(6)，嘉庆二年四月二十五庆成奏。

② 以上引文均引自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③ 《清仁宗御制诗初集》，卷二十六至三十一。

④ 石香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四。

落。因为镇压了起义的朝廷并不能恢复那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道光以后,“高山棚民一往而空”,“山内连年饥荒,地主流徙他方”。^①“川楚客民之有家可归者皆已迁回原籍”^②。与曾经出现过的移民潮相比,显出来的是一片苍凉。

三

与川陕楚白莲教同时轰然而起的,还有湘黔苗民起义。自改土归流以来,外来的汉族客民曾先后移居被称作“苗疆”的地域。至乾隆中叶,移民益多。这个过程带来的苗汉杂处,造成显著的社会变动,与生产技术传播同时产生的,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错综化与尖锐化。这种错综化与尖锐化是普遍的,尤以湘西镇道直辖的凤凰、乾州、承绥三厅为最突出。

镇算三厅是湘西苗族集中聚居的地区,曾长久地被一道数百里长的边墙隔离。处在封闭之中的苗人社会“有族属,无君长”,进化相当缓慢。因此,外来客民大批迁入,输来的不仅仅是人口,而且与改土归流交叉在一起,带入了另外一种社会制度。由此引起的震荡是不容易平息的,对于朝廷委派的流官来说,客民来自内地,久沐王化,比之陌生的苗人当然更易沟通。因此,他们常常自觉地鼓励客民深入苗疆落户,并且委之以甲长、保正、百户、寨长之任,以期呼应之效。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偏斜,由此派生出来的,是地方当局在苗汉之间的两失其平:“一任客民肆意欺凌置之不问,以致苗民仇激生事”。^③不仅如此,流官与客民中的痞棍人物还常常借保甲连坐法株连罗织土著苗民,使之冤抑莫伸。客民借

① 《佛坪乡土志》户口,张鹏飞:《来底堂文集》,卷二。

② 民国《镇坪县新编简要县志》。

③ 《苗匪档·乾隆六十年二月初五日内阁奉上的谕》。

助官方权力而势张,其结果则是苗汉之间的感情日益恶化,仇恨日益加深。

在经济交往和经济活动中,苗汉之间的这种民族矛盾又常常与阶级矛盾交错在一起,并因此而越益激化。这主要表现在客民中的一部分凭借自己的优势,用封建经营方式掠取苗民手中的土地。归纳起来,其常用的办法主要有:(一)代办田赋。即运用充当保正、寨长的利权之便,与官府结纳,倍加苗民之赋,并通过代办田赋使苗民与国家的纳税关系转变为苗民与自己的债务关系,这种债务关系以土地为抵押,一旦债务逾期,就马上收取土地。这种方法,明显地表现了政治利益向经济利益的转化。(二)商品交易。即利用苗民不谙交易之道的弱点,事前将日用什物高价赊卖给苗民,令秋后还谷并以土地作押。秋后无力还谷的人遂不得不交出土地。这种方法则具有显目的欺诈性。(三)放高利贷。自然经济下的天灾人祸会永远制造出困苦无告的借方和残酷盘剥的贷方。苗民一经举债,便难以摆脱高利的无情剥削:“往往收获甫毕,益无余粒。此债未沮,又欠彼债,盘剥久之,田地罄尽。”^①用这种方法勒取土地,表现了赤裸裸的掠夺性。

一部分客民因此而致富,成为移民中的地主阶级。时人以永绥厅为例,记载过这个过程:“居民自内地迁人者,家计淡泊者多,历数十年来,或买土开垦,或贸易经营,渐觉充裕。”^②而众多的苗民却在同一个过程中沦为佃农。永绥“环城外寸土皆苗,不数十年,尽占为民地”^③。“是以苗众转至失业,贫难无度者日多”^④。“在客民之侵占日见其多”,而“苗疆田地日见其少”。这种变化本

① 严如煜:《苗防备览·卷二十二·杂识》。

② 宣统《承绥厅志·卷六·风俗》。

③ 魏源:《圣武记·卷七·乾隆湖贵征苗记》。

④ 和琳:《奏拟湖南苗疆善后六条折》(嘉庆元年)。

质上是一种阶级矛盾,但由此产生的苗汉“积忿相仇”,却首先表现为民族矛盾。曾经用暴烈手段对付汉族移民的苗人后来说:“实因苗子的田地都被客民占了去,小的们不服,因此起事烧杀客民。”^①

改土归流之前,苗族聚居区久被视为化外之地,苗民“居住深山穷谷之中”,时需“打牲防兽”,“比户皆藏”刀矛火铳。一面是不讲王道只讲霸道的官府;一面是人人习武而不喜以口舌争是非的苗人。酿积已久的民族矛盾遂不能不发展为武力与武力之间的冲突。于是而有乾隆六十年(1795年)湘西镇筵三厅与黔东松桃一厅的苗民暴动。随之,“穷苗闻讯,无不攘臂相从”。^②很快聚合了近十万人之众。从初起到扑灭,前后历时十二载。

乾嘉之间的湘黔苗民起义被扑灭后,苗族人口一时锐减。镇筵三厅的苗寨数量从四千减至一千二百,人口从近四十万降为十一万五千,减幅达百分之七十以上。^③苗族聚居区的范围也从近两万平方公里压缩到四千平方公里左右,减少了百分之八十。^④当局在胜利之后用赶苗夺地的残酷手段,在湘西苗族聚居的七个厅县安置了十万余户流民,为外来人口的迁入腾出了空间。这个事实,表现了人口西迁中的悲剧色彩。

四

川陕楚白莲教起义失败之后,东南的移民潮流转入了广西、云南、贵州。西南边陲,素称地瘠民贫,夷多汉少,本不是一块移民的乐土。嘉道年间,东南各省过剩的人口却数量越来越多,时人谓之

① 《乾隆六十年苗匪档》,吴八月、吴三保等起义首领被捕后的供单。

② 和琳:《奏拟湖南苗疆善后六条折》(嘉庆元年)。

③ 严如煜:《苗防备览·卷三·村寨篇》;《凤凰厅志》,卷十一;《永绥厅志》,卷六;《乾州厅志》,卷十一。

④ 转见吴荣臻:《乾嘉苗民起义史稿》,15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①。因此，涌动的移民潮流老是息不下来。而潮流一旦涌动，总会千方百计地寻求一个宣泄的空间。于是，向西南边陲迁移的人口既带着很多希望，也带着很多盲目。以贵州为例，虽然那里“已无不垦之山”，“且地多烟瘴，新徙之民不服水土，辄多死亡”，但外省“极贫之户仍多搬往，终岁不绝”。^②

就桂滇黔三省而论，云贵两地是中国山地面积最大的区域（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山地限制了农田面积的扩展，也限制了移民人口的增加。相比之下，广西的山地少一些，平地多一些，而且有西江湘江与湘粤贯通。因此，迁人广西的客民便非常自然地要比云贵两省更多。

乾隆以前，广西本是地广人稀的宽乡，从那个时候起，来自广东的移民便源源不断地迁入。他们“男女俱勤农事，不憚辛劳，故春耕秋获较他田倍利，有田者，咸愿佃与耕种”，造出了一片繁荣。除了务农之外，还有以经商为业的，当时的桂林，“城内外商贾远集，粤东江右人居多”，梧州也是“商贾輳集，类多东人”。^③ 一时称为“无东不成市”。

但时至嘉道之际，总观广西一省，能供农耕的土地在西江沿岸区域约占百分之二十，丘陵地区约占百分之十，桂西山区则不足百分之五，^④ 宽乡已经不再宽了。从自然经济的意义上说，广西地貌虽好于云贵，但与涌来的人口相比，可耕之地仍形见绌。因此，移垦的趋势是一步一步地由地势低平的西江沿岸，转向地势高峻的桂西山区，以至“深山穷谷，居住俱系来人”。在后来的历史叙述

① 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106页。

② 贺长龄：《复奏汉苗上司各情形折》，《耐庵奏议存稿》卷五。

③ 此数处引文引自光绪《潯州府志》，卷五十，《临桂县志》，卷八十，同治《苍梧县志》，卷五。

④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华南地区经济地理·广西》，7页。

中非常有名的桂平县紫荆山区，“延袤七百余里，深山密箐，人迹罕到，惟粤东无业贫民利开垦者往焉”。^① 由于山多田少，不敷耕种，许多人不得不以烧炭种蓝或挑运为生，无疑，这些人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中的过剩人口。

从地广人稀到人多田少是个经历了漫长岁月的过程。但当人多田少的局面一经出现，就会使人口矛盾牵动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其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封建租佃关系中地主与佃农的利益愈益对立。当时人记述说：“山间佃众田稀，供不应求，谋耕急切，则租约必重。岁晚供所获之半于田主，自非岁时大变，则成分不能稍减。”“租或短缺，则易佃之声立至。”^② 与东南地区相比，广西的家庭手工业非常落后。当地人说：“布帛之利遍天下，惟吾乡所出甚稀。”^③ 显然，在那里是谈不上以织助耕的。而山地客民尤甚，“处舟舶不通之地，力穡而外谋生之路少”。于是，租田成为唯一的狭路。佃农“匪惟租不敢负，且或先期而缴，或奉钱作质。因是鬻及儿女者，往往有之。斯山居之农所常见”。^④ 但佃耕到了不得不“鬻及儿女”的地步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它们一定会召来反抗和动乱。嘉庆十一年（1806）“紫荆山客民谋为乱”，正是社会矛盾在激化过程中喷涌出来的一股愤火。它预示了四十年之后声势更大的熊熊烈火。

移民人口所造成的压力不仅激化了阶级矛盾，而且激化了土（著）客（民）矛盾和民族矛盾。土（著）客（民）都是汉人。但前者“先民均系湘江、江南、山东等省之人”。他们入桂时间较早，可以追溯到宋元，甚至秦汉。由于世代居广西，比之后来者即为土著。这些人往往先得天时地利，占据了境内大部分平坦易耕之地。明

① 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二），2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②、④ 民国九年刊《桂平县志》，卷二十九。

③ 龙启瑞：《经德堂文别集》，卷下，《致各府绅士书》。

清以后迁来的移民则多半出自粤湘闽赣四省,并以广东客家人为主。他们因迟来而不得天时地利,入桂以后很少能在平原立足,多数不得不移垦“僻处偏隅”的山区。而一批一批汉民的蜂拥而入,又无情地迫使原先世居其地的少数民族从平原退入深山。先到的土著、后来的客民与少数民族都在同一片有限的土地上求生存和发展。当客民初来而荒地有余的时候,土著居民多半取旁观态度,很少有人断断相争,迨移民日多一日之后,土地遂成为土客争斗的焦点,并由争斗而相仇视,相对峙,形成一种以方言、地域、宗族、姓界为划分彼己标准的特殊社会冲突。这种冲突因土客双方的势均力敌而得以强化和延续;又因土客双方的阶级分化而变得错综复杂。由此划出的界限,使众多客民常“不与村众为邻,筑屋另居,男女力作,不变乡音”^①而自成一团,既注重乡情族谊,又好勇斗狠,“一呼百诺,荷戈负锛而至,誓不畏死”^②。一般地说,客民多贫苦,但也间有靠经商、放高利贷而富的地主,他们在土客冲突中常常把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也带了进来。这就使土客矛盾从一开始就与多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互相牵动,愈演愈烈,造成了广西社会的动荡与分裂。

当广西社会日益走向动荡与分裂的时候,作为广西移民主要源头的广东和湖南两省,却在鸦片战争之后酿发着更尖锐的社会危机和更沉重的人口压力。五口通商以后,外贸中心北移,原来由广州至九江与湘潭的两条商路因之而急剧衰落。这一变化,把沿线近百万挑夫商贩及依附他们为生的人们驱入了失业的茫茫苦海之中。加上连续九年的洪涝重灾,又从农业中析出一部分不能糊口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因鸦片战争而募集起来的数万广东壮勇

① 梁廉夫:《潜斋见闻随笔》,《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17页。

② 同治十三年《潯州府志·风俗》。

一旦遣散,则“归根谋业者少,相聚为盗者甚多”^①。湖南屡遭天灾之后,不少地方“堤垸尽溃”,“禾稼无收”,“惨遭饿毙和疫死者,不可胜计”。^② 下层社会因之而在困境中聚会呼应,“会党之多,人所共知”。与两广交界的湘南一带“万山丛薄,尤为匪徒卵育之区”。^③ 在湘粤官府的缉捕之下,这些由饥民变为流民,由流民变为暴民的人们往往沿着熟悉的移民西迁路径向广西走去。一种记述说:“自禁鸦片起衅,中国与泰西构兵。广东召募乡勇,防守海滨。军务平,遣散之勇,半系无业游民,流入广西,剽掠为生。”^④ 另一种记述说:“道光二十七年,粤西岁饥多盗,巡抚郑祖琛严檄捕治,不能骤戢。适有湖南叛民雷再浩扰至粤境,盗乃益肆,柳、庆、思、浔及南宁、梧州各郡尤甚。按察使劳崇光驰往剿抚,南路稍平。二十九年,湖南新宁县民李沅发复作乱,窜及柳州、桂林。三十年,沅发遁回新宁,即就擒戮而粤贼蜂起,有陈亚癸、颜品瑶、欧祖润、山猪箭等各率党羽数千,四路劫掠。此外未著名者尚数十股。”^⑤ 武装起来的“乱民”大批涌入广西,是饥寒交迫之下一种特殊的人口迁移。但它又把外省的人口压力与尖锐社会矛盾一起带到了广西。于是,广西成为南中国种种矛盾的汇聚地。远在嘉庆年间,已有天地会众“潜人西省,与依山附岭种地之各省游民结伙抢劫,兼勾引东地愚民,或拜弟兄,或拜添弟”^⑥ 之事,遂使广西拜会之风“日炽”,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不宁的骚动还只是一股潜流。由于湘省入桂的雷再浩与李沅发都以天地会为号召,广西本来就有的天地会潜流在呼应之中“寝成燎然之势”。但由于天地会

① 转见《太平天国学刊》,第四辑,399页。

② 《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16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备陈民间疾苦疏》。

④ 《粤寇起事记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一辑,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⑤ 《平定粤寇记略》,《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一册,1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⑥ 《清宣宗实录》,卷十二。

山堂纷多,其起事多半各自为战,旋起旋落,他们造成了一种声势,却未能聚成一种磅礴的力量。

当旧式的天地会以自己此起彼伏的暴动吸引了官府注意的时候,新式的拜上帝教却日益广泛地在广西穷乡僻壤中蔓延滋长。这种蔓延滋长又常常与土客矛盾缠绕在一起,并因而愈益产生凝聚力和感召力。洪仁玕后来回忆金田起义说,在洪秀全传教的过程中,发生过客家人与本地人的大规模械斗,往往致客家人屋宇被焚,无家可归。“在此患难中彼等央求拜上帝会徒之庇护,此时拜上帝会徒人数约有三千,散居于各县。客家人甘愿遵守教规典礼因而避去仇人之攻击,且得物质之接济”。随后,“不特有患难之村民,而且有被官兵击败之贼匪,均视拜上帝会为逋逃藪,老幼男女,携眷挟财产大队加入”。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增固了洪秀全用拜上帝教为人间造天堂的雄心。后来久被历史学家评说的“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一诗正是在这个时候做成的。自为数众多的客家人依附洪秀全之后,金田起义之势始为增大。虽说土客壮瑶都参加了金田起义,但在传教转为起义的过程里,客家人无疑是此中的中坚。首义诸王当中除了萧朝贵之外,洪冯杨韦石都是原籍广东的客家人。而孕育出金田起义的紫荆山地区烧炭耕山之民,全部是从广东迁来的客家人。有人因此而称客家人是拜上帝会之母。后人读史,容易从这一脉络想见人口西迁与金田起义之间的联系。

太平天国从广西揭竿而起到涌入两湖,浩浩荡荡地顺长江而下,借助的也是当时中国人口压力下的社会动荡。当他们进入湖南以后,“上匪之迎降,会匪之人党,日以千计”^①,“凡人添弟会者,大半附之而去”^②。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庞大的过剩人口,为天父

① 《江忠源遗集·卷一·致刘霞仙书》。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严办土匪以清地方折》。

天兄的圣库制度和平等精神所吸引,成为太平军源源不断的兵源。比之广西一隅,其数日又要大得多。因此,初出广西时的一二万“老兄弟”,到攻克武汉后已猛增为五十多万,而建都天京时已号称二百万人以上。其间大部分都是“新兄弟”了。于是而有与北京朝廷对峙十四年之久的另一个政权。

清代人口西迁由富饶的四川盆地,一变成为山高林密的川陕楚山区,由川陕楚山区再变为贫瘠的桂滇黔三省,时间愈后,迁人地域的自然环境越差,而迁出地域的人口压力愈见增大,与此相伴随,政府当局对迁移的控驭力则越来越弱。所以人口迁移的社会效果呈现一种明显的递减趋向。在这个过程中,历尽苦难的人们便非常自然地成为一种不安定的社会力量;但在异乡找到了自己生活空间的移民,则多半是一种有序的社会力量。因此,川陕楚山区与滇桂黔三省爆发的白莲教与太平天国起义,使清政府的统治由盛而衰,由衰而危。而同样接纳过大批移民的川湘两省,则为清政府提供了剿灭农民起义的人力物力,挽救了王朝危机。人口西迁与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关系令人感叹和深思。

(附记:本文由张景岳、唐克敏提供初稿)

太平天国起落与土地关系的变化

—

太平天国曾经想实现“通天下皆一式”的平等，但历史限制了超越历史的空想。《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仅仅半年之后，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提出并经洪秀全批准，“照旧交粮纳税”成为一种务实然而并无平等意义的普遍经济政策。“照旧交粮纳税”以土地所有者为赋税征收对象，在承认旧有的土地所有权和租佃关系合法性的同时也承认了地主收租的权力。容忍地主的收益无疑是间接保证田赋来源的手段。因此，太平天国区域中，地主阶级和地主经济依然存在。但农民战争的暴风骤雨扫过之后，强烈的社会震荡是无法平复的。由此产生的破坏和冲击又会使旧的经济关系在逼扼中节节变化。

太平天国在大片土地上摧毁了旧日的权威和秩序。在这个过程里，直接依附于政权的一部分地主阶级多在锄灭之列，曾经依附权势的缙绅地主因之而破败衰落。其次，长期的战争造成了长期的重征。太平天国对于“富室”和“积谷之家”的无情勒逼成为地主经济不可解脱的重负：“军行先数百里，即遣人前往遍张告示，令富有贡献资粮”，“必千金数百金，谷米数百担，猪数口，鸡数十只，配以群物”，名为收贡。继以挖洗搜剔，抄没浮财，“虽瓦沟所藏之金，

水塘所沉之银,亦无有免者”,^①名为“打先锋”。继以派捐,“曩称富人,重为刻剥,名曰‘大捐’。千金万金亦不等,不受者,械击之”。^②太平天国后期还有名目极多的杂税。以田亩计征,则有火药捐、田凭费、田捐、局费、礼拜捐、柴捐、军需捐;以户口计征,则有门牌捐、船凭捐、船捐、丁口捐、房捐;以营业和财产计征,则有商税、特捐,等等。^③无须讳言,其中一部分负担是由商人和小农承受的。但揆之计征对象,大部分压力不可避免地会落在地主的头上。因此,地主阶级存在于天国政权之下,不过是一种可资取给剥夺的现成物。与重征俱来的另一面,是旧政权瓦解过程中勃兴的佃农自发抗租风潮,其激烈者竟至“乡官劝谕欲稍收租,而佃农悍然不顾,转纠众打出主之家”。^④在这些地方,地主“收租如乞丐状”,甚者“业主二年无租,饿死不少”。^⑤抗租造成了租佃关系的困厄。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屡被征派之后,积财殆尽,田租所人是他们用以交纳赋税和维系生计的唯一来源。这种来源的萎缩不会不使重征下的地主经济在交困中难乎为继。它带来了两重结果:(一)相当数量的田主因窘迫而逃亡出境。上海一地曾为之“顿增十万烟户”。地主的逃避,意味着赋税征收对象已不复存在了。(二)佃农的持续抗租使业户“租米无着”,收赋成为一个难题。咸丰末年,太平天国区域已有乡人不肯纳租,粮米追征不齐之事。随之,没有出逃的地主也开始失去了赋税征收对象的意义。这并不是太平天国所期望的,否则,太平天国的地区当局者限制或镇压佃农抗租风潮就变成不可理解了。但作为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太平天国的事业又客观地引发了他们并不期望的结果。两者之间,

① 《赋情汇纂》,《太平天国》(三)。

② 《越州纪略》,《太平天国》(六)。

③ 《太平天国杂税考》,《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

④ 《野烟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

⑤ 《(镜雅轩)自怡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

有着一种农民造反者所无法驾驭的矛盾。地主经济难乎为继而渐次破产,这就出现了土地关系变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一)、在地主已经出逃或失去赋税征收对象实际意义的地方,“照旧交粮纳税”会因之而成为一种全无着落的制度。这个过程要求变通,由此产生的另一种做法谓之“着佃交粮”,即由太平天国政权直接向佃农征收赋税。“着佃交粮”并没有改变地权,但它化解了佃农抗租斗争同太平天国赋税利益的间接冲突,从而使本被压抑的抗租获得了地方当局者的宽待和许可。“乡官只管粮米,不管租米”,或“虽有粮局,而业户儿不聊生”,正是这种态度的反映。走得更远的地方则规定业户不得收租。就其本义而言,地租不仅仅是物,而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因此,“着佃交粮”助长了土地所有权的名实脱节。在各色重征下,“实”已不存之后,土地所有权的“名”对于业主远不是值得留恋的东西。太平天国在江浙地区颁发田凭的时候,累见“各业户俱不领凭”^①之事,这无疑足权衡利害的结果。业户“俱不领凭”则地权之名与实皆失。《庚癸纪略》记叙了同治初年吴江“伪监军提各乡卒长给田凭,每亩钱三百六十。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陆续完纳”^②的史实,说明太平天国政权下有过一部分地权的转移。这种转移并不带有土地关系革命的普遍意义,但它的影响直到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仍然存在。

(二)、地主经济在重征和抗租的交困下渐趋破产的过程,又会是地主个人生活贫困化的过程。所谓“出金钗换黄粱,至甘露卖布,荡口鬻衣,每日一粥一饭,每食惟挑草头、野芥”正是那个时候的记实。等而下之者“则以女与人,无论已字未字,苟有人要,不取

^① 《庚申避难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

^② 《太平天国资料》,104页。

分文，意图脱累”。^① 贫富之序在世变中脱出了旧轨，被驱出旧轨的一部分地主出卖土地以换取生活资料是这个过程里出现的多见之事。然而，动乱时世下的土地买卖并不是一种自然的交易。一方面，时世限制了地价。同治初年，江浙地区石米之价在十千以上，而无锡地价不过每亩三千。迟至湘淮军攻破东南之后，浙江还有“图饱一饭，报以腴田百亩者”。^② 另一方面，地主阶级中尚有余力者畏对田赋之累，时世限制了他们的求田问舍之志。两重限制之下，破产地主“鬻田佃户，十得二、三”成为当日地权转移的另一种途径。通过这种途径，小农和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村劳动者曾经得到过一部分土地。

(三)、地主的成批逃亡留下了大片“主亡佃在”的土地。“佃在”说明农业生产并没有中断，土地仍在提供产品；“主亡”则说明地权在治内是空缺的。在业主无从追索的情况下，太平天国地方当局多规定佃农代领田凭，以征取土地产品的赋税部分：“有田产者报明亩数，每亩出钱二百文，领赋凭一纸，其有业主他徙者，佃户代交”。^③ 代交代领并非地权易手，因此“住租屋种租田者，虽其产主他徙，总有归来之日，该租户仍将该还钱米交还原主，不得抗欠。”^④ 这与田凭直接为佃农所有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是，出逃的地主未必“总有归来之日”。身历其时的文人记述过富有田产者“一旦遭兵灾，坐见铜山失，父母冻饿死，妻子皆沦没，孑然余一身，欲归已无室”^⑤ 的呻吟；他们当中乞食道旁，辗转沟壑，死于颠沛流离之途的人正不在少数。于是有“指点累累饿莩堆，半属当年富

① 《(镜稚杆)自怡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

② 《义乌兵事纪略》，25页。

③ 《太平天国史料专辑》，42页。

④ 《避寇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

⑤ 《乞者行》，《欧堂诗集》，卷一。

家子”^①的感叹。这些人当然不可能再回来追收田产租米了。以理推断,在原有田契经兵燹失散之后,他们的土地将转归代领田凭者所有。类似的地权变化也会发生在被太平天国诛锄的缙绅地主的田产上。

这三种情况的存在,标示了土地关系在局部地区的变化。太平天国之后,主持这些地区的人物慨乎“田亩经界,改变旧形”,“旧日之业,纷杂错乱,莫可究诘”,^②其中正有着这种变化的写照。

二

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久为战场的江、浙、皖三省已尽失昔日富庶。仅浙江一省,各属册报荒芜田、地、山、荡已多至“一十一万二千三百六十六顷七十四亩有奇”。^③农民起义和内战兵火的结果,不仅摧毁了这一地区旧有的政治秩序,而且使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在动荡中备受巨创。因此,重建江、浙、皖三省的政治秩序,不能不开始于恢复这一地区的社会生产。见之上谕的所谓“慎选牧令,加意拊循,流亡有归业者,为之清还田产,缓其逋租,假以籽种,俾有归农之乐,以恤民艰,而固邦本”正言乎此。^④然而“流亡有归业者,为之清还田产”又说明,社会生产的恢复,应是旧土地关系的赓续和恢复。所以,“加意拊循”所重在于“业主认田”。同治五年,浙江巡抚马新贻立垦务章法,规定有主之田须“业主招佃垦种”;无主之田由“州县设法招佃”。若无主地垦熟之后有业主指认,经“查明取结,飭令业主酌给垦户工本或仍给原佃之人佃种,按年交租”,即

① 《流民篇》,《危难哀音》,中篇。

②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户政类·屯垦》,卷二十九。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61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④ 《东华续录》,卷七十二,19页。

可“改照有主田产办理”。^①同、光之际巡抚安徽的裕祿，则于业主空缺的抛荒之地首以原主“五服之内者”的认垦权为重。江苏之府县还有用“开垦钱”惠待业主认田的做法。另一面，对于“外省流民乘间侵夺”或“胥吏浮收”而致害及原主归业者，朝廷有从严惩办之旨。在恢复社会生产的过程中扶植旧的土地关系，表现了一种复兴地主经济的努力，江、浙、皖三省的部分地区因之而“与初经兵灾逃亡未复时迥不相侔”。^②其影响尤著的苏南一带在荒地占完以后遂趋于“田日积而归于城市之户”；^③浙东、皖南则渐有拥地千亩以上的巨室，多者至两万余亩。在这些地方，租佃关系的比重之大是显然可见的。

但是，长期战争之后复兴地主经济又是困难重重的，这是当时上地关系变化的另一重要内容。

其一，丁口剧减造成了劳动力的普遍匮乏，地主难于招佃。同治末年总督两江的李宗羲曾就江宁、常州、镇江三府垦务之不如人意而说过：抛荒之地未垦，“不尽无主，大约无力垦种者有之；招佃无人者有之”。^④这种“无从招佃”的困局使缙绅之家有情愿以祖遗田地充公者。在应佃乏人的区域，已有的租佃关系也不可能是稳定的。当时外来佃农因利息不多，往往弃田而归，业主没有办法，以致已熟田地，再次荒芜。本地佃农则以开垦为名，由业主让租三年或四年、五年不等。且年限既满之后，常常托故抛荒，又另向别主领田开垦。这两种情况都会使业主陷于“田已报熟，赋无可蠲”^⑤的窘境。租佃关系的充分实现是地主经济的前提，在前提缺乏或者不足的时候，地主经济的复兴不会呼之即出，成为一种普

① 《马端敏公奏议》，卷三。

② 《沈文肃公政书》，卷七。

③ 《租核》，6页。

④ 《招佃垦荒酌缓升科章程》，《增辑经世文编》，卷三十九。

⑤ 《沈文肃公政书》，卷七，18页。

避景象。

其二,农民战争如大潮过地以后,人世的许多界域都已面目全非,确认旧日地权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东南许多地方几经战守,“向存鱼鳞册、黄册荡然无存,即民间田产契据亦多半遗失”。以至“每有田土词讼到县,在官既无丝毫案据,在民亦无典册契卷;当两造争持,互腾口说,官每四顾周章,莫从判断”。^①这种手无凭据的地权之争又因外省客民涌入应垦而愈见其多端,主事者慨乎言之曰:“果使现在认田土户,当年真正业主,确有契可凭,则客民无可争执,在官亦不难断。无如现查之田,土民皆以空言指认,毫无证据,冒混诡托,情伪百出。”^②无疑,“莫从判断”的官司不能不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丧失了契据的业主中会有一部分人因之而丧失自己的地权。在土著之户流亡者十有八、九的地方,迟归之人至“洪杨乱后约十年”才返回乡里。其间,原来的土地经客民分田垦辟,荒地渐变为熟,“而业已易主”。^③经过变动之后追认昔日地权往往难以做到。这就阻滞了原主归业,也阻滞了地主经济的复兴。

其三,地方当局者出于私利,采取不利于旧主认业的做法。同治年间,浙江新复之区,广召他处民人来垦。“岁令完捐若干交官,以充地方公用,而赋额则阙而勿征”。这个过程使外来人和地方官的利益连在了一起,而客籍势张以后,却又造成了土著无法与之抗争的局面。他们垦而据为己有的田地,不少正是有主之业。光绪初年安徽广德“撮州篆办理垦务”的李某,曾以亩价六百文出卖州中无主荒田“与客民为业”。胥吏董保“皆借买卖公田一事高下其手,从中渔利”。当开丈之时,司其事者“虑土民多认田亩,则充公之田少而卖价无多。于是四乡同日齐丈,使业主奔走不及,又不准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63,632页。

②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户政类·屯垦》,第二十九卷。

③ 《申报》(1880年5月24日)。

其托人代认；而祠庙、公田、祭田一概充公，不准承认”。结果，“土民有田者，十分之中仅认一、二”。^①像这种公然剥夺业主地权的做法不会很多，但遇事“庇客而厌土”^②的地方官吏却并不是个别的。

其四，钱漕苛重，原主以赔赋为畏，怯于认业。光绪三年，两江总督沈葆楨叶请酌减江苏部分地区漕粮，已经论及重赋之下难于复业。三年后，继沈葆楨而总督两江的刘坤一说：江宁府属七县“有田之家大率募佃耕种，工本倍费，租息甚微”；“稍有力者类皆别谋生计，视田业为畏途，故未垦荒田，迄今尚复不少”。^③田业成为畏途，正是“租息甚微”不堪赋税苦重的结果。同样的过程也出现在别处。浙江嘉兴自“咸、同兵火之后，田地荒芜迄未复额。非惟人户凋耗，亦以重赋所困。佃户既畏归耕，业主亦畏赔粮，往往脱籍徙业，不敢承种，比比而是”。^④这一类变化与原主归业是逆向的，在地主脱离土地的地方，地主经济并无复兴可言。

以租佃关系为前提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重建中窒碍延缓，表现了太平天国留下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对江、浙、皖三省土地关系变化的制约。这种局面的出现，同朝廷扶植地主经济以恢复东南农业生产的意图是矛盾的，但又是它所不得不接受的。以此为背景，相关地区的劳动农民可以在间隙中通过种种途径获得小块土地。

（一）、由应召垦荒而得地。太平天国失败后，东南当局以复业为要务，次第招垦。但初则“求之汲汲，而应者寥寥”。这种淡漠，出自于对地权的疑虑：“盖垦种荒田，类皆穷苦农民，图为己产，如

① 《广德县志·杂著·张光藻上州尊书》（光绪七年），卷五十六。

② 周家楣：《期不负斋文集》，卷四，8页。

③ 《刘坤一遗集》，第2册，570页。

④ 金蓉镜：《均赋余议》，18页。

有原主,则明知此田不为己有,安肯赔贴心力,代人垦荒?”因此,自同治八年起,江苏之主持垦务者立为章程:“必以无主之田召人认垦,官给印照,永为世业;仍自垦熟之年起,三年后再令完粮”。在浙江严州,官招棚民来垦之地若三年内无业主指认,则准予垦户“作为己业,过户完粮”。遇有业主之取巧者“俟田已垦熟,再行呈报”,即“将所种田亩罚半归垦户执业”。这一类章约有利于垦民得业是明显的。同治九年,湖州有“客民入境,争垦无主废田数千亩,讼叻叻不休”之事。经官断决,“以所垦之田十之八为垦户产,约归其二于公”。因争垦而致讼,比之“应者寥寥”自是另一番气象了。

(二)、由价买而得地。同治后期,江南因“荒田垦种乏人,类多贱卖”。买得土地的人被称为“自种”者。同这种民间自由交易相比,光绪初年皖南地区的土地买卖则多出于官府意志。太平天国失败后,“楚南北之人”挈室人皖者趾踵相接,以至不数年,“客即十倍于主”。在这个过程里,客民“至则择其屋之完好者踞而宅之,田之腴美者播而获之”。造成了“有主之业,百不获一;侵占之产,十居其九”的既成局面。土客矛盾因之而以地权为焦点日趋激化,往往“一火延及数十家,一斗毙及十余命”。客民之强悍本非官府所能容忍,但他们已成为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和国赋的实际承担者。因此,府县当局者多采取“价买”以“和民”的办法来调停土客之争。发生在这--时期的所谓“价买”,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无主之地。二是土客争执产权之地。三是受佃客民拒交地租而迫使业主卖地。

(三)、垦农虽未办理过户名目,却实际占有垦地。这一类情况多见于浙江地区。招垦之初,官定外来垦户蠲赋而代以捐、租。“原欲待客民安居日久,尽成土著,而田亩之荒者渐变为熟,然后照从前额征之数,收而解之于省”。但既行之后,“官以岁收租息全归善后之用,不若正赋必须报解,其中侵肥正自不少”;垦户则“往往完租十亩,而实垦二三十亩”。时论谓之“官与客民两得其利”。因

此,终晚清之世,捐租代赋之法一直没有改变。由于不纳国赋,这部分土地的产权是虚悬的。然而它们又在地方政府的认可之下为客民占有、使用和继承。这种土地特名为“客荒”,以区别于业归旧主照章完粮之田。在当时,前者与后者相比,并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数日。仅嘉兴、湖州二府,至光绪末期“客荒”已逾四万五千余亩;而同一时间里田之完赋者不过二万三千余亩。从中不难窥见客民实际占有土地的规模。实际占有土地的人们因之获得了一种合法的形式。

由于这些途径的存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江、浙、皖三省土地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明显增多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在各个地区农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平衡,然而他们集中地出现在东南却是一个可观的事实。

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因西方资本主义侵入而造成的社会经济变动渐趋明显。这种情况在东南沿海最早发生,又最为突出。所以,这一地区生成于特定时势之中的新的小土地所有者,面对的是—种与过去不同的经济环境。在商品经济渗透到自然经济的不可逆转的过程里,他们的生产和经营不会不感受到来自商品经济的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刺激包裹着冲击和诱导两重意义,握有地权的小农因其更多的经济自主,会比寻常租佃关系下的农民更自觉地对这种刺激作出反应。刺激和反应,从两个方面把他们同近在咫尺的市场连系起来了。其一,是商品性农业的长足发展。以棉花而论,江、浙、皖三省至少有二十三个州县是见诸当时记载的知名产地。在那些地方,禾稻之类量少者仅占十分之二三。以蚕丝而论,七十年代末期,浙江—省年产已达三百三十三万四千七百五十一公斤之多。而江苏、皖南本无蚕事的区域,亦“往往辟良畴

接湖桑”，“乱后养蚕颇多。”一邑由此获利岁可数万至十数万金。以罌粟而论，推算二十世纪初年江、浙、皖三省之出产量，当有三百三十万亩农田专门用于种植此物。此外，茶叶为安徽“出产之人宗”；烟草、蓝靛亦多见于江、浙农村。这一类作物在数量上的增长，同时又会影响粮食生产的供求，促进其商品化。《益闻录》曾记光绪七年时常熟米市之盛，当时“米业中人”每天在茶肆中买茶“数千百碗”，可见这一地区交易规模之盛。在经营地主还很少见的时代，由农村提供市场的多种农产品，其主要部分无疑来自个体小农的耕作。商品性农业的长足发展本始于对外贸易多重需求的引发，因此流入市场的农产品首先会被外国商人取走。但是，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工业已经产生。到甲午战争以前，仅上海、宁波、福州就先后出现过七家缫丝厂、三家面粉（碾米）厂、三家纱厂、四家轧花厂、一家纺织厂。这些近代工业的原料当然会就近地取之于东南农村。它们同商品性农业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其二，农业产品的商品化在数量上浸假扩大的同时，又会使个体小农不得不向市场购买部分商品，以满足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的需要。这是他们与市场的另一种联系。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江苏地区种植稻米每一亩所需生产资料的费用大体在一千文上下，这个数目约占收入总额的三分之一。而经济比较宽裕的“上农”所费还不止此，仅肥料一项每亩已逾千文。以烟草论，其成本费约占收益的六分之一。养蚕之家则需购买桑叶，他们的预付成本在数量上更大，至有卖耕牛“勉其力以求桑”者。这是向市场购买生产资料，与之相比，购买生活资料在这个时期的农家支出中具有更经常的意义。南方地区，耕田十亩的八口之家除去赋税杂捐和口粮，每年大约可余五千四百文，除用于“买犁锄”以外，都用于生活消费。而从事商品作物生产的农户，因其自给程度的降低，他们收入中用于生活消费的部分无疑会更高。在这些场合，个体小农取之于市场的物资有相当

部分是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由于外国商品的倾销及其在质量、价格上的优势，“洋货”常常是其中的多数。但农村市场的存在和扩大毕竟历史地为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一种前提。

个体小农卷入商品经济的过程，还间接地带来了经济关系的三种变化：（一）在商品性农业发展程度较高的地方，出现了家庭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趋向。盛产蚕丝的南浔、震泽、黎里乡间，至光绪十年已有日产经丝四十两的车户二三千家。这种脱离了农业生产的专业车户，显然代表了经济发展的进步。其中的一部分会因生产扩大而采用雇佣劳动。在宁波，渗入农村的商品资本一方面供给织布者棉纱，一方面代将成品出售，农户的家庭手工业与包买主之间因之而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雇佣关系。（二）在商品经济影响下的个体小农，其贫富分化比自然经济中的农民更快。光绪年间，松江府的富裕稻农一年可以红花草、猪粪、豆饼肥田三通，贫农则“糊口尚艰”，只盼豆饼壅田，“其壅力暂而土易坚，故其收成每歉”。而生产的丰和歉又反过来加剧了贫与富之间的悬殊。这种循环在其一端造成了部分“力农致富”者。他们中一些人会在新的经济环境里走向雇工经营。比之传统的租佃关系，与商品生产相关的雇工经营已表现出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色彩了。（三）由农产品贸易致富的商人，其资金的一部分会流入近代工业，十九世纪后期南浔镇以买卖蚕丝起家而“家财垒聚，自数万至数百十万者，指不胜屈”。这些钱财曾经孵生出近代中国的若干实业。商人涉足实业已是远离农业生产过程的事了，然而他们能够由此及彼却曾经借助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增长。

太平天国失败后江、浙、皖三省土地关系的变化对近代社会经济的影响，是通过获得地权的小农在商品经济刺激下的经营活动及其直接和间接的结果而表现出来的。两千多年里不止一次出现过的土地关系变化因之而衔接于一种古所未有的时代内容。由于

这种衔接,本身并不具有新旧代谢意义的土地关系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催化物。

军功官僚的崛起和轻重之势的消长

—

道光三十年，太平天国起广西，以兕虎出柙之势把严酷的内战带向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其北征之师又沿河南、山西、河北一直打到天津，鼙鼓动京畿。延烧不熄的战火，使这些地方的守土官和统兵官一个接着一个成了失败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命尽于刀戈之下，另一些人则跌仆之后再也不能爬起来。

咸丰元年，当赛尚阿以大学士作钦差大臣督师剿“粤逆”的时候，曾“特赏‘遏必隆刀’”^①以壮行色。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半，他就因湖南战事失利而被捋去顶戴花翎，沦入“革职拏问”的穷境。自此退出战场，也退出了官场。继任的徐广缙气运更促，两个月后即兵败于岳州，奉旨“革职留任”；再过一个月又在湖北同样被“革职拏问”。另一个钦差大臣陆建瀛受命“防江皖”，结果江皖都防不住，他也成了“传旨拏问，委员解交刑部治罪”的罪囚了。其时距离他接篆之日还不满一百天。而解递的“委员”还没有送他上路，太平军已攻破南京，沿用对付“清妖”的规矩把他戕杀了。^② 这些人都长久地主宰过别人的命运。但面对太平天国咄咄逼来的兵锋，他们自己却在命运的摆布之下犹如西风中的一片落叶，倏忽之间便从云端跌入了泥淖。与他们相比，更多的人不等诏书严辞切责，

①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一册，210页。

② 《清史列传》，3310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就已急急忙忙地用自己的性命来偿还欠债了。咸丰二年十二月，太平军破武昌，“巡抚常大淳、学政光禄寺卿冯培元、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汉黄德道王寿同、丁忧盐道王东槐、署盐道林恩熙、武昌府知府明善、武黄同知周祖衔等皆殉难”。此后安庆破，“安徽蒋巡抚文庆死之”。金陵破，江宁布政使祁宿藻“呕血死”，提督福珠隆阿、前广西巡抚邹鸣鹤皆“遇害”死。武昌再破，“总督吴文镕死之”。^①每一次失地，都会有一批朝廷命官像茅草一般被太平天国的排刀划倒。他们以自己的跌落和殒灭，反照出上流社会里积久而成的颓废与衰颓。

战争打破了颓废与衰颓，也使士大夫中久以经世议论慷慨自负的那些人从打破的缺口里露出头来，在危难的召唤下走入战场。这些人因儒学而得信念，因信念而生激越；于是，农民战争横风疾雨的劲气便面对面地遇到了另一种同样亢厉而又强韧的劲气。

自戊卒陈涉篝火狐鸣以来，每一次农民战争都曾促成过知识分子的分化。旧朝作育出来的儒生身处板荡之世，常常会有一部分人愿意在天命所归的过程里扶助新朝。而当读书人为草莽作佐命的时候，他们一定也在按儒学的面貌重新塑造草莽。亭长出身的刘邦与和尚出身的朱元璋都是这样做了皇帝的。可见，历史上的儒学知识分子并非全然不肯附和造反的农民。然而太平天国一开始就从西方宗教里搬来了另一种意识形态，他们在立意打倒“满洲鞑妖精”的同时又立意要打倒孔夫子。于是“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壁水环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②“毁弃”表达的是两种信仰之间的不相容性，其中未必没有理据。但把“马厩”里的粪便和“椎牛屠狗之场”的血污与儒生心中的圣人放在一

① 《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一册，12~30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327页，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

起,则纯然宣泄了鄙视和恶意。当意识形态的不相容性随战争的扩大而被放大之后,本以阶级矛盾为内涵的造反便很容易把战火延烧到文化上去。一个士人记述说:“至可恨则莫过于残毁书籍。贼教目我书为妖书,近日沿江各郡邑藏书之家如汉阳叶云素先生、扬州阮文达公、秦敦夫、程穆堂两先生各第,皆牙签万轴,多人间未见书,不啻琅环福地,而逆贼一至,非付之一炬,即用以熏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太平天国里的老兄弟和新兄弟因之而在儒学中人的眼里显得十分可怕:“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① 毁弃学宫和焚烧书籍,以一种非常激烈的方式向世间人传播了上帝为唯一真神的教理。然而读书人所看到的则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由于“外夷之绪”屣入进来,造反的农民战争遂越出了历史旧辙,演为“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② 一姓之天下的鼎革与“数千年礼义人伦”纠结在一起,表现了更多的恢宏,也唤起了更多的敌意,太平天国的事业容不得儒学,但它们用来排诋儒学的却又是一个狭隘独断而且粗陋不文的宗教世界。因此,儒学知识分子普遍地成了太平天国的反对者:

壬子十二月贼陷武昌,初十日于猎马场设高台,贼目登其上曰讲道理。鸣锣子市,命阖城人往听。内有汉阳生员马姓者挤出人丛,挨至台下,云有要言关白。贼目令其前,问有何说,马生云:“尔才所说之言,一派伤天害理,犬吠之声,何道理之有? 试问自有人即有五伦,尔贼头子群丑皆称兄弟,是无君臣;父子亦称兄弟,姑媳亦称姊妹,是无父子;男女分馆不准见面,是无夫妇;朋友兄弟离散,

① 《太平天国》(三),311页;《太平天国》(四),735页。

② 《曾国藩全集》,诗文,232页,岳麓书社版。

是无朋友兄弟，可谓五伦俱绝。即依尔所述亦只有兄弟一伦，况舍亲兄弟不认而别呼他人为兄弟乎？如此悖谬，是真无用之狂贼也。”于是骂不绝口。贼目大怒，传令将马生五马分尸，四肢各驾一马，辫发系一马，用鞭箠之，诘五马四蹄攢跃，皆不肯前，而马生肆骂如故，贼不得已用刀分裂其尸。^①

“马生”不明白“兄弟”一词在西教里本自另有含义，所以愤而“肆骂”，为五伦争是非。太平军里“讲道理”的兵头也并不真知拜上帝教称天下人为“兄弟”的由来和确诂，所以口舌既讫，则施以辣手，用五马分尸来解决论辩。这个故事里的当事人本是历史记叙中见不到名字的小人物，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故事又能够以一个人的卫道意识写照出那个时候多数读书人共有的卫道意识。

理学崇究义理，与名教贴得最近。因此，当拜上帝教驰骋东南，一路带来“名教之奇变”的时候，从理学入经世之门的知识分子们便接二连三地崛起于湖湘，帕首提刀，呼应汇聚，由章句之儒而成杀人的悍将。于是，在东南群帅一片焦头烂额之时，湘军之名勃勃然而张。王定安后来追叙说：

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②

这个过程非常明白地展示了文化渗人内战之后所衍发出来的兵气。太平天国喜欢把西教的礼拜称做“讲道理”：“锣鼓四声麾令旗，听讲道理鸡鸣时，桌有围，椅有披，五更鹤立拱候之。日午一旗

① 《太平天国》(三)，312页。

② 《湘军记》，2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红袍驰，戈矛簇拥箫管吹，从容下马严威仪，升座良久方致辞”。^①湘军中领兵的读书人也喜欢讲道理，“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言者谆谆，往往“苦口滴杜鹃之血”。^②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两者各自代表了一种与精神相攀结的暴力，以此相凝结，也以此相对峙。太平天国的信念在于营造一个天父抚视下的人间小天堂；湘军的信念在于发煌圣人之教，守护礼义人伦的千年传统。两者都不是为地域所囿的东西。因此，当东南烽火连成一片之后，脱胎于团练的湘军便一步步尾随奔涌中的太平天国，在厮杀中从湖南走向长江流域，由偏师成为内战中的劲旅。

湘军由偏师成为内战中的劲旅，作为对比，是朝廷蓄养的经制之兵一溃再溃，腾出了大片原本属于他们的空间。身在此长彼消之际，湘军中有心经世的知识分子一定会伸出手去，按自己的怀抱和意愿干预世务。这是一种由内战引发的变化。但当旧日的权界还没有被战争打破的时候，他们伸出去的手又常常要被别人推挡回来。于是而有上下左右之间的种种疑忌、勃谿与争斗。湘军起于湖南，然而湖南官场对湘军却有过一种鲜明的异己感。咸丰三年，曾国藩在一封信中说：

今岁以来，所办之事，强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只以时事孔艰，苟利于国，或益于民，即不惜攘臂为之，冀以补疮痍之万一，而扶正气于将歇。

次年，又在另一封信中说：

近年办理军务，中心常多郁屈不平之端，每效母亲大人指腹示儿女曰：“此中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其往事（年）诸事不尽知，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

① 《太平天国》（四），736页。

②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208页。

见者。谤怨沸腾、万口嘲讥，此四弟、季弟所亲闻者。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此，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一有济。^①

这些话表述了用世的抱负为权界所困的苦楚。虽说曾国藩后来以湘军造出了盖世勋名，但他刚刚被诏书唤出来的时候，只是一个在籍守制的绅士。皇帝给他的名衔叫做“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②这种眉目不清的名衔使他和他所总领的湘军在各据一隅的地方官眼里成了被人睨视的物事。“侵官越俎之嫌”和“郁屈不平之端”都说明：“帮同办理”于巡抚司道之间，换来的大半是排斥和轻侮。由此生出来的波澜，常常会无情地撞碎曾国藩的一腔热心。咸丰三年，长沙兵勇私斗。“国藩念内斗无已时，且不治军，即吏民益轻朝使，无以治奸轨，移牒提督，名捕主者。提督亦怒，漫曰：‘今如命，缚诣辕门。’标兵汹汹满街。”提督的“怒”和“漫”，针对的都是曾国藩，因之而有成群的营兵被放出笼来，“汹汹满街”。此后，悍卒的声势被弄得越来越大：

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乃昌狂公围国藩公馆门。公馆者，巡抚射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乃叩巡抚垣门，巡抚阳惊，反谢，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司、道以下公言曾公过操切，以有此变。国藩客皆愤怒，以为当上闻。国藩叹曰：“时事方亟，巨子既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吾宁避之耳。”即日移屯衡州。^③

这段记叙中次第夹述的“闭门不肯谁何”，“不与己公事”，“阳惊”，

①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208页，家书（一），284页。

② 《曾国藩年谱》，22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③ 《湘军志》，22页。

“反谢”以及司道以下的“公言”，用冷峭的笔意刻划了湖南官僚的群体面目，并反衬出曾国藩和他的湘勇在这些人面前的孤立。后来湘军出战，水师大败于靖港。曾国藩愤极，两次投水中求死，“皆左右援救以出”。之后收败卒，孤居长沙城外的高峰寺里，置备棺木，“欲自裁者屡矣”。^①而长沙城内的官绅们正岌岌乎以讥弹相向，布政使徐有壬且“与按察使会详巡抚，请罢曾军，语倨妄甚。”^②一时阴霾四起。城内的人和城外的人相距不过咫尺，却各有各的心事，方寸之间隔得非常遥远。直到另一股湘军在湘潭大获全胜，消息传来，才吹散了罩在曾国藩头上的满天乌云。对于身历其境的人来说，此中滋味当然是很难忘记的。

徐有壬一类人苛待湘勇，显出来的是一种伎刻。然而把伎刻从人心里召唤出来的，则是内战所促成的制度变迁。湘勇由书生（绅士）招募农夫成军，本自文、武、周、孔之道对“天父天兄之教”的激烈回应。但作为一个群体，湘勇之“别树一帜”又带有明显的自发性。这种明显的自发性使他们一开始就处在朝廷的体制之外，也使他们从一开始就缺乏与体制对应的名分。因此，他们虽为卫道而战，根须却伸不进地方权力里去，并常常被官场中的人们当作自生自灭的东西。迨湘军渐得能战之名以后，遂在朝旨指调下四出奋战，无异经制之兵。但由于缺乏名分所赋予的确定性，湘军又很少被人看成是经制之兵。由此产生的矛盾，一面使群聚于湘军里的知识分子能够逞其济时之心，一面又使他们在施展身手的时候老是要同各有事权的地方官僚齟齬嘶咬，弄出许多私怨和公愤。咸丰七年，曾国藩在奏折中积久一发，罗举“历年所值之时势，亦殊有艰难情状无以自申者”，向皇帝倾吐胸中抑郁：

定例军营出缺，先尽在军人员拨补，给予札付。臣处

① 《曾国藩年谱》，41页。

② 《湘军志》，25页。

一军、概系募勇，不特参、游、都、守以上无缺可补，即千、把、外委亦终不能得缺。武弁相从数年，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哨长者，仍领哨长额饷；充队目者，仍领队目额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弁勇互生猜疑，纵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或与巡抚、提督共事一方，隶人衙门，则挑补实缺；隶臣麾下，则长生缺望。臣未有统兵之旨，历年在外，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官兵。实缺之将领太少，大小不足以相维，权位不足以相辖。去年会筹江西军务，偶欲补一千把之缺，必婉商巡抚，请其酌补。其隶九江镇标者，犹须商之总兵，令其给予札付。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募勇在战场上已经成为庞然大物，但用体制来衡量却仍然是小东西。由此产生的是一种不能用礼法调和的矛盾。而以募勇“越境剿贼”，则困于主客之势，千军万马往往为州县所掣肘：

国家定制，各省文武黜陟之权，责成督抚。相沿日久，积威有渐。督抚之喜怒，州县之荣辱、进退系焉。州县之敬畏督抚，盖出于势之不得已。其奉承意旨，常探乎心之所未言。臣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见，呼应断难灵通。防剿之事，不必尽谋之地方官矣。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由州县之手？或臣营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窒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齟齬。

主客之势的不对称，使悍气正旺的湘军常常成为意沮的一方。与这种“阻挠”、“窒碍”相随，还有逼来的“疑悔”：

臣前后所奉援鄂、援皖，筹备船炮，肃清江西诸谕，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外间时有讥议。或谓臣系自

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或谓臣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或谓臣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臣低首茹叹,但求集事,虽被侮辱而不辞。迄今岁月太久,关防之更换太多,往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如李成谋战功卓著,已保至参将矣,被刑辱于芷江县,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见信,周凤山备历艰辛,已保至副将矣,被羁押于长汀县,亦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见信。前福建巡抚吕佺孙,曾专函驰询臣印不符之故。甚至捐生领臣处之实收,每为州县猜疑,加之鞠讯。或以为不足据,而勒令续捐。^①

当曾国藩作《讨粤匪檄》的时候,多半不会想到被他带着走上战场的湘勇们会如同断梗飘萍一般,找不到一个可以自立的地方。内战打乱了许多旧的章法,也生造出许多新的章法。以团练为底本的湘军因之而得到了一种改弦更张,“特开生面”的空间。但在湘军出洞庭,入长江之后,这个空间就显得太小了。新的章法与旧的章法扞格抵牾,造出一派有序与无序交相错杂的奇观。身在两种章法之间的湘军知识分子们一面千里血战,为朝廷肩撑东南数省的残破之局;一面却久处“客寄虚悬之位”,往往“枵腹从事,自捐自养,而其不见谅于人者亦已多矣。”^②这些人虽以信念和信义聚合,然而一旦在锋镝之下艰难立起,则一定不肯甘心仰人鼻息,徒为征途走卒。其用世之初心在屡受困殆之后常常更见炽烈。因此,曾国藩“沥陈办事艰难”,铺叙既毕,遂以明切之辞归结说:“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他心里非常明白,在一个兵祸连结的时代里,“凡有领军之责者,军覆则死之;有守城之责者,城破则死之。

①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365~366页。

②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866页;书信(一),605页。

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① 治军而兼有守土之责将更多一重取死之道,远不是乱世里为一己自求多福。但作为湘军领袖,他又代表了一个由经世思潮孵育出来的知识群体。这个群体虽以军功入世,然而“谈经济,究韬略,明习国家掌故”,^② 抱负大半都在军功之外。所以,百战之后睨视官场的猥琐骄顽,不会不使他们愈多经世致用的自负。太平天国以造反搅动天下,却把儒学知识分子中最能强毅力行的那一群人唤了出来。他们既挽救了王朝危机,也为王朝带来了一种重分权界的紧张。

然而在帝王心里,由绅士募勇练出来的军队终究不是一种嫡出的东西,与国家豢养的经制之兵相比不会没有亲疏之别。薛福成后来记叙说:“粤贼之据武昌、汉阳也,进陷岳州以逼长沙,曾文正公以丁忧侍郎起乡兵,逐贼出湖南境,进克武汉黄诸郡,肃清湖北。捷书方至,文宗显皇帝喜形于色,谓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某公对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③ 这里提到的“某公”是祁雋藻。虽说薛福成笔下流露出来的是贬意。但祁雋藻的进言却并非出于私怨。作为军机大臣,他对这种内战隙缝里冒出来的力量天然会有一种无法亲近的不信任感。而由此引申出来的意思,则非常容易地唤醒了人主内心本有的疑忌。因此,在“文宗显皇帝”之世,越打越疲惫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始终比越打越强悍的湘军更多地系结着朝廷的期望。然而太平天国的攻势却老是要摧毁这种期望。咸丰八年,太平军破江北大营;次年江北大营撤。咸丰十年春,太平军袭杭州,诱金陵围城之敌分兵往援,

① 《曾国藩全集》,奏稿(),866页。

② 《湘军记》,1页。

③ 《庸庵文续编》,《书宰相有学无识》。

趁时击溃江南大营。继向荣之后主持江南军务的和春一路逃奔，呕血而死，经制之兵的气数也随之而尽。湘军中人居长江中游，冷眼俯视长江下游的江南大营在滚滚烟尘中分崩离析，各自议论纷纷。朱孔彰后来为曾国藩立传，追叙当日情景说：

江南大营复陷，官军悉溃，常州、苏州相继失，咸丰十年闰三月也。左公宗棠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或问其故。曰：“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洗荡，而后天者可以措手。”又问谁可当之？胡公林翼曰：“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①

左宗棠多霸气，所以好论大势；胡林翼性深沉，所以只说人事。但两者的议论都非常明显地直露出一种久郁之后的酣畅一泄，其对答应和之辞正写照了湘军人物以自负之心规划天下的意态。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的相继而溃，是太平天国为自己重造战局的大手笔，然而久处偏促的湘军却因之而节节发舒，大步地走入了居天下之重的位置。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藩奉旨“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六月，奉旨补授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②次年七月，咸丰崩于热河。而十月间的上谕已昇曾国藩以“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③从咸丰二年到咸丰十年，曾国藩以奔驰力战之功处“客寄虚悬”之位，官阶不能进一寸，但在尔后的一年多里，却获得了并世无出其右的事权，以一身馆广上重兵握天下安危，可谓冷暖备尝。他是一个群体的代表，因此，当朝廷最终把兵祸连结的东南半壁托付给他，其臂力遽尔远伸，曾经与之栉濡以沫的军功儒生们也一定会纷纷然挺脱而出，布列四

① 《中兴将帅别传》，卷一，7页，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② 《曾国藩年谱》，115、120页。

③ 同②书，139页。

野。从这个时候起，疆吏在内战中的代谢便成为晚清社会中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其间后来居上的人物，与道咸两朝的衮衮诸公显然有着一副不同的面目。成书于光绪十五年的《湘军记》撮叙始末，罗举说：

自广西寇发，海内骚动，新宁江忠烈公忠源，实倡义旅。而王壮武公鑫，罗忠节公泽南以诸生起，其后李忠武公续宾、胡文忠公林翼、左文襄公宗棠、刘武慎公长佑，蒋果敏公益澧，暨今总督曾公国荃、尚书彭公玉麟、总督杨公岳斌、巡抚刘公锦棠，征伐四出，用兵遍十八行省。一时湘人由战功任封圻者，总督则有刘公岳昭、刘公坤一、杨公昌浚；巡抚则有李勇毅公续宜、刘果敏公典、刘公蓉、唐公训方、陈公士杰；其以提督权巡抚者，则有田公兴恕，江诚恪公忠义。而劳文毅公崇光、侍郎郭公嵩焘、总督谭公钟麟、巡抚黎文肃公培敬，虽起家翰林，亦皆涉历兵事。其他专阃、监司，以勋伐昭著于时者，不可胜数。^①

“湘人”之外，与湘军深有渊源而先后致方面，作大吏的显达者还有沈葆楨、李鸿章、严树森、李瀚章、李宗羲、阎敬铭、许振祜等等，这些人大半都是一时豪杰。迨李鸿章领淮军别开一面，与湘军相蝉蜕，江淮群体以及依附于江淮群体的人们中又次第产生了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刘秉璋、丁日昌、钱鼎铭、郭柏荫、王凯泰、刘郁膏、周馥等等以督抚开府一方的人物。在后来的同光两朝里，他们曾长久地支配过大半个中国。当中世纪与近代之交，世运的盛衰起落之间往往留下这些人各有才识情性的心迹和足迹。

疆吏的代谢是湘军中那一群抱经世之心的知识分子用军功打出来的。他们由此自立，在救平内乱的烟焰和血雾里成为中兴名

^① 《湘军记》，1~2页。

臣。然而以军功据方面的人物成群地出现,又是君权社会的一种异态。以儒学的道理来衡量,其中自有许多隐忧。作为主持东南军务的湘军领袖,曾国藩带出了成批的疆吏,在这个过程中,他是一个造时势者。作为做过圣贤功夫的大儒,他又深知天下之势不可潜移,并常常以畏惧之心面对那种由军功作成并越出了常轨的权力。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两者在历史变迁中是依连在一起的,但曾国藩却想把它们剥开来。同治元年,他由节制四省晋阶协办大学士,正隆隆然负一时重望,而奏议之际则惕惕乎申纲纪,辨流弊,以“机括甚微,关系甚大”为虑:

前此迭奉谕旨,飭臣保荐江苏、安徽巡抚。顷复蒙垂询闽省督抚,飭臣保举大员,开列请简。封疆将帅,乃朝廷举措之大权,如臣愚陋,岂敢干预。嗣后臣如有所知堪膺疆寄者,随时恭疏入告,仰副圣主旁求之意,但泛论人才,以备采择则可;指明某缺,径请迁除则不可。不特臣一人为然,凡为督抚者,皆不宜指缺保荐督抚。盖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在圣主虚衷访问,但求投艰而遗大,不惜舍己而从人。惟风气一开,流弊甚长,辨之不可不早!宜预防外重内轻之渐,兼以杜植私树党之端。其督抚有任可履者,不准迁移不到,亦不准他处奏留,庶几纪纲弥肃,朝廷愈尊。^①

这些话从自己说起,而后遍及天下“为督抚者”,具见荐臣心态。然而漫长的内战犹如洪水过地,留下来的是一种不可复原的历史变动。在经世书生扑灭造反农民的过程中,人间的许多东西已经移位。内战过去之后,王朝的中兴是与疆吏的发焯一起来到的。两者都折射了经世之学演为事功的印迹。

^① 《曾国藩全集》,奏稿(四),2059页。

二

起于嘉道之际的经世思潮从一开始就以时政为矢的，具有一种非常明彻的社会批评意识。咸同两朝，经世之学化作干戈，用万千头颅造出了累累军功。而久蓄的社会批评意识也在这个过程中横决而出，借助于分蘖出来的权力由议论而入时政，在补苴救弊之中促成了旧制的改作。

咸丰初年，当曾国藩以在籍侍郎作湖南团练大臣的时候，苏、皖、闽、浙、赣、黔、豫、鲁和直隶还有四十二个团练大臣。但环顾天下，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自觉地执着于以团练经世。他在一封信中描摹绿营嘴脸，说得非常沉痛：

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侈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面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以仆所闻，在在皆然。盖缘调兵之初，此营一百，彼营五十，征兵一千，而已抽选数营或十数营之多，其卒与卒已不相习矣，而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管之官。一省所调若此，他省亦如之。即同一营也，或今年一次调百人赴粤，明年一次调五十赴楚，出征有先后，赴防有远近，劳逸亦遂乖然不能以相入，败不相救之故半由于此。^①

绿营的毛病是与制度连在一起的。因此，他不相信身在制度之中的营兵们可以重铸出勇武朴诚。“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重，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

^①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192页。

鄙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使补额兵。”^① 这些议论感慨愤懑，非常明白地表达了熟思之后的变辙之想。兵制是国家大法，然而其间太多的朽败又使战场上的兵事破洞百出。为朝廷御敌的人们遂不得不从一开始就绕过绿营兵制，走到国家大法的外面去。于是而有以“赤地新立”求“改弦更张”^②的湘军“水陆营制”。两者的代谢，正显示了兵火和溃乱交迫下的一种自觉变法：

初立三百六十人为一营，已而改五百人为一营。营分四哨，哨官四人，统以营官。自两营迄十营，数十营，视材之大小而设统领焉。统领径隶大帅。故营、哨官所辖有定数，而统领所辖无定数。钦差、督抚，皆大帅也。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募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哨、营，哨、营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或帅欲更易统领，则并其全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③

大帅、统领、营官、哨官都以一身而维系自己的那个群体，层层凝聚，也层层制断。比之绿营“将与将不和，卒与卒不习，胜则相忌，败不相救”，^④ 湘军立营以上下之间的气脉贯接为本：“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⑤ 而后有所谓“指臂相联”，“如子弟之事父兄

①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130页。

② 《曾文正公奏稿》，卷一，《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

③ 《湘军记》，338页。

④ 同①书，223页。

⑤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八，《复议练军事宜折》。

焉”。咸丰七年，曾国藩遭父丧回籍守制，居家之际追念兵中旧事，往往流连于危难之中的袍泽情义，感慨唏嘘。他曾致书李元度说：

常念足下与雪芹，鄙人皆有三不忘焉。雪芹当岳州败时，正棹孤舟，搜剿西湖，后由龙阳、沅江偷渡，沉船埋炮，潜身来归，一不忘也；五年春初，大风坏舟，率破船数十号，挈涓滴之餉项，涣散之人心，上援武汉，二不忘也；冬间直穿贼中，芒鞋徒步，千里赴援，三不忘也。足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六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①

湘军规制重在以人立军，束伍之法常衍为人与人之间的感召。儒学知识分子的人格和道义因之而能够溶人其中，结为聚力。彭玉麟（雪芹）和李元度之履险人危，舍生忘死，都说明了人际的感召能够产生出比军令更多慑动人心的力量。因此，当内战正酣之际，绿营一溃再溃，湘军却从屡战屡败中踏出一条血路来。其集群而成的强韧剽悍显然不仅出自军法的部勒，而且出自私恩与公义的层层系结。是以王闿运叙湘军制度，称为“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②

湘军兵制体现了对于绿营的一种变法，其初意本在救内战中的颓势。然而从兵事开始的变法又一定会牵汇万端，在纠弊的过程里由此及彼，使那些与绿营制度相依连的关系因之而解体。

历时二百余年的绿营制度在这个时候虽已衰相毕露，而溯其

①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605～606页。

② 《湘军志》，163页。

原始,却曾灌注了几代君主居内驭外的周密用心。按绿营制度,国家经制之兵分标、协、营、汛散布于十八个行省,“慎巡守,备调征。”^① 编集于标、协、营、汛中的士卒都取自当地的土著,“不准以客民充补。”^② 一旦从军,即名入兵籍,终身不能脱出。此谓之“尺籍伍符,按户可稽”。^③ 虽说身在标、协、营、汛之中的人们有奉调出征之责,但征事既毕,皆须各自归伍,从哪里来,仍旧回到哪里去。因此,在国家法度里,绿营士兵总是被栓在兵籍所在的地方,犹如生了根一般,不能被人随便移动。与之相比,统带士兵的军官则非常明显地处于一种“升”与“调”的流动之中,“凡直省武职副将以上,列名具疏请补;参将以下,按月升迁”。^④ 他们在每一个地方都不可能停留得很长久。这种“兵皆土著”和“官皆选补”的制度,使两者之间的结合只能成为“以传舍之官驭世业之兵”^⑤。一头对另一头永远是陌生的。于是,兵与将之间近在咫尺却又被隔得十分遥远。然而也正因为如此,那个时候不会有跋扈的骄兵悍将。士卒以兵籍为归依;将弁随铨选作流转,而兵籍和铨选都总筦于帝王身边的兵部。两种被有心分开来的东西只有在这里才能合为一体。因此,标、协、营、汛虽远在万里之外,朝廷以一纸诏令即可从十八行省调征千军万马;将帅虽统驭千军万马,朝廷以一纸诏令即可使之敛手而去。由于兵权高高地悬在九重之上,天下曾长久地显出惕息中的一派安谧宁静。道光年间,梅曾亮说:

国家炽昌熙洽,无鸡鸣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于今。
东西南北方制十余万里,手足动静视中国头目。大小省
开府持节之吏,畏惧凜凜,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属

① 《嘉庆续修大清会典》,卷二。

② 《清史列传》,3057页。

③ 《沈文肃公政书》,卷一,《请整顿额兵折》。

④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卷六十。

⑤ 《清史稿》,3903页。

吏，逆相役使，书吏一纸揉制若子孙，非从中复者，虽小吏毫发事，无所奉行。事权之一，纲纪之肃，推校往古，无有比伦。^①

“事权之一”和“纲纪之肃”正写照了君威迫视下内外轻重之间的井然有序。

但湘军的兵(勇)却是由将弁自己招募来的，这些人的聚和散全以将弁一人的存亡去留为转移。因此，绿营那种把士卒栓定在一个地方的兵籍制度便从一开始就被他们改造掉了。不入兵籍的湘勇，是一种兵部的簿册里所没有的东西。虽说他们不停地在内战中奔来奔去，声势越来越大，然而高高在上的兵部却只能看到一片混沌朦胧，其章法与成规都罩不着这一群群由山农蜕化出来的士卒。

在兵籍制度被募勇挣破的同时，湘军的将弁们也在绕过旧径，一群群地逸出了兵部的铨选制度。一方面，湘军自立兵制，以统领、分统、营官、哨官、哨长、什长为等次，与国家武职秩序中的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之类全不相侔。另一方面，湘军的本色是“以书生讨训山农”。能够在其间领一军而成聚将的，大半都出身于功名不显的读书人。这些人虽以武勋搏来官位，但官位却多在兵部铃束不到的文职一路。无疑，两者都会造成湘军规制与国家法度之间的扞格不通。同治年间，左宗棠督陕甘，所部湘军有统领吴士迈以军法诛杀营官朱德树一案，曾惊动过朝廷。这个案子之所以异乎寻常，是因为杀人的吴士迈官不过中书，被杀的朱德树却是记名总兵实授处州镇游击，以官阶而论，遂成了七品文官擅杀二品武官。在一个以等序系尊卑的社会里，这显然是一种大悖理法纲纪的奇观。然而自湘军制度看去，则另有说焉。左宗棠奉旨复查此案，回奏言之侃侃：

① 《柏硯山房文集》，卷二，《上方尚書》。

军营体制，只论事寄轻重，不论品秩尊卑。有保至提、镇而仍当哨官什长，保至副、参、游而仍充亲兵散勇者；有在他军充当统领而在此军充当营官，在他军充当营官而在此军充当统领者。时地既殊，势分即异。当统领者必节制营、哨；当营、哨者必受节制于统领，固无他说也。

因此，“吴士迈官虽中书，分实统领，愤朱德树之违令杀之，是统领以违令杀营官，非中书杀总兵也”。^① 这些话说的都是实情，所以风波也就此平息。统领和营官，是湘军在变法中自立的名分；中书和总兵，是国家制驭天下的名器。但当两者发生抵牾的时候，却是军中的名分比国家名器更占上风。这个例子说明：处在两种身份之中的湘军将弁已失去了绿营军官那种上下尊卑一以贯之的有序。《清史稿》后来记叙职官志，感慨系之地说：自咸同军兴以来，“往往记名提、镇，降充末弁，候补千、把，骤膺统将，官职悬殊，至斯已极”。原先的规矩全都被弄乱了。于是，昔日兵部所握“三载甄别，五年军政，叙功核过，以待赏罚黜陟”^② 的铨选权也因之而变得梗塞不通，军中人物的升转移调遂不再率由旧章。

士卒脱出了兵籍，将弁脱出了铨选，二百年来朝廷用以悬系天下兵权的东西都被湘军的改制不知不觉消解掉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士卒依附于将弁，将弁依附于列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③ 的时代。王闿运后来为湘军作军志，曾富有深意地描述过“曾国藩父丧，委军径还湘乡”之后，布列江西的湘军与西安将军福兴之间的种种“阻格”，并概括说：“始创义师由国藩，军将视为转

① 《左宗棠全集》，第七册，《吴士迈遭杀游击朱德树案由折》，上海书店 1986 年影印版。

② 《清史稿》，3390、3286 页。

③ 《湘绮楼日记》，转引自罗尔纲《湘军兵志》，212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移,福兴等征调,置不訾省,得国藩一纸,千里赴急。”^①“一纸”的沉重和“征调”的轻微,非常明白地折射出兵政在内战中的演变。由此显出来的是个人对于军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在列祖列宗的手里,这本是一种不能容忍的东西。但在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凌厉的兵势更迫人,他们带来的漫天杀气,使原本不能容忍的东西竟成了朝廷不得不借重的东西。咸丰八年“浙省军务吃紧”,“湘军之在江西东路者,悉移师以援浙。”朝旨命曾国藩起复:

东南大局攸关,必须声威素著之大员督率各军,方能措置裕如。曾国藩开缺回籍,计将服阕。现在江西抚、建均经克复,止余吉安一府,有曾国荃、刘腾鹤等兵勇,足敷剿办。前谕耆龄飭令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驰援浙江。该员等皆系曾国藩旧部,所带兵勇,得曾国藩调遣,可期得力。

在相近的时间里,湖南巡抚骆秉章也特为上奏,表达了同一个意思:

现在援江(西)各军将领,均前侍郎曾国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乡,即其旧部,若令其统带赴浙,则将士一心,于大局必有所济。且江、浙本属泽国,利用舟师,杨载福、彭玉麟两军,皆系曾国藩旧部。^②

诏书和奏议所倚重的,都是曾国藩对湘军的个人影响力与支配力。于是,自三藩平定之后,朝廷第一次承认了将帅驭军的不可替代性。

曾国藩的影响力和支配力无疑有着出自儒学人格的一面,但驭军的不可替代性则更多地生成于湘军的营制。因此,随湘军在内战中越打越大,从这个制度中还会更多地产生出一个个以恩威

^① 《湘军志·江西篇第四》。

^② 《曾国藩年谱》,95页。

专制一军的人物。稍后，他省官绅募勇守土，各自为战，纷纷然取法湘军营制，^①将帅之间遂愈多“宗派”，也愈多以“宗派”分天下兵权的自觉意识。等到淮军继起，则派分益显，诸军皆以将帅之名为名，如同印上了各人的铃记一般。于是而有树军、铭军、鼎军、盛军、松军、庆军、奇军、勋军、魁字营、仁字营、昌字营、开字营、胜字营、荣字营、善字营、群字营等等千姿百态的名目。循名责实，其间自有许多不可思议。这个过程与功在社稷的武勋连在一起，并因之而为朝廷所默默接受；然而正在取代绿营的官勇也在这个过程中日益弛脱了自己与朝廷之间的关系，儿几乎成了统将据有之物。当将帅们接二连三成为封疆大吏之后，兵权也随之而去，移为督抚手里的东西。咸丰末年，胡林翼曾说过：

近年督抚以不带兵为自便之计，亦且以不知兵为自脱之谋，此所谓甘为人下而不辞也。凡事以谦为美德，惟兵事不可谦，谦则为败德。且手中腹中无兵无将，即一步不行。^②

这些话非常显豁地说明了从内战中崛起的督抚与前代疆吏的不同意态；也非常显豁地说明了后起的督抚对兵事一道的利害祸福久已思之烂熟，并正在以包办之心把兵事揽入自己的手掌之中。在那个时候，包揽是与筹划天下的一片热诚连在一起的。但在历史的延续之中，热诚是一种不能耐久的东西，而包揽却可以积久成势。因此，三十多年后，康有为议兵政，他所看到已只见包揽而不见热诚了：

昔徐寿衡为兵部尚书，吾问其举国兵数。徐尚书答曰：“我兵部惟知绿营兵数。若其勇营练军，各督抚自为之，吾兵部安得知。”夫以兵部尚书而无由知全国兵数，况

① 参见《湘军兵志》，205页。

② 《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五，《致左季高京卿》。

于调遣训练乎？

与之相对衬的，则是督抚之各私其兵：

向见广西有乱，请兵于湘，请械于粤，则湘粤辞之。
苦请固求，卑辞类乞，频请严旨严迫，乃勉强以客军旧械
应之。

他因之而深致感慨：“一兵一卒一饷一糈，朝廷皆拱手而待之督抚，督抚又皆以保疆圉为词，言之有故，持之成理。”^① 由于湘军的改制把高悬的兵权解了下来，后起的“开府持节之吏”手里有军符，眼中便不会再有梅曾亮笔下那种“东西南北方制上余万里，手足动静视中国头目”的一派肃杀。而后疆吏各言兵政，则天下遂无兵政。内战中的变法虽然志在经世，但变法的预想一旦演为现实，造出来的却是一种不受控驭的局面。因此，当初为王朝振衰起弊而掙击过绿营制度的改作，在后代经世知识分子的眼中也成了一种被掙击的东西。

内战促成了兵制的变法。然而成千上万的军队从团练中脱胎而出，又使养兵成为一个难题。于是，在营制抉破旧规之后，饷制也抉破了旧规，牵连所及，遂使国家度支之法大变。

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已定都金陵，而漫长的战争还刚刚开始。户部的一道奏折说：

今则军需迫不待时，指款悬而无薄。被兵省分，既已无可催征，而素称完善之区，如江苏则请缓征；山东则早请留用；山、陕、浙江皆办防堵，是地丁所入，万难足额矣。扬州久被贼占，汉口疮痍未复，淮南全纲不可收拾，是盐课所入去其大桩矣。芜湖、九江、江宁、凤阳，先后被扰，夔关、苏关，商贩亦多裹足；甚至崇文门亦请尽收尽解，是

^① 《裁行省议》，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二辑，第五册，85页，正中书局（台北）印行。

关税所入，仅存虚名矣。此皆常年所指为俟拨者，今以尽供军需，犹虞不足。于是约征不可恃，乃借助于捐输，捐输不可恃，乃乞恩于内帑。近天捐输之数，业已大减，内帑所藏，亦复不敢轻议。此外补苴之术，如停养廉、开银矿、提当本、收铺租，凡臣等管见所及，与在京臣工陈奏各事宜，见之施行者，不下数十款。

斯可谓罗掘俱穷，而各省需索却正方兴未艾；这就使“有尽之经营”与“无厌之吁请”^①成了一种无法化解的矛盾。延烧不息的战火把大片土地上的地丁、盐课、关税都化成了灰烬；又使军中的“饷需”一天比一天膨胀。两者都在把国家度支逼入死角。到了户部没有办法再支撑于两者之间的时候，便不能不放开手来，把饷事的主权让给了主持地方军务的人们。咸丰四年，朝旨说：

现在贼氛未靖，各路军营饷需浩繁，部库筹拨银两实形支绌。叠经降旨，并由户部奏明，行知琦善、向荣、胜保等军营，运储米石，以充军食。湖北等省漕粮，均准截留接济；山东折漕，因恐出入折耗，令将米石拨营备用；各处仓社米石，均准关支。

其有漕省分，征存未运漕粮，均准各该粮台就地动用；其无漕省分，均令于所属仓谷项下酌量关支。^②

朝旨意在—时权宜以解迫来之急，把悬在户部头上的沉重压力移到地方上去。但久处于国家法度层层套叠之中的地方当局则因之而被放开了手脚。胡林翼后来统而言之曰：“至今日，则兵无可调，惟有募勇；饷无可请，惟有自筹。”^③由“无可请”所换来的“自筹”，正是一种下移的国家权力。

① 转引自《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台北),177页。

② 《文宗实录》，卷一三九。

③ 《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四，《复军机蒋叔起》。

二百多年来,户部缩天下财汇,曾长久地代表了朝廷心里的那个一统之局。但当饷事由户部移入地方之后,财权也会被牵着向下面走去;原本的一统之局遂不能不沿着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界限分解开来。在这种分界中所产生的是切近的局部利益。于是,内战中的饷事便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与四面八方争利的过程,种种紧张由此而生。这个过程常常要使朝廷失落许多东西。同治二年,上谕向地方追索京饷说:

历年京饷,向系预拨各省地丁、盐课、关税、杂款,以备次年开放之月。咸丰十一年以后,每年均拨七百万两,责令分限解齐。惟山西年清年款,他省多不能依限报解,且有逾限不解者。虽因防剿吃紧,奏请留支,或解军营,径行划拨,而藉词诿卸,亦所不免。^①

这些话写照了饷事移入地方之后的变迁。在中世纪中国,京饷久被称作天庾正供,是食君之禄的人所不敢轻慢的物事。然而时至咸同之交,地方因筹饷而得各自为计,则非常容易把局部的利害放得很大,轻重缓急之间便常常顾不上遥远的京师。“他省多不能依限报解,且有逾限不解者”,正说明了用“留支”的名目把京饷就地挪用掉的事是十分普遍的。当地方利益与朝廷利益在内战中被时势分了开来之后,朝廷便成了被侵蚀的一方。虽说诏旨意在儆饷后来,但度支旧轨正在改道之际,儆饷多半成了空话。仅仅过了一年,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又会衔奏告粤省“防剿万紧,支应加倍纷繁。若因饷需不继,致有疏虞,则地方蹂躏,民生涂炭,害在眉睫”,乞“应解京饷请全数截留稍供支放”。^② 在诏书与奏告的对话里,地方所代表的利益往往与兵事的胜败直接胶连在一起。由此产生的急迫,比朝廷一方出自旧章的那些道理更能动人心魄。因此,君

① 《穆宗圣训》,卷三〇。

② 《郭嵩焘奏稿》,119~120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与臣各说各的理,但当内战的兵火正从一个地方延烧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让步的多半是朝廷一方。于是京饷也就此成了经常被截留的东西。熟视已久之后,恍如惯事。光绪六年,户部追溯说:军兴以来各省文武官员养廉减成,可年掣白银九十余万两汇提解京。然而“迄今已二十余年”,掣搏下来的这些银两均经地方“借拨”而归于一乌有。^①虽说这个时候战争已过去多年,但在战争中被剖分开来的利益却如同改了道的河流一般,日积月累,自成泾渭,不复再能纳入旧川了。

在京饷之外,朝廷用以调度天下财政的还有“协饷”,即从有余省分的钱粮中指拨一部分解运于不足省分,此谓之酌盈剂虚。然而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分解之后,酌盈剂虚的事也随之而变得非常困难。咸丰三年,安徽巡抚蒋文庆中途截留浙江解送两湖的饷银七万两;江西巡抚张芾和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则分别从广东解往江南的饷银中截走了十五万两和四万两。^②此后,类似的事常常发生。这种半路拦截过境钱粮的做法不会没有自己的理由,但地方贸然越位,却不能不使朝廷调度财政的全权在节节掣肘中日趋颠倒错舛。天下财赋之序遂不可问。“拦截”移用了朝廷指拨,也因此而搅散了协饷之法。在后来的岁月里,促成协饷之法大乱的还有另一面。咸丰六年,正在江西作战的曾国藩因“八郡沦陷,钱漕捐输无从措手”,曾“先后奏请于上海抽厘者一次,请拨上海关税银者二次”,但“均经江苏督抚臣议驳,未得筹拨来江”。而“欠饷愈久,兵勇愈疲。且亡者无恤银,伤者无养银,怨望之情,积而为挟制之状”。遂不得不再度上诉,“请飭山西陕西两省每月各

① 《光绪朝东华录》,866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 《文宗圣训》,卷一〇六,一〇七;《曾文正公奏稿》,卷一,《请截留粤饷筹备湖南炮船片》。

筹饷银三万两。”^①咸丰七年,胡林翼奏报说:“浔阳两岸水陆马步诸军往往糜粥度日。其月饷本须二十万,旧欠未清,新欠复续,北岸都兴阿,南岸李续宾,马步积欠各三十万,杨载福水师,积欠几十万。”然后以“连年苦战,竟不能求一饱,情殊可悯,势亦可危”为警醒之辞,吁请朝廷“飭催各省应解湖北月饷”。^②咸丰九年,曾文、曾国藩、胡林翼联衔会奏,“请飭浙江按月协饷”。其中有一段专门申说:“钦奉谕旨飭令四川、陕西、山西、江西等省,各按月协济臣国藩军饷三万两在案。除江西按月拨解外,仅陕西报解壹万两,四川、山西并未报解。”“臣等再四商筹,万分焦虑。”^③湘军转战的长江流域既是久经兵灾的破败之区,又是诸军屯集的百战之地。这两面相连而且相扼,使身在局中的人们不能不一次次地吁求协饷。但屡见的“议驳”、“飭催”和“并未报解”,又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他们殷殷期待的协饷老是落空。在一个财赋渐归地方支配的时代里,利界便成了一种难以逾越的东西。疆吏各自为谋,所以来自朝廷的指拨常常是淹掉的居多,协济之法遂萋萋然难乎为继。然而正在进行的内战却天天都在耗饷、索饷,不容协济之法晦晦消歇。这种矛盾长久地存在,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于是,原本属于财政调度的事务竟不得不用人事调度的办法来解决。同治元年三月,曾国藩奏请“特派二三品卿一人,驰赴广东,驻扎韶关,办理通省厘金,专济苏、浙、安徽三省饷项”,^④一个月之后,他在家书中提到这件事,颇慰“广东督办厘金,放晏端书,以其戊戌同年而派。朝廷之用心,良可感矣”。^⑤但自另一面看去,国家的公事须得借同年私谊作交情,则又显然地表现了一种迂回曲折。此后,由于两

①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740页。

② 《胡文忠公遗集》,卷十五,《请飭催各省应解湖北月饷片》。

③ 同①书,1028页。

④ 《曾国藩全集》,奏稿(四),2122页。

⑤ 同①书,824页。

广总督劳崇光“把持牢固”，办厘金的晏端书“苦心经营，卒乏成效”，^① 预期的接济犹如画饼，只能看，不能吃。当年八月，朝廷罢劳崇光，以黄赞汤为广东巡抚、刘长佑为两广总督；不久，又以毛鸿宾代刘长佑、郭嵩焘代黄赞汤。后四个人都是与湘军渊源极深极厚者，取舍替代之间，不难看出朝廷对于军务俯从迁就的一片苦心。因此，粤省易官之际，东南军中多庆得人，以为“前此上存阻挠，下怀观望，原难见功。现闻印（印渠，刘长佑）帅为督，莘（莘农，黄赞汤）帅为抚，气谊当易交孚”。^② 在这一番腾挪搬移里，朝廷能够调换一个个踞坐在疆吏席位上的人，却无法绕过疆吏的权力而对地方财赋作挹此注彼。因此，用人事调度的办法来实现财政调度，质而言之，不过是化私交的亲疏为协济的厚薄，而朝廷法度所曾经有过的那种公意则在掺入的人情之中不能不日见淡褪。

与屡被兵祸摧折的地丁、盐课之类相比较，原本不在国计范围之内的厘金是内战中一枝独秀的东西。然而后来居上的厘金又是一种由地方自行挖掘出来的利藪。“咸丰三年，刑部右侍郎雷以诚治军扬州，始于仙女庙等镇创办厘捐”，以商业为税源；^③ 尔后各地先后仿行，遍及四面八方。但“厘金一项，取什一于商贾，款目繁多，事务冗杂，过客之来去无定，抽收之多寡难权，非若地丁钱粮，垂为定额，官有册籍可稽，民有旧章可守也。”^④ 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各出机杼，并与户部的臂指隔得非常遥远，所以，新起的厘金制度一定会比旧法中的地丁、盐课、关税引出更多的纷歧舛错、纠葛抵牾。咸丰十一年，主持政务的奕訢已在奏议中提到厘局与洋关争税的情状：

①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2927、3046页。

② 同①书，3226页。

③ 《清史稿》，3694页。

④ 《职庵杂识职庵二识》，23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广东设有洋药抽厘总局,如有人先输五十两,即无庸在关上完纳正税。又澳门漏税之茶叶,日见其多,每百斤税银二两五钱,抽厘局只征五钱,即可任商绕越走私,无一肯到关纳税。^①

在这里,厘局收入的是地方税,洋关收入的是国家税。因此,厘税之旺与洋税之衰正以鲜明的对比折射出地方向朝廷争利的肆无忌惮。奕訢代表朝廷一方,其言之忿忿是理所当然的。但时当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经济的分解还没有为商品经济让出足够的余地,商业活动为逼仄的空间所限,商税的来源也为逼仄的空间所限。因此,地方税与国家税在狭路中相遇相克常常是一种避不开的事。由此产生的矛盾,使厘金天然地带有一种吞噬正帑的侵蚀性。同治三年初,曾国藩作《淮南盐运畅通力筹整顿折》,说到盐课与盐厘的拮据:

而筹办之难,大端有二:一在邻盐之侵灌太久。西岸则食浙私、粤私而兼以闽私,楚岸则食川私、粤私而兼以潞私,引地被占将及十年,民既借此以济食,官亦借此以抽厘,积重难返,久假不归,势不能骤行禁绝。一在厘卡之设立太多。淮盐出江,自仪征而金柱关,而荻港,而大通,而安庆,而华阳镇,以达于楚、西,层层设卡,处处报税,均以盐厘为大宗,诸军仰食,性命相依,势不能概行裁撤。^②

在没有厘金之前,盐务所榷的税目只有一种盐课。以纳课与不纳课为界,遂有官盐、私盐之分,其合法和不合法是一目了然的。但到这个时候,厘局中的人们却更乐意把“浙私”、“粤私”、“闽私”、“川私”、“潞私”等等与官盐熔为一炉,概以抽厘之法烹之。由此直

① 《皇朝政典类纂》,卷九十六,5页。

② 《曾国藩全集》,奏稿(七),3915页。

接获得的一时一地之利更多,而留给盐政的则是长久的祸害。一方面,不合法的私盐在纳厘之后便成了受到保护和鼓励的东西,于是而有两岸和楚岸的“侵灌”。在这些“引地被占”的地方,国家是收不到盐课的。另一方面,官盐在运销过程中受“层层设卡,处处报税”之厄,流出去的许多银子,本来都是应当归盐课所有的。曾被太平天国梗阻多年的长江运道重新贯通以后,户部力主率由旧章,以恢复中断了的课额:“查准(淮)南科则,每引六百斤,应征入奏正课银三两零,又不入奏正课银三两零;统计每引征银六两一钱三分零,咸丰七年,淮盐片引不行,暂改设局收税。每百斤抽银一钱五分,每引九钱,较之课额不及十分之二”。是以“现既改复引盐,即应按引征课”。^①这些话都是言之成理的。然而纸面上的道理常常罩不住变化了的事实。曾国藩说:“近年楚西之盐,每引完厘约在十五两以上。”又说:“殷商绝少,招来尤难”。显然,当初盐课减额让出来的税银,早已被厘金加倍地吞吃掉了。而这些吞进来的厘金又都在接济着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军队,“皆万不可停者”。所以,“应完(盐)课银,因盐厘为数过重,未能遽议加增”。^②户部那一套道理遂不能不在已经形成的因果关系面前退却。这一类例子非常深刻地说明了厘金是以牺牲旧税来成全自己的。两者的消长,当然会把财政制度弄得七颠八倒。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西方人带来的经济关系日甚一日地渗入中国,并在一个农业社会里不断诱发出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人群。于是,向商业活动榷税的厘金也越来越膨胀,遂使国家“岁入之项,转以洋税、厘金为大宗”。^③但在内战中被弄得分散了的国家财政却很难再重新粘结起来。所以,终晚清之世,厘务的命脉一直在地方。

①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335页。

② 《曾国藩全集》,奏稿(七),3917页。

③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二十六,《进呈解办年例汇奏会计出入黄册疏》。

当旧的国赋与新的税源成为将帅和疆吏可以支配的东西以后,在各地“自为收支”的过程中先后产生了一个个原来没有的机构。咸丰七年,曾国藩奏告“报销大概规模”,曾撮叙始末说:“臣处一军,未经奏派大员综理粮台,亦无专司之员始终其事。”“在衡州时,出入银钱,多系自行经理。委员即补同知陶寿玉检点账目。四年二月至长沙,委员候补知府李瀚章管理收支事件。七月由岳州赴鄂,于长沙设立后路粮台,派湖南即用道裕麟、湖北记名道厉云官司其事。其水陆行营收支事务,则李瀚章及江南同知郑德基主之。九月以后,于汉口设立转运局,派礼部员外郎胡大任司其事。五年驻军南康,于南昌设立后路粮台,派礼部员外郎甘晋及李瀚章司其事。”^① 咸丰十年之后,曾国藩总督两江,又在赣、皖先后设总粮台。虽说他沿用了旧有的“粮台”一词来指称湘军中的饷务机构,但在咸、同之前,综理饷事的粮台是一种因战事而奉旨特设的机构,主其事者衔钦命而来,过手的军需则全部来自朝廷的指拨;军队向粮台取饷,粮台向户部报销。显然,铃束粮台的不是将帅而是朝廷。以此为比照,则曾国藩所说的粮台既被移入统兵大臣的节制之下,自是另一种东西了。对于置身兵事之间的将帅疆吏来说,后者无疑更便利。因此,地方也设粮台。胡林翼巡抚湖北期间,曾自创“湖北总粮台”名目,“无论何项进款,皆归粮台弹收;无论何项开支,多饬粮台批发”,粮台遂成一省财赋总汇之地。“在当时,胡林翼办理防剿,兼筹支放水陆各军,便于取携,自应为此一时权宜之计。厥后地方底定,邻境荡平,五年之间,巡抚接篆视事者五员,皆因在任未久,不暇兴复旧制。”^② 这种主官屡经更迭而旧制久未“兴复”的现象,正说明了“一时权宜”的粮台能给予疆吏前所未有的自如。由于移用过来的粮台一词未经正名,权界和意义

①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871页。

② 《曾忠襄公奏议》，卷一，转引自《新湘军志》，193页。

都缺乏明切的确定性,所以,其内涵外延反而容易被随意放大,把各种各样东西都统括进来。据赵烈文记述,时至同治六年,两江总督名下的“后路粮台”和“金陵粮台”已经把“沪厘”、“沪之中国关”、“苏省牙厘”、“地丁”、“淮北票盐预厘”、“洋税(二成)”、“运库课厘(之半)”、“皖省牙厘”^①等等,都划入了自己的进款之中。这些不同来路的赋税大半都是职有专司的东西,因此,当它们被一网收进粮台的时候,原本归别人所有的事权便也被一同卷走了。于是,“掌一省之政,司钱谷之出纳;十年会户版,均税役,登民数、田数,以达于户部”的布政使便最先成了名不副实的东西。^②

当内战过去之后,将帅多成疆吏,被他们用惯了的粮台也转化为以“局”立名的种种衙门,并就此积淀下来。^③光绪十年,户部概述说:

查各省散置各局,已报部者,于军需则有善后总局、善后分局、军需总局、报销总局、筹防总局、防营支应总局、军装置办总局、造制药铅总局、收发军械火药局、防军支应局、查办销算局、军械转运局、练饷局、团防局、支发局、收放局、转运局、采运局、军械局、军火局、军装局、军器所、军需局等项名目;于洋务则有洋务局、机器局、机器制造局、电报局、电线局、轮船支应局、轮船操练局等项名目;于地方则有清查藩库局、营田局、招垦局、官荒局、交代局、清源局、发审局、候审所、清讼局、课吏局、保甲局、收养幼孩公局、普济堂、广仁堂、铁绢局、桑线局、戒烟局、刊刻刷印书局、采访所、采访忠节局、采访忠义局等项名目;其盐务则有各处盐局、运局、督销局;其厘卡除牙厘局

① 《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五月廿七日)。

② 《皇朝文献通考》,卷八十五,职官考九

③ 以“局”立名的地方机构在内战中已经出现。内战过去之后尤日多一日。

外,则有百货厘金局、洋药厘捐局,暨两项各处分局更不胜数枚举。其未经报部者尚不知凡几。^①

这些机构显然是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流派,比之粮台,又更多地表现了时势变迁中的日新月异。然而其中大半都与度支相关,以财赋的收入和支出为职份,粮台借“一时权宜”为督抚集中起来的种种地方利益都在这些机构里保留下来了。因此,其间的东西在朝廷眼里都是不入法度之物。光绪十五年,上谕说:

从前各省办理军务,创立支应、采办、转运等局,本属一时权宜,不能视为常例。迨军事收平,又以善后为名,凡事之应隶藩司者,分设各局,名目众多。盐务则督销分设,局卡林立,大率以候补道员为总办,而会办、随办各员,其数不可胜数。所有转(专)管之藩、运两司,转以循例画诺为了事。

朝廷不喜欢这些从法度之外旁生出来的东西,但朝旨反复饬令的“一律认真整顿”和“删减归并”^②却老是实现不了。直到宣统元年,度支部奏议“各省财政统归藩司综核”,还是不得不从这个已经讲了多少年的题目说起:

国初定制,各省设布政使司,掌一省钱谷之出纳,以达于户部,职掌本自分明。自咸丰军兴以来,筹捐筹饷,事属创行。于是厘金、军需、善后、支应、报销等类,皆另行设局,派员管理。迨举办新政,名目益繁,始但取便一时,积久遂成为故事。^③

可见,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虽然疆吏换了几代人,但被内战改变了的财政关系却能够承前接后于疆吏的来

① 《光绪朝东华录》,1879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 同①书,2680页。

③ 《政治官报》,第廿册,第五六五号,《各省财政统归藩司综核折》。

去之间，在一个个器识阅历、志度怀抱各不相同的人们手里传递下去。朝廷与地方之间的牴牾轳轳也因之而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战时的粮台和后来“另行设局”，与地方财政绞缠在一起的种种机构，使将帅和疆吏支配财赋的权力能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沉积凝固于朝廷和地方之间。因此，这一类新衙门虽然不在国家官制以内，但它们代表了疆吏力搏的延伸，与旧衙门争利之际却具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优势。由此形成的此长彼消，一点一点地把天下财政的重心从朝廷专任的官员手中移到了督抚扎委的官员手里。于是，二百年来户部经藩司、盐道、税关监督等等总辖天下度支的那种局面便日趋瘦缩，再也不能回复旧观了。同治三年，曾国藩已感叹：

前代之制，一州岁入之款，置转运使主之，疆吏不得专擅。我朝之制，一省岁入之款，报销听候部拨，疆吏亦不得专擅。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吏之权日重。^①

其时，湘军正在围攻天京。他是促成了这种变化的人物之一，身在局中，以后来比过去，感受格外分明。“户部之权日轻，疆吏之权日重”，说明了朝廷在内战中借出去的权力已经被疆吏们咀嚼消化，再也收不回来了。随后的五十年，许多东西都会因之而错位。

三

延续十多年的内战，不仅分解了集中在朝廷手里的兵权和财权，而且造成一种人世运会，使天下才智之士多聚汇于疆吏的周围。以此反观京师气象，则此盛彼衰，庙堂里的人物往往显得卑卑气弱，见不到集群而起的出类拔萃之辈。比之兵权和财权的分解

^① 《曾国藩全集》，奏稿（七），3997页。

挪移,人才的流趋无疑更能窥测出地方与朝廷的轻重在板荡时势中的变迁。

在道咸年间的经世思潮中,人才消长曾是一个长久引发过忧思的题目。严酷战争把这个题目直接推到了当道者的眼前;又以兵戈掀起的波涛,将一群群散在四方的有心人拔出流俗,卷到漩涡里来。咸丰二年,张亮基“自云南移抚湖南”,^① 恰逢太平军重兵逼长沙。“时承平久,文吏未见兵革”,^② 正在贵州做官的胡林翼向他“举湘衡之士七人”,尤称左宗棠“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③ 一个寻常举人因之而成了大吏心目中的豪杰。而后,躲在深山里“避寇”的左宗棠方自“诛茅筑屋,为自保计”,^④ 张亮基已“发急足至山中”招请,“一以兵事任之”。^⑤ 迨张亮基迁湖广总督,继任的骆秉章益礼敬之,“推诚委心,所计画无不从,得尽所为”,隐隐然“专湖南军事”数年。^⑥ 另一个举人郭崑焘也在咸丰二年入张亮基幕,自此崭露头角。随后骆秉章、毛鸿宾、恽世临、刘琨次第抚湖南,“皆延入幕,倾心倚任”。^⑦ 虽说他的哥哥郭嵩焘后来以超迈时流的卓识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但以才干作比较,则咸同之间的人物更推许的还是郭崑焘。^⑧ 古已有之的幕府制度在危难逼来的时候显出了它富有弹性的一面,为这些各怀韬略而没有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种事功的路径。由是,曾被

① 《左宗棠年谱》,29页,岳麓书社1982年版。

② 《养知书屋札记》,转引自《左宗棠年谱》,31页。

③ 《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十五,《上张石卿中丞书》。

④ 《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349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⑤ 同①书,30页。

⑥ 同①书,39页。

⑦ 《清史列传》,6060页。

⑧ 《星庐笔记》,72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龚自珍用诗人的浪漫憧憬过的“不拘一格”便在内战的血火里非常不浪漫地出现了。

张亮基和骆秉章都是那个时候善用人才以成一时之功的识时务者。然而他们的局度也仅止于因才器使，其思虑所及，很少有广求远视的意念。与他们相比，刚刚做了团练大臣的曾国藩“每牒府县招致贤俊”，并“手书告劝乡人士耆老，虽幼贱，身自下之，必与钧礼”，显然表现了更多罗聚四方的恢廓和自觉。作为回应，“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一时悦服，“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①他后来在一封信中说：

大约上等贤哲，当以天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阁下眼界过高，将来恐全无中毅之人。程子告司马温公曰：“愿相公宁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贤之心自此而墮。”阁下味此二语，庶几悬格渐低，取士渐广。^②

这些话意在用自己的阅历作别人的启导，说的都是平实之言，而文辞之间自能现露出说理的洞达和力行的沉挚。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战争正在把人拖得精疲力竭，并以倏起倏落的成败利钝使人不息地转辗于生死存亡之途。但曾国藩之热心延揽，却常常怀抱一种超越了成败利钝的寄托。咸丰十年，他与胡林翼论时势，曾非常苍凉地说过：“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③他所着眼的东西，要比同时代的人们显得更大一些，其苍凉之中也多了一派致远之意。因此，在二十年漫长岁月里，他曾汇聚和笼罩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知识分子群。同治二年，容闳至安庆谒曾国藩，目睹会集在那里的众

① 《湘军志》，20页。

②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2767页。

③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1538页。

多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此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①

他直观地写出了四围兵祸之中安庆一隅的人气之旺，既有惊异，也有赞叹。曾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了八年光阴的薛福成后来作《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罗举“所尝与共事”，及“溯所闻而未相覩，或一再晤语而未共事”的一时翘楚都八十三人，各以器识才干标榜，分为“闳伟”、“明练”、“渊雅”、“雄略”、“硕德”、“隽辩”、“清才”、“闳览”、“朴学”、“干济”、“勤朴”、“敏贍”。比之容闳的直观记录，无疑要更深入一些。这些人附丽于湘军。而籍贯分属合肥、长沙、平江、武冈、溧阳、奉新、嘉兴、长洲、定远、中江、阳湖、溱浦、遵义、桐城、新建、开县、南昌、吴川、桂阳、江夏、衡阳、益阳、瑞安、乌程、江阴、湖口、剑州、望江、东湖、巴陵、南丰、武昌、德清、新城、当涂、独山、秀水、武进、海宁、江宁、石埭、南江、仪征、宝应、金匱、无锡、南海、宜兴、忠州、宣城、汉阳、富顺、歙、黟、泾，还有汉军，大半都不是湖南人。薛福成刻画这些从四面八方来的人“闻公(曾国藩)下土，徒步数千里从公”，又以他们的钦慕景从反衬出曾国藩“致力延揽，广包兼容”在那个时候的声气远播。两者由感应而聚合，而后有“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②

幕府制度本是非常古老的东西，时至清代，已源远流长而几经

① 《西学东渐记》，110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② 《薛福成选集》，213~2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变迁了。乾隆年间,袁枚曾说过:“古名士半从幕府出,而今则读书不成始习幕,此道渐衰。康熙、雍正间,督抚俱以千金重礼,厚聘名流。一时如张西河,范履渊、潘荆山人满保、李卫幕;岳水轩等皆名重一时”。^①与前代征召辟置相比较,清世的幕府制度显然更多地维系于一种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读书不成始习幕”的人们并不食君之禄,但随人作幕,勾当的又是官家公事。乾隆年间以久幕得名的汪辉祖说:“上人不得以身出治,而佐人为治,势非得已。然岁修所入,实分官俸,亦在官之禄也。”从这些道理中产生了佐幕的伦理和义法:

官与幕客非尽乡里之戚,非有乡故之欢,厚禀而宾礼之,什伯于乡里亲故,谓职守之所系倚为左右手也,而视其主人之休戚漠然无所与于其心,纵无天谴,其免人滴乎?故佐治以尽心为本。^②

“厚禀”出自做官人的私囊,当它成为佐幕人的“岁修”之后,官幕之间便筑起了一种以东家与西席相对待的关系。这种关系在雇佣之中离“情谊亲洽”,示别于官场体制里的上下尊卑;^③而后有幕宾、幕客、幕友、西宾等等名目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宾礼”。于是,本属官场局外人的佐治一方便成了“官幕同舟”的局中人。“幕客以力自食,名为佣书,日夕区书,皆吏胥之事,而官声之美恶系焉,民生之利害资焉”。佐幕之业虽“因人为事,无功业可见”^④,而天下吏治却半出幕客之手。官僚体制派生了幕府制度,但在这个时候幕

① 转引自《笈外摭屑》,1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 《佐治药言·尽心》

③ 《清史列传》卷七十一说:“值缅甸用兵,命(赵)翼赴滇赞画”。在这种受朝命而佐军幕的场合里,幕府制度都是从官制里移过去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这种情况是少数。

④ 《佐治药言·素位》。

府制度已经成为官僚政治中的一种不可割离的东西了。至咸同之际,内战造成的人才消长使将帅和疆吏的幕府一时辐辏八方,蔚为众川聚流的巨流。佐幕的义法由此而变,因果递连,官僚政治中的骨架也随之而变。

当李星沅、赛尚阿先后衔钦命开军府的时候,他们代表的是在战争中延长了的朝廷权威。因此,职官入军幕“供差遣”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后起的军幕日多一日,虽说它们已经没有那么多敕赐的权威了,但战争本身又在造出权威。是以做官的人依然在军务的名义下沿着旧例被檄调去佐幕。咸同之间,山西人冯志沂“由刑部郎简放庐州知府,出京赴任,道由河南,胜(保)奏留军中司章奏”,^①一个本应到任的太守便被拽入军营做了文案。后来贵为军机大臣的阎敬铭这个时候还在户部做主事,“署湖北巡抚胡林翼闻敬铭在部严整,不可干以私,为吏胥所畏,因奏调赴鄂委用”。^②本来为国家理财的京官遂转过身来为疆吏理饷糈。丁宝楨佐蒋霨远、马新贻佐袁甲三、尹耕云佐毛昶熙,都与此相类,以朝廷命官而受军府差委,作大吏的幕客。与这种军府檄调职官的事相对映,还有职官寻找军幕的事。《清史稿》为李鸿章立传,叙其巛始说:

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从曾国藩游,讲求经世之学。洪秀全据金陵,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奏鸿章自助。咸丰三年,庐州陷,鸿章建议先取含山、巢县图规复。巡抚福济授以兵,连克二县,逾年复庐州。累功,用道员,赏花翎。久之,以将兵淮甸遭众忌,无所就,乃弃去,从国藩于江西,授福建延建邵道,

① 冯志沂字鲁川。《清代野记》,《近代稗海》第十辑,28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清史列传》,4462页。

仍留军。^①

从咸丰二年到咸丰八年,李鸿章在皖北奔来奔去,先后依团练大臣吕贤基、安徽巡抚福济,职分都是办理乡团。“其时皖南北土匪遍地,各乡筑围以御,而又此围攻掠彼围,扰无虚日”。统带乡勇的李鸿章也在这种生涯里消尽了翰苑人物的儒雅性气。一个故事说他领乡团出战,败退,回到自己那个土围子里。“时已逾午,饥甚,入宅不见一人,盖先避去。疾往厨舍,饭正熟。灶低洼,即翘一足踏于灶沿,一手揭盖,一手取碗,直递口狂咽,不暇用箸,亦无一蔬。随咽随呼:同队快干(快食之谓),好跑(即逃之谓)。”^② 其举手投足之间的仓惶和猥琐正非常生动地写照了皖北的乡团还远远没有自成气候的模样。咸丰二年吕贤基战死,咸丰八年福济“镌级去”,无所依傍的李鸿章遂在一个一个山头之间变得非常孤独。与胜保拽留冯志沂、胡林翼指调阎敬铭相比,他从“淮甸”归入湘军幕府,显然更多地出于自寻门户的意愿。而“无所就,乃弃去”则洗练地说明了那个时候的职官在地域和门户之间流动的自主性。在后来的日子里,像这样带着官职到幕府里去“佐治”的人越来越多。以身价履历而论,他们与来自仕途以外的“读书不成始习幕”者当然是不一样的。

在清代的祖宗家法里,朝廷命官作入幕之宾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事。乾隆年间“两定准部,一定回部,两定金川,两定廓尔喀,一定台湾,及安南缅甸先叛后服”^③,用霹雳手段成“十全武功”,统兵大臣的营幕里都有职司“章奏”、“书牍”、“营务”,以及“军事谋画”、“粮饷军火”的京官和地方官。但这些专为征战而设的军幕都具有

① 《清史稿》,12011页。

② 《惜阴堂笔记·书合肥轶闻》,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册,5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③ 《圣武记》,上册,157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非常明显的临时性,它们的权限很少能越出兵营之外。由于襄办戎幕的人选都在帝王那里备过案,所以,佐幕的命官不会有来去进退的个体自由。幕客和幕主都在朝廷的节制之下,相处而不能相熟,相熟而不能相知,相知而不能相亲,很难形成盘根错节的私人关系。在那个时候的幕府制度中,军幕显然是一种缺乏普遍意义的殊相。咸丰初年的军幕依然是沿用祖宗成法构筑起来的。然而仗打得越来越久,军幕的临时性越来越少,孳衍出来的权限却越来越大。军务在漫长的战争中已经居天下之重,因此,在人手不够用的时候,将帅调取职官到营幕中来当差便成了朝廷所不能钳束的事。佐幕的官员也因法度的松弛而获得了一点择枝而栖的自由。当拥兵的将帅先后兼封圻之后,这种调用职官的权力又连带着从军幕里面被移到了疆臣的官幕之中,并就此沉淀下来。变化是从一个一个军府里开始的,但由此伸展而为幕府制度的一部分,则幕府制度中的人际关系便不能不随之而变。

朝廷命官都是食君之禄的人。因此,他们从自己本来的位置上腾出身来走进大吏的幕府里去,明白地显示了由公室转入私门的过程。与官场里的上司和下属相比,幕府是一个更容易培植私谊的地方;然而以职官佐幕,主客之间的对待又并不全然等同于雇佣关系笼罩下的东家与西席。这种异乎上司下属、东家西席的私谊需要一种对应的伦理,于是,咸同以后的幕府遂常常借用涵义宽泛的师生一说相维系。在“督抚俱以千金重礼,厚聘名流”的年代里,隐隐然居“宾师”之位的是幕客。但到了这个时候,做老师的已经是幕主了,幕客中的多数人却只配做弟子。两者的移位,正反映了幕府关系的一种变迁。李鸿章后来追叙自己在湘军幕府中的经历,言之有味的也是师从曾国藩的那些情节:

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曾国藩)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

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而诚服，受化于无形焉。^①

虽说李鸿章在京师的时候曾经“从曾国藩游”，但幕府中师与弟子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由旧谊延续而来的。他所描述的“心悦而诚服，受化于无形焉”的场而，说明了以师生一伦对应幕主与幕客，确乎有过名实兼备的一面。然而在当日的督抚里，像曾国藩那样“持己所学，陶铸群伦”的人物其实并不多。他所留下的导师意态被纷纭的世事磨泐得日久而日淡，并没有在后来的幕府中传下去。迨湘淮嬗蜕，几经生息之后而有北洋幕府挤插一时的“门下俊髦”；在南方，与之声光相埒的则是湖广总督幕府里的那一群“抱冰堂弟子”。这些地方罗致了众多愿意围在疆吏四周的才士，常常引动天下人注目，而用心审视，“心悦而诚服，受化于无形”的景象则极难再得一见。于是，幕府中的师礼遂带上了一种不可用本义界说的模糊性。但模糊的东西更便于引申。对于幕主和幕客来说，因模糊而变了内涵的师礼虽然经不住循名责实的推究，却更多些运用的曲折自如。以此钩连人际，既能够表达出官场体制的上下尊卑，又能够表达出官场体制的上下尊卑所无法述意的私人恩义和私人情感。因此，佐幕的职官由公室而入私门，或多或少，或显或晦，大半都对开府的疆吏奉以师礼。民国初年，被时局弄得非常狼狈的盛宣怀曾托人向袁世凯卑辞疏通，“谓愿出效力”。袁世凯回答说：“七年前，盛欲师事我，我不敢僭前辈。今犹此志，望勿复言。”^②盛宣怀的自甘卑贱显然把师生之义糟蹋得更加不成模样了。虽说这个故事已在幕府制度的范围以外，是后来的事，然而联想前后，由此显出来的种种心态则不会不使人触类旁通，对晚清幕府中的

① 《异辞录》，卷一，21页，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版。

② 《近代名人小传·官僚》，145页，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

师门与弟子之间那可用实利折价的一面略有心悟。

幕府中的实利最初是由军功带来的。同治年间,福建巡抚王开泰奏疏言时政,已列指“军兴以来保案迭开”造成的种种弊端,力主“限保举以慎名器”。^①类似的议论呼应于此起彼伏之间,正说明了内战中的军营是一个不停地制造功名和官阶的地方。一仗之后,血肉的搏杀一定会在文字的铺叙中化出一个保案,使带兵的武将和从军的文官沿着等序拾级而上。帷幄中的人们虽然与战场离得很远,但曲径通幽,易入胜境,与军功的距离则往往更近一些。因此,仗打得越多,保案也造得越多;保案造得越多,这些人头上的顶子也换得越瑰丽。与军营外面那些守着缺分等候铨叙磨勘的官僚相比,在军营里供差遣的职官们无疑有着一种常规所不能统束的优势,他们在别人苦于淹滞的时候自能无碍无窒,九转成丹。咸丰九年,阎敬铭以户部主事入湖北巡抚幕,官阶止有正六品。次年,“官军复安徽太湖,敬铭与有功,以员外郎即补”,而后“升郎中”、升“四品京堂”;至咸丰十一年,已实授湖北按察使。两年之中,晋阶六级。当他最终离开湖北幕府的时候已官拜山东巡抚,而细数时光,则上距入幕之日不过三年有余。^②阎敬铭不是一个没有才干的人,但从仕途上造就了他的显然是湘军的军功。在那个年代里,像这样因佐幕而成大官的人是常常能够见到的。起家拔贡的李瀚章,咸丰三年以知县入曾国藩幕府“总理粮台”。因时叙功,由知州、知府“荐擢监司,旋膺疆寄”,继恽世临之后巡抚湖南。^③李瀚章才地本自平庸,而后来仕路腾达,以总督开府武昌、广州;挂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衔,赫赫然巍巍然。其一生功名的根基大半是在佐幕的日子里筑起来的。军营中的保案能把名位不显

①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十,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版。

② 《清史列传》,4462页。

③ 同②书,4644页。

的人托到青云里去；也能用军功赎抵罪衍，把已经剥掉的官职从朝廷那里讨回来。同光年间的洋务里手丁日昌本由“廩贡生捐教职”入仕。咸丰十一年，他刚刚“署庐陵县事”，即“坐失地方律，褫职”，被剔了出来，随后另辟蹊径，以革职官员托身湘军幕府。不过一年，经“两江总督曾国藩疏报日昌随征有劳，开复原官”。^①当李鸿章开府苏南之后，他又追随而去，为淮军佐幕；并从此崭露头角，数迁而成封疆大吏。

内战使入幕的职官因叙功而得保举，也使幕府中还没有做官的读书人由保举而得入仕。道光十四年，闽浙总督程祖洛因“将幕友陈时等五人率行保列，下部议处。”那个时候“各省督抚幕友”用的都是布衣，“于例不准邀议叙”。^②程祖洛之碰了钉子，正说明这种敬称为“例”的东西是不可通融的。然而十多年之后，它就被太平天国打破了。佐幕的布衣也一个一个由保列议叙而翎顶辉煌。曾国藩当年的讲学之友刘蓉初入戎幕的时候不过是一个“附生”，与“廩生”、“增生”相比，只能算三等秀才。而“经骆秉章、胡林翼保奏，受两朝特达之知”，七、八年内，由训导、知县、知府，四擢而成四川布政使。随后领封圻，以陕西巡抚督办军务。^③后人述掌故，把他列为“同光之间不由科第而致身通显”的“八大生员”之一。^④与之相似的，还有以“增生”入骆秉章幕，而后长久地为左宗棠佐军务的刘典。当他最后“卒于甘肃军次”的时候，已“授太仆寺卿”，赏头品顶戴。^⑤佐幕的过程，把一个布衣造成了公卿。

虽说这些人累保而累升的官秩本属朝廷的名器，但为他们取来名器的则是开保案的那个人。同治年间，曾国藩有意招致淮军

① 《清史列传》，4324页。

② 同①书，2933页。

③ 同①书，3905～3906页。

④ 《佞楚斋续笔》，卷三。

⑤ 同①书，4313～4318页。

门户中的刘秉璋，李鸿章私下里说：“往也，惟此老翁能致人于方面重任”。^① 他所说的正是这种意思。因此，“保案迭开”一面在不停地制造功名和官阶，一面又在不停地制造人际的私利和私恩。从后一面中产生出来的东西，一定会腐蚀食君之禄的人们对于君恩的依恋孺慕，使集权于朝廷的专制主义在一个个职官的手里走样。《异辞录》记叙说：

金陵围攻不下，时苏州已克，朝旨令淮军助战。李文忠迂延不行，显然让功之意。及大功告成，文忠至金陵，官场迎于下关。文正前执其手曰：“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方诏之日促也，铭、盛诸将咸跃跃欲试。或曰：“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刘壮肃曰：“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文忠存心忠厚，终不许，将卒皆知其事。文正益感不置，故云。^②

在曾国荃围攻金陵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城内的太平军和城外的湘军都既病且饥，苦苦对峙于精疲力竭之际，而言路讥弹已纷纷然起。曾家兄弟因之而忧忿交集，绕室彷徨。与他们相比，李鸿章领淮军接连攻克苏南名城，正在锋头极健之时。于是而有“朝旨令淮军助战”。朝旨代表的是君命，但对李鸿章来说，师门的脸面其实具有更大的约束力。所以，他宁可把“诏之日促”放在一边，用自己的敷衍迁延来成全曾国荃攻破金陵的勋业。其间的轻重权衡，已分明显出了偏斜。然而当时的议论和后来的记述，都把这种轻重失衡看成是处事的“忠厚”，在推许之中表现出世人对于这种偏斜的接纳和认同。大吏以国家名器播种知遇之恩，而收获的则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深厚渊源。

① 《异辞录》，卷一，40页。

② 同①书，39页。

内战使保案成为疆吏常常过手的東西。然而他们一旦把这种東西弄得非常嫻熟,就再也不肯轻易放手了。因此,内战过去之后,“保案迭开”的局面却长久地留了下来。光绪九年,以“善辩论,好搏击”雄踞言路的张佩纶上奏论保举,非常峭刻地说:

夫从军以摧锋敢死为上,而叙劳乃属文员;治水以负薪捐竹为功,而请奖不必工次。甚或一案累百人,少亦数十人,连名比牒,作福市恩,此何异于斜封墨敕哉。

又说:

凡保案中任劳者十之二、三,徇情者十之七、八,亦纠之不胜纠矣。若不亟挽其流,下吏生事以邀功,大臣植私以滥举,将若之何?^①

他所罗举而掎击的,都是那个时候的时弊。比之咸同光景,显然更多错乱芜杂。虽说太平天国和捻军已被敕平多年,但军营里似乎还在源源不断地叙功。而军功未歇,新起的洋务又成为经世济国的要目,蓬蓬勃勃地造出了许多“劳绩”,加上没完没了的河工、海运、劝赈、劝捐等等,都在为天下的督抚们提供可用的名目,保案迭开也因之而愈见得心应手。“一案累百人”,而且“徇情者十之七、八”,其间最近便的无疑是幕府中人。^②这种从内战中延续下来的权力久假不归,使一代一代的疆吏之门云蒸霞蔚,也会使幕府制度中的人际关系与物利和物欲缠结得越来越紧。《国闻备乘》述宣统初年时事说:“张之洞晚年笃念故旧,颇以煦煦为仁,凡附之以求官者,必百计经营,履所欲而去。”与他当年厕身清流,以大义责天下的那些言论相比,这种“煦煦为仁”已是堕落。但张之洞浸淫孔学

① 《光绪朝东华录》,1474页。

② 光绪十九年,钟德祥参刘秉璋说:“至道员徐春荣,身在督署;绅士叶毓荣,掌教成都,并无殊功,皆以马边、雷波两厅剿夷等案滥保二品顶戴。”所言正是这一类情况。(《光绪朝东华录》,3266页)比照张佩纶的奏议,又可见世风已成之后言官议论的苍白无力。

多年,心头毕竟还留有太多的儒门义理,所以,其放手植私的腕力与后辈中的强人相比又弱了许多:“当时袁世凯势力极大,出其门者,不二三年辄至专阍。之洞自领封圻,以至入参枢府,推毂人卒不过道府丞参而止。故小人有才者不甚附之。”^① 这些记述虽意在比较人物,而侧写出来的却是一种公室衰而私门盛的景象。由幕府汇聚起来的人材,曾为王朝重造了中兴。然而这个过程又使督抚的幕府变成了天下仕路的捷径。于是,一面是“天下之才不能自见于天下,而先委身于私门”;一面是食君之禄的人“惟感臣门之私恩,而不复知朝廷之威福”。^② 当君臣一伦被蛀得千疮百孔之后,最初的私谊便非常容易地演化为私党了。

朝廷命官檄调入幕和布衣幕客叙功得官,都显示了幕府人物的职官化。而连年内战中的军务又在把事权从别的地方一个一个挪过来,使幕府被锻造为官衙。因军务而集中起来的政府权力屯聚于幕府,可以从纷乱否塞的官场关系中重组起一种与战争相适应的秩序,也会使佐幕人的面目今时不同往昔。咸丰年间,左宗棠主骆秉章幕,自谓“连年因桑梓之故,为披发纓冠之举,忘其愚贱,一意孤行”。^③ 为人作幕而志在“一意孤行”,说明了许多事权已经移到了他的手里。这种移来的权力没有一个规范的界度,左宗棠因之而能够意态纵横,也因之而常常光焰迫人。一则记载说他“腹笥笔底,俱富丽敏捷,而性情跋扈,在骆幕任意横恣。骆短于才,拱手听命。文武官绅非得左欢心者,不能得意;而得左欢心者,无不得意。好之生毛革,恶之成疮痍。”^④ 这些话里显然掺杂着一己之爱憎,但由此画出来的一派声势却与真相离得并不太远。湖北人

① 《近代稗海》,第一辑,288~289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1290、784页。

③ 《左宗棠年谱》,68页。

④ 《道咸宦海见闻录》,315页,失落十字,据《左宗棠轶事汇编》14页补入。

樊增祥以诗文鸣于清末民初，而文苑传写其人，则多半喜欢从他父亲樊燮讲起，并因之连及当年的左宗棠：

（樊）燮承袭一等轻车都尉，历官湖南永州镇总兵，酣饮不事事。巡抚骆秉章将劾之。湘阴左宗棠方以在籍举人佐秉章，主其军政。燮恐，谒求解，伏地拜。宗棠不答，又垢让燮。燮负武官至红顶矣，亦惭怒相垢唾而出。遂以剥饷乘轿被劾。罢官归，谓增祥曰：“一举人如此，武官尚可为哉！若不得科第，非吾子也！”^①

于是从武官的门庭中产生了一个学而优则仕的诗人。在这个故事里，樊燮“伏地拜”左宗棠，并不是一个朝廷命官拜另一个朝廷命官，而是永州镇将拜主持湖南军务的人。虽说左宗棠此时已叙功得兵部郎中并赏“四品卿衔”，^②但对湖南官场来说，更使人敬畏的却是他在幕府中的地位。“垢让”是一种用漫骂来达意的批评方式，其言辞的凌厉必然会夹人许多赤裸裸蔑视。一个候补的郎中能够以十足的傲慢“垢让”实缺红顶大员，凭借的正是这种来自幕府的居高临下之势。然而大官伏地听小官“垢让”毕竟是一件既伤颜面又失官常的事。所以，被剥尽脸皮的樊燮忍无可忍，索性从地上爬起来，“亦惭怒相垢唾”；并在落职之后迭连上诉湖广总督和都察院，深诋左宗棠，最后把官司打到了皇帝面前。这场风波因左宗棠的倨傲而起，但透过个人对个人的恩怨，却不难看到正在扩大幕府事权与由来已久的官场旧序之间不可避免的犄角。湖南掀起的风波之所以能够远达北京，把才气自喜的左宗棠逼人困厄之中，正说明了渎职的樊燮曾经获得过不以是非论曲直的同情和共鸣。后来打动君心的是南书房里潘祖荫的一折，他说：“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

① 《现代中国文学史》，203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② 《左宗棠年谱》，56-63页。

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因此，“左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① 加上湘军群帅交章保荐，遭“谤陷”的左宗棠才有惊无险地走出困厄，而后以事功发煌，渐至大位。樊燮与左宗棠的官司就此了结，反映了朝廷的权衡和取舍已不能不受到内战的制约。潘祖荫的奏议本意在于用军务烘托左宗棠，而不知不觉之间却论证了幕府在内战中扩展事权的合理性。合理的东西总是锄不掉的，因此，当左宗棠离开长沙之后，刘蓉接手为湖南巡抚佐幕，依然是一个能够坐在帷幄里支配文官和武官的人。

左宗棠的例子，以鲜明的个人方式表现了幕府的权威。但在国家权力的一部分从政府移入幕府的过程里，个人方式不过是一种表象，比表象更深刻的则是幕府权力在这个过程里的制度化。咸丰四年，曾国藩自衡州建旗东征，奏报军中“设立八所，条综众务：曰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皆委员司之”，^② 这些机构都在主军政的营务处之外，本应另成一局，但这个时候却移入军中，为幕府所统括。而八所兀立，又非常壮观地筑成了一排幕府的衙门。过去用岁修聘来的幕友礼遇隆而权分少，他们的足迹多半被圈在东家的官署之内，不能发号施令，也无须与上下左右的行政机构作公务往来。在那个时候，政府和幕府之间有着一条明晰的权界，坐而论道的西席不能超出自己所在的那个范围。然而“条综众务”的八所显然不是坐而论道的地方，其中许多公事都与别人的官署相牵连，因此，司其事的人们虽然分属幕客，而行使的则是衙门对衙门的权力。这些从幕府里伸出来的权力本来是一种野生的东西，却极富张力，它们一经产生就会随幕主官位的腾达而膨胀，轻易地淹掉了幕府和政府之

① 《左宗棠年谱》，71页。

② 《曾国藩年谱》，37页。

间原有的界限。咸丰十年，曾国藩奉旨“署理两江总督”，幕府制度也越来越宏大。他后来奏告说：“臣在皖南驻扎行营，仍于安庆水次设立老营，规模与行省衙署相似。历年文卷概存水次官署，专委司道大员经管。其地方寻常事件，即令代拆代行，紧要者汇封送营核办。此臣兼管地方变通办理之大概也。”^①“行营”和“老营”都是幕府，“行省衙署”则是政府。“老营”之“规模与行者衙署相似”，正非常明白地描述了幕府在内战中的政府化。因此，被“专委”的“司道大员”无须由朝廷指派到任，只要从幕府里的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就可以了。后来领兵作战的大帅们一个一个膺疆寄，大半都是用这种办法来“兼管地方”的。比之左宗棠的跋扈，这种制度化的过程显然更内在地反映了国家权力的变迁，它所牵动的官场关系也会广泛得多。两年后，久主粮台，为湘军“综饷务”的李瀚章经“曾国藩派充襄办广东厘务”，^②期为军营助饷。就其本旨而言，“襄办广东厘务”是从粮台里蔓生出来的一种差使，但那个时候的广东既不在湘军的作战范围之内，也不在两江总督的治辖范围之内。所以，“派充”需要请旨，而“襄办广东厘务”也随之成了朝廷的一种差使。粮台的差使取得了朝廷差使的名分，使湘军幕府里伸出来的权力能够越界进入广东的官场之中，对比清代列帝惯以国家法度衙勒疆吏幕府的谨慎和细密，这种由朝廷助成的空间跨度无疑是不同寻常的。清人喜欢持“例”以为立论之据，内战则像一场大火一样，烧掉了许多旧“例”，又焙制出许多新“例”。后四十年里，督抚中的强者往往伸手越界，把幕府关系拉得很开，以“例”而言，并不是无所取法的。

从内战中崛起的那一代疆吏生当多难之世，他们常常要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中瞻前顾后，并不得不做许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① 《曾国藩年谱》，117-118页。

② 《清史列传》，4639页。

由此拓展出来的局面,最初都是与幕府制度接在一起的。咸丰十一年冬,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①他后来说:“窃中国试造轮船之议,臣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复奏购买船炮折内即有此说。同治二年间驻扎安庆,设局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②是“内军械所”有时候又被简称为“局”。虽说后来的历史叙述已把这个机构指为“清政府经营近代军用工业的开端”,^③但在当时,新起的“内军械所”与分属粮台的“军械所”一样,都不过是幕府里的一个部门,所以,主其事的徐寿、华衡芳皆以幕客受曾国藩“檄委”。与安庆的曾国藩遥遥相对,已经“孤军入沪,进规苏浙”的李鸿章也在长江下游忙着“就军需节省项下,筹办机器,选雇员匠,仿造前膛兵枪、开花铜炮之属”。^④正在广东当差的丁日昌被“催调”入幕以“专办制造”;英国军医马格里也因“通习军器”而成了最早进入淮军幕府的西方人。于是便有了上海洋炮局。稍后,左宗棠在杭州“引洋将德克碑、日意格考求西国机器制造,仿造小轮船试行于西湖”,^⑤做的也是同一件事。这一类以“局”、“所”立名的机构都是从幕府事权蓬勃扩张的过程里衍生出来的,它们由疆吏创置,也归疆吏支配。因此,李鸿章攻下苏州之后,就把上海洋炮局搬到了苏州;“嗣后李氏升任为(署两江)总督,他又把苏州的兵工厂迁到南京。”^⑥最初的沪局遂一变而为“苏州洋炮局”,再变而为“金陵制造局”。直到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宁局

① 《曾国藩年谱》,142页。

②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七,《新造轮船折》。

③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249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④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六,《上海机器局报销折》。

⑤ 《左宗棠年谱》,110页。

⑥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263页;《论中国的军火制造》,《北华捷报》(1872年4月11日)。

仍是他伸手可及的东西。一个名叫鲍尔吉的西方人为马格里作传,叙述说:“虽然李鸿章离开了南京,但金陵制造局仍听他指挥,因此,马格里得同时应付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后来马格里监造的洋炮出了毛病,其“督管金陵制造局”一职也是由远在华北的李鸿章撤掉的。^① 管局务的人们与李鸿章之间的这种关系,显然是从内战中的幕府里沿袭下来的。

这一类师夷之长技的事业于古无征,很难从板结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里自然分蘖出来。而富有张力的幕府制度则提供了一个茬口,使它们能够与中国社会接起来。在后来的三十年里,这些官局一个一个地成了炙手可热的洋务衙门。“仿铸西炮”的机构又派生出翻译馆、广方言馆、武备学堂等等,并由“制器”推及航运、电报、铁路、开矿、织布、炼铁,悬河泻水,寢寢乎以致富致强系国运之盛衰;官局的事务也在奏议和诏书里越放越大,成为时政中的要目。由此产生的势位,使它们在纵横舛结的官僚机构里得以后来居上,手眼通天。但自另一面看去,这些以“局”立名的机构又始终是国家体制中非常夹生的一种东西。它们的位置既不在六部管辖的范围之内;也不在司、道、府、州、县那个行列里。后来修《清史稿·职官志》的一班人因之而无法把这些新衙门嵌入国家的官序里去,只好让它们不明不白地淹掉了。这种明显的不对称,正说明了从幕府制度里演变出来的官局一半已在嬗蜕中变形,另一半则老是蜕化不了。由于另一半老是蜕化不了,所以,管局务的“总办”、“会办”、“襄办”和成串的“提调”、“委员”都不是吏部编制里的“缺”,而是督抚指派的“差”。光绪七年,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槩以京秩谒两江总督左宗棠于金陵,被派为“两江营务处会办”,极得赏识,越明年,转“委上海制造局会办”。而后由局差荐沪道,历苏、

^① 转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325~326页。

皖、浙三省巡抚。^① 上海制造局最初是从李鸿章的幕府里分娩出来的,因此,李鸿章能够长久地以个人影响支配局事;但以归属而论,这个时候的制造局显然已不再是他幕府里的东西了。从李鸿章幕府里解下来的制造局是留给继任的两江总督的,然而在两江总督治辖的属官中,未入国家典制的制造局又是一种既不能归类于军政,也不能归类于民政的外来物。所以,后来的江督便常常沿用管理幕府的办法来管理上海制造局。聂缉槩以京秩人幕作“两江营务处会办”,然后佐制造局,都出自左宗棠一手提调。当时主局事的李兴锐曾特为上书,以聂缉槩“年轻而纨绔习气太重”致疑,左宗棠回信说:“局员非官僚之比,局务非政事之比。仲芳(聂缉槩)能则进之,不能则稟撤之,其幸而无过也容之,不幸而有过则改之、讦之。”^② 这些话虽因一人一事而发,但“局员非官僚之比,局务非政事之比”,却非常直白地说明:在左宗棠的心目中,制造局的事务天然是一种幕府事务。所不同的是,咸同年间的幕府机构只能归随于幕主一人,而这个时候的制造局则是迁动不了的。因此,当左宗棠离任之后,又须把它从自己的幕府里解下来,交给下一任江督。于是,为国家造富强的官局便在前任与后任的交替之间成了疆吏幕府轮管和共管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行政构造。在长期内战中积成的幕府制度政府化,使疆吏的幕府与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的近代化过程缠绕在一起,众多效西法的洋务衙门在这个过程里产生出来的新的物力和权力遂大半融入了疆吏的幕府之中。后来郑孝胥佐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先后做过洋务文案、洋务局提调并在商务局差委、芦汉铁路南段总办、洋务处督办、营务处总办等等,要从这一段履历里细细分辨出哪些名目在幕府之内,哪些名目在幕府之外实在是非常困难的。疆吏的幕府在膨

① 《崇德老人纪念册》,《左宗棠辑事汇编》,250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② 转引自《凌霄汉阁笔记》,《国闻周报》,卷十,九期。

胀中把许多界限弄得非常漫漶,天下的官制遂越来越乱。

连续十多年的内战,为身系军务的大吏挣来了调职官供差委的权力,战争中的幕府因之而能够胜任繁剧。但这种权力是以轻重失衡为前提的,所以,当内战终于过去之后,用惯了这种权力的疆吏使常常要与朝廷的法度相磨擦。光绪元年,有一道上谕说:“官方亟宜澄叙。外省督抚遇有地方差委事宜,自应于本省各员内量材器使。嗣后不得率调他省人员,以杜营私奔竞之弊。”^① 显见得这一类事已经太多,朝廷非常想截断这种不合祖宗家法的局面。然而在积久而成的惯性面前,诏书的告诫似乎没有一点约束人心的力量。七年以后,言官钟佩贤又说到这个题目:

军兴之时,用人不拘常格,自可从权。现在军务肃清已久,而外省请调京员,习为固然,并有请调翰林者。以文学侍从之臣,下供疆吏差委,殊乖国家设官本意。皇上若以此一二翰林宜于外任,原可改授府、道等官,无待于督抚奏调。今论官则仍厕词曹,而奉职则已同外吏,体制既多未协,名实亦觉相淆。^②

上谕说的是一个地方的督抚调用另一个地方的职官,钟佩贤说的是疆吏调用京官。这些都是不按老规矩办事,“官方”、“体制”也随之而被弄得支离破碎。但“营私奔竞”一语又说明:在这种流动里,调人的督抚与被调的职官都是两厢情愿的。“他省人员”和“文学侍从之臣”乐于“供疆吏差委”,两者之间的呼应是诏书写出来的文字和言路中的议论都管不住的。这种天下人才归趋于督抚的大势,和兵制的变法与利权下移一样,都在使后来的岁月成为一个疆吏的时代。

① 《光绪朝东华录》,20页。

② 同①书,1291页。

四

疆吏在内战中汇集起来的权力,使他们很早就能够以足够的自信做出些掀天揭地的事来。同治八年,太平天国留下的硝烟刚刚消散,山东巡抚丁宝楨就把过境南下的当宠太监安得海抓起来杀掉了。这件事曾震动一时,非常明白地向朝廷显示了疆吏的臂力。薛福成后来作《书太监安得海伏法事》,追叙当年夏天丁宝楨与他“语天下事”,已切齿于安得海用事,以为“往者恭亲王去议政权,颇为所中,近日士大夫渐有凑其门者”。言次愤懑,而杀机涌动:“吾闻安得海将往广东,必过山东境,过则执而杀之,以其罪奏闻”。至秋间,“安德海果出都”,丁宝楨一面“奏闻”,一面织造天罗地网:

 亟檄知东昌府程绳武追之。绳武躬篲屣,驰骑烈日中,踪其后三日,不敢动。复檄总兵王正起发兵追之,及泰安,围而守之,送至济南。当是时,朝旨尚未到,而安得海大言:“我奉皇太后命,织龙衣广东,汝等自速戾耳!”官吏誓焉。丁公念朝旨未可知,欲先论杀之,虽获重遣,无憾。知泰安县何毓福长跪力谏,请少待之。会朝旨亦至,乃以八月丙午夜,弃安得海于市,支党死者二十余人。

这个过程里有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而内官的人头终究捱不过疆吏的刀锋。安得海被杀头,廷议所列的罪名是“祖制,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但丁宝楨与薛福成之间的对话却说明,不安分的太监还没有出都,山东巡抚已经在想要他的命了。因此,致安得海于死地的其实不是“祖制”,而是缔造了中兴的那一代督抚不能容忍一个用事弄权的太监。事后,湖广总督李鸿章阅邸钞,“矍然起,传示幕客”,连声说:“稚璜(丁宝楨)成名矣!”身为疆臣领袖的曾国藩闻讯之后尤为兴奋地告诉周围人说:“吾目疾已数月,

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惟璜，豪杰上也！”^①这些话说明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其共鸣和快意都是非常明显的。而“奉皇太后命”去织龙衣的安得海，却由当皇差的钦使而不明不白地变作了刀下之鬼。这种罪有可杀而杀非其罪的错移，正反衬出疆吏的声音里自有一种不可漠然视之的压力。

丁宝桢的豪杰意态和曾国藩、李鸿章的交口称誉，显示了造中兴的一代人曾经有过的为天下除秕政的怀抱。章太炎后来评述那一代人物说：

清以枉挠吏失民，洪氏致讨，而西邻致谪。江南既定，而邻之责言未平也。曾、左知失民不可与共危难，又自以拨起田舍，始出治戎，数为长吏牵掣，是以所至延进耆秀，与共地治，而杀官司之威。民之得申，自曾、左始也。平生狭迫，喜修小怨，既得志，始慕修名，渐忍性为大度。赏劳举功，未尝先姻私。位至将相，功名已盛，而国藩家人络纬堂居，不改先畴旧署；宗棠身死无羨财，终身衣不过大袖，食不过一肉。时时与人围棋宴游，或具酒肴，杂以茶笋，言谈时及载籍文辞，恢啁间之，其山泽之仪不替也。故其下吏化之，不至于奸。初政十年，吏道为清矣。^②

他从“清以枉挠吏失民”说到曾、左“杀官司之威”而致“初政十年，吏道为清”，挟着一种赞赏之心侧写了疆吏以个人意志抑扬一时的势态，以及由此造成的世风变迁。就其初志而言，疆吏的抑扬一时之中未必没有变法之意。

曾国藩在内战之前已“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自谓“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之。积

① 《薛福成选集》，128～129页。

② 《章太炎全集》（三），6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
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① 这种以感慨抒发出来
的抱负本来只是纸面上的东西，然而内战造成的乱世混沌却提供
了一个人口，使纸上的东西能够移到现实里来。由此凿出来的许
多改作痕迹，又使咸同以后的治体与咸同以前显出了种种不同。
时人叙述说：“晚近吏治稍调，大吏以迁调频仍，莅事日浅，不能获
指臂相使之效。时艰益棘，牵制愈多，号令不行，浸至复败相随属。
自曾文正、胡文忠诸公乘时踔起，划去文法，不主故常，渐为风气。
各省自司道府以下，罔不惟督抚令是听，于是政权复归于壹，而事
乃无不济，治道蒸蒸日上矣。”^② 曾国藩、胡林翼那一班人都是以
翰林起家，在一个一个衙门里历经升转而成督抚的。他们熟识官
场体制，所以，其“划去文法，不主故常”，正蕴含着由“积不能平”而
来的一种自觉抱负。在这些人手里，儒学的理想主义是与战争中的
军事集权主义交织为一体的，由此形成的俯视之势，使他们在划
破旧序的时候非常容易流露出勃郁而发的独断之气。胡林翼说：
“天下之督、抚、藩、臬、一差一缺，无一不照例而行，即无一不挟私
以徇。”悬一例，“而预谋于例先更”；变一说，“以圆通于例外例”。
眼见“无一事不照例，实则无一事真照例”。这些话由阅历得来，包
含着许多沉痛和不平。因此，他施政不辞更张，发愿“破格而以一
人执其咎。”^③ 曾国藩也喜欢破格，他说：

国家定例，督抚以司详为凭，司道以县禀为凭，州县
以绅民公呈为凭。论者谓如汉学考据之家，惟恐其说之
不出于人。弟则素性武断，拟仿理学陆、王之家，惟恐其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信》，卷四，《复黄子春》。

② 《庸庵文续编》，上卷，《书吴观察论时事疏后》。

③ 《湘军人物年谱》（一），254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说之不出于己。^①

用这种破格的办法做督抚，一定会把许多依附于旧例的权力剥下来。因此，虽然曾、胡一辈志在变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吏道远未澄清，官场等序已经大变，“自司道府以下，罔不惟督抚之命是听”。在这个过程中，被称作“司”的布政使（藩司）和按察使（臬司）身价直落，从主理一省民政的大官跌为督抚附庸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变化。咸丰季年，湖南巡抚骆秉章“不由藩司”，直接委任了一个知县。布政使文格“大惊愠，然无可奈何”。“大惊愠”，是因为州县委官例须藩司“牌示”，现在不由旧径，绕了过去，心中自有一股贲张之气；而“无可奈何”则是以势相较，力有未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本来属于自己的职权被人攫走。文格的矛盾和抵触，反映了一种局面里的人们在另一种局面刚刚来临之际的失措。迨风气既成，后来人见惯不怪，便既没有“惊愠”，也没有“无可奈何”了。于是，“其后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至庭见提、镇，易置两司”。^② 旧制里的两司由朝廷直管，几乎与督抚共治天下。这种格局的命意，在于“督抚果能公忠自矢，毫无欺隐，固不待旁人纠察；若使稍有未协，两司据实人告，则督抚亦有所防检而不敢恣。”^③ 因此，两司的跌落，一而打破了地方事务的叠床架屋；一面也打破了权力构造中的制约和制衡，使行省政事就此悉归督抚之手。在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之后以举人、秀才、童生作疆吏的刘长佑、曾国荃、潘鼎新、杨昌浚、张树声、刘坤一等人，则都来自民间，凭藉着军功从沙场径直走到官场里的高位上。他们对原来的体制并不熟悉，所以，其号令一省率多取法于曾、胡制作便成为一种非常自然的事了。但曾国藩和胡林

①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2934页。

② 《湘军志》，10、1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2666页。

翼在划破旧法中灌注的那种经世济时之想，却未必都能够被他们一起接过去。随后的递相传移愈多茫昧朦胧，留得下来的，便只有疆吏在群僚面前的龙行虎步和只手独断了。时至光绪中期，康有为说：“昔香山黄槐森（植庭）为广西布政，而张联桂为巡抚，尝问黄曰：‘曾致军机书乎？’黄植庭震慑避嫌，不敢一致军机书。”他因此慨乎言之曰：“夫以两司为使者之尊，位冠全省百僚，府、州、县、厅为所牌遣，而抑屈不得少行意志如此，况其下焉者乎？”^① 这个故事发生在光绪二十年前后，上距太平天国落幕不到三十年。而曾被曾胡寄以深意的“杀官司之威”则已经从治病的药石蜕变为一路斜走的偏锋了。

在长久的内战之后，同光两朝人人乐言中兴。但昔日的旧观却渺不可追。经过战争的搅动，本属朝廷的兵权、财权和一时人才都在向下流去；而地方中各有职司的官权又正被拽着节节上移，就像是筑成屋架的梁、檩、桁、柱重新挪了位置。居上下之交的二十多个督抚便成了晚清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与湘军群帅平辈论交的王闿运自负才地，少所许可，而常能于誉议嗤笑中描绘些人世间的社会相。他在光绪初年的日记中评说湖北吏治说：

自咸丰以来，节镇权重，以喜怒为曲直，以爱憎为生死。湖广居江湖要脊，官（文）相恣睢专断者一十二年。而合肥李氏（鸿章、瀚章）兄弟先后相继为总督，湖广官吏之视总督，一若实封此土。凡有建议，朝廷不敢支吾。李君起家州县，以持重镇物为务，然不喜清议，听察旧之言，不如属吏；属吏之言，又不如左右。尝枉断光化一狱，再诉西台，辄下复奏，终不得一直，湖北之人，悚息权势。^②

官文和李瀚章都不是心雄万夫、劲气纵横的人物，他们很少有自造

① 《康南海文集·裁行省议》。

② 《湘绮楼日记》（光绪元年十月十三日），转引自《国史旧闻》，第三分册，658页。

“恣睢”与“权势”的那种才具。然而身为疆吏，则已位居举足轻重之地，“恣睢”与“权势”都无须自己营造。所以，本来并没有足够本领“专断”一时的平庸人也能够恣行无忌而游刃有余。王闿运以“节镇”称那个时候的疆吏，显然是联想五代，以比附历史来表达一种对于时政和时人的讥刺。^① 同治初年，曾国藩说过：“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② 所言亦多忧思。他在声势鼎盛之际阢陞乎声势鼎盛，心中未必没有与王闿运相似和相通的同一种历史意识。然而后来的疆吏则极少有人再会因太多的威权而忐忑不安，因此，也极少有人愿意自敛。光绪五年，一个叫田翰墀的御史说：“臣查定例，凡邻省督抚及钦差大员过境，在离城一二里地面以内者，准地方官前往迎送，不得过二里之外。又，新任督抚入境，司道准差人于本省境内迎接，府、厅、州、县许于本管地面十里内躬迎。”在定例划出来的尺寸里，含有体制和名分，一旦出界，便是僭越。但当督抚被权势放大之后，定例就变得小了，出格的事遂越来越多：

近来直隶司道大员率同在省各员，每逢大员过境，或于省西相距二十五里之大汲店；或于省北相距二十五里之漕河店，及省东相距四十里之板桥村迎接。以致现任州县纷纷效尤，无不越境迎送，在于邻封地面驻候。又，历年冬间督臣李鸿章由津回省，武职各员有送至距省一二里之白河及任邱、大城等县者。甚至候补道、府、州、县于督臣启行前迎至津郡者。

他发问说：“似此不惮远行，极力迎合，置公事于不问，疲驿马而不

^① 参阅《湘绮楼日记》（同治九年正月十六日）。

^② 《曾文正公全集·书信》，卷二十二，《致李宫保》。

恤、长奔竞之风，启夤缘之渐，官方吏治安望有起色乎？”^①直隶近在天子身旁，疆吏出行已经地动山摇。在更远一些的地方，迎送的排场还会愈加壮观。一批批“不惮远行”的人们来来往往，都是踏着体制和名分在走路。与“政权复归于壹，而事乃无不济，治道蒸蒸日上矣”那一面相比，王闿运的日记和田翰墀的奏议都记述了另一面的形相。

以“节镇”比拟同光督抚，主旨并不在刻划疆吏个人性气上的强横悍悖。唐代宗时，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守陕州，大言“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长安城”。皇帝只能默默含容。^②像这种直露猖狂的话头清代疆臣就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但督抚拥有太多的权力，尊王的意念自会日趋弛蹶。由此显出来的是一种群体的蹇慢。与强横悍悖相比，蹇慢没有那么多的咄咄逼人之势，然而合群的蹇慢却足以封杀不为自己喜闻乐见的东西，使朝廷的意志经常在漠漠然中窒息。言路里的人们很早就用力挤击过这种慢上的倨态。光绪七年，给事中张观准因“国计之日绌”而引申说：

“自粤匪构乱以来，各省督抚因时因地每有便宜陈奏，朝廷往往曲为允从，部臣亦破例议行。原以时局多艰，不得不稍通权变。今海宇又安亦有年矣，乃各省疆臣积渐成故，各存意见，或专擅利柄，或徇庇私人，浸浸乎视定章若弁髦。而部臣亦玩愒因循，巧于避嫌，工于卸过。近年以来，疆臣建议，每每立见施行，间有廷臣条奏饬部核定之件，部臣每以情形难于遥度，仍请交督抚酌议。而督抚则积习相沿，动以窒碍难行，空言搪塞，虽有良法美

① 《光绪朝东华录》，780页。

② 《资治通鉴》，第四册，4页，岳麓书社1990年版。

意，格而不行。”^①

言路里的掙扎概括天下疆吏而言之，抉发出来的是一种普遍情态。但也正因为这样，这些没有具体情节的言论在每个疆吏的心中都是搔不着痛痒的东西。是以“外省督抚监司，玩法任性，骄蹇如故。其被劾来京，稍不如愿，即中途托病，罕有至者。”^② 议论自议论，蹇慢自蹇慢，言官的道理始终不能感化疆吏。十八年之后，这些已在言路中被人嚼了一遍又一遍的道理又被皇帝引入诏书，用作切责之辞：

人臣事君之道，要贵勿欺。朝廷孜孜求治，大小臣工或条陈时政，或申明旧章，一善可从，无不诏令通行，责成各疆巨实力兴办。但各直省情形不同，即一省之中各属之情形又不同。宜于东南者或不能行于西北，宜于通都者或不可施之于僻地。其可行者自当切实奉行，而实有窒碍者即当剴切陈奏，朝廷曲体民艰，未有不洞鉴者。无如各疆臣狃于积习，凡有奉旨交办之事，其不能行者默无一言，但以敷衍了解；其能行者百无一效，亦以敷衍了事，朝廷以股肱耳目相寄，而诸臣以因循欺饰相报，受恩深重者何忍出此！^③

这个时候中兴名臣多数已经凋殁，天下督抚大半都是没有见识过当年刀光血影的人。然而群体的蹇慢却日甚一日，弥久弥大。这种生生不息的蹇慢是从中兴名臣改作过的权力构造里衍发出来的，所以，它能够穿过一茬一茬的督抚而前后延续，并显出他们之间的共相。但若以“默无一言”和“百无一效”比照当日由军功致名位的那一班人，则不难看出后来的疆吏已经在蹇慢中移人了许多

① 《光绪朝东华录》，1048页。

② 同①书，1491页。

③ 同①书，4428页。

顛頊。顛頊移入蹇慢也是一种演变。它们使作始者“划去文法，不主故常”的一番改作重新与“软熟和同之象”联结起来，在不知不觉中走了气。于是，群体的蹇慢遂与个体的委琐便常常成为互相依存的东西。诏书用“朝廷以股肱耳目相寄，而诸臣以因循欺饰相报”作对仗来叙述愤怒，表达的却半是悲凉。愤怒和悲凉，都令人非常明白地感觉到帝王手里的乾纲已经日趋衰弱。在同光之前，君主多喜自炫聪明精察，出手的文字惯常以利害祸福为耳提面命之辞，尖辣峭刻，摸之有棱。雍正八年，有一道硃批说：“凡百奏闻，若稍有不实，恐尔领罪不起。须知朕非生长深宫之主，系四十年阅历世情之雍亲王也。”^①这些话一定会使臣下看了出汗。时至光绪，这类森森的滋味对人主和人臣都已变得很陌生了。帝王对臣下的切责，也由胁之以利害祸福转变为一种向良心的发问。然而，与利害祸福之不可轻忽相比，“受恩深重者何忍出此”是一个没有人愿意回答的题目。这种追问既不会有管制力，也不会有惊悚力。

督抚因坐大而蹇慢，又在蹇慢中愈益坐大。这个过程时时都在打破部臣和疆臣之间原有的平衡。同光之间的朝士常常缅怀往昔，以向往之情追说“我朝定制，外则统之以督抚，内则综之以六部，内外相维，法至善也”。^②发其底蕴，这种“内外相维”的要义其实在于居内以驭外。因此，位置在“内”那一边的部臣，官序和权位都比疆臣为优。清世总督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秩正二品；加兵部尚书衔者可从一品，巡抚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秩从二品，加兵部侍郎衔者可正二品。官制里的弹性使疆吏成了可以浮动的东西，弹性和浮动都说明：由加衔而升上来的一阶，本来并不是品秩中的固有之物。而部臣与疆臣之间的轻重高低也因之而见。

① 《光绪朝东华录》，683页。

② 同①书，1048页。

“外则统之于督抚，内则综之以六部”，“统”与“综”虽然相对举而言，但督抚所统的只是一地之事，而六部综理的却是天下之事。在朝廷威行四方的年代里，六部代朝廷立言，一纸文书即可摆布督抚。是以疆臣总是处在部臣的下游，他们之间的区别和平衡都是以此为前提的。然而，当内战造出了成批挂着大学士、侯、伯、宫保衔和拥有头品顶戴，三眼花翎、双眼花翎、黄马褂的督抚之后，疆臣的品秩和声光就普遍地放大了。同治八年正月，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入京觐见之际曾赴“廷臣宴”，陪皇帝吃饭。他在日记中叙当时座次说：“东边四席，西向。倭相首座，二座文祥，三座宝璽，四座全庆，五座载龄，六座存诚，七座崇纶，皆满尚书也。西边四席，东向。余列首座，朱相次之，三座单懋谦，四座罗惇衍，五座万青藜，六座董恂，七座谭廷襄，皆汉尚书也。”^①在这十四个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是疆吏，而以官阶序先后，则位在汉大臣之首。后来李鸿章久作文华殿大学士，也以直隶总督而班列百僚第一。同他们品秩相仿的还有骆秉章、左宗棠；与庙堂里的衮衮诸公相比，这些人都是那个时候的出类拔萃之辈。在他们面前，部臣惯以清贵自处的意态遂不能不一时俱失，居内驭外的优势便随之而倾塌了一半。而发生在这个过程里的两司降位、兵制改易和财政制度的节节变迁，又使疆臣和部臣之间那些专门的通道一个个淤积堵塞，错位断裂，两者的往来变得非常困难。居内驭外的优势也因之而倾塌了另一半。后起的疆吏虽然没有那么多光彩烂然的勋位，但部臣与疆臣之间旧有的平衡一经打破，则督抚本被束缚的手足就会舒展开来，随后，他们的各行其是又会很快把“内外相维”的局面弄成内外纷争。同治七年，御史李德源说：“窃查吏部则例，内开：在省道、府缺出，应请旨简放及应归部铨选者，均不准外省扣留”。但督抚多逸出则例之外，“于应归部选之缺，往往以该省候补

^① 《曾国藩全集》，日记（三），1603页。

有人,奏请扣留”,致“各缺多为外省侵占,外重内轻,选法壅滞”。^①同内战以来户部与地方论争已久的财政纠葛相比,这种铨政上的抢攘是个后起的题目。而则例一被撕破,窟窿就会越扯越大。十一年后,给事中戈靖又说:知州一途,“所有缺出,各省尽扣外补,自去年七月以后至今一年有余,并无内选一人,未免偏枯。”^②督抚能够把应归吏部铨选的缺分“扣”下来,既显示了疆臣之藐视部权,也说明了部臣已经看守不住朝廷托他们代管的东西了。因此,站出来向疆吏争铨政的往往不是吏部堂官,而是旁观的言路中人。与督抚事权相接的地方一个一个地发生角抵,以口舌争是非的一方显然敌不住“一省肇端,各督抚援例而至”^③的群争。结果总是疆臣神旺而部臣气馁。随后,已经下移的国家权力又会带走更多的权力,使这一类纷攘此起彼伏,前后相继。当疆臣所“统”的事越来越多,而部臣所“综”的事越来越少之后,前者的越来越重和后者的越来越轻就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局面了。光绪五年,礼部尚书恩承、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童华奉旨赴四川查案,路过晋、陕,因“未能屏绝供应,致有失察家丁需索情事”,被人奏了一本,奉旨交部议,“降三级留任”。在当日的官场里,管不住家丁的事是常常有的,而大员因之得罪受谴的事则很少见。所以,御史邓承修抗疏鸣不平,讲了一通微言大义:

“祖宗立法,内外相维。故督抚则畀以重权,其如有怀奸挟诈,荼毒百姓,欺罔朝廷,必遣使查办,所以申不测之威而防畸重之势,责至重,法至密也。近来奉命查办事件,有关督抚者,率皆敷衍了事。臣伏见恩承等查办东乡数年之巨案,百姓之奇冤,一旦平反,虽于国家新政有裨,

①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二,18、20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999页。

③ 《近代稗海》第一辑,219页。

而于奸人敛怨必多。今言者不察，乃以小民一纸之呈诉，摭以入告，朝廷未加诘问，便蒙罪责。弹疆臣如撼山，参廷臣如拉朽。臣恐自此以后，使臣习为畏阻，遇事悉相徇隐；疆吏知其易动，妄生揣测，轻量朝廷，长其骄蹇恣肆之习，驯至内轻外重之势。”

恩承、童华在查案期间颇与川督为难，但还没有等到回京，就被绊了一跤，跌得鼻青眼肿。邓承修的议论正是揣度此中因果，发为愤切之言。其中“弹疆臣如撼山，参廷臣如拉朽”一句尤能写照世象，警策动人。然而在那个时候，疆臣正越来越重，部臣已越变越轻，文字的警策并不能再造出一种平衡。因此，抗疏不过换来朝廷的申斥。被议的部臣经此一疏反而罪愆愈重，“予以降三级留任处分，尚不足以示惩戒，礼部尚书恩承、都察院左（都）御史童华，均著改为革职留任”。而邓承修的一番道理则“所奏著毋庸议”。^①言官碰了一个钉子，却使人非常明白地看到：当疆臣与部臣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之后，朝廷心目中的平衡也不得不随之而被打破，这种以不平衡应付不平衡的做法，包含着许多外在的矛盾和内在的掣肘，在它们面前，言路的那些道理都成了不中肯綮的东西。部臣与疆臣相比而轻，遂使身在落差之中的朝官往往麻木不知自重。被称作“八座”的部院堂官已习于怠惰，“相率因循，或数日进署一次；或到仅片刻，虚应故事，慢不经心。遇有应办稿件，辄令司员奔走私宅，或在朝房呈画”。上谕忿忿然斥之为“玩愒成风，殊堪痛恨”。^②一个叫崇勋的副都御史更等而下之，竟翎顶辉煌而比肩商贾，在京城一家洋货铺开张之际“为之知客，终日酬酢。道路观瞻，无不惊叹，而崇勋不以为耻”。^③以那个时候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种自

① 《光绪朝东华录》，768页。

② 同①书，647页。

③ 同①书，1462页。

轻自贱。作为职司弹纠的言官领袖,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那个时候的笑料。大官们在泄泄而变,小官们也在泄泄而变。时人概括而言之曰:“近日京员盼慕外放,极不易得。恒以困于资斧,告假而去,绝迹京华。其留者衣食不贍,竭蹶经营。每于国家之掌故,民生之利病,不暇讲求。此京秩所以愈轻也。”^① 疆吏显出来的是一种合群的蹇慢,以此为反衬,京官显出来的是一种合群的泄沓。蹇慢和泄沓,都在当时和后来的中国历史上留下过许多悲喜剧。

当廷臣的议论还在“内外相维”之中流连忘返的时候,国家官体的畸轻畸重其实已日趋而日益明显了。由于畸轻畸重,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疆吏似乎与庙堂里定策的过程越来越切近,而近在咫尺的九卿中人却在同一个过程里反倒显得疏疏而远了。

同治五年,英人赫德、威妥玛向中国政府递送了《局外旁观论》和《新议论略》。他们的议论使朝廷紧张。随后,湖广总督官文、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署两广总督瑞麟、江苏巡抚李鸿章、江西巡抚刘坤一、浙江巡抚马新贻、前湖北巡抚郑敦谨、署广东巡抚郭嵩焘以及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都收到“廷寄密谕”,令“各就该处情形,亟早筹维,仍合通盘大局。或目前即可设施,或陆续斟酌办理,或各处均属阻滞,断不可行,务条分缕析,悉心妥议,专折速行密奏。此事关系中外情形甚重,该督抚大臣等务当共体时艰,勿泥成见,知己知彼,保国保民,详慎筹画,不可稍涉疏略。是为至要”。^② 英国人出了个难题,使朝廷不得不岌岌乎倾听督抚的声音。所以,这些话虽是以君谕臣,而又非常明显地直露出一种移樽就教的意思。疆吏之受到倚重,既反映了世事的艰难,也折射了内战留下的积势。自咸丰末年曾国藩受命“统筹全局”以来,他便成了疆吏中最先与闻国是的重臣,常常要奉旨“议复”许多事关社稷

① 《光绪朝东华录》,59页。

②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5232页。

至计的题目,回答朝廷一次一次的垂询;几几乎身在两江而牵动廷议,“每定约章,辄诏问可许不可许。”^①成批的折差和驿马因之而连番奔走在京师与江南之间,踏着尘埃泥泞,来去匆匆地传递廷寄和奏疏。后来《清史稿》为李鸿章立传,统论曰:“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闽藩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②“枢府”和“政府”都是指军机处。除了领班的亲王,其间很少有人能够以一己之风采光声动天下。曾国藩与李鸿章由百战军功兀然自立,与行走于军机处的那些人物相比,才略和时望显然都在他们一边。于是而有“政府亦倚以为重”。然而枢府代谢,疆臣也代谢。“诏问”和“议复”行之既久,则一定会在世路迁移中衍变出一种督抚议政的局面。随后,本来缩一地之事的疆吏便纷纷然越出范围,各是其是;欲以一纸奏疏为朝廷指画国事,也欲以一纸奏疏来左右庙堂里的抉择。自同治朝至光绪朝,督抚渐惯立论,遂使国家的兴作常常由疆吏的奏请发端,并经疆吏的群议而演为朝廷之策。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练兵制器、海防塞防、和战、议约、通商、传教、海运河运、新疆置省、台湾置省、联日制俄、联俄制日等等,众多事关全局的题目都以疆吏的议论为转移。左宗棠是疆吏中的强有力者,又曾一度入军机处行走,一身兼有两种阅历。他说过:“臣曾督海疆,重参枢密,窃见内外政事,每因事权不一,办理辄行棘手。盖内臣之权,重在承旨会议,事无大小,多藉疆臣所请,以为设施;外臣之权,各有疆界,虽南北洋大臣,于隔省之事,究难越俎。”^③外臣之“各有疆界”不可“越俎”,是一种旧有的常态;而内臣之“事无大小,多藉疆臣所请以为设施”则是因时而变的结果。在这种变化里,内臣的许多见解都是从外臣那里趸过来的。所以,熟视已久的左宗棠用一个“藉”字刻划了

① 《清史稿》,11916页。

② 同①书,12017页。

③ 《中国近代史》,上册,233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版。

趸人和趸出之间，一方对于另一方的依傍。其间有过非常可笑的场面：

法越事起，政府以曾忠襄（国荃）督两江，特召入觐。人人心目中以为忠襄久于行间，娴习营务，应变之才，或非所长也。及见张幼桥副宪论兵事，曰：“吾兄文正公盈满是惧，吾亦功成而不居。不然，金陵既克，我师七八万，皆百胜之卒，先打捻子，后打回子，再打鬼子，宁待今日？”见周小棠通宪，有旧，稍作深谈，曰：“我师今与西师战，有十六字秘诀，曰：先去先败，后去后败，同去同败，不去不败。”值边情日急，副宪通宪常相见，述及，讶曰：奈何于彼此之不同也。翌日，会于译署，恭邸问曰：“事将奈何？”时副宪通宪及诸大臣皆在侧，颇觉答话措词之难。忠襄曰：“吾犹炮耳，诸公犹炮手，全权在握。诸公命勿动，炮之为物，静物也，待命则已。诸公一拨机话，则弹丸立出。”当时闻者四面均有照应，及去，金服其应答之妙。^①

在这个故事里，做疆吏的人其实并不愿意把心底里放着的东西都讲出来。而政府“特召入觐”，却无异于开出题目专门请他立论，其期待之意是明明白白的。这种对比，说明了疆臣议政浸假而成风气之后，听的一方便有了受取的惯性。但讲的一方显然不中意这个题目，所以前两段话牛头不对马嘴，旨义全然相悖；后一段话则答非所问，言不及义，留下来的只是些讶然和茫然。虽说译署诸公被比作“全权在握”的“炮手”，而其中的许多人实已日力不济；没有疆吏的指点，他们常常会对自己心中的那一点准头缺乏把握。

廷议依傍于疆臣，初旨本在借助疆臣的器识和肩力。然而这种由上而下的借助又非常容易派生出自下而上的制约。当疆臣的议论一旦与朝廷意向相左的时候，器识和肩力便都成为了一种不

^① 《异辞录》，卷二，31页。

可蔑视的箝束,使定策的人不得不为之气塞。光绪二十四年,西太后推倒维新变法,重新训政,“坚欲废立”。朝野之间的许多人都被卷入了这一场是非恩怨之中,现出种种心迹和脸相。时人记述说:

貽穀闻其(西后)谋,邀合满洲二三大老联名具疏请速行大事。荣禄谏不听,而恐其同负恶名于天下也,因献策曰:“朝廷不能独立,赖众力以维持之。疆臣服,斯天下莫敢议矣。臣请以私意先覘四方动静,然后行事未晚。”孝钦许之。遂以密电分询各省督臣,言太后将谒太庙,为穆宗立后。江督刘坤一得电,约张之洞合争。之洞始诺而中悔,折已发矣,中途追折弃回,削其名勿与。坤一曰:“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后图。吾老朽,何惮。”遂一人挺身独任,电复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道员陶森甲之词也。荣禄以坤一电入奏,孝钦惧而止。^①

后来西太后虽然牵出了个“大阿哥”,但废立之说却经此一塞而不复再有本来的恣酣凌厉之气。当怨毒与是非缠绕在一起的时候,单用口舌说道理常常会显得不够用。刘坤一的“电复”之所以能使“孝钦惧”,正由于督抚代表了一种势,以势申理,则怨毒不能不知所顾忌。亲眼目睹了清末最后二十年斗转星移的张謇曾说过:“晚清朝政之乱,表病在新旧,本病在后帝,始于宫廷一二离异之心,成于朝列大臣向背之口。因异生误,因误生猜,因猜生嫌,因嫌生恶,因恶生仇,因仇生杀。恶而仇,故有戊戌之变;仇而杀,故有庚子之变。戊戌仇帝仇小臣,卒仇清议;庚子杀大臣杀外人,卒杀无辜之民。”^② 他所说的这个时代上距同光之际已经二十多年了。帝王

① 《近代稗海》,第一辑,270页。

② 《张季子九录·文录》,《四川忠县秦太公墓表》。

家中的勃谿咄嗟渗入了国是，遂使国是在勃谿咄嗟之中颠簸起落，引出许多不容易收场的风波。在这个乱纷纷的过程里，天下督抚大半身居朝局之外，另有一番主张，并往往在互通声气中彼此联聚。于是，由中兴名臣们传下来的疆吏议政便廓然恢张，一变而为疆臣之强有力者公然与朝廷立异同。虽说刘坤一的勋名和时望都远远及不上当年的曾国藩，但在这个时候他与朝廷对话的口气却显然要比曾国藩大得多。二十多年之间世事嬗递，人物也因之而显出了此一时和彼一时的不同。当“戊戌之变”在时势的牵动下演化为“庚子之变”以后，庙堂与疆臣之间的裂罅也越来越大。光绪二十六年夏，北京城里正在围攻使馆、教堂，痛剿大毛子、二毛子；而洋兵已从大沽登陆，一路杀来。朝廷下诏与各国开战，并谕各省督抚杀洋人，华北一时烟尘滚滚。然而分据南省的疆吏们却函电交驰，一面忙着与列国领事议东南互保之约；一面纷纷然宣布不奉朝廷诏书。^①南方和北方几几乎成了两个世界。《抱冰堂弟子记》一书后来追叙张之洞在庚子与辛丑之际“单衔径电各国外部，及各国外来华水师提督，与约保护东南，勿扰东南，勿惊乘舆；并联合各省督抚十余人，电各国外部。与刘忠诚（坤一）会同，与沪上各国领事立约，不得犯长江”，^②洋洋乎颇以为功在社稷。但就当日情势而论，这些事没有一件不是践踏着圣旨做出来的。在朝廷与洋人打得昏天黑地的时候，十多个督抚“电各国外部”谋和局，这是一种奇观。南方的疆吏们在朝廷之外聚成另一个中心，宗旨本在于“留东南以救社稷”，其中自有一番苦心。而由此下手的“自保”和“互保”，却已把本属朝廷的权力接了过来，使庙堂里下诏的人越益难堪。等到朝廷因战败而仓惶西狩，是非也随之易位。主持东南互

① 《中国近代史事日志》，1078、1080、1084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② 《张文襄公全集》（四），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保的督抚们先后以“共扶危局，各著勤劳”^①一一叙功得褒奖，并因此而被朝野视为一时巨擘。在李鸿章身死以后，刘坤一、张之洞和与闻东南互保的袁世凯遂成了疆吏中最有个人影响的人物。随后的十年，是一个朝廷受疆臣调教的时代。从刘坤一和张之洞联衔的“江楚会奏三折”，到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岑春煊、周馥、端方联衔会奏的《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中国社会里许多源头久远而牵汇万端的物事，都在督抚们的指画之下被铲得面目全非。他们用文字写出来的奏议，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促成了新制替代旧制，使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生活和命运。自有行省以来，像这种疆吏以联衔会奏改造天下的局面还从来没有过。作为对比，则是王纲在长久弛蹶之后临近解体。四川人高树在光绪朝的最后五年里先后以军机章京、御史行走于朝房，目睹种种官场社会相。他后来作《金銮琐记》，以诗叙史，各缀记注。其中三则描述袁世凯说：

卫士持枪似虎熊，桓温入覲气何雄。

玻璃窗内频探望，暗暗心忧两相公。

注曰：“项城在湖园入覲，卫士如虎如熊，有桓温入覲之概。王（文韶）、瞿（鸿祺）两相在玻璃窗内观之。观后，凭几而坐，默然不言者良久。”

如云骑从剑光寒，内监惊疑伫足看。

装饰狰狞谁不畏，满身都画虎皮斑。

注曰：“项城荷枪卫士，以黄布裹头至足，画虎豹头虎皮斑文。王公大臣繯马见之皆辞易。宫监亦却立呆看。查东西洋无此军服，惟中国戏场有之，项城入京城，以此示威，可谓妙想。”

怒马锋车谁敢当，舍人奔避入朝房。

偏言海外真天子，内监谰言亦太狂。

^① 《光绪朝东华录》，4686页。

注曰：“西苑当值下班，项城卫士驱逐行人。山人与徐博家奔入朝房，行道者摇首曰：太凶猛。有一魁梧内监高声嚷于道曰：难道袁某非海外天子耶！无人与辩。京中岂海外之比，况在宫门口，何得如此，此即清室禅位之影响，洪宪天子之先声。”^① 这些场面出现在天子脚下，显然很少再有臣子的敬意了。由此返视，辛丑年李鸿章人都议和，与“僭居西苑”的“联帅”瓦德西相见时，“入苑门即徒步”。或曰：“何不乘舆？”他回答说：“今虽播越，犹是君门，老臣何忍忘之”，言次“泣下”。^②

相隔不过数年，而两副面目已大是不同。十九世纪的督抚由勋臣而成为重臣；时至二十世纪，另一代督抚则駸駸乎正在由重臣变为权臣。高树以桓温写照袁世凯，正说明了时人触目惊心的忧思。与咸同以来由儒生成勋名的湘淮军功人物比，后起的袁世凯受名教熏染的程度无疑要浅得多。因此，前一代人心头那一点不敢褻渎的东西，在后一代人的眼中却并不足以唤起敬畏。两者的气类因之而显出了分殊。但以源流而论，则两者之间又因传承而相递连。由上个世纪那一场内战引起的嬗蜕，使国家权力下移的态势延续了五十年。一茬一茬的督抚于此楔而不舍，已经造成了一派偏畸倾侧的内轻外重之势。后起者收揽积久之势，很容易俯视天下。当疏离的名教罩不住身心的时候，他们手中那些长久积聚起来的力量便不能不使身在庙堂的人们感到害怕。于是而有王文韶、翟鸿祺观旁袁世凯张狂跋扈，“默然不言者良久”的一幕。由勋臣而重臣，由重臣而权臣，折射了晚清上流社会以王纲为重心的秩序在板荡中的变迁。这个过程以内战的血腥胜利开始，然而它又使朝廷所得到胜利一点一点地异化。以五十年历史为场景，勋臣、重臣、权臣各自代表了演化中的一个环节，在环节与环节的衔接之中，他们的人格、意志和心术都成了非常淡化的东西。

① 《近代稗海》，第一辑，61～62页。

② 《义和团史料》，上册，1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

自明清易代后，曾经鼓荡起伏于宋明之世的学风和士气在不长的时间里便余波消歇了。接踵而起的是一个没有议论的时代。章太炎后来统括而言之曰：“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诗歌文史槁；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待死，而术近工眇蹕善矣。”^① 这个过程使读圣贤之书的士大夫们在精神上日趋蜷缩，并越来越远地疏离了二千年儒学涵育出来的担当世运之气。

—

清代早期的士大夫当中产生过不止一个循吏和名儒，他们的私德都是经得起后人评说的。康熙年间由江苏巡抚迁礼部尚书的汤斌一生恪守天理人欲之界，风骨棱棱，被称作“清兴以来，八座之中一人而已”。^② 但当他与君权离得很近的时候，又会不知不觉显出气馁。康熙二十五年夏，灵台郎董汉臣应诏上书，“指斥时事，语侵执政，下廷议”。作为一个君子儒，汤斌同情董汉臣。^③ 而在皇

① 《检论》卷四，《清儒》，《章太炎全集》（三），4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下），761页。

③ 《清史稿》，9932、9933页。

帝的“诘问”面前，他却缺乏足够的胆气去评论“时事”和“执政”，把应当说出来的话都咽了回去。遂以“词多含糊”、“遮饰具奏”，成为一场宫廷官司里的懦弱者。这种天威俯视下的拘谨畏惧，与宋明之世的儒者气象已经显然不同了。

儒学尊君，但儒学中的优秀人物又常常怀抱一种自觉的师道意识。宋儒程颐受命作讲官，曾上《论经筵劄子》，非常明白地向皇帝争师道：

人主居嵩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惧，莫敢仰视，
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议，所养如此，其惑可知。

在人间的纲纪之中，天泽分严而不可度越，皇帝是至尊者；但在“德义”和圣人之教面前，则君心有待启沃，皇帝并不是天然的至尊者。因此，事关师道，人主应当有起敬之心：

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
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①

这些议论以从容意态表述了一派尊严，直露出儒学精神中敢于规范君权的一面。所以，程颐进讲，“色甚庄，言多讽刺”，每“以师道自居”：

闻帝在宫中盥而避蚊，问：“有是乎？”帝曰：“有之。”
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尝凭槛偶折
柳枝，颐正色曰：“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
帝不悦。^②

程颐是一个理学家，理学家多半可敬而不可亲。于是面有“帝不悦”。柳枝的故事也因此而成为一个话柄，被人用来讥嘲宋儒的迂腐。这种讥嘲当然反映了一面的道理。但若以程颐的怀抱来理解

① 《二程集》，第二册，539～540页，中华书局版。

② 《续资治通鉴》，第三册，1994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程颐的讽谏,则可以从另一面体验到迂腐与师道有时候是掰不开来的。在局外人看到迂腐的地方,往往是局中人守护师道的苦心所在。

自汉唐以后,像程颐这样在君权面前辞色毕露地力争师道的人并不多。但儒学的师道意识是从孔子和孟子那里一脉传来的,因此,能够读懂孔孟之书的知识分子都会久受浸润,并在心里执守这种意识。另一个理学家朱熹在一封信中评点汉唐帝王说: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为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①

他以自己心中的尺度来衡量汉高祖和唐太宗,显然自信“尧、舜、三王、周公、孔子传所之道”是自己懂得更多。比之程颐,尤见其不肯多让。

程颐和朱熹都是理学精神最有资格的代表。他们的师道意识出自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②的理想,归宿则在于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从宋代到明代,理学流布天下,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虽然其间曾有过程朱与陆

① 《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卷三十六,579页。

② 这段话是张载说的,但反映的却是宋儒共有的精神。

下的互歧,但儒学的理想和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却一以贯之地传承于这六百年之间,并以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影响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知识分子的士气日益高涨。

用儒学的理想来度量并不合乎理想的时政,一定会产生批评。而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则成为一种内存的动力,驱使读书人把批评发为朝廷的谏争和在野的议论。在中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士气大半是从谏争和议论中涌出来的。明代君主动辄用廷杖来对付言路,但“血溅玉阶、肉飞金陛”之下也出现过一个一个不肯在箠楚面前低头的人。这种勇气里含有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在悬杖下的儒学思考。写过《呻吟语》的吕坤说:

天地之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下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持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①

与宋儒相比,明儒与君权之间有着更多的隔阂。虽说吕坤并不是那个时代最有思想影响的人物,但他用“势”与“理”来分辨“帝王之权”和“圣人之权”,则无疑代表了以廷争对抗廷杖的人们心头共有的信念。因此,明世士气屡经摧锄而起落跌扑,“敢于任斯道之南面”的儒学中人却后继不绝。天启一朝首尾不过七年,而士大夫因廷争之罪由庙堂入诏狱,由诏狱致折肱断骨,残身绝命者已经前后相接,累累成群:

初,魏忠贤乱政,首攫祸杖死者,万燿也。后因汪文言狱逮死者六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后因李实诬奏逮死者七人:则周起元、周顺昌、

① 《呻吟语》,79页,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

高攀龙、李应升、黄遵素，并先逮周宗建、廖昌斯也。以吏部尚书遣戍遇赦，为逆党所抑，卒死于戍所者赵南星，以争挺击首功为逆党论劾逮死狱中者王之寀，各有传，共十六人。他如刘铎之以诗语讥讪弃市；夏之令以阻挠毛帅逮死；苏继欧、丁乾学、吴裕中、张汶、吴怀贤或缢死，怖死，仰药死、杖死，皆以逆珣死者也。^①

这些人大半都是那个时候的社会精英。他们面对附生于君权之中的阉祸，用自己的生命表达了儒学精神中慷慨激昂的一面，并在身后留下了长久的光彩。左光斗被逮之日自度必死，勉其弟曰：“率诸儿读，勿以我为戒，而谓善不可为，”^② 全无一点彷徨气沮之意。在他待死于牢狱之中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史可法曾潜入探视：

至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公跪抱公膝而呜咽，左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持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即先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③

左光斗以担当世运之气“务为危言覈论”，在皇帝面前为天下争善恶是非，^④ 并因此而得祸。但当他备受榜掠，体无完肤之后，托付给心中传人的“国家之事”和“天下事”里仍然是一片担当世运之气。史可法后来以一介书生督师抗清，苦守危城，力竭被俘，从容

① 吴应箕：《熹朝忠节死臣列传》，传引自《明代特务政治》，390页，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冷庐杂识》，25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③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55—56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 《明史》，6331～6332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授命,其间未尝没有老师留给学生的精神感召。

在近代国家观念产生之前,国家一词是用社稷作诠释的。时当一姓之天下,能够维系国家而代表社稷的只有一个君主。因此,儒学崇尚“忠君”,其忠忱所托的对象大半是一种国家和社稷的人格化,而并不尽在时君的一人一身。^① 由此划出来的一片空间,保留了忠君的知识分子批评一个一个人间帝王的权利。这种意思,宋儒称为“正君”。自理学作始之初起,为后世开风气的人们就曾用力发摅此中义蕴,并亢然引为己任,^② 知识分子能够批评帝王,是因为君位与圣人之教是分开来的两种东西。但对于君权来说,批评所代表的又是一种限制。所以,在此后的六百多年里,知识分子的士气鼓荡常常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君权与士大夫之间的紧张。从宋代到明代,君权日趋而日尊,天子的敬惮之心也越来越少。立意“正君”的人们便常常要为议论付出自己的鲜血。然而知识分子手中的圣道并不是从帝王那里得来的,因此,即使是廷杖和诏狱也不能把圣道从士大夫的手里剥夺殆尽。于是,廷杖和诏狱之后,圣人之教还会继续酿发出士人的讽议和批评。出现于明代最后一段岁月里的黄宗羲无疑其间走得最远的人。他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直言人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由此表露出来的沉痛和愤激在当时和后世都具有足够的震撼力。正像廷杖代表了君权的极端一样,《明夷待访录》代表了儒学知识分子批评君权的极端。就君权与士大夫之间的紧张而言,后者正是前者的直接对应物。追寻中国古代民主思想萌蘖的人们后来常常热烈地评赏《明夷待访录》,并总想在其中引发出一点反封建的深意来。^③

① 陈寅恪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前有序文一篇,论及王国维死因,有谓“所殉之道,所成之行,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他所说的正是儒学中的这一层意义。但这一层意义在论史的时候又常常容易被人漠视。

② 《二程集》,第二册,538页。

③ 《明夷待访录》,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其实,黄宗羲不是一个儒学的异端,而是“嗣轨阳明”,接理学之绪余的大儒。虽说他在批判君权的时候以独有的尖锐和峭刻表现了鲜明的个性,但作为一个从理学时代的思想环境中产生出来的人物,他的情感和理路与前代儒者规范君权的师道意识之间又有着一种可以辨识的心印。^①因此,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明夷待访录》里的放言正代表了宋明之世知识分子批评精神的最后一阵隆隆潮音。

清儒很少有师道意识,他们在另一种世路中趋入了另一种士风。康熙一朝曾宏奖理学,而能够真知理学批评精神的前朝遗民则多怀种族之痛,漠漠然视新朝。是以热心在帝王身边侍讲的便只剩下一些专以理学邀宠的小智小慧者了。他们帮助皇帝作成过卷帙可观的“御纂诸经”,而理学关怀世运的一面却从此日渐萎靡。当前朝的遗民一个一个离开人世之后,接下来的漫长岁月是一个文祸绵延的时代。

清代因文字获罪起始于对明清之际那一段历史的著述和评论。叙史传播的种族之见触痛了尚未愈合的满汉创口,种族之见也就此成为文字狱长久追究的一个题目。由此产生的残酷和霸蛮,常常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雍正六年,湖南人曾静懵懵然投书大吏岳钟琪,以种族之说策动他造反。经穷治之后,这件事又牵出了浙江人吕留良。虽说此时吕留良已经死去四十五年了,但被雍正称作“逆物”的曾静却是由他留下的著作点化出来的。所以,“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②这种以此量彼的比

① 《明夷待访录·原臣》：“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其说与程顺颐近。黄宗羲痛贬君权，而明亡之后，又终身以故国遗民自处，社稷之思至死未泯。其苍凉心事适以见儒者忠君之念终究难以去怀。

② 《清代文字狱档》，下册，908页，上海书店1986年版。

较,说明了雍正心里是把制造思想的人看得比传播思想的人更可怕,吕留良也因此而成为一个须由天子亲自动手力施笔伐的罪人了。然而吕留良的种族之界来自孔夫子的夷夏之辨,雍正能够批判吕留良,却不能批判孔夫子。于是其挾伐之辞便常常绕过夷夏之辨,转人君臣纲纪和礼义廉耻:

当流寇陷北京时,吕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后,伊亲被教泽,始获读成立,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嗣经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窃虚名,夸荣乡里。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

且吕留良动以理学自居,谓己身上续周程张朱之道统。夫周程张朱,世之大儒,岂有以无父无君为其道,以乱臣贼子为其学者乎!此其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之罪魁也。^①

这些话虚实参半,着力于把吕留良刻画成一个假遗民。其辞缺乏说理的深刻,却具有足够的机巧。比之就思想论思想的辨驳,一个假遗民的形象无疑更容易毁掉吕留良的人品;也更容易毁掉吕留良留给后人的耿耿孤愤和血性文字。方吕留良以夷夏别满汉之日,曾说过“今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②他把一腔心事托付给了天下士子。雍正用满纸憎恶痛诋吕留良的人品,着眼的也是天下士子。因此,他喜欢把文字狱的场面做得很大。雍正八年,“刑部等衙门会议”后,合词陈奏:“吕留良应挫尸梟示,财产人官;伊子吕葆中曾叨仕籍,世恶相济,前此一念和尚谋叛案内连及吕葆中,逆迹彰著,亦应挫尸梟示;吕毅中应拟斩立决;伊子孙并兄弟、叔伯、兄弟之子及女、妻、妾、姊妹,子之妻、

① 《清代文字狱档》,下册 905、909 页。

② 转引自《清代通史》,上册,924~925 页,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妾,应行文该督查明,按律完结。并行知各省、府、州、县,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刷抄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这种剿洗异路思想的严酷手段本是从雍正的诏书里揣度出来的,但雍正犹嫌未能得其旨要。他更想借吕留良的尸骸作教具,向每个读书人昭示思想和文字出界之后带来的家破人亡。所以,雍正把“刑部等衙门”的廷议布告天下,富有创意地叫每个读书人都来裁决吕留良:

朕思吕留良之罪,从前论旨甚明,在天理国法,万无可宽。然天下至广,读书之人至多,或者千万人中,尚有其人谓吕留良之罪不至于极典者。朕慎重刑罚,诛奸锄叛必合乎人心之大公,以昭与众弃之之义。

这些话因虚伪而显得阴险。但天下士子却因此而不能不在朝廷和吕留良之间作公开的选择:

著将廷臣所议行文直省学政,遍行询问各学生、监等,应否照议将吕留良、吕葆中挫尸枭示,伊子吕毅中斩决,其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刷印暨抄录者尽行燔毁之处,著秉公据实,作速取具该生、监等结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者,令其自行具呈,该学政一并具奏,不可阻挠隐匿。^①

虽说诏书允许“独抒己见”,但刀锯迫视之下的思考产生出来的只能是恐惧。当恐惧汨没上气之后,读书人的思想便呈显出了一种虚假的同一。至雍正十年,各地奏报已先后送来,都说“所属读书生、监,各具结状,咸谓吕留良父子之罪罄竹难书,律以大逆不道实为至当。并无一人有异词者。”^②人人都接受了由刑法界定的思想是非。这正是雍正一心期待的结果。与“普天率土之公论”相

① 《清代文字狱档》。下册,953-954页。

② 同①书,965-966页。

比。此后吕氏家族的破棺戮尸、杀头充军其实都已经是次一等的事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种族意识是从儒学里演绎出来的。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它们与儒学旨义中的其他部分又有着内在的同一性,并会因这种同一性而彼此牵动,由一个命题引出另一个命题。那个以夷夏之辨策动岳钟琪造反的曾静,在另一个地方说过:“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至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按他的心愿,孔子、孟子、二程、朱熹、吕留良都应该做皇帝。^①用君权的眼光审视,这些话里的意思显然更“悖逆”。因此,以读书人为对手的文字狱虽从究治种族之见开始,而一旦罗网张开,其范围一定会超出种族之见。雍正七年,主持边地军务的锡保奏告广西人陆生柟作《通鉴论》,“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另一个广西人谢济世“注《大学》,诽谤程朱”。这两个人原本都是京官。谢济世因弹劾一个大吏而被雍正目为结朋党以“扰乱国政”;陆生柟则由于和谢济世同属广西籍,在雍正看去平日必有“结为党援之处”,遂一同革职,“发往军前效力”。他们既已自愿入仕,心头当然不会再有种族芥蒂,而且一个读史,一个注经,做的都是与圣贤对话的事业。然而不知不觉之间读史和注经都出了毛病,使他们被一个武人举劾,与吕留良一样被收进了文字狱。因为他们在文祸临头之前已有前科,是雍正的旧识,所以本来寻常的文字,雍正都能联想前后,读出些别有用心来的含义来。比如锡保举发谢济世“诽谤程朱”,说的其实都是外行话,但到了雍正手里则意思又深了一层:“朕观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谤毁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

^① 见《大义觉迷录》,卷二,转引自《雍正传》,23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① 比起“谤毁程朱”来，雍正更留心搜寻的是文人谤毁君主的心迹。然而他所摘举出来当作罪证的东西半是经义中的原文，半是读经所得的体会；把这些东西与“怨望诽谤”连在一起，显出来的是——一种不可知和不可测，以文字致罪也因此而越益使人感到可怕。儒学经典中的很多章句都是说给人君听的，其用意大半在于警戒。读书人以“明道”为正路，学问和思想的起点即在这些章句之中。所以，沿着圣贤的话头讲下去本是非常自然的事。但谢济世以自己的祸难向天下上人说明，圣贤留下的道理当中也包藏着许多为时君所忤忌的东西，涉笔其间，便会成为一种危险。人人都怕靠近祸难。于是，在趋避危险的过程中，读书人与儒学精神的义理一面也离得越来越远了。

与注经相比，论史需要更多的创见，也更容易捕捉出能够立罪的文辞。因此，雍正对写了《通鉴论》的陆生树尤觉痛恶。他做过一篇四千多字的上谕，专门批诂《通鉴论》，而包裹于这个篇幅里的则是满腔愤怒。陆生树读的是历史，议论的都是《资治通鉴》里的故事，这些东西与雍正那个时代至少相隔了九百多年。然而用心读去，他所谈到的许多题目都使雍正想到了自己：“其（陆生树）论人主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人主身为天子，富有四海，自尧舜禹汤以来，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岂有位尊而即危祸者乎？至于生杀赏罚，人主皆奉天命天讨以行之；其生杀赏罚者，皆其人之自取耳。”陆生树的议论以普遍性为本意，而雍正却处处都要追究出具体性：

朕临御以来，日程万机，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

^① 转引自《明清史讲义》，下册，55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以己意生杀人，赏罚人。而陆生柟为畏之、怒之、报之之说。试问在廷诸臣，朕自雍正元年以来，曾因藩邸旧人而擢用者何人？曾因当时宿怨而治罪者何人？且朕从前与外廷之人毫无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怒，何所庸其报哉！

又云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乃陆生柟自述其心也明矣。虽蓄怒而不敢显言，是以托于论列《通鉴》，以微泄其愤；又怒而欲报，欲报而不能，但以身危祸烈等语肆为咒诅，其逆谋发露，公然形于纸笔矣。

雍正写了那么多话，而笔下流泻出来的不过是一股帝王的霸气。从孔夫子以来，读史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引发议论，从前人的行迹中讨求是非成败之理。在陆生柟之前，也以《通鉴》为题作过史论的王夫之说：“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已之去危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政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①因此，论史总是危惧之词多而谀颂之词少。就儒学本义而言，危惧表达的正是一种深沉的关切。但雍正与儒学精神的这一面很难沟通，他更执着地把读史所得看做是读史人“自述其心”，并且一意要从他们的危惧之词里剥出“狂悖恶乱”。显然，这些推理都是作论的陆生柟所料想不到的。除开“论人主”之外，经雍正从《通鉴论》中摘举出来，并归为一类的“悖逆”论题还有另外七个。它们加在一起，彰显了以文字触怒君主的“罪大恶极，情无可道”，陆生柟因之而被“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②。陆生柟因认真读史而获心得，因读史有得而人头落地。他以自己个人的悲哀向世人显示了史学的悲哀。在一个没有政治学

① 《读通鉴论》，1114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十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雍正·十五》。

的时代里,史学曾培植灌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并以兴亡、安危、利病使他们与国家社会相维系。因此,有经世之心的知识分子总是在精神上与史学靠得很近。然而文字狱以实例演示了读史论史招来的杀身之祸,史学沾上了斑斑血迹,遂使史学成为一种不可亲近的东西。从这个时候起,十八世纪的中国很少有人再用陆生枏那样的态度去读历史了。保留于历史记述中的“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①的政治意识也随之而日见淡漠。

雍正以君权的力量改变了那个时候的士气和士风。但就个人学识而言,他对儒学其实懂得并不多,他更喜欢的倒是佛典。因此,在待罪的读书人面前,他所撰作的批判文字常常显得辞不达意,肤浅浮躁,使人不明不白,最后只能靠杀气解决问题。与之相比,乾隆对儒学无疑要内行得多,从言论里编织出罪状的手段也更见老辣。出现于乾隆四十六年的尹嘉铨一案由小题目引出种种大议论,尤能见其用心之深鸷。

尹嘉铨本是一个致休京官,然而心头那一点与名利相关的热衷却老是息不下来。所以,当乾隆西巡之际,他愤愤然在半路上递折,“为父请谥”,又“请将伊父从祀文庙”。这些乞请因痴迷而出格,不知不觉中已经把手伸入皇帝最疑忌的地方了,乾隆称为“丧心病狂,实出寻常意料之外”,并直捷地连想到“尹嘉铨如此肆无忌惮,恐其平日竟有妄行撰著之事”。与“请谥”、“从祀”相比,他更容不得“撰著”：“如果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②于是,从尹嘉铨孜孜矻矻写出来的文稿中轻易地寻出了许多可以定罪的句子。在清代文字狱众多的受害人里,尹嘉铨是被自己的热衷驱着走进罗网的。这种无意间得来的奇祸多少显

① 《上(资治通鉴)》,转引自《资治通鉴序》,3页,岳麓书社版。

② 《清代文字狱档》,下册,555、559页。

得有点可笑,遂使他在后人笔下受到的奚落多,同情少。但自乾隆看去,尹嘉铨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私议里多褻慢僭妄,不少话题事关君臣名分,尤触痛了自己心头最碰不得的东西。因此,他决不肯轻轻放过。然而尹嘉铨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以儒学命题为源头的。乾隆对这一点看得明明白白。是以他对尹嘉铨的痛挞也随之而深入到儒学的肌理之中,成为一个用帝王私意重新诠释儒学命题的过程。在这种地方,乾隆比雍正更多自信,也更多悍气。他说:

朋党为自古大患。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御制《朋党论》,为世道人心计,明切训谕。乃尹嘉铨竟有“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之语。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是日非,可为鉴戒。乃尹嘉铨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不知是何肺腑。且其书又有为帝者师之句,竟俨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如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昔韩愈尚言:自度若世无孔子,不应在弟子之列,尹嘉铨将以朕为何如主耶!①

乾隆以“明季东林诸人”为比,把朋党看做是由“讲学”派生出来的一大患。他所不能容忍的显然是知识分子以讽议相呼应的批评精神。东林人物当天下滔滔之际起而讲学,本意在于“卫道救时”。在他们身上,被称作“朋党”的东西是与儒学的济世之心连在一起的。然而从君权看过去,读书人因济世而讲学,因讲学而聚汇,因聚汇而议论,因议论而批评,正是一种人主无法驾驭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与朝廷立异同,所以尹嘉铨为“朋党”辨公道的那些道理在乾隆脚下都成了被践踏的东西。

由朋党深入一层,遂及师道。虽然君临天下的人很少喜欢知

① 《清代文字狱档》,下册,590页。

识分子的师道意识,但只要他们还不能把“尧、舜、三上、周公、孔子所传之道”化为己私有之物,则代表了圣人之教的知识分子群体仍然是天下师道之所在。因此,像乾隆那样操笔犹如操刀一般着力诛杀师道的皇帝还没有过。在这一点上,乾隆用文字显示了比明代廷杖更厉害的独尊之心。他以“君臣大义”排拒师道,取的是儒学中的一面之词。孟子说过另外一面:“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①从那个时候起,伊尹、管仲就成了一种象征。虽说这些故事与十八世纪的中国已十分遥远了。然而这些故事又是读书人非常熟悉的。它们保留在四书五经之中,使乾隆痛挞尹嘉铨的千钧霹雳常常要打到孔庙里正在受用祭祀的先圣和先贤头上。当他“即以学问而论”,与尹嘉铨比长短的时候,显出来的是非常明白的蔑视。但他的话又是讲给天下读书人听的,每个人都能从这里体会到人主面前已无师道。中国知识分子规范君权的意识于是乎一天比一天萎顿。

在乾隆朝的文字狱里,比朋党和师道更富有深度的题目是“名臣”。尹嘉铨编过一本《名臣言行录》,“胪列”的高士奇、高其位、蒋廷锡、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等等都是与他同一个朝代的人物。乾隆说:

至谓名臣之称,必其勋业能安社稷方为无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况历观前代,忠良屈指可数而奸佞则接踵不绝,可见名臣之不易得矣。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乃尹嘉铨竟敢标列本朝名臣言行录,妄为胪列,谬致品评,若不明辟其非,将来流而为标榜,甚而为门户、为朋党,岂不为国家之害、清

^① 《孟子正义》,上册,154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流之祸乎？

这些话训诫的是已经出仕和将要出仕的知识分子。名臣体现了儒学的一种理想人格。因此名教中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忘情于名臣。然而乾隆用另一副眼光去看，在名臣身上见到的却是君权的衰弱。与前代帝王相比，这种眼光的深刻和雄猜都是十分独到的。每个时代的名臣，都是那个时代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儒学涵育出来的士气尽在于以天下为己任之中；乾隆视名臣为不祥之物，心中疑忌的也在于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他在骨子里非常不喜欢鼓荡士气的宋儒，并由尹嘉铨上溯，与六百年前的程颐作过论辩：

昔程子云天下之治乱系宰相，此只可就彼时朝政阙冗者而言。若以国家治乱专倚宰相，则为之君者不几如木偶旒纒乎？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人君者深居高处，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大不可；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尤大不可也！^①

自两汉以来，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都能够在中国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乾隆却以虎视之态把四海治乱，生民利病划出读书人的思考范围，森森然剥夺了儒学付予读书人的悲天悯人之权。从这个时候起，知识分子群体便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了。他们在恣睢的君权面前一点一点地变得奄奄无气。有人记录过十八世纪中一个读书人仕者的始末，以几个细节描述了文字狱下士人的跌扑和难堪：

乾隆癸未岁，杭州杭大宗（世骏）以翰林保举御史，例试保和殿，大宗下笔为五千言。其一条云：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宜汲满、汉之见。是日旨交刑部，部议拟死。上博询廷臣，侍郎观保奏曰：是狂生，当其为诸生时，放言高论久矣。上意解，赦归里。

^① 《清代文字狱档》，下册，597 - 598 页。

乙酉岁，纯皇帝南巡，太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谓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着，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

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太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太宗返舍，是夕卒。^①

这个故事写照了帝王贱视斯文的顾盼自雄；也写照了有心报国的士人在失路之后的苍凉和气短。前者的顾盼自雄与后者的苍凉气短都说明：宋明六百年之间曾经有过的那种儒者气象已经变得遥远而且陌生了。

二

当明代的宗庙社稷在天下板荡中分崩离析之后，中国人的学术思想也正在发生变化。

儒学以修己治人为宗旨。由前一面言之，则不能不正自己的心；由后一面言之，则不能不正别人的心。因此，人心始终是儒学关怀的一个大题目。朱熹曾经以“天理”、“人欲”来讲这个题目，王阳明接着朱熹，以“良知良能”来讲这个题目。就儒学思想的历史发展来说，从“天理”到“良知”，曾为理学提供了能够延续气脉的东西。所以，力倡“致良知”的王学在一百多年里长久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思想。然而“良知”本质上是一种意志。它可以用棒喝唤起世人的道德自觉；也容易沿着“心上功夫”越走越远，一代与一代不同，衍生出面目全非的东西。时至晚明，一面是心学数传之后渐失本旨，“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另一面是心学笼罩下的士林风气日久

^① 《钱自珍全集》，161页。

而日趋空疏，“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① 这个过程与明代最后一段岁月里的天崩地坼交织在一起。因此，经历了天崩地坼的那一代人在尘埃落定之后不能不从世运追究到学风，并向儒学传统重求复兴之路。于是理学便成为一种渐被非议的东西。

顾炎武说：“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② 在明清之际那一辈大儒中，顾炎武是最鲜明地以经学来排拒“今之所谓理学”的人。同理学相比，经学代表了一个更加古老的时代和一种更加古老的学风。但在明人的浮虚已经走到尽头之后，经学的义疏博证之风却能够演绎出为儒学开新局的实证精神。乾嘉人物后来说：“有明一代，囿于性理，汨于制义，无一人知读古经注疏者。自梨洲起，而撮其颓波。亭林继之，于是承学之士知习古经义矣。”^③ 这种植根于“古经义”之中的实证精神强调的是“探讨本源”以“明六经之旨”。时至十七世纪，当日述经的文字和文理在二千多年岁月流逝之后已经贻误了后人的误读误解。顾炎武谓之“世日远，而传日伪”^④。他极信圣人留下的章句须经一番考据才能够字字读出本意，而后始可言理义。因此，其读书治学多以辨证绵密见功，“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⑤ 他以实证精神自别于流俗，也把实证精神带入了与“古经义”相关的许多专门学问；并留下了供人临摹引申的范例和方法，景从渐多之后，遂为后世的小学、音韵、校

① 顾炎武：《答友人论学书》，转引自《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8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

③ 《汉学师承记》，卷八，135页，上海书店1983年版。

④ 《音学五书序》。

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九，子部，杂家类三，《日知录》。

勘、辨伪、辑佚开先河。所以,在后来人的心目中,“国朝称学有根底者,以炎武为最。”^①但顾炎武那一代人本以旧朝遗民而作清初大儒,他们在身世家国之变中由世运追究到学风,其学术思考不会不因之而表现出明显的经世意向。在他们的心里,从“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得的学问最终都被纳入明道知耻、通经致用的怀抱:

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②

在这些地方,他们与六百年以来的理学精神仍然保持着一种截不开来的相印和相通。顾炎武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缺矣。”^③他拳拳关注的人心和世风,也正是王阳明一生倾心倾力,不能去怀的东西。虽说顾炎武由痛诋王学而后自成一代宗师,然而他与王阳明一样,都是有心经世的人。因此,在儒学留给知识分子的天下国家之责面前,他们的人生信念里又有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一面。^④这种学风嬗递之际的同一,保留了读书人与斯世斯民之间的一脉相通。

① 《清史列传》,5437页。

② 《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

③ 《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九》。

④ 梁启超说:“亭林是教人竖起极坚强的意志抵抗恶社会。其下手方法,凡在用严正的规律来规律自己,最低限度,要以不至与流俗同化;进一步,还要用个人心力改造社会。我们试读亭林著作,这种精神几乎无处不流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158~15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比照王阳明当日创“致良知”,其本旨也在于此。

“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① 在亲身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的知识分子当中，顾炎武是对后世学术影响最大的人。但就儒学在清代一路演变的行迹而言，后来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把他心中的意想全部接受过去。全祖望作《亭林先生神道表》，已援引时人之论慨乎言之曰：“宁人身负沉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后起少年，推以多闻博学，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乡，甘于客死！噫，可痛也！”天崩地坼过去之后，清代康、雍、乾三朝为中世纪中国造出了最后一个盛世。“后起少年”多半不会再有遗民的那种沉痛，因此，“读先生之书者虽多，而能言其大节者已罕”。^② 这种由时间与空间造成的隔膜，使他们在读顾炎武的时候不容易体验“行己有耻”和“通经致用”中所含结的“遗民心怀”。而“行己有耻”和“通经致用”一旦失去了与时事相接的具体内容，也不能不在另一代人的眼里成为空泛的迂谈。乾嘉年间，钱大昕为《二十二史札记》作序，非常明白地说过：“经以致用，迂阔深刻之谈，似正非正也。”^③ 可见，明清之际的大儒曾经注以心血的命题，在这个时候却已变得没有一点吸引力了。与钱大昕相比，写过《国朝汉学师承记》的江藩对顾炎武显得更为疏离。他说：

甲申、乙酉之变，二君（黄宗羲、顾炎武）策名于波浪
磅礴之上，窜身于榛莽穷谷之中，不顺天命，强挽人心，发
蛙黾之怒，奋螳螂之臂，以乌合之众，当王者之师，未有不
败者矣。逮夫故土焦原，横流毒浪之后，尚自负东林之党
人，犹效西台之恸哭，虽前朝之遗老，实周室之顽民。当

① 注中：《国朝六儒颂》。转引自《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11页。

② 《鮑琦亭文集选注》，118页，齐鲁书社1982年版。

③ 《廿二史劄记校证》，下册，88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名編熏胥之条，岂能入儒林之传哉？^①

作为一个经学家，江藩不会不知道他用来对付经义的许多东西都是直接或间接受益于顾炎武的。^②但他评述顾炎武的这段文字则纯是以柔顺奚落“行己有耻”的悲壮，醒目地显示了盛世文人与前朝遗民之间不可沟通的一面。

当“博学于文”远离了“行己有耻”、“六经之旨”远离了“通经致用”以后，明清之际蓬蓬然澎湃一时的思想嬗变就只剩下了以细密见长的实证精神。

就学术史自身的脉理而言，儒学既有“尊德性”的一面；也有“道问学”的一面。从宋人到明人，“尊德性”的一面曾绵延地辉煌了六百余年，“至于阳明良知之论，鞭辟近里，已达极度”。^③“极度”是理路的巅峰，也是理路的止境。出现在巅峰和止境后而的实证精神因之而成为一种转换，它所代表的儒学中“道问学”一面在长久沉寂之后遂为天下学术别开生面。实证精神内含的这些历史合理性，使它能够通过以学术本身的力量吸引一批一批的学问中人；而文字狱造成的触笔即犯时讳，又会使原本别有抱负的英达之士自愿或不自愿地走入实证精神里，去亲近这种用不着议论的学问。于是，以考据为功夫的实证和博证便挤挤插插地汇聚了那个时候的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在经学、朴学、汉学、古学、实学的名目之下蔚为一时显学。

用实证的态度来对待儒学，则多半会把儒学当成一门考史的学问。凌廷堪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也；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经、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

① 《汉学师承记》，卷八，135页。

② 参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32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9页。

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① 在另一面，从实证中求得是非又是一种以光阴研磨心血的生涯。为经学扬焰的大吏阮元说过：“我朝儒学笃实，务为其难，务求其是。是以通儒硕学，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岂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② 这种以光阴研磨心血来换取“实事求是”的精神，被叙史的后人称作“为学问而学问”，“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③ 由此造就出来的人物和著述，曾为中国学术史带来过不同于宋明理学的另一种光彩。二十世纪初，刘师培作《近代汉学变迁论》，叙之津津有味：

江、戴之学，兴于徽歙，所学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且观其治学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征不信者矣。即嘉定三钱，于地舆、天算各擅专长，博极群书，于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而段、王之学，溯源戴君，尤长训诂，于史书诸子，转相证明，或触类而长，所到冰释。即凌、程、三胡，或条例典章，或注释物类，亦复根据分明，条理融贯，耻于轻信而笃于深求。征实之学，盖至是而达于极端矣。^④

他提供了汉学鼎盛时期的一种鸟瞰。这些东西都是由实实在在的功夫凝聚起来的，它们以学术的深度和广度显示了学术本身的价值。因此，当朴学所代表的时代过去很久之后，它们所留下的绪余还能够继续影响后来的学问中人。

然而，在“征实之学”日趋而日成显学的过程里，持考证训诂为天下造风气的人们也在精神上和学术上日趋而日益偏狭了。乾隆

① 凌廷堪，《校礼堂集》，转引自《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31页。

② 阮元：《汉学师承记序》，《汉学师承记》，1页。

③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41、40页。

④ 《近代汉学变迁论》，《左庵外集》，卷九。

年间的程晋芳是一个兼治经义、诗古文，并出入乎训诂之门的学人。他作过一篇《正学论》，其中说：“海内儒生，倡言汉学，盖已四十年矣。大旨谓唐前之书，皆寸珠尺璧，不可贵，由唐溯汉，由汉而溯周。宋人以后，固可置之不论。余尝静而思之，盖有两故，曰：天也，人也。天道气运，常有往复。自明中叶以后，士大夫空谈性命，高阁古书，乡塾小儒，则抱兔园册子，足以令人喷饭。物极必反，宜乎令人将唐以前之书，只字不问而皆珍之矣。人心之巧，又有与天合者。唐以前书少，用功甚易，足以动人。若浸淫于宋后七百年之书，则涉海靡涯，难以究竟。是以群居终日，皆以《尔雅》、《说文》相角，必以服、郑绪论相论，古则古矣，不知学问之道，亦果尽于此否也？”^① 他对汉学中的人物弃置“宋后七百年之书”的做法表达了一种深思之后的异议。

实际上，最早倡导实证精神的那一代人虽曾痛诋明季积久而成的凿空之风，但这些人自身则都是“有闻于宋明之绪论”，而且“于宋学有甚深之契合”^②者。因此，他们对于“清谈害实”的凌厉揆击并没有一意要划清汉宋之间的界线。然而，当实证一旦成为治经的正宗以后，历史上的经学就显然是明人不如宋人，宋人不如唐人，唐人不如汉人了：盖“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因此，“自元和惠栋严划汉宋之界，其弟子江声，余萧客承之，于是汉学之壁垒乃森严矣。”^③ 这个过程无疑内含着一种学术本身的走势。惠栋和他的传人们筑起的这一道壁垒，本是实证精神一路演变而来的结果，但当壁垒既成之后，实证也不知不觉地变作了笃信，其“流风所被，海内人士无不重

① 《正学论》，《经世文新编》，卷十九。

②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页。

③ 阮元：《汉学师承记序》，《清代通史》，中卷，549页，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七年版。

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① 这种“信古”并不都是考证出来的,梁启超称为‘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专以‘古今’为‘是非’之标准”。^② 由是,尊汉和诋宋都带上了明显的盲目性,而风会所趋,又使盲目性成了影响多数的东西。相比之下,与惠栋中分学界并同为一时领袖的戴震则更多些理论的自觉,其褒贬汉宋之辞也更显得言深旨远。他说:

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者也。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③

因此,持六经本旨以论长短,则

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转在其所弃。

这是一种等而下之的趋向。沿此以往,则“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

① 王昶:《惠定宇墓志铭》,转引自《清代通史》,中卷,569页。

②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26页。

③ 《戴东原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卷十,《古经解诂序》。

乖。”^①显然，在严划汉宋之界的过程里，惠栋重在尊汉而戴震更着力于诋宋。

“宋以来儒者”的优势在于义理，戴震从咽喉处下手，向宋儒追问义理的来路。在他论学的撰述里，理义有时候是一种彼岸的东西，一定要从“故训”和“语言文字”筑成的桥上走过去才能够触及；有时候又像是一种与“故训”和“语言文字”溶为一体的东西，解得“故训”和“语言文字”，也就自然解得了义理。由于“宋以来儒者”是“语言文字实未之知”的门外汉，因此，他们注定既不能走到彼岸，也不能解得溶在“故训”和“语言文字”里面的那种东西，其义理遂成为来路不明的可疑物。用这样的理路来通释文字和义理之间的关系，是把哲学化作了文字学。人类认识过程中的许多环节都因之而被文字吞并掉了。其实，戴震并不是一个钝于思辨的人。他也知道圣人自有“精微之所存”，须“以吾之精心遇之。”^②这些功夫无疑都在“故训”和“小学”的范围之外。然而，时当考据之学沸沸然掀动天下之际，戴震很少有心思专注于这一面，去补足认识过程中被他用文字吞并掉了的那些环节；而士林中多数人更喜闻乐见的也是义理统于“故训”的一套道理。于是，懂得用“吾之精心”去思辨圣贤“精微之所存”的戴震，自身能够从“故训”和文字的桥上一路走到彼岸，写出《孟子字义疏证》与《原善》那样的义理之作；但被戴震贬抑宋学之论所影响的多数人则往往一生沉浸于“所以明道者，其词也”，他们在桥上踱来踱去，老是不肯走出“故训”圈起来的天地，也因此而老是到不了彼岸。戴震向宋儒争义理。然而诋宋的结果，却使义理与宋学一起在天下士人的心目中跌落了。他所阐扬的“以词通道”之说，既有考据的自负，也有宏道的自负，但奉戴震为宗师的人们始终只记得他的考据；其著述中的义理一

① 《戴东原集》，卷九，《与其书》。

② 《戴东原集》，卷十，《春秋究遗序》。

面百年之中竟得不到一点回响。

在一个义理日见萎谢的时代里，学人的眼界会变得越来越窄。而寸积铢累于一节一句，一文一字的考据征实之功，又会使他们的眼光在订此校彼，炫博矜奇中变得越来越细。当这两个方面成为一种普遍的意态之后，儒学中的知识分子就再也产生不出大题目了。十八世纪后期，经学家桂馥说：

三十以后，与士大夫游，意气自豪。历城周永年见嘲曰：“涉猎万卷，不如专精一艺。”馥负气不从。及见戴东原，为言江慎修不事博洽，惟熟读经传，故学有根柢。又见丁小疋自讼曰：“贪多易忘，安得无误。”馥始惊然，知三君之教我也。^①

这些话里未必没有一点做学问的心得。但“专精”又是一条狭路，它常常是在舍弃广度的过程里求取深度的，由此产生的优点和缺点是一种割不开来的东西。在一个才智之士都心骛于“专精”的时代里，便很少有人再会去思考大本大源。随之，一面是儒学中不断地孽生出局部和细节的深度；一面是这种局部和细节的深度不断地把儒学割得支离破碎，使人一叶障目，不见丛林：

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习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已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故训，而别创一义。群流附和，坚不可易。^②

最先倡导实证精神的人们，本意是在“明六经之旨”。而到了炫炫然为“汉学”守壁垒的人们手里，由实证精神派生出来的音训、考据、笺疏、辨伪等等却如同被人拆散的八宝楼台，满眼珠光宝气而

① 《晚学集》，卷六，《上阮学使书》。

② 《曾国藩全集》，论文，222-223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看不见亭台楼阁,最终在几经传承之后流为“一种破碎之学”,使“世聪明杰魁之士,相磨而为考证纤末之务,名治经而经日以蔽晦。”^① 六经之旨似乎离得更远了。

宋学喜欢讲大题目,汉学喜欢讲小题目。这种区别系之于学风,又会由学风影响到世风,使盛世的清儒显露出一种与宋明人物判然不同的气象。刘师培说:

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谄。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②

“智而谄”和“弃而湿”显然都算不得恭维。但与刘师培同属一代的梁启超论及中国学术史上的乾嘉时期,则另是一种口气:

兹学盛时,凡名家者,比较的多耿介恬退之士。时方以科举笼罩天下,学者自宜十九从兹途出。大抵后辈志学之士未得第者,或新得第而俸入薄者,恒有先辈延主其家为课子弟。此先辈亦以子弟畜之,常奖语增益其学;此先辈家有藏书,足供其研索;所交游率当代学者,常得陪末座以广其闻见,于是学渐成矣。官之迁皆以年资,人无干进之心,即干亦无幸获。得第早而享年永者,则驯至卿相,否则以词馆郎署老。俗既俭朴,事畜易周,而寒士素惯淡泊,故得与世无竞,而终其身于学。京官簿书期会至简,惟日夕闭户亲书卷,得间与同气相过从,则互出所学相质。琉璃厂书贾,渐染风气,大可人意,每一过肆,可以永日,不啻为京朝大士夫作一公共图书馆。^③

① 《邵位西遗文赠陈艺叙序》。

② 《清儒得失论》,《左庵外集》,卷九。章太炎也说过:“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权谄。”(见《检论》,卷四)

③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53~54页。

其辞较多流连叹赏之意。虽说两者的旨趣并不相同,而刻画描述却各有其传神之处。

自十八世纪后半期至十九世纪前期,汉学群体中把学问放在第一位的人们确乎为器器天下带来过一种不慕荣利的宁静和淡泊。皖人金榜“性嗜学,乾隆三十七年第一人及第,授职后即告归,研究经籍,尤精《三礼》之学。晚年病髀,痛卧不能起,就卧榻著《礼笺》十卷,口授弟子书之。”^① 与之科名相近志节相类的还有孔广森。他是孔子六十八代孙,“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年少入官,翩翩华贵,一时争与之交。然性淡泊,耽著述,不与要人通谒。告养归,不复出。”^② 他们在登天之梯上爬到了万人瞩目的高度,然后从容一跃,轻轻地跳了出来。对于中世纪中国的读书人来说,爬上去和跳出来无疑都不容易,而后面所表现出来的通脱和透彻尤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乾嘉学人中像金榜和孔广森这样把自己的事业划出仕途之外的人物并不是个别的。曾“据经传以纠乖违”,作成《史记志疑》三十六卷的梁玉绳,“家世贵显,有赐书”,面颀意于经术,“自号清白士”。其私心所愿,惟“世世作书生门户”,因而“年未四十,弃举子业,专心撰著”。^③ 他还没有爬完天梯,就已飘然引去了。与这些人相比,“六岁而孤”的凌廷堪则是一个由书坊佣工起家而成进士的人。朝廷用为知县,“自请改教职,选宁国府学教授。则奉母之官,孝弟安贫,毕力著述。”^④ 清代的教职,常被上司用来安置牧令中的才具欠缺者,在多数人的眼里是一种没有前程的冷官。凌廷堪一路坎坷地从乡试、会试、殿试里走过来,最后欣然指认一个冷官为栖身之地,正

① 《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35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② 《清史列传》,5527~5528页。

③ 同②书,5540~5541页。

④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册,160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显而易见地说明了他的怀抱并不在世路上的腾达。作为一个寒士,凌廷堪不能不谋俸禄以助衣食;而作为一个学问中人,他却宁肯要落寞中的一点闲暇。这种选择表达了“为学问而学问”的本心和本色;因此,在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里,有心“为学问而学问”的人们常常一个接一个地走人这种选择。曾作《律吕古义》的钱塘,“乾隆己丑举江南乡试,明年,成进士,需次当得知县,自以不习吏事,请就教职选,授江宁府学教授。公务多暇,专精撰述,于声音文字,尤有神解。”^①另一个叫任大椿的经学家,“乾隆己丑成进士,授主事,补礼部仪制司。礼部四司,祠祭、仪制号繁剧,他司往往求兼。先生独请于部尚书,移司闲曹,得竭半日一夜之力,假书诵习;以为十年守官,犹可强半读书也。”^②他们都是一生消磨在冷板凳上,以小官而成大学问的人物,其余风袅袅,为清史的《儒林传》增添了不少广文先生和闲曹下僚。在汉学播为风气的时代里,出仕的学问人也有闻达者。但他们多半不肯把官场认作归宿,往往正当盛年,即抽身而去。乾隆朝“以积学著闻都下”的钱大昕,通籍以来曾做过二十年京官和四省乡试主考,而后简放广东学政。“盖上深知其学识兼优,寝将不次大用矣。顾先生淡于荣利,以识分知足为怀,谓官至四品可休。明年夏,丁父忧归里,遂引疾不复出。嘉庆四年,仁宗亲政,垂询先生家居状况,廷臣写信劝还朝,则婉言报谢。于是返初服者几三十年。”他在宦味正酣之际悠悠然离开了官场,并无一点留恋,后来的岁月里,他“迭主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而主紫阳独至十六年之久,门下上积两千余人”。^③显然,他更愿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归宿。

这些人在进退之际都无负于向学之心,“其穷也不忧、其乐也

①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册,66页。

② 同①书,158页。

③ 同①书,60页。

不淫”，他们的人品自有卓卓不可轻议之处。然而细细看过去，他们不慕荣利的淡泊里面又显然地包含着一种对于世事的淡漠。这种淡漠为尘寰中的读书人提供了心头的宁静，也使潜心于音韵、训诂、名物、句读中的人们很少想到要从书本上抬起头来四顾天下，看一看人世中的苍茫景观。他们在仕途中和仕途外撰写了那么多与古人争是非的“著述”，却见不到用喜怒哀乐写出了心底波澜的文字。宋儒范仲淹说过：“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①过了六百年，明儒顾宪成又说过：“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②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优秀人物。清儒中也有优秀人物。然而以金榜、凌廷堪、钱大昕比范仲淹、顾宪成，则清儒中的优秀人物显然没有宋明儒者那么多济物利人的怀抱。他们所关怀的东西与世局和众生隔得实在太远，所以，在仕途之中和仕途以外，他们都不容易产生念头在“君父上”、“百姓上”、“世道上”的热忱。其人品的“耿介恬退”也因之而仅剩下一一种淡淡的个人意义。

儒学中砥砺志行的一面在宋学，而音训、考证、辨伪、辑佚、校勘都是无涉于修己立身的学问。稔熟乾嘉士风的天潢贵胄昭槎说：“自于（敏中）、和（珪）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弃置正道。黠者诉罢正人，以文已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余尝购求薛文清《读书记》及胡居仁《居业录》诸书于书坊中，贾者云：‘近二十年，坊中久不贮此种书，恐其无人市易，徒伤本耳！’伤者是言。”^③他的记叙，一方面反映了乾嘉两朝宋学的苍凉荒芜，另一方面则折射了道德对于人心的

① 《岳阳楼记》，《古文观止》，第三册，136页，广益书局刊行。

② 《明儒学案》，卷二十八。

③ 《啸亭杂录》，317-319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约束随宋学衰落而日见松弛。汉学之名既因诋宋而起，又因诋宋而张；所以，附集于汉学的人们多半不会去做明心见性的圣贤功夫。由此所得的道德自由，使读书和立身成为分开来的两件事；也使汉学人物的面目各不相同。他们中所产生的“耿介恬退”者私德自佳，但以心路历程而论，这些人却并不是在天理人欲的一番剧战之后悟彻源头的，而是用学问淡化荣利，由岑寂走向澹远的。因此，他们身上很少有道德磨砺留下的嵯峨嶙峋。然而学问和荣利在每个人心头的重量各有不同。当学问不能淡化荣利的时候，道德自觉的普遍低落就会使汉学中的人们很容易露出耐不得寂寞和清贫的一面。“盖举世风俗，轻视宋学，于是人心风俗，日即于苟”。^①写过《十七史商榷》的王鸣盛“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而在时人的笔下，他的利欲之心却显得非常可怕：

王西庄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宅时必双手作接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接入己怀也。”及仕宦后，秦谗楚诋多所干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公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故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②

他的可怕不仅在于贪欲，而且在于思考周密，理路清晰，能够把贪欲的可行和可取讲得一片透彻，井井有条。他“未尝一日辍书”，天天在与圣贤打交道。但读书和立身既已分成两件事，圣贤也就无法感化他了。另一个经学家汪中“不喜宋儒性命之学。朱子之外，有举其名者，必痛诋之。于时流不轻许可，有盛名于世者，益肆讥

① 劳乃宣：《桐乡遗稿》，卷一，《为学标准》。

② 《瞿亭杂录》，441页。

弹”。^①他留下过许多故事，其中一个说：

汪容甫少狂放，肄业安定书院。每一山长至，辄挟经史数难事请质，孙志祖、蒋士铨，皆为所窘。在院中遍观藏书，遂为通儒。然性卞急，无容人之量。商总某尝报效十万金，得赏二品衔。汪瞰其每出拜客也，乘驴从其从，其后戴草制暖帽，以红萝卜为顶，以松枝为孔雀翎，于项间挂冥镗一串，商行亦行，商止亦止。商恨甚，而无如何，以五千金为寿，始寝其事。^②

狂放本来算不得大毛病。用草帽和红萝卜来戏弄商人买来的顶戴，虽是酷刻多，幽默少，其蔑视之意则自有堂堂正正的一面。但末了“以五千金为寿，始寝其事”，却用一宗交易把狂放、酷刻、幽默、蔑视全都弄得变了滋味，显现于白纸黑字之间的“通儒”形象也不知不觉地沾上了一些青皮人物的痞子气。所以，自《儒林外史》刊行以后，喜欢作索隐的文人很早就认定，吴敬梓笔下的匡超人“实暗指汪容甫先生”。^③这一类说法所包含的精确程度是无法估定的，然而作为一种历史材料，它们又明白地显示了世人心日里的汪中和匡超人之间的可比性。曾与汪中一同做过幕客的章学诚后来说：“此人非不用功者也，有才无识，不善用其所长，激以名心，凿以私智，久游江湖，客气多而志不逊也。”这些都是没有“先立乎其大者”的结果。“是以学问文章，必收摄于身心”。^④他对汪中的评说来自于观察，而由此引申出来的道德思考则已包含着一种非常明显的普遍意义了。宋明六百年之间有过所谓假道学。但能够以经义立说，被奉为一代宗师人们却多半具有鲜明的君子意识，其规

①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册，109页。

② 《新世说·任诞》，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影印版。

③ 《小说考证》，178、561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④ 《章氏遗书外集》（二），《又答朱少白书》。

行矩步，凝重肃穆虽未必尽合人情，而由此表现出来的人格和风裁实有足多者。与他们比，乾嘉人物里的宗师显然没有那么多的君子意识。以训诂考辨得大名的戴震，生前“施教于燕京而其学益远被”，^① 岸岸然为学界领袖。然而死后不久，挂在他名下的两部撰著便因著作权的疑问而先后变作别人考证的对象了。^② 其间，魏源曾作《书赵校水经注后》，发摘“近世赵一清《水经注》为戴氏所剽。”从那个时候起，这件事就成为一个常被咀嚼的话题。^③ 近人汪辟疆曾撮叙其始末说：

惟戴氏有二事滋人疑虑者，则《水经注》与《畿辅安澜志》二书之攘美是也。戴氏在四库馆手校《水经注》，自言据大典逐条校勘。凡补阙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妄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神明涣然，顿还旧观，世人推重，皆无异辞，今大典本《水经注》已影印行世，与戴校迥异甚多。而戴校与赵东潜（一清）《水经注释》正合。东原素负征实之学，不知何以暗取东潜，托辞大典。此不解者一也。《畿辅安澜志》十卷，王履泰撰。其实王本窃东原旧稿，排比成书。惟戴书亦非自出，实窃赵东潜。近人孟森有《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公书案》（应为《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一文，钩隐发微，佐证赅备。此不解者二也。^④

魏源所说的“剽”和汪辟疆所说的“攘”、“窃”、“暗取”，都用同一个意思指述了戴震把别人的著作据为己有的事实。戴震原本是“经

① 《近儒学术系统论》，《左庵外集》卷九。

②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37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中册，20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 《郎潜纪闻四笔》，64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上册，224页。

④ 《汪辟疆文集》，7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学为当世冠”的大儒，无须借剽窃为自己的学问再添声光。但以科名论，他又是一个三经会试而不能登第的举人。不能登第说明运蹇，而三经会试则说明心热。当他奉召入四库馆校《永乐大典》的时候，乾隆曾许“实于办书有益，”可不用会试，径与新进士“一体殿试”。这是一种科举速成法，在久困公车之后尤能引人遐想。因此，后来考证这段故事的历史学家孟森说：“自有此谕，而东原之欲心动矣。非办一大著作，恐不得为办书有益”，于是而“以《水经注》自任”；于是而“窃赵书以应诏”。^①可见，其伸手“暗取”，念头本来不在学问而在功名。迨馆事了结之后，戴震以校书之功蒙皇帝恩赏“进士”和“翰林院庶吉士”。然而仅仅过了二年，他就“卒于官”，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留给后人的，既有学术史上的声望，也有长久不息的议论。戴震一生轻诋宋儒性理之学，但身后为人所讥刺的，恰恰是心性功夫太少而造成的“制行不严”。王国维曾作《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因《水经注》一书的曲折而论及戴震的为人。他说：

东原学问才力，固自横绝一世。然自视过高，骛名亦甚。其一生心力，专注于声音，训诂、名物、象数，而于六经大义，所得颇浅。晚年欲夺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义疏证》等书。虽自谓欲以孔孟之说还之孔孟，宋儒之说还之宋儒，顾其书虽力与程朱异，而亦未尝与孔孟合。其著他书，亦往往述其所自得，而不肯言其所自出。其平生学术出于江慎修，故其古韵之学根于等韵，象数之学根于西法与江氏同；而不肯公言等韵、西法与江氏异。其于江氏，亦未尝笃在三之谊，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已。^②

① 《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373～376页。

② 《观堂集林》，卷第十二，《王国维遗书》，第二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显然,这些地方表现出来的都是一己之名和一己之利的精刻。而太过精刻的人物总是君子意识非常淡薄的。他们只能作经师,不能为人师。

与明清之际的社会矛盾和种族矛盾相伴而生的学术变趋,经康、雍、乾、嘉四朝衍化聚汇而成一世主流。这个过程以实证精神为中国文化营造过一片静静的灿烂;也使众多知识分子的心气和志趣在实证中变得沉寂细碎。而“盛名所在,人更蚁附,钝拙藏身,人一己百。”^①时至十九世纪初期,回过头去看一看为清学开先路的人物和他们在明清之际留下的论学心旨,则不会不看到:经过一百五十多年岁月流逝之后,士林中的慷慨激越,苍凉深沉已经消散殆尽。于是,“昔胜国之士以好讲学为风尚而行衰,今日之士以恶讲学为风尚而行亦衰”。^②人物、学术、世风都在沉寂细碎之中日趋而日益萎靡。

三

十九世纪初年,学术史上的乾嘉时代还没有终结,但历时百年的康(雍)乾盛世却已经过去了。

继乾隆而君临天下的嘉庆从一开始就面对着一场像山火那样旋扑旋起,一路延烧的内战。成千上万的农民由白莲教围聚成一群一群,从西南揭竿斩木,涌出山地,随后是旷日持久的造反、厮杀、围剿、屠戮。历史学家在事后追叙这个过程的时候,非常明白地从兵火的映照中看到了王朝盛衰的嬗递:

国家极盛于乾隆之六十年,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

① 《国史旧闻》,第三分册,528页。

② 《养一斋集》,转引自《清代通史》,下卷,1977页,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

服逾康熙。外宁则内蘖，始兴于湖南、贵州红苗。越明年，授受礼成，太上皇帝训政，宣重光。而湖北、四川教匪旋起，蔓延河南、陕西、甘肃。是时彗星出西方，长数丈，逾年不灭。乘新政之宵旰，兴五省环攻之兵力，且抚且剿，犹七载而后定，靖余孽者又二载，先后糜饷逾万万金。视伊犁回部、大小金川几再倍过之。且前代流寇皆发难未造，川壅必溃，夫有蠢动于庞豫之余，劳师焯武如今日者。心腹患甚四支，内讧急于边陲，痛深者其惩切，创钜者其愈迟。^①

当五省官兵在西部剿洗白莲教众的时候，东南洋面上又聚集起一股与朝廷为敌的海上武装，依荒岛大洋，凭巨舸火炮，往来攻掠于粤、闽、浙之间。“三省洋面各数千里，我北则彼南，我南则彼北，我当艇则土盗肆其劫，我当土盗则艇为之援。”^②在这种波涛里的生死角逐中，东南海患前后延续了十三年，比之首尾九年的川楚白莲教之役更见漫长。据《清史列传》说，其间水师名将李长庚中炮而殪，天子“览奏”之际曾为之“心摇手战”。^③“摇”和“战”当然都是惊吓的结果。迨海事初靖，华北天理教又轰然而起，“骚动四省”。其中林清一股直扑皇城，“分犯东华门、西华门，白帕其首。太监刘金等引其东，高广福等引其西，阎进喜等为内应”，夺门越垣，一直打到殿陛之前。^④虽说这些人最后半被格杀，半被捕杀，但变起于畿辅而血洒禁宫，由此产生的震动却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头。

民变以及由民变酿发的内战用一种暴力的形式昭示了那个时候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原先在视野之外的东西也因此而一个一

① 《圣武记》，下册，37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同①书，354页。

③ 《清史列传》，2390页。

④ 同①书，453~454页。

个被放到了眼前。川楚白莲教起事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嘉庆怀抱犁庭扫穴之心对付白莲教,却不能不带着一团“惻然”在这个口号面前久久沉思,由民变的剧烈想见吏治的黑暗:“百姓幸际昌期,安土乐业,若非迫于不得已,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总缘亲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变至此。然而州县之剥削小民者,不尽自肥己橐,大半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之所以勒索属员者,不尽安心贪黷,无非交结和珅。是层层朘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①他把罪衍尽归于刚刚赐死的和珅,未必算得上是一种鞭辟入里之见。但他对官场情状和天下吏治的腐败却看得明明白白。民变是逼出来的。而当“官逼民反”之后,由民变酿成的内战又会给国家财政戮开一个合不拢来的窟窿。嘉庆一朝的前十数年之间,“川、湖、陕教匪之役,二万万两。红苗之役,湖南一省清销一千有九十万。洋匪之役,广东一省清销三百万两。”^②在十九世纪的中国,由此汇成的巨量白银是无法从岁人中凑出来的。^③于是而“司农竭厥”。国家度支成为一个穷于应付的难题。民变、吏治、财政已经足够使人焦头烂额,然而与之结伴而来的还有连年河患和漕运、盐法中积久而现的困厄。嘉庆在位二十五年,被记入《河渠志》中的河“决”、河“漫”、河“溢”至少出现过二十二次。决堤之水漂走了百姓的性命,也漂走了朝廷花在河工上的大笔银子和一任一任河道总督头上的顶子。而“黄河屡决,致运河淤垫日甚”,^④则直接由河患而连及漕运,使东南送往京师的天庾正供为河路所阻。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① 《十朝东华录·嘉庆·七》。

② 《清史稿》,3709页。

③ 以嘉庆十七年为例,岁入银共四千零一十二万两,岁出银三千五百零一十万两,收支相抵,余五百零三万两,(参阅《清代通史》,中册,408页,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七年版。)

④ 同①书,3786页。

河运和海运之争一直延续到很久之后。河患与漕弊都在把财政窟窿撕得更大,但从上个世纪以来已经弄得千疮百孔的盐政却“疲埠欠饷”,日见尪羸。至道光前期,被朝廷列为岁入要目的两淮盐课已累亏六千三百万两。^①这个数目比同期国家岁入的总额还要多出一半。事关国计,清厘盐务的廷议和奏章遂越来越多。

由民变、吏治、度支、河患、漕政、盐法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危机一层一层地淤积于盛世的升平景象之中。当它们一下子露出脸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被剥尽光泽,毕显出里头的蛀洞、豁罅和朽烂。众多的矛盾舛错交结而又此起彼伏,由此带来的重重忧患冲淡了上一代帝王留下的文字之禁;也使天下事日益迫近地成为士人的切己之事。随后,世风和士风都明显地发生了变化。

乾嘉之际,汉学已压倒宋学,煌煌然如日中天。然而日至中天,接踵而来的总是西坠之势,后来使汉学(清学)裂为两片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在中国学术史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都托始于汉代,也分流于汉代。皮锡瑞说:“西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谓岐阳石鼓文,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以历史过程叙其先后次第,则:“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通行之今文,乃使学者通习”。至刘歆始倡古文经,而后东汉的一批经学家们“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②显然,同

① 《清史稿》,3617页。

② 《经学历史》,87~88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皮锡瑞在这里对于今古文经学的区别以及对“古文”所做的解说显然过于简单化,而且并不精确。但他的说法却是那个时候有代表性的见解,并因此而更接近于这里所叙述的时代。

古文经学相比,今文经学的资格要更老一些。但文字的今古异同所显出来的不过是外观一面,这两种经学能够各立门户,“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①其分野的界线应当是从内里划出来的。“章句训诂”推求的是文义,“大义微言”阐发的是意义。文义需要考证,而意义则需要解释。所以,古文经学的源头和归宿都在经典文本之中。家法所传,既能以一字一句见功力,也易为一字一句所拘囿。其推演之际容不得一点活泛的浮想。没有浮想的嫁接,时务与经义就连不起来,两者之间的这一段距离,使家法中的学问人矻矻然抱元守一,“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讽)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②由此产生的著述,可以增添盛世的文华,却不能回应衰世的忧患。与之相比,今文经学显然是另一副面目。清代最早有志于今文经的是庄存与。他也读一字一句,然而精神所注,则在于圣人的“约文以示义”。^③“约文以示义”,既说明了“义”由“文”示,又说明了意义在文义之外。这是一种无法由考证而得的东西,因此,治经的功夫并不在一字一句之中,而在于读出圣人的言外之意,“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④这就需要附会和悟想。被称作“微言大义”的物事大半都是这样揣摩出来的。例如,《春秋》文公五年记“秦人入都”。庄存与引申而衍绎之说:“《春秋》之法,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民者,《春秋》之所甚爱也,兵者,《春秋》之所甚痛也。”是以“秦人好用兵,而先见其端于天下,于入都然后见之也。”^⑤这些话本身都是不错的。但《春秋》记事只用了四个字,圣人写这四个字的时候是否一定融进了那么多的深

① 《经学历史》,89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章太炎全集》(一),476页。

③、④ 《春秋正辞·春秋要旨》

⑤ 《春秋正辞》,卷八,《外辞·八》。

意却是一个没有办法确定的问题。这种由历史空间所留下来的不确定性,为今文经学提供了解说的自由,其中必然会有许多自觉和不自觉的再创作。微言大义既在“语言文字之外”,^①自由的解说又是从各人已有的人生体验和知识构造里派生出来的,因此,今文经学的路数很容易产生“非常异义可怪之论”。^②继庄存与之后弘扬今文的宋翔凤,“其义瑰玮,而文特华妙”,^③却又老是喜欢把阴阳、五行、谶纬孱入微言大义中去,使孔夫子显出些非理性的神秘来。然而微言大义总是在讲天道人事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天道的意蕴,也在人事。与古文经学疏证字义、文义的路径相比,人事最终不能不归趋于论政,并使古典因一遍一遍的阐释而不断翻新。在世路蹉跎的年代里,从这里发出来的议论能够以自己的回声对铜山西崩,作洛钟东应。由是,当学术史上的乾嘉时代过去之后,以“魏晋以还,莫敢道焉”^④的《公羊》学为前导,今文经学蓬蓬然而起。

今文经学发源于西汉,古文经学发源于东汉。所以,由古文经学而今文经学,在时序上呈现的是一种倒卷之势。梁启超曾说:

入清代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继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⑤

他用一百八十多年以来儒学的走势来说明今文经学的复兴,自有

① 阮元:《庄万耕宗伯经说·序》。
② 何休:《公羊传注自序》。
③ 《章太炎全集》(三),476页。
④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1页。
⑤ 同①书,60页。

其以经学解释经学的道理。然而以经学解释经学,说的只是竖看一面。若横看学术思潮的嬗递,则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代谢又是一种与世运相关联的社会变迁。开始退落的旧潮与正在涌起的新潮都具有自己的群体性,并不断地在群体意识的翕合中折射出各自所代表的世风、人情、心态、价值。因此,旧潮的退落和新潮的涌起正以学风的变化昭示了那个时候人心的变动。

由于人心变动,所以,古文经学以累世之力一针一线编织出来的华袞,在另一种眼光的审视下显出来的却是周身破绽。因此学术思潮的代谢大半是从批判中开始的。魏源说:

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诘厉者乎?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①

《周易》决疑,《洪范》占变之类是经学上古已有之的一种理想。其中既有严肃的命意,也有经不起推敲的臆说。这两层意思的思想价值并不一样。但由此显示出来的“以经术为治术”,却是儒学中的一个深入人心的命题。在士大夫的用世之心久受文祸的噬噬和短钉的研磨之后重新发舒这个命题,反映了艰难时世的殷殷呼唤。因此,以诂训、音韵、名物器服截断了经术转化为治术之路的古文经学,便成了后起的知识分子痛加掙击的对象。在另一个地方,魏源曾把乾嘉人物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一网打尽,历数“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之“争治诂训音声,爪剖鉅析”,而后以一言作概括,切讥

① 《魏源集》,上册,24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为“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①这些人当日都有过名动天下的风采,然而仅仅隔了一代人的时光,他们就在酷评之下变得衰飒败落了。此可谓世风骤变。在魏源之前,与汉学相角牴的言论并非没有出现过。但时当“诂训音声”光焰万丈之际,这些言论只能是一种寂寞的孤唱。以此做比照,则世风骤变中的痛诋汉学之声已纷纷然成为一时群鸣了。嘉道年间久客京华的而惯以饱看世间相的沈垚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因此,

汉宋诸儒,以经术治身则身修,以经术饰吏治则民安,立朝则侃侃岳岳,宰一邑则俗阜人和。今世通经之士,有施之一县而窒者矣,有居家而不理者矣。甚至恃博雅而傲物,借经术以营利。故垚尝愤激,言今人之通,远不及前明人之不通。其故由古人治经,原求有益于身心,今人治经,但求名高于天下,故术愈精而人愈无用。^②

他对汉学的评估与魏源非常相近,而由吏治说到修身,其憾意则更深于魏源。世风因世事螭蟾而激变。所以,从批评中累积起来的意气一定会驱使后起的知识分子向汉学追究以学术误天下的责任。“周知庶务,而一本儒术”的孙鼎臣说:

国初诸儒,矫前明讲学空疏之失,读书实事求是,务明考证,以汉经师为法,与宋儒未尝相戾,其学未为失也。于时硕德名贤,布列朝野,急躬行而耻以言竞,风流笃厚,礼教相先,号为本朝极盛。其后日久,承学者始用私意,分门别户,造立名字,挟汉学以攻宋儒。而又有一二巨公,凭借权势,阴鼓天下而从之,士大夫于是靡然向风,争趋汉学,其言皆六艺之言也,其学则孔孟之学也,所托者

① 《魏源集》,上册,358页~359页。

② 《落帆楼集》,卷八,《与孙愈愚》,卷九,《与许海樵》。

尊，所当者破，猖狂妄行，莫之敢非，天下学术由是大变，宋儒之书能举其名者少矣，至于缙绅之徒，相垢病以道学。人心风俗，流失陷溺至于如此，尚可言哉！

他以学术的流变为界线，把“国初诸儒”与后来挟“私意”的“承学者”们分开来，然后词气锋利地一路倾泻说：

天下之祸，始于士大夫学术之变。杨墨炽而诸侯横，老庄兴而氏戎入。今之言汉学者，战国之杨墨也，晋宋之老庄也。夫杨墨老庄，岂意其后之祸天下若是哉？圣人忧之，而杨墨老庄不知，此其所以为杨墨老庄而卒乱天下也。今夫天下之不可一日而离道，犹人之不可一日而离食。人日食五谷而不知其旨，凡物之味皆可以夺之，然而一日厌谷必病，病久谷绝必死。今之言汉学，其人心风俗至如此，后之论天下者，于谁责而可乎？^①

孙鼎臣的话很少有轻裘缓带从容论学的趣味，因此引申之际会不由自主地带出些苛刻来。但苛刻是从忧时之思里产生出来的。从他眼里看出去，漠视风俗人心的汉学一面与天下苍生的精神世界隔得很远，一面又以自己的漠视孵化出了另一种风俗人心，并由此而映衬出它们所据有的“孔孟之学”与圣人之道之显然相悖。所以，苛刻和忧思都反映了久被汉学排诋的那些儒学观念正在急迫地重新崛起。魏源和沈垚把汉学看做“无用”之物，同他们比，孙鼎臣的议论无疑显得更加深沉凌厉。后来做了中兴名臣的左宗棠把洪秀全与汉学连在一起，追咎前后因果，“持论亦与芝房（孙鼎臣）相同”。^②这一类推论未必说明得了真实的历史联系，却能够使人十分具体地体会到汉学的声光在那个时候的低落程度。魏源、沈垚、孙鼎臣代表了乾嘉之后那一辈人的思考。他们常常用一种非

① 朱克敏：《儒林琐记·雨窗消息录》，56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② 《清稗类钞》，第八册，3824页。

常自觉的态度把自己与乾嘉人物划分开来。但细绎乾嘉人物的心迹,则可以看到其中年辈较后的人们蒿目时艰,也有过一点反思。嘉道间“专为汉儒之学”^①的陈寿祺在自己的文集里转录过两段取之于著述之外的话:

仪征阮夫子金坛段若膺寓书来,亦兢兢患风俗之弊。段君曰:“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仪征曰:“近之言汉学者,知宋人虚妄之病,而于圣贤修身立行大节,略而不谈,乃害于其事。”二公皆当世通儒,上绍许郑,而其言若是。^②

“仪征阮夫子”是阮元,“金坛段若膺”是段玉裁。前者被人看作汉学护法;后者则以音训之学而久负盛名,然而他们在心底里对于汉学营造出来的局面都已失去了十足的自信。当世风骤变之际,是非常常别有新解,遂使门户中的人们也守不住藩篱了。于是,古文经学在“如日中天”之后便被后起的舆论浇熄了光辉,一步一步地显出黯淡和背晦来。

古文经学的黯淡和背晦,说明了训诂考据提供不了为衰世里的众生详述指归的东西。详述指归一定要借助义理,然而训诂考证之学在排诋宋学的过程中已经把义理逐出了门墙之外。所以,在需要宏宣妙旨的时候他们便不能不露出一脸的枯窘,并因此而越发反照出挟微言大义而来的今文经学那一派咄咄逼人的磅礴。微言大义也是一种义理。^③ 在古文经学敛手的地方,今文经学能

① 《清史列传》,5577页。

② 《左海文集》,卷七,《孟子八录·跋》

③ 侯外庐说:“虽然宋代理学专讲义理,与汉学有历史的分立,而其中义理之学正继承前汉董仲舒微言大义的传统”(见《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册,58页,生活书店民国三十六年版),此说极是。

够“引《公羊》义讥切时政”，^①以“三统”、“三世”之说恣酣地放言因革。虽然由“三统”、“三世”衍发出来的文字里常常杂有一团一团的“要眇之思”，但它们用经术论说治乱，期待“三王之道若循环，圣者因其所生据之世而有作”^②的滔滔讽议，却为纷乱的世象画出了一条可以寄托祈想的歧路。因此，清代的今文经学起于庄存与，立于刘逢禄、宋翔凤；至道光年间则喷薄而出，发为龚自珍的时论和魏源的策论，以忧危之言“规天下大计”，一时声光四射。时弊与时病的丛积，需要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世间人说清大是大非。然而梳文栉字的博证和实证铸造出来的眼光，其志趣与乐趣都脱不出小是小非。与古文经学相比，今文经学的优长显然在于多了一点形而上。当乾嘉人物矜矜然贬斥宋儒的时候，他们都深信义理不过是凿空得来的无根之物，而握在自己手里的则是“实学”。但造化喜欢调侃人，在世局“殆将有变”^③之际，能够从本源上立论，为天下国家开出药方来的并不是“实学”，而是与义理同属一路的微言大义。社会变迁制约下的这种学术起伏，使人分明地看到：曾被汉学痛加挞伐而尘灰蒙面的义理，已在世路忧患的召唤下由今文经学带入了汉学之中。把汉学推向巅峰的古文经学是以排诋宋学起家的，而继起的今文经学却在排诋古文经学的过程中驳驳乎成了汉学里的宋学。读史至此，不能不感慨系之。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发生于汉学内部。在门户之外，沉郁已久的理学则以廉(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之说裁量政教学术，把许多被古文经学遗忘了的话题重新推到了士大夫们的眼前和心头。在士林中的多数人忙忙碌碌地向音训、考据、辑佚、辨伪讨声望的时候，理学那一脉细细的香火是靠着

①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1页。

② 《龚自珍全集》，193页。

③ 包世臣：《艺舟双楫》，《内与杨季了书》。

桐城派里的几个词章之士延续下来的。后人叹为“一编之内，惟此尤竞竞。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①至嘉道以后，怀念程、朱的人已越来越多，理学也从一隅之地里走出来，进入了忧时之士的议论之中。在盛世与衰世之交的那个时代里，人心的变动同时又是一种人心浮动。变动和浮动引发于四海治乱，生民休戚；又明白地表现出经历了冗冗琐碎之后的知识分子在时艰迫来之际身心无所依傍的惆怅杌隍。因此，四海治乱和生民休戚的家国之思一定会拽着士大夫中的自觉者内省寸衷，为自己和别人去寻求安身立命之地。道光十七年，罗泽南说：“予迩年始得宋儒之书，读之，因复求之四子《六经》。至道精微，固非愚昧所能窥测，然已知圣贤之道，不外身心。往日之所学，未学也。”^②他后来以书生统兵立勋名，被谥为“忠节”，但这个时候还是湖南乡间蹭蹬于饥寒之中的穷儒。在相近的时间里，太常寺卿唐鉴“潜研性道，宗尚洛、闽诸贤”。已经做了京官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窦埏、何桂珍“皆从鉴考同学业，陋室危坐，精思力践”。^③这些天子身边的人们也在向宋儒之学讨取安顿身心的地方。他们中产生过在后来的历史上留下了深远个人影响的人物。居庙堂之高的读书人和处江湖之远的读书人沿着各自的阅历、体验和思考都在重研理学，这种共趋反映了今文经学之外的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忧患时势的心解和心路。与公羊学善用“三世”、“三统”解说世运的“俶诡连犷”之辞相比，理学的长技显然不在于放言纵论政事的因革。所以，其言之淳淳的道理很少有新奇动人之处。然而从另一面看，理学“施教化、厚风俗、致太平”的践履和理想又在迂远之中沉蓄阔大，代表了一种能够凝聚中国社会的精神力量。由“三世”、“三统”演绎出来的

① 《曾国藩全集·诗文》，247页。

② 《湘军人物年谱》（一），5页。

③ 《清史稿》，13155页。

托古改制之说不难动人耳目，而“施教化、厚风俗、致太平”的践履和理想却意在入人心田。十九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社会已在暮云低垂中“四海变秋气”。但衰世的苍凉萧飒不仅仅见之于政事的枯槁破败，而且日甚一日地表现为人气的疲散麻木和猥琐迷离。吴廷栋曾与友朋论天下事，把后一面看得更可怕：

来书所示官场之弊，谓士大夫无耻如此，安得不江河日下，实深中今日人心风俗之弊。欲挽回尽人之无耻，必先视乎一二人之有耻。权足以有为，则挽回以政教，权不足以有为，则挽回以学术。即伏处一隅，足不出里闾，但使声气应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将必有闻风兴起者，纵不幸载胥及溺，犹将存斯理于一线，以为来复之机。是亦与于维持补救之数也。^①

他的话里既有剥极而复的自觉，也有此心耿耿的强毅。两者都说明：乾嘉时代过去之后，复兴中的理学是以一腔危苦与四围散淡人气相撑持的，其“慷慨激烈轩爽肮脏”^②的蹈厉远远多于“方巾大袖冥目枯坐”^③的虚静。因此，十九世纪的理学群体没有重造出宋明两代那种哲学意义上的博大精深。他们中最优秀的人物直面一世颓波，心中回萦的始终是一种汲汲皇皇。性理之学的主敬主静也因之而化作前跋后蹶中暗口焦思的危言危行。

*

*

*

晚清的理学和今文经学都是在衰世来临之际立起来的。后来的岁月里，它们又以各自的学术影响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文

① 吴廷栋：《复沈舜卿书》。

②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四），《复黄子春》。

③ 《国史旧闻》，第三分册，521页。

化。理学以“扶纲常，传圣学，位天地，育万物”^① 为本位；今文经学“以经术为治术”而“通乎当世之务”，致力于“变通之法”。^② 因此，在万国梯航开中西交冲之局的时代里，理学人物的经世之路越不出取新卫旧的界限，而今文经学却促成过除旧布新的事业。但不同的学术也陶铸出不同的人物。十九世纪的中国，从今文经学里走出来的人多策士、壮士和功名之上；迂远的理学则为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提供了精神领袖。这种区别，又常常使人在读史的时候沉思久之。

① 《罗忠节公遗集》，文集卷五，《健庵说》，《重修谢叠山先生祠引》。

② 《魏源集》，下册，432页。

鸦片战争与儒学

1840年到1842年的中英之战以禁烟开始，议和结束。这个过程，使中国士大夫与英国资产阶级直交面逢于民族战争之中。他们的激昂和愤懑、惊疑和紧张、辛酸和悲哀虽然因人而异地表现为不同的主张和不同的心路，但又多面地汇示了那个时候的士大夫群体意识。

林则徐在遣戍伊犁的途中曾致书友朋，指论时事，一吐积郁。他比照中西说：

岸上之城郭廛庐，弁兵营垒，皆有定位者也。水中之船无定位者也。彼以无定攻有定，便无一炮虚发，我以有定攻无定，舟一闪躲，则炮即落水矣。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若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转展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

因此，“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列戎行之人，而皆觐面接仗，似此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

左”。^①他写出了中英战争的实情，也写出了中国人的窘态。久有内战和外战历史的中国虽然产生过《孙子兵法》和各有韬略的众多名将，但这个时候西方人用利器造成的战争态势却是旧法所提供的经验难以破解的。“未之前闻”一语，真切地表达了炮火下的人们在拒敌时的茫然和愕然。

以旧式暴力抵抗新式暴力，中西之间舟船与枪炮的悬殊对比，常会化作无情的压力，逼出血性者的英雄主义，召唤他们在劣境中慷慨一击，肉搏赴死。

关天培是近代民族战争中第一个带着一品官阶殉国的将官。虎门一战，中国人手中的火炮曾八次炸裂，相形之下，愈觉西人“炮密如栉”。而“天培督兵据炮台拒战，自巳至酉，兵溃，天培亲熬大炮，火门透水，炮不得发，英人自台后上，天培格杀数人，枪箭雨至，负创奋斗，力竭没于阵”。^②事前，他已“緘一篋”寄家人，内藏“堕齿数枚，旧衣数袭”。这种安排，说明了他的致死之心并非生成于一夕之间。“盖公怀敌忾之忠，有死无二，故寄齿与衣，以绝生还之望”。^③此后一年又四个月，另一个提督陈化成阵亡于吴淞炮台。时人记叙说：方酣战之际，“我军炮子多砖心，比至贼船而灰，炮门且裂，全塘震动。部将韦印福、钱金玉、许攀桂、徐大华等皆死，尸积公前，公麾旗痛哭”，而西人则“架炮桅顶”四面轰击。这是一个血与泪交流的局面，但中国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正见于此。“时（火）药无布袋，炮无米囊，燃必跃子，心空炮耳折，架窳不可再用。公掬药纳子，炮震伤手，血流至胫。旋有巨炮冲陷土牛，击公仆地，细子中股，纷如雨点。”当英国人涌入炮台之后，七十六

① 《林则徐关于鸦片战争的书札》，《鸦片战争》，（二），568～569页。

② 《清史列传》，3090页。

③ 《诰授振威将军广东全省水师提督关忠节公传》，《顾志斋文钞》，卷一。

岁的陈化成以重伤之躯再起扑击,枪弹洞腹,“伏地喷血而死”。^①据说,前一夜,他曾与部将周世荣论战事,以为“吾两人福皆不薄”。周懵然,“公笑曰:‘诘朝功成,吾与汝受上赏,不然,亦俱不朽矣,岂非幸哉?’”显然“上赏”不过是笑谈,“不朽”却是严酷而且真实的归宿。比之关天培,这同样是一种熟思已久的致死之心。中英之战,像这样甘愿以头颅抵挡利炮的人并不是个别的。梁廷枏作《夷氛闻记》,曾有“夷寇一役,提镇大员皆死疆场”之叹。虽说统括不免过宽,但毕竟反映了身负守土之责的中国军人死事之多。这些人留下的血路昭示了不屈的民族气概。但他们身在战局之中,亲眼目睹过硝烟下的天地玄黄,又是对中西之间的历史差距感受最深的人。于是,军人的勇敢和血诚不能不在心长力绌中走向狭路,多自见于必死之志,少求伸于必胜之心。“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②他们的心迹和苦痛,既显示了民族战争中英雄主义的悲壮,又显示了民族战争中英雄主义的悲怆。对于历史来说,两者都记录了真实的时代内容。

关天培谥忠节,陈化成谥忠愍,同时俱见的,还有壮节、刚节、昭节等等。这些人职在持干戈以卫社稷,未必都有意自居于士大夫之列。但他们由儒学的浸泡而形成价值观念和人生信仰,并在生死交迫之际以见危授命实现了这种观念和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正反映了士大夫群体意识的一面。关天培临命之前,“创痕遍体,血濡衣襟”,但引为深憾的,仅是“吾上不能报天恩,下不能养老母,死有余恨”。^③这恐怕是他在人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了。“天恩”就是“君恩”。在那个时候,忠君是与爱国是等值的。这种等值,表现了为历史所囿的狭隘和片面,但它随儒学播撒于人心之中,又确乎支撑和凝聚了民族战争中的反侵略者。富有凄楚

① 《江南提督陈忠愍公殉节略》、《陈将军画像记》、《鸦片战争》(六),356~357页;《清诗铎》,679页。

② 《清诗铎》,676页。

③ 《诰授振威将军广东全省水师提督关忠节公传》,《顾志斋文钞》卷一。

意味的是,关天培战死前一个月,还刚刚受过上谕的严词切责:“身任提督,统辖水师,平时既督率无方,临时又仓皇失措,著先行革去顶带,仍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① 后人读史,自会生出许多感慨。

以旧式暴力抵抗新式暴力,中西之间舟船和枪炮的悬殊对比,又会逼出颟顸者的蒙昧相,用他们落后的议论和行为描画历史的情性。

虎门失陷后一个月,参赞大臣杨芳带着远调而来,奉旨进剿的大兵抵达广州。道光在诏书中称他“久列戎行,受恩深重”,并许以“应守则守,可战则战,一切剿办机宜,朕亦不为遥制”。^② 在当时的中国,他大概是皇帝最信得过的一个武将了。这种信任未必是浪得虚名的结果,但在中世纪与近代相交之初,他从内战中揣摩出来的心法,却在民族战争中淋漓地表现了自己的不合时宜。其历史形象也因此而变得一塌糊涂:

芳之始至,遣佛山口入,民耆其宿将,望之如岁,官亦群倚为长城。入城即发议谓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在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为压胜具,载以木筏出御鸟涌,使一副将领之,自部卒隔岸设伏,约闻已炮响,即举筏齐列木渚,溺器口向贼来路,而后自抄出筏首夹攻之。

结果是排满溺器的木筏并没有挡住英国人的“长驱直进”。于是,出乎意料的杨芳不得不“亟勒兵入城”。^③ 这个故事极富调侃性,但它包含的历史内容却是非常严肃的。杨芳起家于川楚白莲教之

① 《清史列传》,3091页。

② 《鸦片战争》(六),392页。

③ 《夷氛闻记》,《鸦片战争》(六),33页。

役,由民间教门的神秘主义推衍出来的妖法和厌胜术本是惯闻之物,虽然其中怪诞多于真实,但耳熟以后,非常容易成为经验中已有的东西。因此,当他看到近代火炮并为它超乎想象的威力震慑时,沿用已有的经验去解释未知的事实,便不会不想到妖法。在这里,杨芳是认真的,他相信厌胜术可以对付“邪教善术者”。其意态和心态,以独特的方式表现了那个时候一部分中国人对西方逼迫的抵御和回应,然而用溺器对付火炮,究其底里,又不过是中世纪对于近代的抵御和回应。伸张正义的愿望与蒙昧的玄想因之而连为一体。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这种逼出来的蒙昧相并不仅见于杨芳一人。一八四一年夏,飓风过香港,西人舟船颇有沉没。但经奕山人奏,张大其辞,穷尽描绘,遂一变而为天助中华:“淹毙洋人汉奸不计其数,帐房寮篷吹卷无存,所筑马头,坍为平地,扫除一空,浮尸满海”。尽管此中颇多谎言而且易见破绽,却极大地满足了焦头烂额的道光。由此产生的兴奋,显示了更多的蒙昧:

朕披览之余,感邀天贶,既深欣幸,更益悚惶。英人恶贯满盈,肆其荼毒,多行不义,竟伏天诛,此皆冥漠之中,神明默佑,余氛扫荡,绥靖海疆,允宜虔蒸瓣香,以伸诚敬。著发去大藏香二十炷。交奕山等分诣各庙宇,敬谨报谢。^①

在西方资产阶级开始用科技征服自然,并汲引出巨大生产力的时候,中国的君主却几乎要对着一场南方的夏季风暴感激下跪。两者的对比是明显的,但两者又是同一场战争中的对手。这种比较,并不仅仅意在奚落道光。在屡战屡败的刺激下,相信“多行不义,竟伏天诛”和“冥漠之中,神明默佑”的中国人正不在少数。叙录广东战事的《英夷人粤记略》一书,虽至今已不知撰人,但文字体气毕见士人口吻。其中以记实的笔法写到了民族战争中的神道:“四月

^① 《清宣宗实记》,《鸦片战争》(一),417页。

之役，逆从永字台发火箭数十百枝，射入城中，攒聚于火药局，无一燃者。咸云：见一白衣妇人，以袖拂箭，箭落不燃，咸谓：观音山慈悲大上显圣云。”^①“咸云”与“咸谓”，既反映了多数人的观感，也表达了作者的识见。另一个士人张维屏所作的《三元里歌》曾经久负盛名。他意在赞颂抗英的义民，然而“夷兵所恃惟枪炮，入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②则歌吟之中又非常明白地臚进了不可言传的“天规”。将帅、君主、士人，他们的资质本没有高低上下之分，但他们的蒙昧相却正在伯仲之间。屡见的蒙昧接源于传统文化的负面，它们展示了士大夫群体意识的另一重内容。后人无理由蔑视这些东西。然而，在侵略和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中，正义一方所显露的蒙昧相又不是单单用蔑视可以说明的，它含结着严峻的历史矛盾和深沉的历史悲哀，并反映了中西之间舟船和枪炮之外的另一种时代差距。

二

在近代外交意识萌生以前，中国人对付非我族类者只有攘夷与抚夷两种古法。鸦片战争中的士大夫是从古法中选择自己现实立场的，他们因之而被分成两类。

虽说中英之战最后以抚夷了结，但主张攘夷的人们始终居士大夫群体的多数。光绪年间曾因出众的洋务议论而几乎被时人目为汉奸的郭嵩焘，这时才刚刚二十岁，是一个出入场屋的读书人。他后来追叙旧时情怀说：“当庚子、辛丑间，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③这些话要比局中

① 《英夷入粤记略》，《鸦片战争》（三），18页。

② 《清诗铎》，408页。

③ 《郭嵩焘诗文集》，34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人的言论更能反映那个时候的普遍情绪。“忠义之气”表现了对英国人强暴侵逼的敌忾，它又会唤起意识形态的敌忾。从孔夫子以来，儒学就强调两种界限。一是以伦理分善恶，于是而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二是以礼教分人禽，于是而有华夏和诸夷的区别。在久经沉积之后，这些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汇成朝野士大夫的通识。一朝触发，便使“逆夷性同犬羊”之说蔚为南北东西的时调。以禽兽比拟夷狄并不是值得称道的思想，然而它在夷夏之间划出的文化界限，又从意识形态上维系了中国人的民族心理防线。由是，西方人的嚣张所刺戟出来的忧国忧时之痛与儒学固有的板结观念非常自然地贴合在一起，成为众多士人立论的根据。收录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里的大量奏议，以及产生于同一时期的信札、诗文、揭帖、笔记保存了当时的各色舆论，剿夷与攘夷的呐喊比之抚夷的声音实在要响亮得多。“从来外夷，非畏威不知怀德，故驭夷必先剿而后抚，自宋至明，边患不同，要之申国威者，皆忠义之臣，而不顾国体者皆奸佞之辈，虑远者皆智勇之士，而苟图目前者，皆庸懦之流。”^①这一类言论既多忠愤，又多意气，它们的呼应和共鸣，形成了民族战争中的清议。

攘夷的士大夫们常常把林则徐看成代表，并且相信“林邓镌职，逆夷洒酒相贺”。^②他们按照先贤留下的形象来理解林则徐，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人未必知道林则徐主持翻译过《四洲志》和《华事夷言》。这种区别，画出了历史的时序感。林则徐是最早怀抱禁烟御侮之心与英国人对抗的士大夫。但当他逼视西方人的时候，他同时又看到了历史经验以外的另一个世界。来自这个世界的器物使中国人在战争中相形见绌，于是而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耿耿之想。开眼看世界获得的知识突破了以人禽分夷夏的旧见，林

^① 《清道光朝留中密折》，《鸦片战争》（二），516页。

^② 《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三），171页。

则徐也因此而成为最富时代意识的爱国者。相比之下,汇聚于攘夷旗帜下的士大夫中,更多的人们则表现了义愤与否塞的同一。

一个广东士人曾经引“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的古训以论兵事,主张多施斩梟以夺彼族之气:

逆夷最畏我朝刑法。闻裙带路人回说云:“诸逆兵常相与语,若打败仗,宁即死于刀炮,不愿被获,中国刑法惨毒不堪。广人益言刑烈以恐逆兵,逆兵即色怖震懼”。夫制人者必中其所畏,苟获得逆兵,无论兵头水手兵役,立即处以极刑,梟示海滨,一则以生逆夷之畏,二则以夺逆夷之气,此亦制逆之一法也。^①

以酷刑为制夷之计,虽是书生见识,却不是当时的空论。蒙古人裕谦上持浙东军务的时候,就在镇海前线剥过“白黑夷匪”的两张人皮。他的奏报里有一段专门叙述了这件事:

该逆前在广东,有奴才曾将逆夷剥皮之谣,随即发令飭委翼长狼山镇总兵谢朝恩,宁绍台道鹿泽长,将该逆噶里绑出营门,先将两手大指连两臂及肩背之皮筋,剥取一条,留作奴才马缰,再行凌迟梟示。其黑逆米哈勿亦即戮取首级,剥皮梟示。俾众咸知奴才有剿无他,以杜其首窜两端之念。访察兵民,无不踊跃称快。^②

以剥皮对付英国人,是愤夷已极的结果。然而酷刑引入战争,又使民族自卫变成了狭隘的仇恨宣泄。它显示了情绪和意气,却不能显示理性和力量。仅仅过了一个月,英国军队就攻陷了镇海。剥皮梟首并没有吓退这些用重炮为商品拓路的西方人。裕谦在兵败力竭之后投水而死,实践了“城存俱存,以尽臣节,断不肯以退为

① 《英夷入粤记略》,《鸦片战争》(一),22页。

②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三,35页。

词,离却镇海县城一步”^①的誓言。他是一个文官,但一腔愤血毫无吝嗇地洒在了疆场上。这些人是传统造就出来的,他们又代表了一个传统的社会。当他们从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以抵御强敌的时候,他们的种种情态又绽露了传统的局限。

与攘夷相比,抚夷是一种低调。而清议的激扬,则越益反衬出这个圈子里的人们在国难面前的心怯意沮。1840年8、9月间,琦善在天津与北上的英国人交涉之后,曾非常惊讶地向道光描述过他们的船炮:

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二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亦逐层居人。又各开有窗扇,平时藉以远眺,行军即为炮眼。其每层前后,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移转磨盘,炮即其所向。

其观察和记叙的仔细,在当时是少见的。而后,他比较中西,“溯查向来破夷之法”说:“有攻其船之下层者,今则该船处所,亦经设有炮位,是意在回击也。又有团练水勇,穿其水底者,今白含章^②亲见操演水兵,能于深五六丈处持械投入海中,逾时则又跳跃登舟,直至巅顶,是意在抵御也。又有纵火焚烧者,今则该夷泊船,各自相离数里,不肯衔尾寄碇。其风帆系白布所为,节节断离,约长不过数尺,中则横贯漆杆藉以蝉联,非如篷蔑之易于引火,是意在却避延烧也。”于是,“我师从前之长策,而该夷所曾经被创者,兹悉见机筹备。是泥恒言以图之,执成法以御亡,或反中其诡计,未必足以决胜”。^③琦善在华北看到的景象与林则徐在华南看到的景象是一样的。他们都已经感觉到旧法不足恃。在这一点上,两者都

①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三,20页。

② 琦善所派窥察夷情者。

③ 同①书,卷十五,6页。

与那个时候的否塞者不同。但林则徐从这里走向更新旧法以制夷,琦善则从这里走向了和戎抚夷。时人以诗嘲之曰:“望洋先怯狂涛势,航海唯通外国祠。割地交情千古厚,滔天罪恶万人知。”^①以抚夷为时务的士大夫,是中国社会里最先屈服于西方军事优势和军事胜利的一部分人。在当时和后来,他们都理所当然地成为世人睨而视之的对象。

然而,两千年儒学灌溉出来的夷夏之见以及与之相关的观念和感情,并不是仅仅凭借军事胜利可以扫荡干净的。持抚夷之论的士大夫屈服于英国人的军事胜利,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扔掉了孔夫子。这种矛盾,使他们在曲意与西方人周旋乞和的时候,又常常憎恶和鄙夷西方人。琦善是第一个主和者,而以中华国体比彼邦风习,则蔑乎视之,目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知君臣上下”。^②另一个参与议和的大吏牛鉴,虽曾在西人的炮火下落荒而逃,而心底里实在是把英国人看做人类以外的东西:“彼虽畜类,亦具人形。譬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论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尝不摇尾而帖伏”。^③在这些方面,他们与一心攘夷的人们不仅见识相近,而且感情相通。但是,奋臂攘夷的人有激愤而无彷徨,他们的信念与行为是一致的。嗚嗚抚夷的人却因屈服于一个为自己所不齿的敌人而撕裂了灵魂和人格。他们中一部分人曾由此而体味过一种说不出的涩苦。本是攘夷派的浙江巡抚刘韵珂,后来变作了抚夷派。由攘人抚之际,自述“忿恨之余,哭不成声”。^④在此以前,广东议和也有过相似的一幕:“各大宪于会衔时各自引咎云:不能仰副皇上委任,致被该夷人猖獗致此,实属辜负

① 《溃痼流毒》,《鸦片战争》(三),344页。

②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十五,7页。

③ 同②书,卷五十三,26页。

④ 同②书,卷四十八,9页。

圣恩,言此皆痛哭流涕。怡(良)大人更为凄怆,顿足失声,闻者莫不感动”。^①当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道光也成了抚夷派。然而“条约既定,帝阅之,徘徊于廊下,直至夜分。从者时闻帝叹息之声,或自语曰不可不可。夜三钟,忽顿足携约款入殿,以硃笔批准,令太监送至军机处”。^②度其心事,正有许多愧对祖宗的忿痛。他们的痛哭与叹息未必富有历史价值,但毕竟以真情流露了局中人的心犹未甘。所以,和局既成之后,曾经致力抚夷的人们又往往另换题目,用心于防夷一面。刘韵珂所作《致金陵三帅书》正是一个例子。其中罗举夷夏之间的十虑八患,用缜密的思量写出了对西方人的提防之意。民族战争中这一部分士大夫所显露的丑陋相是理无可恕的。但他们的曲折心路又说明,儒学观念构筑起来的民族心理防线是强韧的,即使在屈服之中,它也没有消融殆尽。

三

在中英战争之初,西方人对中国有一种优势感;中国人对西方也有一种优势感。西方人的优势感来自目测和比较,其窥探觊视在战争爆发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一八三六年,美国传教士主编的《中国文库》(旧译《澳门月报》)曾经非常轻侮地写道:

对于常备的有实效的军事力量,中国人似乎一点也不知道。即使在一个城门里,人们必以为经常有一支强大、可靠的卫兵驻扎,但实际上,当一个外国人,由于好奇而向里面窥探时,他所见到的不过是一个像苦力的样子,穿着短裤,手执纸扇或藤鞭的人。外国人到官署呈递禀帖时,就是他们集合兵马的信号。这时候,兵士鱼贯而

① 《鸦片战争新史料》,《鸦片战争》(三),434页。

② 《清室外记》,转引自《清代通史》,中册,922页。

入,不穿军服,不带武器,没有准备,半睡半醒,同时把一堆一堆的棕色毡帽和红色、黄色、蓝缕的衫前后缝有一个“勇”字的长号衣,从闸门送进来给这群英雄们打扮。稍后,又慢吞吞地走进一个大概是当时可能找得到的个子最大的军官来。这出武戏的行头是一些弓箭和几把生了锈的刀剑,显然都是临时找来惊动和威吓“番鬼佬”的。^①

这些刻划,虽以极尽挖苦为能事,但终究是熟视以后的写照。比较起来,中国人的优势感则半是来自历史的成见,半是来自臆想和附会。它们所表现的是一种懵懂的自大。当廷臣和疆吏交章发议,集矢于禁断烟毒的时候,他们常常提到西方人,然而他们中几乎没有人想到过西方人会发动战争。其时,琦善还不是抚夷派,他在奏折里极富自信地说:

内地实有可制外夷之权,乃反受其欺而不善用其权,为大可惜者,则大黄茶叶是也。凡西口外极大者为俄罗斯,以及诸番,皆需此物。盖地土坚刚,风日燥烈,又日以羊牛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以此为通肠圣药。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亦惟茶叶是急,英吉利较近,皆不能离此。

而且“夷人心思才力虽优,独于此二物,即欲购种移植,而物土异宜,竟不能如其愿”。因此,他称这些东西为“造物予中土以制外夷之权”,深信一旦“海口关隘严戒,不准通商”,则诸夷大黄茶叶无以为继之后将“不能不哀息”。^② 中国人的优势就在于西方人别有一付胃肠。这种见解不知起于何时,但却是那个时候多数士大夫的共识。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也心同此理,在奏告中非常有

① 《鸦片战争史料选译》,70~71页,中华书局版。

② 《溃痲流毒》,《鸦片战争》(一),516页。

把握地说：“至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查访，实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尤厚，果然悉行断绝，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权。”^① 他是一个认真的人，然而一开始并没有走出士大夫群体意识。从臆想和附会中产生的优势感是虚假的东西，它很容易被事实撞碎。中英闭隘断市以后，英国人并没有“哀恳”，而是以武力显示了自己的犷悍和强横，茶叶大黄之说从此就很少再见于奏议和公牍了。但是，当懵懂的自大还是一种群体意识的时候，虚假的优势感又十分容易在撞碎之后重合。英国人从海上打过来的最初一阵炮火击破了旧的臆想和附会，却引发了新的臆想和附会。后来以《瀛环志略》一书驰名的徐继畲，这个时候曾轻率而自负地议论过英国人的军事弱点和生理弱点：“至于登陆步战，则非彼之所长，其人两腿僵直，跳走不灵，所用者自来火之小枪，不过能四十步，此外则短刀而已。我兵之排枪、弓箭、长矛等器，彼皆无之”。^② 这也是当时的一种共识。另一个士人在《上浙抚乌尔恭泰（额）筹办英夷书》中表达了同样的见解：“其战也，又以诱令登岸为首务，盖逆夷远涉海洋，久为风涛掀簸，其身心安于鼓荡，一经舍舟登陆，则头晕脚软，必无能为”。^③ “头晕脚软”比“两腿僵直”似乎要更近事理一点，然而也同样是文人遐想的结果。稍后，英国人就沿福建、浙江、江苏汹汹北上，途中下船登岸，多次在陆地上大打出手。备受创痛的东南地方当局者们于是而明白了原先的想法是靠不住的：“论者本谓该逆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山越岭，又有汉奸为之引道，各处路径，转较我兵反为熟悉”。^④ 陆战的一败再败，终于导致了炮口下的江上议款。

① 《鸦片奏案》，《鸦片战争》（二），97页。

② 《退密斋文集》，《鸦片战争》（二），597页。

③ 《平夷录》，《鸦片战争》（三），366页。

④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四，30页。

这个结局,给士大夫们带来的是一种身世家国之哀:“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至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①其中不无久睡初醒的感觉。

“回首何堪此建旌,槛车一辆去南濠”。^②两年又四个月的中英之战,使卷入战事的整整一群大吏都成了皇帝的罪人。除去死于战事者外,参与其事的十多个钦差大臣和总督巡抚里,四个人被处斩监候,一个人被处绞监候,三个人被革职戍军台。此外,还有多人的革职和革职留任。在这些人当中,既有抚夷派,也有剿夷派。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于上流社会的强烈震动,士大夫们惯性的懵懂自大,不能不因此而发生变化。战争过去之后,耆英在奏折中说:

探闻奕经、文蔚、余步云之在浙江,奕山、林则徐、琦善之在广东,颜伯焘之在福建,筹办剿抚,不遗余力,亦皆井井有条。此中或任用失当,或抚夷过柔,或偏执己见,或不谙兵机,致都债事。前据夷酋郭仕立等向臣言及,畏服林则徐办事结实,敬服琦善临事敏捷,佩服伊里布处事诚实,并云:“皆中国好大臣”。臣闻之亦为之叹服。至于前督臣牛鉴,亦复为该夷等中心诚服,执礼甚恭。是诸臣之材识,皆足以慑服外夷。且数十年来,仰蒙造就栽培,未尝不加以委任,一经办理夷务,均不免于获罪。^③

他所提到的这些人虽说今日评价各有不同,却大半都是当时的官场能吏。但用古法衡量,他们都先后成了驭夷的失败者。而时论纷纭,“主剿者莫不痛诋议抚之非,及至剿而失利,又归咎于剿者之

① 《退密斋文集》,《鸦片战争》(二),598页。

② 《咄咄吟》,《鸦片战争》(三),232页。

③ 《清道光朝留中密折》,《鸦片战争》(三),466页。

多事。主抚者咸称剿不足恃，及至抚议既成，复不伸度彼己，欲图一试，取快目前。若即令主剿者剿之，主抚者抚之，临时之际，亦皆一筹莫展”。^① 剿与抚于是乎俱穷。这是一种令人唏嘘的困局。

耆英是一个肤浅的人。因此，他并没有意识到困局中包含的时代内容。然而在战火的烤炙下经历了剿夷与抚夷的一代士大夫中毕竟出现了最早的警悟者。初版于鸦片战争结束这一年，并在后来两度增辑的《海国图志》一书，虽以转述西方历史地理为主旨，却代表了中国人在时代嬗递之际的认真思考。魏源所了解的英国人，已经不再是莫知由来的犬羊之类了：“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得腴削其精华”。^② 这些观察指出了西方人无情的扩张之势，也激生了对于西方人扩张的理性反应：“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③ “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抉示了民族自卫与民族自强的历史同一。它是中国人用一场失败了的血战所换来的醒悟和警觉。

但是，“万年和约”带来的昏沌会使战争留下的惊怵很快成为烟云过眼之物。那个时代耆英多而魏源少。当庚申之变以后中国人再度议论这个题目的时候，二十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

① 《清道光朝留中密折》，《鸦片战争》（二），471页。

② 《海国图志》，卷五十二。

③ 同②书，卷二。

曾国藩论(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近代中国产生过不少矛盾人物。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维护传统又超越了传统;他保守旧物同时却冲撞了旧物。作为“中兴名臣”之首,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自觉代表;作为“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他又不自愿地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引入开了门洞。容闳称曾国藩为“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①“特产”刻画了时代在一个士大夫身上留下的印记。“世事别来一番新”。这种富有历史内容的矛盾深刻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儒学中人的忧患困惑及其艰难曲折的历史分化。

—

洪秀全发动了太平天国革命,曾国藩扑灭了太平天国革命。这两个历史造就的对立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又代表着中国社会的这一段历史。

洪秀全是一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事业曾寄托着千百万小农的利益和憧憬。小农既苦于传统,又囿于传统,在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之前,他们原本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传统。然而由太平天国聚合起来的小农却信仰着西方的上帝,一开始就否定了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十三章。

传统。这一矛盾,使阶级的冲突在形式上首先表现为异端宗教同传统文化的冲突。由是,无法突破传统的事业,却取得了猛烈突破传统的外观:“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毁。”^① 在上帝教昭示平等的教义背后,是成群结队涌来的小生产者们燃烧着的激情。当金陵小天堂出现在人世的时候,洪秀全的理想似乎实现了。但是,没有内容的外观终究不过是一种幻境。激情冷却之后,天堂的影子也在风吹雨打中模糊了。太平天国借助宗教猛击传统,却不能借助宗教而跳出传统。使洪秀全获得力量的东西最后又使他丧失了力量。他在一大片土地上把旧日的封建秩序化为废墟。然而,为了反封建而建立起来的天朝新秩序仍然包含着封建:“子不敬夫(原文如此)失天伦,弟不敬兄失天伦,臣不敬君失天伦,下不敬上失天伦。”^② 可以说,远在湘军的炮火把天京城墙轰塌之前,洪秀全的理想已经破灭了。

曾国藩以镇压太平天国而成为地主阶级的出类拔萃之辈。他直言自己身上的血腥气味:“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③ 斯可谓化人间之至酷为平淡无奇,因此,称他为刽子手并非刻薄之词。但仅止乎此,用来说明这样一个人物又是远远不够的。曾国藩不是鲍超。他以书生而操杀人之业,是人生信念驱使的结果。太平天国崛起于东南,多数人看到的是农民战争兵锋面前的王朝危机。曾国藩却看到了“外夷之绪”冲击下,“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前一种危机在中国历史

①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讨粤匪檄》。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496页。

③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638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的螺旋循环里并不算新鲜,后一种危机则是从来没有先例的。比之李自成“不犯圣庙”;张献忠“亦祭文昌”,洪杨要可怕得多了。于是,产生了《讨粤匪檄》。它的主题,是一种强烈的保卫传统的自觉意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①在这个主题之下,曾国藩不仅代表王朝,而且代表圣道;不仅代表圣道,而且代表神道。由名教衍生的传统本是历史的惰性,但在这里却变成了引动杀机的使命感:“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②当曾国藩带着一身热孝奉诏而出的时候,举目四顾,看到的是“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在一片惨淡景象里,支撑着他的精神力量便是这种使命感。“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③他从这里径直走向战争,沾上满手鲜血,也因此而丧失了两个兄弟。“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④涕与泪交流写出了由衷的哀痛。但其中并无后悔之意。这种顽梗,使他体现了封建道德的理想境界;也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亢厉的刽子手。

因为曾国藩代表了传统,所以,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他远比洪秀全更能得到理解、承认和支持。在他的呼喊之下,汇聚起成批从性理之学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当权派,但当权派更深刻地了解和熟悉社会;他们不是官僚,但比官僚更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处在封建政权的底层,但因此而更直接地承受着农民战争的压力。旧制度培育了他们,他们又适逢其会地成了挽救旧制

①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讨粤匪檄》。

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737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与江岷樵左季高》。

④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915页。

度的“抱道君子”。咸丰初年,东南地区的钦差、督抚在太平天国的席卷之势面前一溃再溃。但两湖战场却涌出了一群儒生变成的悍将。“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①他们杀人流血,也殒命战场。在这些人身上,孔孟程朱之教是以非常残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最使人感慨而太息的,莫过于“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②了。儒学孵化出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同上帝教旗帜下的农民为敌,但在他们指挥下出力死战的,又全是刚刚放下锄头的“朴实山农”。《湘军记》的作者王定安说过:“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③他的话美化了不值得称赞的东西。但他说出了传统制度下的农民同时又沉浸于传统影响之中的事实。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可能产生代表自己的独立意识形态。因此,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便成为一种现成的权威。而生产方式的保守又决定了思想方式的保守。在世代承袭的过程中,古老的观念与同样古老的生活相适应,变为天经地义之物。曾国藩以“诸生讨训山农”^④,正是自觉地用自己的卫道意识来呼唤小农的卫道意识。如果说,聚集在洪秀全理想下的众多农民显示了小农精神世界的一半,那么,追随于曾国藩之后的同样众多的农民则显示了小农精神世界的另一半。于是,沿着传统,镇压农民战争的血腥事业却从农民群众当中获得了主要的物质力量。这是一种令人思之恍然的历史矛盾。

洪秀全的失败和曾国藩的胜利,表现了传统的力量和传统的

①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林君殉难碑记》。

② 转引自罗尔纲:《湘军兵志》,1页。

③、④ 《湘军记》,卷一,2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湘军记叙》,1页。

选择。一个应当灭亡的王朝因此而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命数。大大小小的士人们半是谀颂半是祝祈地名之为“中兴”。其实,在中国社会已经面临着近代化剧变的时候,这种力量 and 选择不过是中世纪的最后一阵回光返照。曾国藩在回光返照里以学问建立“事功”,成为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人物。“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① 一代地主阶级以比附历史表达了自己的推崇之忱。但是,末世不会有中兴。同前代人物相比,时代为曾国藩安排的是另一种命运。

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正同太平天国血战于长江中下游的曾国藩,面对面地遇到了挟着天津条约溯江而上的西方人。这种相逢,使一个出自传统的卫道者目睹了传统之外另一个匪夷所思的世界;一种旧式的暴力碰到了一种强劲的新暴力;外夷渗入了内战。在它的背后是庚申之变留下的浓重阴影。

当曾国藩接到中国同英、法、美三国新订的和约条款时,“阅之不觉呜咽”。^② 比之洪秀全所谓“窃外夷之绪”,和约描绘的那种西方人带来的局面已经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了。它们褻渎和践踏了曾国藩的信念,因此,曾国藩一腔愤恨,以“五胡乱华”相比拟。^③ 呜咽和愤恨,在地主阶级的忧时之泪里交融着中国人披发左衽的民族伤痛。它显示了曾国藩同他所鄙夷的“奉洋若神”者们之间的区别。“白齐文痛殴杨道(坊),足使挟洋人自重者爽然自失”。^④ 这种称心快意之语,以双重的憎恶发

① 《清史稿》,39册,11918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②、③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年十一月卅日。

④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复李少荃中丞》。

舒了一个士大夫内心的本来感情。

但是,西方人用大炮两次打败中国的结果是泪水和愤火所无以为计的。在曾国藩的眼前,“洋船上下长江,几如无日无之”。^①它们带来了不可回避的逼迫之势。胡林翼视师安庆期间曾驰马江边,目见汽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他因之而“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②仓惶失措正是压力下产生的一种时代意识。这种意识不仅说明了胡林翼,也同样说明了曾国藩。曾国藩以水师肃清长江;用陆战攻陷坚城,同太平天国厮杀了十数年。其间,他既从太平军手里领教过“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的厉害,为之“惊心动魄”,^③也购买过同样的东西来对付太平军。战争使他真正懂得了船炮。过去凭道听途说而知道的“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④,已经成为阅历之后的切肤感受。畏惧之心随之而生。曾国藩辛酸地承认过;“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⑤在他身上,惶遽休惕之情超乎个人生死,而又带着啃心噬肺之痛:“四更成眠,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⑥这是一种真正的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畏惧是比较的结果。因此,它比憎恶包含着更多的理性成份。从这里走向反思不过是一步之远。剥绎畏惧之心,可以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中一部分身当其冲的人们在西方优势面前的危机感。这些人直而着现实,所以,他们又是当时中国最清醒的一部分人。危机呼唤自强。于是,“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⑦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704页。

② 薛福成:《庸盦笔记》,17页。

③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864页;《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九月初二日。

④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致左季高》。

⑤ 同①书,655页。

⑥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⑦ 《清代七百名人传》,上册,392页。

在近代中国,自强曾是一个多义词。但最被人注目的是与洋务运动同义的“自强新政”。曾国藩发其端绪,在抵御西方苦相煎逼的动机下接受了一部分西方的事物。这是地主阶级对于时势的一种逸出常轨的反应。二十余年前,林则徐、魏源已经见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先知者总是寂寞的。民族战争失败所换来的真知灼见,只能发为友朋之间的慷慨议论,成为没有回声的孤鸣,直到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一把大火使世人重新看到这个题目。咸丰十年岁末,曾国藩在一件奏折中用“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口而忘备”的设问,引出了“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①身同此境,心同此理,继林则徐、魏源之后,他是再鸣此声的第一人。次年,奕訢奏请购买外洋“小火轮船,益以精利枪炮”,用来剿洗太平天国。曾国藩力赞买船买炮之议,称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但他意不仅仅在太平天国:“目下贼氛虽炽,而江面实鲜炮船,不能与我水师争衡”。同奕訢相比,他所着眼的是“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②斯时,湘军正倾全力猛攻安庆,没有一个人比曾国藩更直接地处于同太平天国为敌的地位。但是,他更担忧西方列强。他所使用的“救时”二字是概括时局之词,无疑已经包含着后来李鸿章所谓“二千年来一大变局”的基本意思了。因此,当曾国藩赞成买船买炮的时候,他的目光并不止乎买船买炮:“欲访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以勤远略,未敢遽问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③同一年,湘军攻陷安庆,第二年曾国藩即设内军械所,试制新式船炮。稍后,容闳奉派出洋采办机器,于是而有规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二,《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

② 同①书,《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

③ 《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137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模可观的上海机器局。曾国藩是一个起点,在他手里,“师夷智”从一种议论开始转化为一种社会现实。

但是,在内战和外患的并发之中,外患刺激下产生的接受西方事物的过程不会不同内战纠结相缠。复杂的历史环境曾使曾国藩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交错面前表现出一种心力俱绌的牴牾和彷徨。人们常常不忘记曾国藩是最早赞成“借师助剿”的人物之一。咸丰十年,他在奏折中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可以纾一时之忧”,^①就此留下了骂名。然而奏折之外,他还有一番全不相同的意思见于私人信札:“彼甘言蜜语,以师船助我打长毛,中国则峻拒之;彼若明目张胆,以师船助长毛打我中国,再哀求之,岂不更丑?”是以“宜虚与委蛇,与之为婴儿,与之为无町畦,犹为少足自立之道”。^②这些话表达了对西方人根深蒂固的疑虑。奏折是真实的;私信也是真实的。而两种真实之间却有着一道深深的裂痕。外在的牴牾反映了内在的彷徨,体现了一部分传统的士大夫在时代旋涡之中的一种心理过程。曾国藩经历了牴牾和彷徨,但牴牾和彷徨并没有淹没民族界限。两年以后,他作成《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留下过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中国之寇盗,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即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貽讥于后世。”^③

曾国藩从船炮着手寻求自强。这种眼光既反映了他对西学的认识程度;又反映了他实利主义的选择标准。然而“师夷智”的过程一旦开始,近代工业的内在联系和外在联系就会发生作用,拖着从事这一事业的中国人在接受西方事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其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二,《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

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612页;《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三,《复胡宫保》。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六,《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

一,船炮引入了制器之器。安庆设局制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这个结果使曾国藩看到了旧式技术同新式产品之间的矛盾。因之而有容闳出洋采办机器之举。先进的制器之器正是沿着这条渠道第一次为中国社会所自觉接纳的。不仅如此,同一个过程还复制出制器之器。上海机器局开局之初,就有过“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之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的事实。据说,用这些机器做出来的落地开花炮之类,“皆与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敌”。^① 制器之器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新生产力。虽然它由船炮引入,并在生产船炮的过程中被复制出来,但它一经出现就会在量上积累,而且按照自身规律运动,或迟或早会突破开其始端者的狭隘预想。其二,制造引出了翻译。近代中国在缺乏相应科技背景的条件下移植了西方的机器工业,这是一种脱节。而语言障碍又加重了这种脱节:“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因此,曾国藩把翻译看做是“制造之根本”。他并不反对由外国人帮忙译出《汽机发轫》一类入门读物,但更寄意于另立学馆以习翻译。“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另勒成书。”^②从而产生了一种专门机构。曾国藩所注重的是“有神制造”,然而近代工艺同声光化电是难分难割的。翻译不但输入了实用技术,也输入了科学知识。而科学知识则会带来改变世界观的思想力量。在一个古老的社会里,这正是否定古老本身的力量。其三,器引来了相应的“制”。当曾国藩只注目于船炮的时候,自强之道不过意味着对泰西之器的一种拿来主义。但船炮其实不是孤立的东西。随着新作战工具的出现,“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

①、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七,《新造轮船折》。

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① 同治四年,曾国藩观看了“纯用洋人规矩”操演的淮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赞叹:“余平生所见部队不逮此远矣。”^② 其所赞叹者已经不仅乎器了。三年后,他提出:江南水师往年所用之长龙、舢板均不便于出洋。“现于上海船厂制造轮船,又于芜湖等处试造广东艇船。俟船成之后,仍须酌改营制,略仿西洋之法”,乃可角逐海上,日起有功。^③ 比之操演规矩,营制是更深的一个层次了。“仿西洋之法”是仿西洋之器的结果。在曾国藩的时代,这种由“器”到“制”的过程还刚刚初见于兵伍之事。但它已经使人意识到拿来主义不足以应付之。“酌改”和“略仿”的对举说明,接受外来之物和变更中国自身之物在这里是同一的。于是,从小小的一角开始,自强之道为了维护传统而戳破了传统。其四,“设局仿造”洋器引发了选送幼童“出洋学艺”。“夷智”最先表现为洋器。但仿造洋器的过程又会使人看到“夷智”之精妙并不系乎洋器。曾国藩在垂暮之年已经懂得:“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苟非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因此,重洋相阻的隔手仿造终究不能收“远大之效”。这种见识来自洋务经验,又成为他采纳容闳教育计划的思想基础。同治十年,曾国藩领衔奏请选派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近代官费留学自此而始。曾国藩指望这些幼童子弟能从异国学来新的本领,同时又保留旧的思想:“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④ 但是,他们既离去故国而到异域,“终日饱吸自由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62页。

②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四年八月廿八日。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六,《拟赴上海查閱铁厂片》。

④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

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①成了与八股士子大不相同的另一种人。他们学到了新的本领,也学到了新的思想。

曾国藩是一个识时务者,但又背负着几千年历史的沉积。在今日被统称为“洋务派”的人们中,他是第一个师法西洋新文化的人,又是中心固恋中国旧文化的人。李鸿章游孔林时说过:“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②这是一种新与旧的联想。相比之下,曾国藩初见西洋千里镜,惊羨之余,却发生了另一种联想:“因思天下凡物,加倍磨冶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人圣。”^③从千里镜想到进德之功,异乎寻常而又非常自然。透过这种联想,可以看到一个开风气之先者的保守心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日记中还留下了这样的话:“内人病日危笃,儿辈请洋人诊视,心甚非之而姑听之。”^④寥寥数语,画出了一个士大夫的传统感情。但是,在剧变的时代里,命运会捉弄感情。当曾国藩手创制器、练兵事业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由此搬入中国的泰西之物竟是侵蚀二千年文物制度的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制器之器为军火工业提供了新的生产力,而后,军火工业推出了民用工业,官办企业诱发了商办企业。封建社会的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在同一个时间里,西方传人的科学知识使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眼界大开之后,自然观急匆匆地转化为社会观。梁启超后来说:江南制造局译出的几十种“科学书籍”曾是光绪年间号称“新学家”的人们求知识于域外的“枕中鸿秘”。^⑤而留学生严复则以他的《天

① 《西学东渐记》,第十九章。

② 刘休仁读《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眉批。

③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廿一日。

④ 同③书,同治十年三月十九日。

⑤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60页。

演论》促成了近代思想史上的进化论时代。洋务派哺育了自己的继承者和否定者。由是,在旧的社会形态被缓缓撕开裂痕的同时,传统的观念因冲击而动摇了。曾国藩曾经惊骇于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十哲两庑,狼藉满地。”^①然而“狼藉满地”并没有打倒传统。与洪秀全相比,曾国藩引来的西洋之物实在更利害得多。一个以捍卫传统起家的人却变成了否定传统的历史中介。它深刻地说明:在时势的逼迫之下,地主阶级的一部分身不由己地接受了本来不可能接受的东西,承担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使命。由此,地主阶级的历史分化也就开始了。这是一种变态。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旧嬗递正是借助这种变态而越过了一个难以越过的环节。

三

两次民族战争的失败不仅触发了士大夫群体中一部分人的自强意识,而且使“驭夷”成为他们面对的一个历史的难题。

曾国藩在庚申之变以后身膺重寄而绾接中西。他的眼前,刚刚过去的“车驾北狩”之祸依然历历在目。沿波讨源,叶名琛“辱其身以大辱国”的结局不能不重重地牵动他的身世家国之念。于是而有“久作达官,深虑蹈叶相末路之愆”^②的长思久想。叶名琛“初以拒洋人入城有贤声,因颇自负,常以雪大耻、尊国体为言。凡遇中外交涉事,驭外人尤严,每接文书,辄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顾其术仅止于此,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审诸国情势之向背虚实强弱,而谋所以应之。”^③因此,在彼族的汹汹之势面前,他同时显示了一个士大夫的攘夷之志和“驭外

①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讨粤匪檄》。

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1418页。

③ 《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二),228页。

骄傲之态”^①。这种攘夷之志和骄傲之态的同一，曾是中西交汇之初众多士人的群体意识。咸丰七年，曾国藩就第二次鸦片战争初起时的粤中形势遥为议论说：“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耳。英夷土固不广，其来中国者人数无几，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他预言：“此次确斗，彼必不能坚守。此后官兵之气日强矣。往时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筠仙归自上海，亦震诧之。鄙意彼蹈骄兵贪兵二忌，恐不能久。”^② 曾国藩的话反映了他对叶名琛的期许；也反映了他同叶名琛的相似和相近。但是，骄傲并不能成为攘夷的真正力量。当西方人强暴地打破骄傲之后，中国只能在劣境中倍受勒逼。咸丰十年，曾国藩“接恭亲王咨文，敬悉銮舆已出巡热河，（夷）氛逼近京城仅二十里。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③ 严酷的现实推翻了他的预言。一个久居于骄傲之中而不自觉其骄傲的人物，因此而明白了骄傲之不可恃。他后来说：“若叶崑臣则受唾无穷期矣。”^④ 叶名琛由夷务而得名，又由夷务而身败名裂。他以自己的背时说明了驭夷之道的困窘。所以，曾国藩对叶名琛的非议，同时又自觉地包含着他对驭夷观念的变化。李鸿章初主北洋之际，曾以为用“痞子腔”可以应付西方人。但曾国藩却深深地表示不以为然。^⑤

与这种观念变化相联的另一种认识，是随华洋杂处而来的中西对视。两次鸦片战争后，“泰西诸国，久已遍行内地。”^⑥ 西方人以自己的出没纵横给中国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又使中国人在前所未有的切近中日睹了他们的面目。曾国藩驻节东南，身近洋场，

① 《粤客谈咸丰七年国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二），243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致左季高》。

③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年九月初三日。

④ 《曾国藩未刊信稿》，375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⑤ 《庚子西狩丛谈》，109页。

⑥ 《曾国藩未刊信稿》，8页。

彼族种种情态不可排遣地成为日见夜思之物。这是一个忍看“彼狡焉者，虽隔数万里而不啻近逼卧榻”^①的过程。由此产生的“海国环伺”一语，摹写了一种二十四史里没有出现过的夷祸。与古来的边患相比，十九世纪中国所面对的已不是一个族类，而是“数十国联成一气”的西方世界，“其合纵之势，狼狽之情，牢不可破。”^②曾国藩身在局中，慨乎此而有“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③之谓。他的话表达了因不能摆脱西方人带来的夷祸而产生的愤懑。

然而切近的对视又把单色变成染色，使曾国藩能够直观地看到西方人的别一类情态。同治初年，他在的一封信中提到：刘丽川起事期间，上海“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他因此而叹曰：“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④以“君子之行”比夷人夷事是夷夏之辨的出格。它同曾国藩言及彼族而不胜其愤愤之情的诸多痛恶议论全不相合，但又与后者孱杂在一起，同样真实地反映了他观察之后的感受。曾经因所闻而深信逆夷“性同犬羊”^⑤的曾国藩，这时却因所见而称说“西人素重信义”^⑥。观察的具体性带来了观察的多面性和矛盾性。这一类感受，都是用异族入侵的历史经验来比较西方人；用一种文化来体会另一种文化；用封建主义来理解资本主义。就认识的真理性而言，未必富有价值。但作为认识的一个阶段却是开眼界的结果。由此，惯把夷狄视作禽兽的人们发现，在要挟狂悖之外，西方人还有另一面：“诸夷不知三纲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三，《复袁小午讲学》。

②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八年一月十七日；《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三，《复李次青廉访》。

③ 《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三，《候选训导计棠呈稟豫中采访记略折》。

④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七，《复毛寄云中丞》。

⑤ 同②书，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⑥ 《曾国藩未刊信稿》，21、27页。

而尚知一信”^①。与历史经验相比,这是一种大为不同的东西,而它产生之后又不会不影响和改变历史经验铸成的固有之见。

反思和观察,引来百感交集,撞击着曾国藩的心扉,促成了驭夷之道的转向。在谋求自强的同时,他又提出另一个观念:“推诚”。淮军初入苏南之际,曾国藩多次论及用忠信笃敬以处华洋交涉:“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②推诚于西洋人,搬用了封建道德的推己及人之义以周旋交际于资本主义泰西诸国之间。时代造出了一种像是移牛头就马嘴的奇相。以此替代“驭外骄傲之态”,表现了困厄中的矛盾:士大夫中的一部分因更多地见识了西方人的诸种情态而懵懂初开;又因其以己度彼的一知半解而远没有摆脱懵懂。所以,他们在克服懵懂的同时又显示了另一种懵懂。

懵懂初开而又并未摆脱懵懂,是枪炮推动下的中西交逢所必有的一段过程。在两者的纠结之中,驭夷之道的转向以畸形的历史形式显露了近代外交意识的最初萌芽。一、同治元年,赫德过安庆。曾国藩受奕訢之囑,亲自答拜“以示稍优”。有人因之而以过谦为谏。曾国藩回信说:“鄙意求胜于洋,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在税饷之盈绌,尤不在体制之崇卑。”^③末一句话,卸下了以天朝威仪睥睨西方人的架子。六年后,他就外国使节朝覲所牵引出来的礼仪问题发表意见,主张“不必强以所难,庶可昭坦白而示优容”,^④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天朝体制是一块历史结成的化石。它以夷夏之见为前提,因此,封建主义的不平等是它的一种本色。道光十四年,“夷日”律唠啤用“平行款式”致书两广总督卢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33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八,《复李少荃》。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复李少荃中丞》。

④ 转引自《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228页。

坤。后者深以为耻：“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目律唠啤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① 使他愤慨不平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咸丰年间一度主持夷务的徐广缙，则在体制的名义下指定河边城外的冷落仓库为接见西方使节、收受国书之地，其折辱之意是非常明显的。相比之下，从卢坤、徐广缙到曾国藩，几十年间士大夫的观念起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走出数千年华夷秩序构筑起来的否塞圈子，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一步。它与民族战争的失败俱来，并实现于外在暴力的强推硬挽之下。当战败的天朝被迫放弃封建主义不平等的时候，中国却面对着西方人带来的另一种不平等。扭曲的历史过程造成了一个扭曲的近代化。二、同治六年，曾国藩应诏沥陈中外修约事宜。他在奏疏中说：“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执，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这种意思又称作“平情说理”。^② 1840年以来，中国地主阶级曾经在战争与议和两种途径下同西方人打过交道。它们是没有外交意识的交往，但又是外交意识的前导。随后出现的“平情说理”异乎此二者，表现了创巨痛深的地主阶级在西方人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同治三年，由总理衙门出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中文本刻印成书，并被送到每一个通商口岸。^③ 出于丁韪良、蒲安臣和赫德的介绍，第一代洋务人物在身历战争与议和之后接受了万国公法。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兼署南洋大臣，成为这本书的先睹者之一。他的话正体现了接受公法以后的一种反射。西方人运来公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119页。

② 转引自《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228页；《庚子西狩丛谈》，110页。

③ 《中国翻译简史》，231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207~2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法,是因为公法代表了他们用以改造中国的条约制度。中国人接受公法,则是“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①这种身居劣境的以理相争,曾国藩谓之“于羁縻之中,仍寓裁制之意”。^②中西各有怀抱,但两者又被时代联结在一起,形成一种移接资本主义公法于封建主义中国的特殊历史同一。移接资本主义公法于封建主义中国,包含着双重内容:一方面,它促成近代外交意识的萌生,超越了只有朝贡没有外交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由此而来的中西交往方式的变化,又是西方人改造中国的结果。这一矛盾,使跨出暗昧无知的过程与适应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互相渗透;使“始终坚执,百折不回”的抗争与“豁达大度,片言立定”的忍让互相制约。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时代催发了新陈代谢,但时代的双重内容又把合理的东西置于不合理的桎梏之中。于是,近代外交一开始就带上反差鲜明的两重色彩。当曾国藩面对着西方人的时候,这两重色彩在他身上强烈地折射出来了。

他曾经多次说过:“中外交涉,总宜坚守条约,条约所无之事,彼亦未便侵我之利权。”因此,“坚守”的本意在于用“执约而拒之”来对付彼族的“不守约而侵占”^③,以维护条约之外的民族权益。这是一种色彩。

但是,在条约制度下“坚守条约”又意味着对西方列强既得权益的自觉确认。它表现了另一重色彩。外来权益实现于冲击和吞噬中国民族利益的过程之中。然而这种异己之物借助条约而获得了合法形式。对于曾国藩的信义之说,这是一帖难以入口却又不得不咽下的苦药。同治九年,他奉旨办理天津教案,因此而经受了

① 《中国翻译简史》,231页

② 《曾国藩未刊信稿》,135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九,《复许缘仲观察》、《复丁雨生都转》。

一生中最大的精神窘迫,自谓“吾目昏头晕,心胆俱裂,不料老年遭此大难。”^① 作为一个深通世务的人物,曾国藩并非不知道教案的激烈冲突之中凝结着中国民众反侵略的愤怒和自卫的愿望。他说过:“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逞。”^② 但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外交代表,曾国藩却不得不屈服于列强的压力,“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心”^③。曾国藩用自己的双手把他的名字同这一民族耻辱牢牢地连在一起了。他并不喜欢天主教,但又自觉地庇护了天主教;他曾经准备牺牲性命,结果却牺牲了比性命更要紧的名声。在远近“诟骂之声大作”^④ 面前,他用“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表达了灵魂在矛盾之中的呻吟。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又使他异乎“事事图悦洋酋之意”^⑤ 的崇厚,并表现为对于西方人迁就之外的某种抵制,并以“坚执不允”拒绝法国公使“欲杀府县”的照会,^⑥ 保留了天津地方官的两颗头颅,也保留了自己的一点天良。由是,在身受中国人“诟骂”的同时,他又遭到意犹未尽的西方人因心怀不满而生的奚落。赫德挖苦地说:曾国藩“对人民的恐惧和他的优柔寡断,曾使人们对于他怎样取得他从前的声望,很普遍地发生了怀疑,并且认为他是一个被评价过高的人物,才能不过平庸而已”。^⑦ 作为一个矛盾人物,这就是曾国藩不可摆脱的历史命运。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1375—1376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六。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二,《复崇地山官保》。

④ 《曾胡谈荟》,《国闻周报》,第6卷,第38期。

⑤ 同①书,1375页。

⑥ 同①书,1379页。

⑦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228页注释。

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问。虽不至遽形决裂,而上下偷安久,将疲恭而不可复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自非理势并审,体用兼备,鲜克有济。”^①言势者看到了西方人造成的变局;言理者宣泄了因民族矛盾而激生的义愤。但前者因“势”而走向消弭偷安;后者因“理”而依连于盲目暗昧。他们各自从一端片面地触及了中西冲突的历史内容。曾国藩比言势者更深地攀结于传统,又比言理者更多地见到过西方事物。于是而有“理势并审,体用兼备”之说。昔人曾探其心事而言之曰:“文正公以为不量彼己而轻排强敌,是以国注也;不修备而媮久无事,是自削也。是以戢锐养威,外壹务为怀柔,而内自愤发,以徐图自强之术。”^②因此,“理势并审,体用兼备”既包含着明显的“制夷”意识,也包含着明显的“和戎”意识。“制夷”与“和戎”的并存,一面反映了被侵略者抵抗侵略者以伸张“理”的愿望,另一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化过程中面对着“理”的伸张为“势”所抑之苦。当曾国藩无法突破抑制的时候,他表现了一种抵抗和妥协兼而有之的矛盾。这种矛盾显示了四十年代最先开眼看世界的人物与六十年代洋务派之间的相同和不相同。两者的差异,以一个阶级的变化反照出中西民族矛盾的格局在三十年之间的变化。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九,《请以陈钦署天津府折》。

② 张裕钊:《濂亭遗文》,卷二。

曾国藩论(二):在经世之学的 延伸中为西学东渐拓开门洞者

一

自嘉道之际始,晚清士风渐变。乾嘉诸儒“恒订琐碎”近百年后,经世致用思潮蓬蓬然而起,促成了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丕变。

曾国藩由“时文帖括之学”取科名,^①呼吸于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想丕变之时。他出自湖湘而受湖湘学人风气的陶铸,矜矜然以“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自别于流俗中人;^②他人于词垣而处京华儒林之中,得人文荟萃以破启一个山国士子持“无本之学、寻声逐响”的孤陋。^③于是而有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他曾自叙说:“仆早不自立,自庚子(道光二十年)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桐城姚郎中鼎之绪论”,始开闭塞,而后有所谓学问之取径。是以“国藩之粗解

① 《曾国藩年谱》,2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曾国藩全集》,家书(一),87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② 《曾国藩年谱》,5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复贺耦耕中丞》。

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①姚鼐是桐城派宗师,以文鸣于乾嘉之世,而意不仅仅在文辞之间。“其论文根极于性命”,“探原于经训”,多近宋儒宗旨,以为“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②曾国藩师法姚鼐,无疑于词章之学受益孔多。但桐城派以因文见道为家法,他所有会于心的是一种“立言”境界。因此,他一生不能忘情于诗文,而笔下多圣贤,少逸致。由姚鼐之教,曾国藩浸淫乎词章而结缘于性理;稍后,他从唐鉴“讲求为学之方”,得“唐公专以义理之学相勖”,将携以入宋(理)学之门。^③宋学迂阔,然而它迂阔的道德主义中含结着儒学古老而又常新的人生理想。曾国藩“以朱子之书为日课”,^④摸索于形而上的“格物致知”,“理一分殊”之中,正体现了这种理想感召人心的力量。感召人心的东西同时又锻炼人性,“其为日记,力求改过,多痛自刻责之言”,^⑤甚至丑诋及于梦寐:

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羨,醒后痛自惩戒,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煎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心动,真可谓下流矣!与人言语不由中,讲到学问,总有自文浅陋之意。席散后闲谈,皆游言。^⑥

刻责之下,已无生人之乐。从这里走出来的人不会是一个假道学,他因之而终身都保留着浓重的理学气味。直到二十多年之后,刘长佑还以“做过圣贤功夫”^⑦亟称之。曾国藩接受了宋学的性命义理之说,但汉宋交争,多士群鸣,处风会所扇之中又会使他抉破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致刘孟容》;《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圣哲画像记》。

② 《清代七百名人传》,1787页;《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二,《欧阳生文集序》。

③、④、⑤ 《曾国藩年谱》,7页。

⑥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116页。

⑦ 转引自《清代通史》,下卷,79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宋学的偏狭。道光二十六年,他寓居城南报国寺,由日见顾炎武祠而遥想“亭林老子初金声”,^① 赞其音训之功。对于音训的赞叹,流露了一种涉足汉学之想。几年以后,他遂“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说”,^② 渐得考据章法。曾国藩迟窥汉学门户而又犁然有当于心,以为“欲读周汉古书,非明于小学无可问津”。有志于学者,“不可不一窥(顾炎武、阎若璩、戴震、江永、钱大昕、秦惠田、段玉裁、王念孙)数君子之门径”。在他的教子书中,汉学是一个大题目:“望尔辈为怀祖(念孙)先生,为伯申氏(引之),则梦寐之际,未尝须臾忘也。”^③

以孔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在其二千年的历史演变中曾表现为由原始儒学而汉唐经学;由汉唐经学而宋明理学。它们各自有过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又先后替代,显示了各自的别有义蕴。而后的“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纒演之。”^④ “倒卷而纒演”说明了二百余年与二千余年之间的渊源。曾国藩出入乎汉学和宋学之间,由汉学以通“经”;由宋学以通“理”,这个过程会产生对儒学精神富有深度的理解。一方面,在守一家之成说者断断于伐异的地方,他看到了不同义蕴中的本来价值,因此,“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以此视当日“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自量之习”。^⑤ 另一方面,熟见“汉宋二家构讼之端”,又使他深憾于“后之见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深和博的“有差焉”说明了汉学和宋学并不能尽惬人心。它触发了不

① 《曾国藩全集》,诗文,60页。

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809页。

③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809页;家书(一),477页、453页。

④ 《清代学术概论·自序》。

⑤ 转引自《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58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七年三月廿五日。

甘自囿于汉学和宋学的意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① 其中驳诤乎有着超越汉唐宋明，追溯道之大原的深意。这种深意里包含着向原始儒学归复的趋向。

但儒学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就其本义，它“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② 从道光十八年到咸丰二年，曾国藩历经翰林院、詹事府、内阁，先后管礼、兵、工、刑、吏五部部务（侍郎）。其间，“于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所究心”，并“悉取则例博综详考，准以事理之宜”。^③ 多方面的阅历使他“饱更世故”，目睹种种时病秕政，熟悉和了解了中国社会的多方面。由此产生的忧患意识曾一见于《应诏陈言疏》；再见于《议汰兵疏》；三见四见于《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忧患意识反映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得自儒学的社会责任感：“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 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④ 这种社会责任感连接了“学”与“治”，使抱负孔孟之道者蒿目世事多艰，恹然有触于胸中之所积，走向经世致用。道光咸丰年间，中国社会正面临着近代化剧变。但在古老的传统尚未被时代浪潮席卷而去的时候，经世致用所寻求的出路不在未来，而在“三代”。所以，曾国藩处蛸蟾当中，“退食之暇，手不释卷于经世之务及本朝掌故”，而深以为“经世之道不出故纸之中”。^⑤ 比之龚自珍“药方只贩古时丹”，正可以见同一种文化造成的同一种社会心理。觅经世之道于“故纸之中”，从另一面同样地表现了向原始儒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致刘孟容》。

②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之六。

③ 《曾国藩年谱》，12、16页

④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四，《复黄子春》。

⑤ 《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卷一；《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答雷鹤皋》。

学归复的趋向。

回归是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但回归的结果从来不过是后人的重塑。曾国藩向原始儒学归复,他所省视的是“礼家”之言:“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是以“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① 在领会了儒学精神的多面意义和多种内容之后,他从“礼家”之言丰富的包容性里找到了用一元统摄多义的东西,“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② 因此,回归的过程又会是由“多”入于“一”的过程。他说: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
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③

以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对应孔门四科,同时是对于义理、词章、经济、考据的归一和统摄:“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④ 这种对应和统摄能否完全合乎孔夫子当初之意是可议的,但它显示了“姝姝自悦”于一先生之说的门户中人所缺乏的历史眼光。一方面,不同的儒术在对应于孔门四科之中“通结”、“息争”,融为礼学内“阙一不可”的部分;另一方面,“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⑤ 古代“礼家”之言中的经世之意因包罗了二千年儒学发展结成的精致之物而近时务,成为晚清富有影响的经世之学。

“经世”和“经济”本是同义或近义之词。它们代表了传统文化

①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圣哲画像记》；《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笔记》。

②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二，《复夏致甫》。

③ 《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卷上，《同学》。

④ 《曾国藩年谱·附一·墓志铭》。

⑤ 《曾国藩年谱·附一·神道碑》。

中以实事求是功为·一面。所以,嘉道之际和道咸以来,士大夫倡经世致用者多以事功为指归。严如煜撰《洋防备览》、《苗防备览》、《三省边防备览》;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① 林则徐以河工、赈务、盐课施惠于当时,又以禁烟御侮留名于后世,皆其中之尤著者。而魏源助贺长龄辑成《皇朝经世文编》,则以此启一代风气。曾国藩并不漠视事功,常致力于“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② 但其指归却不仅仅在于事功。与同时代的经世论者相比,他多以“经济”称政事,而以“经世”名礼学,以表述两者狭义和广义的区别。广义的礼学把事功与义理、词章、考据连在一起,构成了曾国藩经世之学的内涵和外延。

他说:“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因此,“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③ 以“体”“用”论义理和经济,强调的正是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在礼学中的胶合。这种胶合所包裹的是非常现实的社会内容和富有深意的用心。有人曾抉其“微意”而言之曰:“国史自中唐以下,为一大变局,一王孤立于上,不能如古之贵族世家相分峙,众民散处于下,不能如今欧西诸邦小国寡民,以舆论众意为治法。而后天下乃为举子士人之天下。法律之所不能统,天意之所不能畏,而士人自身之道德乃特重”。所以,“舍经术而专言经世,其蔽有不可言者”。^④ 曾国藩的“微意”反映了他对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超出侪辈的认识程度。晚清从事经世学的人们

① 《清史稿》,卷二七九,11608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卷上,《治道》。

③ 《曾国藩全集》,诗文,358、443页。

④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589页。

咸多“恶夫恒订为汉，空腐为宋”，^①而实力讲求“致用”。在他们注目功利之于事的地方，曾国藩同时又看到了道德之于人。他们的功利主义代表了无可怀疑的社会进步性；但当多数士人仍然向慕唐虞之世的时候，曾国藩以道德主义和功利主义胶合，却能够代表儒学“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并因之而更具有吸引人心的力量。

义理和经济皆本乎“礼”，然而“礼非考据不明”。^②就思想史的本来逻辑而言，嘉道之际经世思潮的兴起是对乾嘉考据之学的一种否定。但保存在考据之学中“详其始末”、“通其源流”的实证精神和历史精神又是明末清初经世人物留下的绪余。曾国藩着意经世而不废汉学，盖深悟于此中之理。他说：“圣清膺命巨儒辈出。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江慎修氏纂《礼书纲目》，洪纤毕举。而秦树澧氏遂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私独宗之。”^③在当日的学人中，他指“顾（炎武）秦（惠田）于杜（佑）马（端临）为近；姚（鼐）王（念孙）于许（慎）郑（玄）为近，皆考据也”。而“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也”。^④曾国藩推崇这些人“得先王经世之遗意”，^⑤然而考“制作之源”和辨“因革之要”又说明，“先王经世之遗意”是在历史的叙述中表现出来的。钱穆是有见于此者，他称曾国藩之“言礼，本之杜马顾秦，亦几几乎舍经而言史矣。盖苟求经世，未有不如是”。^⑥孔门四科无史学之日，历史意识即系于考据之中。在一个没有政治学的时代里，历史意识包含着政治意识。章学诚所谓“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⑦

① 《魏源集》（上），361页。

②、③、⑤ 《曾国藩全集》，诗文，256页。

④ 同②书，250、251页。

⑥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588页。

⑦ 《文史通义校注》，524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正言乎此。阅前代典章制度、行政事实而窥成败之理是一个温故知新的过程：“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①“名分”、“风俗”、“正闰”、“名实”都是前事昭示后人的章法和成宪。但前代典章制度、行政事实的记录，又以自身的因革反映了星移斗转、时易势变的代谢。所以，观“因革”会“通变”。这是不同于温故知新的另一面：“所贵乎贤豪者，非直博稽成宪而已，亦将因其所值之时，所居之俗，而创立規制，化裁通变，使不失乎三代制礼之意”。以“不失乎三代制礼之意”为前提，“通变”的本义应在于传统社会的自我改革，但它又内含着向前延伸的可能性。深厚的历史意识赋予曾国藩的经世之学以温故知新和因革通变两重秉性。当温故不能知新的时候，通变就会成为故与新嬗递的契机，“所谓苟协于中，何必古人是也”。^②

义理以“立德”为事，经济以“立功”为事；曾国藩置词章之学与两者同序，则志在“立言”：“凡仆之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③ 曾门词章之学的传人黎庶昌称之为“并功、德、言为一途”。^④ 曾国藩是于“古文境之美者”深有心得的人，其为文“探源杨、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词，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彩炳焕而戛焉有声”，^⑤ 遂别开湘乡一派之局。他因之而成为晚清文学史上留下过影响的人物。但是，列词章之学于孔门四科之一，又会使词章之学具有远比文学更多的意义：“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与罗少村》。

②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七，《复刘霞仙中丞》。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致刘孟容》。

④ 《拙尊园丛稿》，卷二。

⑤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33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次醇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①“见道”是奇偶复单气声之类以外的东西，然而它又是规定“文”之方圆，并使词章之学入于经世之业的东西。“立言”之旨即寄于此中。一代有一代之言。所以，以文“见道”固非重述往古圣贤的陈词。时人谓曾国藩“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其阅历亲切，迥出诸先生上”。^②“阅历亲切”，正是能够“见道”于当世之务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具体的历史内容渗入了儒学的一般观念；包含于义理、经济、考据之中的经世之“道”借助“文”而表达为一代儒学知识分子的理论思考。这种思考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又是传统文化中的个性。“立德”者未必能够“立功”；“立功”者未必能够“立言”。体现一代儒学知识分子的理论思考者，同时是一代儒学知识分子中的富于思想者。曾国藩因之而成为晚清思想史上留下过重大影响的人物。

义理、经济、考据、词章在礼学中汇为一体，贯通了久已变为儒学内外两端的道德与事功、经与史、道与文。由此，曾国藩重现了保留于古文化中的“内圣外王”精神。但是，当他代表儒学的时候，他也淡化了儒学与百家之间的界限，“自登第以还，于学无所不窥，九经而外，诸子百氏之书，靡不规得要领”。^③先秦百家持异说以争鸣，表现了那个时代不同社会利益和社会理想之间的对立。百家又同源于一，夏、商、周三代远古文化，在对立中维系着种种同一，“其间交互影响之迹，宛然可寻”。^④西汉以后，儒术一统百家，诸子学由是衰微。然而一统和衰微并没有割断同源和同一。在某种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致刘孟容》。

② 《拙尊园丛稿》，卷二，《薛福成选集》，239页。

③ 《曾国藩年谱》，254页。

④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附录。

意义上,儒学之各领风骚者,常正是吸取别家的有心人。清代汉学以“节节复古”为势,六经之外,“所校多属先秦诸子”,^①古籍真义赖以渐明。“于是世人方知诸子书中尚有许多可宝之名言快论在”。^②曾国藩生当乾嘉之后,所以,他比前代人物更容易比较儒学与百家,以体会其同源和同一:“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犹(伯)夷(柳下)惠之不及孔子耳”。^③“偏至”说明了诸子不逮儒学,而“极至之诣”又说明了诸子本通于儒学。他说:“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政刑,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④推而论之,所谓“偏至”而“各有极至之诣”,正在于诸子各自从一面说出了圣人理所必有而言中所无的东西。因此,“大抵理之足以见极者,百家未尝不切合也”。^⑤曾国藩是一个孔孟之徒,但他比前代和同时的粹然儒者更深刻地理解诸子思想在经世之学中的价值:“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缺也”。^⑥“治身”是与道德的会融,“齐民”是与政事的会融,而以《庄子》与韩(愈)文并提,举为“平生好读”之书,^⑦则是与词章的会融。“偏者裁之,缺者补之”表现了儒学的主体意识,在这种意识的规范下,“诸子百氏”之说皆由异端而成为曾国藩礼学

①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49页。

② 《清代通史》,中卷,751页。

③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④ 《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卷上,《问学》。

⑤ 同④书,咸丰十年十二月廿一日。

⑥ 同④书,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⑦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331页。

的一端，曾国藩的“布衣交”兼幕府人物欧阳兆熊曾以为“文正一生三变”，即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出办团练军务则“变而为申韩”；第二次守制以后又“一以（黄老）柔道行之”。^① 他看到了曾国藩身上儒术之外的另一面，然而他过于简单地以“三变”划而分之，并没有看到这一面与儒术在礼学中的会融。

曾国藩以一身糅合汉宋，并镶接了儒学和百家，其学问关乎此，其事业也关乎此。但是，出现于中世纪和近代之交的这种“糅合”和“镶接”并非中国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作为地主阶级在艰难时世中的自觉者，曾国藩承受着“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惕悚；又自厉于“手眼具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的力行。^② 惕悚和力行满包着来自现实的沉重压力。在章句之学不能沟通畛域的地方，它们会压碎藩篱，破开畛域，于是而有传统文化的兼容并包之局。以理学得名于光宣年间的夏震武曾谓：“儒者学孔孟程朱之道，当独守孔孟程朱，不必以混合儒墨、并包兼容为大也”。^③ 他意在非议曾国藩，然而“独守”造成的矮小，正使他难以懂得“并包兼容”所反映的是传统文化在内忧外患交迫之秋聚汇以应变的历史意向。曾国藩体现了这种意向，因此，在中国社会蹒跚地走出中世纪的过程里，他成为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代表。

二

传统文化的一多相容铸就了曾国藩的多重人格。在上个世纪，他曾受到过西太后“公忠体国”的褒扬；又被气类全异于西太后

① 《水窗春吃》，《一生三变》。

② 《曾国藩年谱》，160页。

③ 《灵峰先生集》，卷四。

的容闳目为“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之辈。^① 这个世纪初期,革命家章太炎贬其人,以为“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谥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与章太炎同时的另一个革命家宋教仁却以曾国藩之“是非亡足论,观其识度无忝于英雄”称道之。^② 异途人物的同调和同途人物的异词,以他们评说之间的矛盾反衬出曾国藩多重人格的矛盾。这是一种无法用一言以蔽之的笔意来加以说明的现象,然而它确乎存在于历史之中。

(一)“拙诚”和智术

曾国藩晚年作《湘乡昭忠祠记》,返视“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之迹,一归之于“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这是论人,也是自述心迹。由“诚”而“去伪崇拙”^③ 本系理学家言,但在践履久之以后已成为其人格的一面。李鸿章初入曾国藩幕府时,因惮于“每日黎明必有幕僚会食”之苦,曾以头痛辞。而差弁、巡捕络绎来请,不得不披衣踉跄往。薛福成记其事颇能传神:“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④ 使李鸿章“为之悚然”的东西无疑在权势和威仪之外。这并不是曾国藩的有心作态。咸丰八年,他再次起复以后在一封信中说过:“余在外未付银至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自明。不欲自欺其志,而令老父在家受尽窘迫、百计经营,至今以为深痛”。^⑤ 在一个儒学知识

① 《西学东渐记》,第十三章。《西学东渐记》虽初版于1909年,但容闳在书中对曾国藩的评说,应是追叙上一世纪目见其人的观感。

② 《章太炎全集》(三),583页、6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四,《湘乡昭忠祠记》。

④ 《庸庵笔记》。

⑤ 《曾国藩全集》,家书(-),388页。

分子的道德义务和人子之情之间,有着一种矛盾。由这种矛盾所产生的感情痛苦是真实的,但却不是强加的。当他自愿地选择“不欲自欺其志”的时候,他也自愿地选择了“至今以为深痛”。“拙诚”之义正见于此。在“中兴”人物中,曾国藩“每苦钝滞”,^①远不是一个才气横溢者。然而他以“拙诚”化“理学迂阔之语”为湘军悍勇之气。^②“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③灌溉久之,“朴实山农”悉成“尊上而知礼”的敢死之卒。^④他又以“拙诚”鼓动气机,聚合了患难中有心经世的知识分子。当时人谓其“手书告劝乡人士耆老,虽幼贱,必与钧礼”,遂使“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⑤于是,处大地干戈之中,展转兵间而“乘运会立勋名者,多出一时章句之儒”。^⑥在这个过程中,封建道德的精神力量凝系了封建制度下的社会力量,曾国藩人格中的这一面因之而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印下了自己的渍痕。左宗棠后期与曾国藩交恶,而盖棺论定,则以“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挽之,^⑦表达了一个士大夫对另一个士大夫不为意气易移的推服之心。

但曾国藩并不是一个诚而且愚鲁者。他饱阅人间世态,久知“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⑧“有所贪有所利”和“有所激有所逼”指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

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539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与张石卿制军》。

④ 《湘军志·管制·第十五》。

⑤ 《湘军志·曾军篇·第二》。

⑥ 《曾国藩全集》,诗文,322页。

⑦ 《曾国藩年谱·附二·联》。

⑧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1266页。

出了《拙诚》影响不到的另一端,其言语之中全无理学迂腐气息。曾国藩未必会自居于此,然而在“百废莫举,千疮并溃”之世,因人成事却不能不以此驭人。他善用绅士,心法在于“奖之以好言,优之以廩给,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不露一字”,以期劝善者而化不善者。此谓之“少予以名利,而仍不说破,以养其廉耻”。^①就其初衷言之,“少予以名利”旨在以利成义,但取义予利之间,其用心已近道家之术。制造事功的过程常常会把这种意思唤出来。咸丰十一年,“祁门军中贼氛日逼,势甚危”。幕府中人已奄奄无气,“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预为逃避之计。而曾国藩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給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②以行事窥心术,可以见推己及人之中已隐寓着“有所激有所逼”之意。有人因之而称其“性毗阴柔,实师黄老”。^③这是曾国藩人格中的另一面。智术迹近“拙诚”的反义,它表现了一种自觉的表里不一。曾国藩家书中有一段话说:“澄弟办贼,甚快人心。然必使其亲房人等知我家是图地方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贼既办后,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④其中半是真话,半是做作。真话与做作之间,显露了一个“拙诚”君子的不诚。这是同一个灵魂里的矛盾,所以它又会使身处矛盾之中的曾国藩常为之怅然自失:“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⑤他曾经以为“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袪不祥”。^⑥但“忘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342页;《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八年十二月初六。

② 《水窗春呓》、《曾文正公书》。

③ 《花随人圣庵摭忆》,1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④ 同①书,176页。

⑤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363页。

⑥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九年九月十六日。

机”并不是不知机，“懵懂”也不是本来意义的糊涂颠预，以此消弭“机权”，不过是一种更深的机权。作为一个有信念的道德主义者，曾国藩并不喜欢机权；作为经世事业的惨淡经营者，他又不得不在道德所不能达的地方出入于人世间的机权。两者的背反，显示了一种人格的两栖。

(二)“侠动”和淡泊

王闿运曾在日记中称曾国藩“汲汲皇皇有侠动之志”。然后推论说：“因思诸葛孔明自比管(仲)、乐(毅)，殊非淡静者，而两者陈义皆以恬淡为宗，盖补其不足耶？”^① 他试图对曾国藩作一番皮相背后的观察，虽语焉不详，而所言颇耐咀嚼。

书生而谓“侠动”，所指在其慷慨激烈的用世之心。这是曾国藩人格中的又一面。他久以“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自期，^② 以况诸葛亮之自比管、乐，犹为过之。这种用世之心表现了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人生抱负，当它面对着上帝教旗帜下的农民战争时，又激变而为“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③ 的力挽世运之心。“汲汲皇皇”正现乎此。自一面言之，以世运自任的人能累受掎击而曾不反顾。曾国藩后来以“打脱牙和血吞”一语自叙“平生咬牙立志之诀”，说尽此中滋味：“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④ 十数年之间，他不是一次地直面“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囚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⑤ 的场面，与太平天国一赌生死，并在守护名教的事业

① 《湘绮楼日记》，转引自《清代通史》，下卷，770页。

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39页。

③ 《曾国藩全集》，诗文，233页。

④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1309页。

⑤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湖口楚军水师昭忠祠记》。

中,从精神上勘破了生死:“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①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儒学的理想人格。自另一面言之,以世运自任的人又能用武健行严酷。曾国藩出办团练之初,即相信“壹意残忍”可以“回颓风于万一”,力主“严缚匪党,动与磔死”,虽“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概以宽厚为心”^②。这是一种戾气。虽说这种戾气并非出自赋性,所谓“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③ 然而,比之赋性惨酷的恣睢,它包含着更多熟思之后的审度权衡,因此而显得更加彻底,也更加残酷。咸丰十一年,湘军攻破安庆,太平天国守城者“男子髻髭以上皆死”。^④ 曾国藩致书老弟,告以“城贼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差快人心”。^⑤ 其言词流露了一种恻隐之心为“抱道”之志消泯殆尽的忍刻。这种忍刻,不仅反映了壬权对于造反者的不宽容,而且反映了“名教”对于“窃外夷之绪”者的不宽容。在曾国藩身上,“壹意残忍”是“见危授命”的另一种表现,两者合成“侠动”,以见其置身于“骨岳血渊”之中而以舍我其谁为志的精神。

“侠动”者做就的是人世勋业,淡泊者则尘视轩冕荣利而意近出世。所以,王闿运颇疑曾国藩以“侠动之志”归宗“恬淡”为“盖补其不足”。其实,对于曾国藩来说,淡泊并不是矫情的造作。他自述三十岁以后“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662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与魁荫亭太守》,《复欧阳晓岑》;《曾文正公文集·奏稿》,卷二,《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与魁荫亭太守》。

④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⑤ 同①书,769页。

羞可恨”。比照其晚年身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①实不可以谓之虚假。他一生以这种志度教子诫弟，每多居家处世的格言：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②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③

这一类话是咸同风气之中所不可多见的。金陵未下之前，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开府安庆，署中置办“棉花车”七架，“每夜夫妇两人纺棉纱，以四两为率”，二鼓后始歇。然而他并不吝于用财，“俸入悉以养士”。^④在当日的官场里，曾国藩是一个身居极品而对名位之不可恋思之烂熟的人：“吾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⑤因此，他一面以“精忠耿耿”之心日操杀人之业得名位，一面又视“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⑥同治元年，曾国藩晋阶协办大学士，而心中所思却在“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溉之，人满则天溉之。’余谓天之溉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溉之，霍氏盈满，魏相溉之，宣帝溉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溉之，吴主溉之。待他人之来溉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溉、人之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183页；家书（二），836页。

② 同①书，324页。

③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1319页。

④ 《水窗春吃》，《夫人俭朴》；《清史稿》，三十九册，11917页。

⑤ 同③书，1326页。

⑥ 同③书，1082页。

来溉，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溉之”。^① 比之曾国荃“求田问舍”的鄙陋猥琐，他实在要透彻得多。这种熟视名位货利而淡泊于名位货利的澹如，使曾国藩在湘淮军功人物群中标出了自己特有的人格。欧阳兆熊称其“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糝糠尘垢”，自以为能“道得此老心事出”。^② 他的话未必无谏，然而并非全是虚造。淡泊的背后，有着一种取义于老庄之旨的旷达意识：

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③

他由“老庄之虚静”而悟谦退，以“不以物喜”的淡泊表现了超越“伎求”的襟怀，而后“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愁”。^④ 与满身的血腥气味相比，这一面同样是曾国藩身上真实的东西。他的历史形象正存在于这种剥离不开的矛盾之中。

（三）百结忧悒

曾国藩同太平天国血战多年，用自己的双肩支撑了一个倾颓的王朝。然而内心深处，他又常常怀疑这个王朝的气数，四顾“吏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833页。

② 《水窗春吃》，《一生三变》。

③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

④ 同①书，1372页。

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情状，时有“天下似无戡定之理”^①的叹息。同治三年春，天京已在湘军重围之中，曾国藩却睡“不甚成寐”：盖“骨肉死丧之感”、“闹饷内变之事”、“江西流贼之多”，百端丛集，“竟不知事变之胡底也”。^②他是一个踔厉奋发者，但身上常背着百结忧悒的沉沉重负。夹处于两者之间，使他比别人更能意会圣人“尽性知命”之教：“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所不可知者于天，命也。”^③这是一种苦恼的哲理，它以哲理的透彻说明了无以解脱的苦恼；其古老的语言正写照了晚清没落中的传统社会和传统社会里不甘于没落的人们。因此，曾国藩手创了“中兴”之业，而“中兴”之业并没有化解百结忧悒。金陵攻陷后一年，他与彭玉麟相会，“言及国事与渠家事，欷歔久之”。^④过了八个月，他在家书中说：“以余饱阅世变、默察时局，则劝沅（曾国荃）行者四分，劝沅藏者六分。”^⑤其时，曾国荃正开缺在籍养痾。“欷歔久之”和作计于行藏，都说明了“中兴”之后的家国之忧。这种东西不可以轻易言说，但它时时触景生情，啮人心怀，“今日有四川庶常来见，其言谈举止不类士大夫。前日有同乡庶常送诗，排不成排，古不成古。国家所得人物如此，一代不如一代，文章与国运相关，天下事可知矣。”^⑥曾国藩惯于谨慎，不肯放言高论，然而忧悒日久，一为发抒，则谨慎往往变为愤鸣：“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僨乱，恐非能久之道”。他因悒生惧，“忧见宗祏之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560页。

②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③ 同②书，同治元年七月初十日。

④ 同②书，同治四年四月初三日。

⑤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1232页。

⑥ 《能静居士日记》，同治六年五月十一日。

陨”。^① 这一类话出自一个为王朝事业鞠躬尽瘁的人之口，包含着无穷的悲哀和痛苦。同治六年，他叙写心境说：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恼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事身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②

其中不仅有老境侵寻的愁绪，而且有强毅力行者的气沮。气沮并没有阻断强毅力行；但气沮映照于强毅力行，正表现了曾国藩维护传统的苦心在历史时序面前的悲剧色彩。一面是百结忧悒，一面是死而后已；无限心事，欲说还休：“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③

曾国藩的多重人格反映了一个复杂历史人物精神世界的诸面；其间折射着传统文化在十九世纪中叶自我复兴的努力和困苦。因此，他能够成为那个时候传统文化中有志于经世者的精神领袖。咸同之际，郭嵩焘致书李鸿章说：“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④ 他的话不仅仅代表了一种个人的选择。

三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崛起于内战血火中的地主阶级经世派

① 《能静居士日记》，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六月二十日。

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1341页。

③ 《水窗春吃》，《一生三变》。

④ 《玉池老人自叙》，7页。

面对西方人的咄咄逼来,以事功造“中兴”的曾国藩遂成为首当其冲者。咸丰十一年春,他驻守祁门,身陷困境;而“洋鬼”已“纵横出入于安庆、湖口、湖北、江西”之间。^① 对于一个久恨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的名教中人来说,张目以看外夷挟“庚申之变”的余威而人东南,不能不因在外忧外患的交逼下生出莫可言状的愤痛。在“大局已坏,令人心灰”的无限伤情中,曾国藩曾“扼腕久之”,泫然有呜咽之哀。^② 这种愤痛生成于西方人带来的民族劫难里,又显示了传统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最初反应。

但是,民族战争失败所带来的“万里梯航成创局”,包含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内容。它不仅留下了创巨痛深,而且会迫使身历其境者在创巨痛深中舐血审视。见识过租界景物的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一夷灭,百夷不俱灭也;一夷灭,代以一夷,仍不灭也;一夷为一夷所灭,而一夷弥强,不如不灭也。盛衰倚伏之说,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此夷衰,彼夷强,夷务仍自若”。他看出了“夷务”已不是一时一地之事。曾国藩仔细读过《抗议》一书,并视为“名儒之论”。^③ 在这一点上,他的眼光同冯桂芬非常相近:“彼狡焉者,虽隔数万里而不啻近逼卧榻”,“国无远近,皆得与我为邻”。这是一个以“商战二字为国”,别有纲常的世界;而其“累世寻仇,不胜不休”则使中国困对“海国环伺,隐患方长”而无可回避。^④ 他触及了历史经验以外的东西,又因之而弥增其既憾且忧之情。不可摆脱的夷祸带着震撼人心的压力伸入了中国人的世务:“违一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653页。

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616页;《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咸丰十年十一月三十日。

③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九月十七日。

④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三,《复袁小午讲学》;卷十七,《复毛寄云中丞》;卷三十三,《复刘霞仙中丞》;《曾国藩未刊信稿》,288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言而嫌隙遽开,牵一发而全伸俱动”。^①“救时”已成经世之学的要目。于是,怀着“世变正未可知”^②的沉重心情,曾国藩走上了一条他所不熟悉的路,成为最早由经世之学延伸而入洋务的士大夫之一。

经世之学的延伸是时势逼迫的结果。然而在延伸的过程中,经世之学又染苍染黄,变为传统文化中率先与西方文化交汇的部分。从道光到咸丰,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战争流血,议和流泪;中西双方用暴力比较的结果,挟着无可怀疑的权威性使中国人认识了西方的暴力。曾国藩谓之“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由此产生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③的主张表达了与林则徐、魏源之说的同所识见,但在“车驾北狩”结成的深重痛楚里,又比林则徐、魏源之说有着更多的急迫和仓惶。咸丰十一年秋,湘军攻陷安庆,三个月之后曾国藩即设内军械所,试制新式船炮,“阴有争雄海上之志”。^④西方人带来了诸般器物,而传统文化中的人们最能够接受的东西却正是他们感到最可畏惧的东西。这种选择,既反映了民族矛盾刺激下自强以图御侮的怀抱,又反映了取彼之长以新卫旧的意愿。然而近代船炮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们的移植需要与之相应的现实前提。因此,“师夷智以造船制炮”的事业虽然开始于一种既定的预想,其行程则会越出自身的界限,历史地为“西学东渐”拓开门洞。正是“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与西学东渐的舛结和叠合,曾使有志于“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⑤的容闳与首开洋务之声的曾国藩成为可以同路的人物。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六,《议复兼摄通商大臣折》。

②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三,《复袁小午讲学》。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三,《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

④ 《中兴将帅别传》,9页。

⑤ 《西学东渐记》,第十六章。

同治三年,容闳在学成归国并为自己的理想经历了八年求索之苦以后入曾国藩幕府。当这两个经受不同文化洗礼的人相会于同一历史变局之中的时候,后者询以“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前者建议设一“制造机器之机器”厂,“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①问与答都表现了浓厚的时代意识。曾国藩是当时中国能够懂得容闳之议的少数人之一。容闳视其人为“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②带着这种心情,他受命出洋采办机器,于是而有期为“御侮之资,自强之本”的上海机器局。他后来追叙说:“自余由美国采购机器归国以来,中国国家已筹备千百万现金,专储此厂,鸠工制造,冀其成为好望角以东之第一良好机器厂。故此厂实乃一永久之碑,可以纪念曾文正之高识远见。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③这种评价出自一个受过西式教育的人之口,应当比一个士大夫对另一个士大夫的恭维包含着更多意味深长的历史内容。在这个过程中,船炮引入“制器之器”,古老社会接纳了新的生产力。而移植西方机器工业于缺乏近代科技的中国,会使久以天圆地方为理所当然的人们在从事制造的时候亟感“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④多年以后梁启超所说“曾文正公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翻译西书为第一要义”,^⑤正是一种困而后知的结果。由是,随新生产力的进入,涌来了传统文化以外的新知识。制器之器所在的地方天然地成为引进新知识的中心。王尔敏氏作《清季兵工业的兴起》,曾大略描绘说:“当时对西方知识最能发生推广作用的,是翻译西书。江南制造局几乎是一个最早的译书总汇。沪局自同治七年设立翻译学馆起,迄于清

①、②、③ 《西学东渐记》,第十三章;第十六章。

④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七,《新造轮船折》。

⑤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

末,前后共译成西书凡二百种之多。”其间的景物使中国人看到了六经以外的另一种世界观;它们比坚船利炮打动过更多忧时的知识分子。曾国藩死于同治十一年,出现在机器局里的许多物事都是他所未及亲见的。然而他是一个开先者,追溯历史,人们不会不看到开先者留下的痕迹。制作船炮的机构不仅生产出武化的东西,而且运来文化的东西,影响了一代人的观念。这是近代中国特有的现象。容闳的异国朋友吐依曲尔牧师曾经感慨于“一个人出于基督教的动机,最高抱负是促使祖国文明前进,但他的头一件工作,竟会是(帮助)创办一个兵工厂”。^① 其实,当中西交逢之初,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的路径并不是可以自由选择。西学借助于兵工业而迂人否塞已久的中土,其迂回曲折的取径之中正有着那个时代沉默的历史必然性。

“师夷智以造船制炮”的命题本是对秦西奇技的回响。但制器引发的多方面需要又是传统社会中专治时文帖括的士人所难以承当的,“自道光二十年以来,因海疆多事,曾经奉有谕旨,广诏奇才异能之士,迄无成效。”^② 所以,制器会促成当洋务之局者究心于育才。同治六年,曾国藩视察上海机器局,容闳“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③ 从孔门四科里走出来的曾国藩为求制器之才而“极赞许”孔门四科之外的兵工学校,其用意无疑与容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④ 的宗旨并不完全相同,然而容闳“所怀教育计划”正由此得以“小试其锋”。^⑤ 结果便产生了异乎传统的另一种

① 《西学东渐记·附录·吐依曲尔氏之讲演》。

② 转引自《洋务运动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64页。

③ 《西学东渐记》,第十五章。

④、⑤ 同③书,第五章;第十六章。

教育机构。因此薛福成以学堂与制器、练兵并举,同列为曾国藩洋务事业的大端。与“器”相比,育才已及于人了。曾国藩作始于前,随后:

同治八年(1869),上海的广方言馆并入沪局,成为局内的一所西式学堂,主要传授国文、英文、法文、及算学、舆地各课,学额八十名,四年毕业。同治十三年,设立操炮学堂,但在光绪七年改为炮队营。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局中设立一座工艺学堂,内分化学工艺与机器工业两科,学额五十名,四年毕业,形同现在的一所工学院。除沪局本身以外,局中华洋人士又在上海成立一座私人创设的学堂,就是光绪元年(1875)9月所设的格致书院。

终晚清之世,上海机器局在同时各局中是从事近代教育之“贡献最大”者。^①

比兵工学校走得更远的一步,是选送子弟“出洋学艺”。曾国藩由久谙江南而多识西国情事,眼界的广度会转化为思想的深度。同治元年,他初次见到安庆内军械所自造的火轮船汽机,曾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②但十年以后,他已渐知“夷智”并不止乎此:“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人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这种“月异而岁不同”的东西是“设局制造”和“开馆教习”所不能穷尽的,“此中奥笈,苟非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知之多者思之远,所以,曾国藩能够接受容闳的留学生计划,期望以育才于泰西,“得其法,归而触类引伸”,可“扩充于无穷”。同治十年,他领衔奏

① 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155页。

②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七月初四。

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①近代官费留学自此而始。曾国藩在自己的最后一段岁月里走到了他一生中最远的地方，当第一批留美学童在黄浦江边登上横渡太平洋的邮船时，他离开人世已逾五个月了。然而他的像被挂在大洋彼岸哈特福德的中国留学事务所墙上，时时提醒着莘莘学子们：“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②

经世之学是传统文化中最容易通向变易观念的部分；经世人物是传统社会里最切近时务而能亲知现实者。曾国藩由考究“天下之大事”而明变，久知“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③又因身当中西交冲而备尝“局中之艰难”。前所未有的历史内容楔入了古已有之的变易观念，催使后者衍生出新的意义。在众多士人昧于“无事则嗤外国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的时候，他由经世之学延伸而入洋务，以不同于深闭固拒者的见识表现了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逸出常轨的反应。逸出常轨的反应逼成于西方人的炮口之下，它又是一种不自愿的反应。在“救时”之“要务”^④的名义下被搬入中国的一部分西方事物，同时还带着搬来人所赋予的挽救传统的主观意义。“未敢遽问几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⑤在这里，因民族伤痛而生的情感是同守护中华政教文物的意识是连为一体的。中世纪和近代相交之初，传统社会里能够“增其新”者留恋的却是固有的旧物。曾国藩“晚年衰病，犹日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

② 《西学东渐记》附录：《吐依曲尔氏之讲演》，第十七章。

③ 《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卷上，《治道》。

④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四，《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

⑤ 《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137页。

从事于经史”，^① 适可以见其价值观念之所在。这一面，他与深闭固拒的人物不仅相似而且相通。但是，为了挽救传统而搬入中国的西方事物是传统所容纳不了的。它们会在蓄孽中以自身的本来意义否定外加的主观意义，促进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二十多年后，严复自序《天演论》，说：“风气渐通，士知舛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② 这已经是另一种景象了。曾国藩为西学东渐拓开门洞，而西学东渐之后，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人们则开始走出了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新学和旧学的对峙之称已使中学与西学的区分寓褒贬之义。于是而有中国文化漫长而又缓慢的近代化历程。

① 《曾国藩年谱》，255页。

② 《严复集》，第五册，132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李鸿章论：没有义理之学的洋务巨擘

—

李鸿章由内战露身手，以军功得高官。但他后半生中最自负的却是洋务。这种自负常因事发抒，以独步一时的意态睨视天下。光绪初年，他在的一封信中调教刘秉璋说：

至谓鄙人喜谈洋务之言以致冒险负谤，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足下三太息，可惜不甚切题耳。^①

在晚清的疆吏中，刘秉璋并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但以洋务作论题，则李鸿章的话头和口气正像是在为他发蒙。由文字见神态，其负手向天的傲岸和忧世忧时的心怀都是非常明显的。

被今天的历史学家称作洋务运动的那个漫长过程，当时的人们是用自强一词来立名和释义的。以自强名洋务，寄托着他们“虚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2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心忍辱”，“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①的一腔苦心。西方人用利器逼出了中国人的自强；西方人的利器同时也为中国的自强提供了一种物化了的尺度。因此，自洋务运动发轫之初，主持自强新政的人物就纷纷把目力鸠集于器物，急切地以实事、实利、实功来比照西方人手中的尺度。同治九年，李鸿章致书曾国藩论洋务，发心“苦做下学功夫，做到那处，说到那处”，并四顾天下，慨然有担当世运之想：“吾师弟在位一日，不得不于此致力一日。”^②二十年之后，他在岁月的研磨中于洋务一道已经久尝甘苦，感慨系之，而检点往事，则期期然自信“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③ 勘对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历史，他所说的并不是大话。《清史稿》为李鸿章立传，枚举其“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煤铁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坞台垒；遣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然后赞叹说：“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④ 在这些“前此所未有”的“营造”中，既有着他的心血，也有着他的心愿。其数量和规模都是没有人能够比拟的。环视前后左右，在那个时候受自强新政召聚而汇为一类的人物中，李鸿章无疑更沉鸷地自觉于实事、实利、实功。他因之而成为这个群体中的最显目者。这种地位，后来的历史叙述多半名之为“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然而他始终未能成为洋务运动的精神领袖。年辈在他之前的曾国藩，一生汇融汉宋，以富有个人体验和学理深度的经世之学换来过众多士人的服膺。年辈在他

① 《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

② 《洋务运动》，第一册，267页。

③ 《洋务运动》，第六册，295页。

④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12018页。

之后的张之洞,则善用智术和智慧作折衷新旧之论。他以中体西用为底本铺叙出来的大篇文字兼备词章与义理,极合章法地表达了洋务人物取新卫旧的共有心影,并在形而上的层次上感染了更多留心世务、关注国运的人们。中体西用一语,也赳赳乎成为张之洞的专利。与他们相比,李鸿章显然是略输文采。他匱于学植,所以他没有理论。虽说李鸿章起家翰林,在清秘堂里泡过一阵,但还没有等到他摸熟门径,就已被召去带兵了。后来的生涯中,他见长的一手是“才大心细,劲气内敛”,^①然而义理、词章、考据等等,则从此渐成陌路。因此,当他需要说理的时候,往往无法把不成片段的新知与“理气”、“道器”、“体用”、“本末”之类粘连成一个理路圆融的东西。于是,他的洋务议论便只能赤裸裸地以利害来动人心了。以利害动人心本是洋务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断断乎言利言害,显出来的又是一种短视和短气。自中西交冲以来,李鸿章比别人更透彻地识得利害,也比别人更专注地宣述利害。前一面表现了他见事之敏,后一面却常常使他看不到其他许多应有的东西。光绪十四年,御史余联沅以铁路为题目弹劾李鸿章说:“是洋人以利啖李鸿章,而李鸿章以利误国家也。”^②前一句话是不实之词,后一句话却超出了以铁路为本题的论争范围,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士大夫中的多数人对李鸿章惯以利害论事断理的嫌恶。在他们深深的嫌恶里既包含着守旧的顽固,也包含着功利所不能淹没的价值思考。后起的梁启超远不是一个同情顽固的人,但他为李鸿章作传,则直叙其“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并概括而言之曰:“不学无术”,是“其所短也”。^③以利害为眼光,看出来的东西总是捉襟见肘的。当

① 《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139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② 《洋务运动》,第六册,207页。

③ 《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兵事”、“外交”、“朝廷”被视为天下大利大害之所在的时候，“民政”、“内治”、“国民”就成为目力照顾不到的地方了。他用“不学无术”四字把李鸿章的眼光与学问联在一起，富有深度地画出了一种没有理论的功利主义。虽说梁启超所代表的历史时序比李鸿章更“新”，但他说出来的这些话中未必没有当日言路中的人们愿意引为同调的内容。不同的是，梁启超的评说更多地流露了惋惜，而言路君子则更多地表现了隔膜和鄙薄。两者的区别，毕竟又折射了新与旧之间的界限。

李鸿章与清议缠磨牴牾半生，常常从清议中看到自己被塑造出来的委琐形象。由此激生出来的愤懑不平，成为他言谈中的一个多见话题。然而瞻前顾后，其心头又并非全然没有自惭形秽的感觉。他晚年曾以曾国藩为比，叙述过一种不无苍凉的心境：

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受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只好看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迹，与自己生平行事，互相印证，藉以镜其得失，亦尚觉有点意趣。^①

这些话以深自刻责之辞表达了阅历之后的内省，也表达了莫可言述的沉重惆怅。由此形成的，是一个解不开来的心结。时人记叙说：“公（李鸿章）最喜衡文，前充总理衙门大臣，适同文馆学生年终考试。中文一场，试卷多于束笋，各大臣请公校阅，公喜甚，扃门三日，亲手点定甲乙，其勤于衡鉴如此。”在这里，“喜甚”二字表现出来的其实是受宠若惊，而“扃门三日，亲手点定甲乙”则写照了精神重负下的战战兢兢。受宠若惊和战战兢兢，都反映了因中气不足而产生的过度热切和倾慕。还有一个故事更见痴心。光绪二十三

^① 《庚子西狩丛谈》，111页。

年夏,李鸿章去见瞿鸿禛,相托说:“闻今科北闱乡试主考已经内定,我与君均在选中。但我数十年戎马奔驰,久荒笔墨,不知能胜任否。君年优学富,久掌文衡,确系科场熟手。届时务祈主持一切,格外偏劳。”后来知道,这个消息出自“不知何人”的“凭空结撰”。^①但由李鸿章的语言神态现出来的一副脸相却使人印象非常深刻。因此,梁启超不无困惑地说:“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人人深矣。”^②他困惑于李鸿章的眼界之浅。其实,李鸿章并不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他对八股取士之“丝毫无与时务”早就看得明明白白,并在奏议中直白地非议过:“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主张“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③在当日的中国,这些意见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对于科举制度的不敬。然而“衡文”一事又常常牵动他心头久有的隐痛,使他无法忘记自己的“盖代勋名”抵不上士大夫眼中以宗师而称大人先生者。他忿忿地说过:“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就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④以“秕糠”比大人先生,表现了极度的蔑视,但“我一扫而空之”的以己比彼,又用一种奇特的句式显露了想做一个大人先生的强烈愿望。这种化解不开的心结,使一个从心底里鄙夷时文帖括的人物非常矛盾地“恋恋于此物”,希望能从中借取一点领袖群伦的斯文和权威。当他延颈企足望着“北闱乡试主考”那把椅子的时候,仿佛人也一下子变得短小了许多,其神情既使人可笑,也使人可哀。

然而,与同一个时代里庙堂内外的大人先生相比,李鸿章自有另外一类声望:“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国藩为相,皆总督

① 《梦蕉亭杂记》,《近代稗海》,第一辑,38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饮冰室合集》,第六册。

③ 《复刘仲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五;《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四。

④ 《庚子西狩丛谈》,108页。

兼官，非真相。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① 这种声望并不来自清议的推崇，而是来自力负“防海交邻”之重，“无论若何大难皆挺身以一身当之”的血性和强毅。血性和强毅，使李鸿章在身后获得了“不避劳苦，不畏谤言”^②的追思，但在生前却常使他孤独地直面困窘，为天下承当难事。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争的兵火由朝鲜蔓延到辽东。以主战得时名的翁同龢衔西太后之命急急赴天津诣李鸿章问策：

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时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归乃不敢言战。^③

“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刻画了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愤恨。其中包含着两重思之伤心的内容：一、“初，鸿章办海防，政府岁给四百万。其后不能照拨，而户部又奏立限制，不令购船械。鸿章虽屡言，而事权不属，盖终不能竟厥功焉。”^④ “其后不能照拨”，是被西太后挪去造颐和园了；而户部“奏立限制，不令购船械”，则出自翁同龢的裁抑。在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后，李鸿章以二十年惨淡经营换来国耻、骂名，扼腕沉思之际，不会不想到这些往事。他后来说：“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⑤ 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够回答的问题。二、“倭事初起，廷议决欲

①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12020页。

② 《中国四十年来大书记》，《饮冰室合集》，第六册

③ 《国闻备乘》，《近代碑海》，第一辑，231页。

④ 同①书，12018页。

⑤ 《庚子西狩丛谈》，107页。

一战,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① 由这种“水火之不相入”牵曳出来的意气和情绪曾浸没了其他许多东西。“战”与“和”各有理由,然而两者之间又隔着一层不能沟通的厚膜:“至是,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② 李鸿章盘算的是物力,所以想在战争之外别求途径;“廷议”和“国人”伸张的是义愤,所以想用战争一展挞伐。义愤具有打动人心的感染力,然而最后裁断胜负的还是物力。这个道理主持廷议的人们不久之后都明白了,而韩事引发的战火也已经烧红了中国的半边天空。因此,李鸿章事后追论,犹有余憾: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实能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裱糊,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下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③

他说出来的是一种不能动听的低调。但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他又“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④ 比言战的人们更直接地担当着成败胜负的沉重责任。曾在北洋幕府的吴汝纶叙述当时情景说:“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寐;此肯堂^⑤ 所亲见,某亲询之者。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⑥ 他心中的敌忾之气应当不会比“廷议”和“国人”更少。当战争最终把中国拖入“不可收拾”

①、② 《答陈右铭》,《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115页。

③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12020页。

④ 《庚子西狩丛谈》,107页。

⑤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121页,天津《大公报》社印行。

⑥ 范当世,字肯堂,北洋幕府中的另一个人物。

之局的时候,因连战连败而灰头土脸的李鸿章又被同一群人组成的“廷议”召去,在催逼推挽之下满目凄凉地乘槎东渡,向战胜的日本觐面求和。于是而有创巨痛深的《马关条约》。

李鸿章练兵多年而一溃再溃,在当时的舆论和后来的评说中都不是无可指责的。但当和战嬗递之际,他却以自己的行事表现出一种主持“廷议”的人们所没有的血性。《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收录过非常传神的一幕:“鸿章请同龢同往议和。同龢曰:‘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正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鸿章曰:‘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孙毓汶徐用仪则以不割地恐难成局。诸人相对默默”。^①这些人个个都知道:炮口勒逼之下的委曲求和既是难事,又是污名。但面对“日人方图远略,举倾国之师,逼我和款,所索既奢,且不愿遽和”^②的局面,却没有一个人愿为天下作计,分担难事和污名。“诸人相对默默”正写出了当初一腔义愤与如今一腔私心的对比。若以这些人作为反衬的景观,李鸿章白发远行的零丁身形确乎显出了挺拔和强毅。他在日本期间曾受刺中枪,子弹入颧颊,“血洒袍服殆遍”。众医以“割创取子”为请,被李鸿章拒绝。因为从他住处的窗口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正在源源出征的日本船队。他自述两相权衡之后的心情说:“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死生有命,我宁死无割。”^③但当他形神俱疲地带着《马关条约》回国的时候,等候着他的正是预料中的一片唾骂。一个京官上奏说:“今道路传言,云有见李鸿章者,谈笑自若,依然故态,而上并无一点伤痕。然则非真中枪也,恐人议与倭通,故假捏之耳。”^④人心之难以相通,竟一

①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255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五册,381~382页,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③ 同②书,281页。

④ 《中日战争》,第四册,34页。

至于此。李鸿章在唾骂声中作过一个奏折，备极沉痛：

敌焰方张，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昏耄，实无能为。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①

数年后，康有为过马关，记曰：“九月二十四日夜至马关，泊船二日，即李相国立约遇刺地也。有指相国驻节处者，伤怀久之。”在时光淘洗之后返视历史，真相常常容易看得更清楚一点。他留下一首诗，其中两句是：“有人遥指旌旗处，千古伤心过马关。”^②

二

李鸿章是一个洋务派，但他对后起的维新派常常流露出一种非常明显的同情。描述这种同情，有时候会使历史人物本来的复杂多态溢出历史分类后来为他们设定的界域。

就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此起彼伏而言，蕴积已久的维新思潮是在中日战争之后走向社会的。“乙未二三月间，和议将定。时适会试之年，各省举人集于北京者以万数千计。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③ 方和约初定之际，李鸿章的名字是与和约同义的。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对李鸿章有着一种深深的异己感。当维新思潮一路腾越，滔滔然成大波，并在戊戌年间的百日新政里登上巅峰的时候，李鸿章多半闲居在贤良寺里，寂寞地看着新一代人物的纷纷出场。他曾经向强学会捐款二千两，并请入会，但立即就遭到新党们的回绝。显然，他们认为李鸿章不是一个够资格的人。

① 《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八。

②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41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 《戊戌政变记》附录一，《改革起原》，《饮冰室合集》，第六册。

然而百日维新终究是一种没有根基的东西。因此,当西太后反手一掌打来的时候,它很快就被捺入了血泊。在六君子断头于菜市口之后,新党中的名人便一个接着一个成了缇骑追捕的逃犯。当此血泪交进之时,被强学会接纳过的大人物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都漠漠然看着西太后以辣手再造乾坤,并无一人敢以口舌争是非。而能够出来为新党讲公道话的,却正是久为新党所不齿的李鸿章。西太后重新训政后,有过一次“召对”,其间的君臣问答都极富个性:

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今肥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

使西太后“默然”的,是李鸿章的倔强。不仅如此,李鸿章还把自己与康有为作比较,深叹“(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并“在都中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①在戊戌年间的中国,这些话都是惊世骇俗之论,正因为如此,这些话又决不会是率意出口的一时之言。远在康有为鼓吹变法之前,李鸿章已经在同一个题目下发过不少议论了。虽说此变法与彼变法是分开来的两篇文章,但同一个题目下的两篇文章毕竟容易观摩比较,引发心得。因此,小变法论者李鸿章能够比别人更多地欣赏和理解大变法论者康有为,并因之而产生同情。这种同情的力量有时候竟胜过诏书,使得“奉懿旨捕康梁”的李鸿章一次又一次地向这些海外逃客们送去“倦倦之意”。梁启超在这个时候写回来的一封信中恭敬地说:

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精研西学,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197~1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这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①

字里行间集注着一汪强烈的知遇感。身在海国,时处逆境,这种知遇会触发百感交集,并使人终身难忘。所以,梁启超后来“为李文忠作传,篇中着眼处,即写其所以文,所以忠”。“盖深服文忠之为,人,其于文忠生平办事不得已之苦衷,皆洞若观火。”^②由此流露出来的同情,又表现了历经患难之后的下一代维新变法人物对上一代自强变法人物在精神上的理解。与梁启超相类的,还有新党的另一个幸存者张元济。他在政潮起落中被革职并“永不叙用”,一夜之间丧失了官职,也丧失了事业,而落寞之中向他援手的也是李鸿章。时过半个多世纪,他追叙旧事,仍然不能忘情:“我平素与李鸿章没有什么渊源,只是长官或(与)下属的关系而已,但他对我似乎是另眼相看。”^③人世间很多悲欢都会成为过眼烟云。相比之下,能够积留在记忆里的东西总是经得起岁月磨洗的。

李鸿章对这些人“另眼相看”,并不是因为他完全赞成维新派的主张。当维新思潮声光四播的时候,康有为曾极富自信地上书皇帝说:“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图霸定矣。”^④在相近的时间里,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196页

② 《忘山庐日记》,上册,482、4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张元济诗文》,236~237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④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224页。

李鸿章有过一次“历聘欧美”之行，一路留下许多言论。其中在英国的一场讲演正非常明白地表达了他与新党少年们在同一个问题上的歧见：

吁嗟乎！以华人生齿之繁，求其一世中（三十年为一世）于变时雍，与西方相伯仲，天下纵有笨伯，亦断不敢谓今日言之，明日成之也。而况矫柔造作，使其强就此途也？攀琉璃冷盏以探汤，有不猝然碎裂乎？是故华人之效西法，如寒极而春，必须迁延忍耐，逐渐加重。^①

在这种歧见里隐含着可以演绎出来的更多歧见。因此，李鸿章不会把志在行天的新党看做自己那个池子里的东西。然而，三十年来，他由办洋务而周知人情世态，对“诸臣墨守旧规，不足振兴”^②有着切肤之痛：“凡事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为捕风，而文人学上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③他在旧党里找不到一个知音。相比之下，他对新党要更少一点隔阂。被后来的历史分类称作早期改良派的人们是康梁一代的思想前辈。但其中若干知名者又都是围绕在李鸿章周围的人。李鸿章影响过他们，他们也影响过李鸿章。有此渊源，新一代人物的种种除旧布新之论对李鸿章来说就不会显得太过陌生。虽说新党别有怀抱，而以旧邦新造立论，则他们用以醒世的滔滔危言中，有不少内容是能够引发李鸿章心头共鸣的。因此，在一个新旧不能相容的时代里，他更愿意把这些人看成是中国的元气。“另眼相看”正是有心为多难的中国留一点后来的元气。自甲午一战之后，李鸿章暮年宦情冷落。然而于新旧厮斗之际，意态转觉昂藏挺特。光绪二十六年初，西太后立大阿哥，有置换皇帝之意。正在上海办学堂的经元善“感德宗有志振

①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10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复曾沅浦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十。

③ 《洋务运动》，第一册，270页。

作,甚不嫌于此举”,与章太炎、唐才常、蔡元培等联名通电总署争废立。“西后震怒”,限期缉捕经元善。当经元善逃往澳门之后,有人担心总督两广的李鸿章会“就近拿办”,特为致函其幕府中人,劝他不要执行廷旨。李鸿章极明白地回答:“我决不做刀斧手。”^①他用七个字说出了熟思之后的心路。同治年间,曾国藩以俞樾比李鸿章说:“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荫甫拚命著书。”^②其褒贬之意是看得出来的。由于“拚命做官”,所以,李鸿章半生远望宫阙而直不起腰来。他并不是对紫禁城里传下来的话没有一点异同,而是把这些东西都咽进肚子里去了。此谓之“疆吏尤不敢有窥测朝廷之迹。”^③但当他走向人生尽头的时候,却以自己的一连串举措直露爱憎取舍,在是非、善恶、新旧之争中显示出平生未有的谔谔之气,就像日落之前西天的一片明亮余晖。

十九世纪的最后一个新潮是维新,二十世纪的最初一个新潮是革命。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维新还不愿歇手,革命却已经露头。当庚子事变使华北在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交作之下成为一个动荡世界的时候,被人目为“乱党”的孙中山曾想策动李鸿章“挈两广宣告自立”。^④同一个时间里,介乎新党与“乱党”之间的章太炎也上书李鸿章,请“明绝伪诏,更建政府”。^⑤他们寄重于李鸿章,醒目地反映了李鸿章在近代中国新陈代谢过程中累积起来的时望。但他们并不明白:一个由十九世纪后半期的风霜雨露铸育出来的老人只能属于十九世纪。代表二十世纪的人们盼望王纲解体,属于十九世纪的人们却不愿意看到王纲解体。因此,在各国军队由海口涌入,占领天津,逼近北京之际,李鸿章不会接受孙中

① 《花随人圣庵摭忆》,3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春在堂随笔》,1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李文忠公尺牍》,第二十八册。

④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19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⑤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45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山、章太炎的建议自立于两广，只会接受朝廷的诏书“入都议和”。他在离开广州的时候曾预想此行的种种磨难煎熬，黯然说：“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一个在场的人很久之后还记得他“语次涕下如绠縻”的神情。^①当他到达北京的时候，北京已经“禁城尽弛”，无复旧日模样了。“联帅瓦德西僭居西苑”，李鸿章去见他，“入苑门即徒步。或曰：‘何不乘舆’，文忠曰：‘今虽播越，犹是君门，老臣何忍忘之。’因泣下”。一个翰林以诗记其事曰：

芜深辇道马嘶风，野草花开照殿红。

播越敢忘天咫尺，老臣含泪过骊宫。^②

其中既有君臣之思，也有家国之哀。

三

李鸿章一生心仪曾国藩，但与曾国藩相比，他又非常明显地缺乏一种导师气象。薛福成曾作《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描绘过曾国藩“持己所学，陶铸群伦”的神貌：

惟公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门，自文梓榱桷以至竹头木屑之属无不储。其成之也，始之以规矩绳墨，继之以斧斤锥凿，终之以磋磨文饰。其用之也，则榱栋榱椳。榱闾榱楔。人人各如其意去，斯所以能回乾轴而变风气也。^③

曾国藩生当一个多事的乱世，然而他关注“风气”，更用心于化人。这种眼识，表现了一个以事功得名位的人思虑不为事功所囿的深

① 《悔逸斋笔乘》《清代野记》第七辑，130页，巴蜀书社1987年版。

② 《义和团史料》，上册，1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③ 《薛福成选集》，2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度和广度。由此产生的道德感召力,使他周围能够汇聚起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群体。他曾说:“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① 在一个世变日亟的时代里,他始终保留着一种鲜明的人文精神。比别人更迂远,也比别人更清醒。

李鸿章很少能体会到这些乐趣。当内忧外患迫来之时,有些东西会被放大,有些东西会被缩小。一个没有人文精神的人很难越过直面相对的时务去思考不可指述的世风人心。所以,他重做事过于重为人。淮军创立之初,其将帅幕僚即多半以了事为才干,“文章道德,尚在其次”。^② 他们中未必没有明于英断之辈,然而被信念和信义感召来的人则并不多。李鸿章没有向这些人提供赖以维系凝聚的精神力量,他更惯于“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③ 于是,被利禄驱来的人们追随于李鸿章的身后,汇成了另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群体。蒋廷黻后来说:李鸿章之人格,能入人之脑,而不能入人之心。又说:一看李之全集,只见其做事,不见其为人。^④

李鸿章半生倾力办洋务,代表了那个时候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最初一小步。但相助他办洋务的人们又大半是被利禄召来的。这种矛盾,常常会使近代化的过程中出现许多百计肥私的齷齪相。光绪十一年,马良受派调查轮船招商局,他在报告中指名指事列叙说:

帐目之弊,失之太渥。不外四柱,有帐无实;而每年结帐又徒务虚名,纷然画抵,究难取信。患在公私混乱,挪欠自如。唐总办欠六七万,徐欠二万余,各司董所欠不

①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己未九月。

② 《淮军志》,311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③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12022页。

④ 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398页

等，殊与初定章程凡有挪欠者立即撤退之意相左。此特其净欠者耳。更有以烂贱股票押取局银至三十余万之多者。徐道名下押有十五万，其实并无抵物可以赎回，以致局无现银，去年九月几乎倒闭，蒙拨公款，赖以周转。当时限定，凡动局款，自万金以上须公议。乃唐道于年底回沪，辄以局中地基押于怡和，借银二十五万，二十万归局用，五万则擅抵私欠。^①

被称为“唐道”、“徐道”的唐廷枢和徐润都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能够办事的先驱人物，他们因此而受到过后人的称赞。但他们又缺乏一种以道德立身的境界，所以，细细看去，其面目总使人感到不干不净。另一个能够办事的先驱人物盛宣怀，则借助于经营洋务企业而积资“数千万两”，^②由武进乡间的中产之家成为中国巨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些钱财都是取之有道的结果。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古老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近代化，也为这一类人带来了自然经济下不可能有的取财门径。这种矛盾和同一，使这些人为私利而助成过近代化，也使这些人为私利而蛀蠹了近代化。后来的历史学家常常把初期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营私看成是一种从封建制度里移过来的东西。其实，在封建社会里，污吏也是被人诘击的道德批判对象。这一类人的毛病并不是出在新与旧之间，而是出在义与利之间。一个私利汨没公义的人，无论用资本主义的尺度衡量还是用封建主义的尺度衡量，都是小人。李鸿章以利禄为驱人之具，但当别人学会同一种方法之后，他也成了被驱策者。沃丘仲子说：“其所荐拔官吏，如周馥、龚照琦、盛宣怀之流，非庸碌即贪劣。创举实业，则官私糅杂，无复条理，而招商轮船、开平

① 《洋务运动》，第六册，126~127页。

② 《侯楚斋随笔》，第五卷，10页。

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及歿，家资逾千万，”^① 他把李鸿章与他周围的人连为一类而并论之，尤以“虚股甚多”一语，写尽言外之意。

李鸿章在一封信里说过：“我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类似的话还有“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② 用器物来比较儒学的优劣，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利器逼迫下的那一代中国人在新旧之间初现的文化忧思；一方面又反映了器物的升值和人文的贬值。这两个方面都使识时务的李鸿章从精神上疏离不合时宜的儒学。但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人格是由儒学鼓铸出来的。蔑视人文的结果，又常常会使人远离君子人格。胡思敬是晚清一个留心掌故的京官，他在一则记叙中说：

湖北候补道杨宗濂初为御史邓承修所劾，改官直隶。太仆少卿延茂，御史屠仁守再劾之，遂革职永不叙用。总督李鸿章与宗濂有旧，极力为图开复。时部例方严，久之不得当。适园工兴，费无所出，醇亲王奕譞假巡阅为名赴天津，与鸿章筹商移用海军费。鸿章曰：“海军筹款不易，常捐为部例所限，亦所获无几，无已，其令诸臣报效乎。”因授意宗濂，令乘机报效二万金。醇王大喜，回京即取中旨，复宗濂官。

“报效”二字从此便成为一个内涵独特的名词，与之对应的是一种新出的秽政。“后练兵处祖袭海军故智，仍用报效之法，罔利鬻官，鞶金求进者自十万以至数十万不止，监司部郎上下不甚贵重，动以京堂相答谢”。^③ 练兵处的“罔利鬻官”儿几乎是把官场当做市场

① 《近代名人小传·官僚》，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

② 《复刘仲良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五；刘体仁读《曾文正公手书记》眉批。

③ 《近代稗海》，第一辑，262页、240页。

了。李鸿章未必乐意看到这种景象。但以先后为序,则“报效”这个门洞正是由他亲手打开的。从“祖袭”者追溯作始者,人们不能不想起李鸿章。因此,胡思敬在记事的时候夹叙夹议,言之耿耿地用“徇私坏法”四字来评说李鸿章。一个影响历史的人物首先会以自己的人格影响当时的社会。李鸿章一生很少关注风气,却在身后留下了污漫的风气;李鸿章一生有心“变法自强”,却在是非情理之间常常“徇私坏法”。这种矛盾深刻地说明:在新旧嬗递的时代里,不仅需要能识时务的通达,而且需要“方寸之地”的莹彻。没有人格力量作支撑,负重者是难以致远的。

光绪初年,赵烈文在日记中描写北洋人物说:“自军务稍息,合肥公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①多年以后,与李鸿章有翁婿之亲的张佩纶又在书牘中说:“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②与淮军初起时的景观相比,这个时候的情状显然更等而下之。“喜用小人之有才者”,则“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③于是,李鸿章手中所办的事越来越大,而身边群聚的人则越来越小。他依靠这些人办天下之大事,但这些人没有骨鲠,没有志节,他们恰恰是最靠不住的。被李鸿章荐为“朴诚忠勇,缓急足恃”^④的皖人卫汝贵,中日战争期间领兵为大将。“其妻贻书曰:‘君起家戍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汝贵守妇议,益避敌军。败逃后,日人获其书,后引诸教科书以戒国人”。^⑤中国人的耻辱成了日本人磨砺胆气的砥石。以“守妇议”对比“朴诚忠勇,缓急足恃”显出来的是一

① 转引自《张謇传记》,55页,上海书店1983年版。

② 《中日战争》,第五册,230页。

③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12022页。

④ 《近代名人小传》。

⑤ 《中日兵事本末》,《清季野史》,19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种峭刻而悲怆的调侃。

李鸿章半生事业以洋务为总目,然而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为中国留下了一堆残缺不齐的洋务事业,却没有留下为后世所称道的人才。

新学生社会相

汪康年是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但作为一个知名的历史人物,其事业却多半应当归入报界一行。这种富有特色的履历,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择业旨趣的变迁,也会浸润出科名之士原本不容易有的职业眼光。他所留下的《汪穰卿笔记》一书,撮录见闻,记叙了晚清最后十多年里的纷呈世态;在写实之中表露了自己对于社会的观察,并为那个时候特有的人与事立此存照。其中可以咀嚼品味、发人感想的内容之一就是清末新政作育出来的学生形象。

二十世纪以前,中国人语汇中的“学生”一词多用作秀才的别名;有时也与门生或弟子同义,作为受业师的对待之称。自从仿效西法的各色学堂借诏旨的力量一批一批地产生出来之后,它们已经不再具有上个世纪那种异花盆栽的性质。随之,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举子生童的知识分子群体,学生二字遂被移用为他们的专称。在这些人中产生过后来的杰士和英才,但就他们中的多数而言,最初一代学生却以其夹新夹旧的社会相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汪康年叙录的一则故事说:

京曹官有奉部命至湖南某州有所调查,一日偶与人家婚宴,座中有昂然气态出众者。问之,则以湖北寻常师范毕业生,在其州中办新政者也。一人忽前语曰:“某家逼嫁事,君何不过问欤?”其人曰:“吾何暇为之?吾既办

全州教育，而州官又浼吾办警察，岂暇为此？”请者又徐曰：“君盍姑问之，某家固尚有三牛也。”此人闻言，即俯首沉思，不复言有暇否矣。^①

在新政之名时行天下的年代里，旧学的贬值和新学的升值都会因功利主义而被人为地放大。由此造成的新旧不相榫接，使那个时候出产的成群学生正好成为新与旧之间适逢其会的人物。“寻常师范毕业生”之所以能够包办教育、包办警察，并且有权干预新政范围以外的民间诉讼，并不是因为他生就一副无往不宜的好身手，而是因为他脸上有一块新学的胎记。比起满坑满谷正在延颈企踵苦盼差使的穷候补官来，靠新学吃饭的人们确乎有滋有味。得来容易的富贵，总会带上些暴发户惯有的倨傲气。一个“浼”字极富妙趣地表达了他们俯就之态中包含的踌躇满志和顾盼自雄。但在旁观者眼中，踌躇满志和顾盼自雄都脱不掉沐猴而冠的轻薄相。这些人因新学而得时，说明了庚子与辛丑之后，高居庙堂的当权群公和珠帘背后的两太后已经不能不求助于新学了。回眸反看戊戌年间在菜市口断头于刀斧之下的新党六君子，则此一时与彼一时之间，社会变迁之迹昭然可睹。然而，后起的新学家们多半是依靠办学堂而一批一批制造出来的。在东洋传来的速成法备受欢迎的时代里，粗制滥造是常有的事。时人曾举师范为例评论说：“监督不常驻堂，校员无所统属，学生惟闻钟上课，退则宿舍聚谈耳。师范生汉文通者，则鄙夷科学，汉文劣者，则徒有技能，不数年或不数阅月而均毕业矣。虽简易科、本科、选课，所立之名目殊，而程度浅深，品性高下，不甚悬绝也。”与科举制度的苛严规制相比，学堂无疑是一个自在世界；与科举制度狭小的人口相比，学堂的门又要大得多：“凡老师宿儒以及黄口孺子，皆可为师范生，师范生类无不可

^① 《汪穉卿笔记》卷五，杂记。

以毕业。”^① 这种长幼无序、老少同堂的景观本不悖乎教育宗旨，但作为塑造新学家的对象，“老师宿儒”与“黄口孺子”毕竟不是同一类物。若以缠足为比喻，那么，前一种人已是数十年久经桎梏之后的小脚，留下的只是麻木。后一种人则甫受缠绕，天足还没有变成金莲。其可塑与不可塑是一目了然的。数量更多的人是介乎“老师宿儒”与“黄口孺子”之间者，他们在人生的半途中折入古今中西交汇之局，“变亦变，不变亦变”，吸纳了一点来自新学的声光电和亚细亚、欧罗巴，然而举手投足之间又会非常自然地流露出旧习浸染而成的惰性与惯性。其夹新夹旧，恰像小脚放大之后的模样。湖南某州襄办新政的“寻常师范毕业生”之所以具有历史观赏价值，正在于他是能够代表这类人的一个典型。虽说“气态昂然出众”于周旋揖让之际的官僚相和“俯首沉思”取财之术的贪婪相本是旧染中人多见的面目，但这些东西出现在以新学进身者的脸上却会使人觉得格外不受用。旧习已经化其气质，于是新学只能化其皮毛。这种兼有旧气质和新皮毛的人物常常是既没有旧原则，也没有新原则的人物。他们在品类上更等而下之。《京华慷慨竹枝词》中有一首题名为《学生》，其辞曰：“攘利欺名此一肩，如今世界总须官，也曾青紫场中去，多少纷华误少年。”^② 它描写的是北方社会。南与北同此曲调，反映了那个时候学生界的通病，也反映了新学行时的年份里众多新学家们的旧嘴脸。

自学生成为一种新起的社会群体之后，其中的妇女知识分子遂引人注目地受到各类文字的描述和记叙。比起男子来，她们更加新奇。汪康年说：

河南某观察丧偶，谋续娶，以友人作伐，聘南中一女学生，年三十八矣。既讫吉，遣纪纲仆先期迎至汴，偕来

① 《教育感言》，《时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九日）。

② 《清代北京竹枝词》，14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者仅一女之表兄耳。迨吉日迎娶交拜毕，甫入房换妆，女谓仆媪曰：“速请老爷来，我须开谈判矣。”某至，女曰：“我此来仅能留一星期耳，届时我须行。我方为某处某某学堂教员，学生尚有一学期毕业，我不能半途而废也。”某默然。至期，果不携一仆一婢，只身偕其表兄行矣。某至此嗒焉若丧。闻其送妆时，以一亭置其毕业文凭，舁而过市，人有视之者，则一初等女小学堂之文凭也。^①

旧式妇女本以婚姻为终身之托。《女界钟》刻画其心理说：“生平束身圭璧，别无希望，惟此却扇之夕，如登科及第，望阙谢恩，以为供职录用，生平之大事毕矣。”^②这段记事中所录叙的“南中女学生”却能在旧途之外别开蹊径，轻易地把婚姻的位置挪到了其他东西的后面。虽说“开谈判”一语用在夫妇之间有点不伦不类，但时当大量新名词从日本进口并行销于新学界之际，不伦不类正是语言变迁中的一种特色。能够表现其新派面目的地方不在这里，而在于她蔑视夫权，懵然不知男尊女卑的昂藏意态。比照旧式女子的甘于雌伏，可谓一猪一龙，判然不同。然而以昂藏意态表现新面目，庄严之中又显得滑稽，由此产生的是一种笑不出来的俳谐相。身背四品翎顶的“某观察”因之而“嗒焉若丧”，显得瘟头瘟脑。在那个时候，取法新学的妇女恐怕比男子更多一些标新立异的自觉性。她们想借助这种方式来表达女性的自主，但女性的自主并不能借助这种方式真正实现。于是，标新立异常常流为肤浅轻躁，使她们在世人眼中成为不无悍气的人物：“一条辫子直长拖，不着绫绸不着罗，双脚革靴双眼镜，原来中国主人翁。”以“主人翁”指言女学生，描绘的正是她们的盛气。所以，民国初年报刊中的征婚启事类多以新知识与旧道德并举，列为理想女性的必要条件。即使同

① 《汪穉卿笔记》，卷四，杂记。

② 《女界钟》，7页。

出新学之门的豪杰,也很少有人愿意择偶于身上带着龙虎气派的女子。由是,曾不数年,常见于第一代女学生中的浮嚣意态在后来的知识女性身上日渐褪去,仅仅成为时人记述里留下的一种曾经有过的社会相。“浮嚣”是个贬义词,拿来形容历史进化中产生的新式妇女显然有点不敬。然而,从彻头彻尾的旧到半通不通的新,又是进化本身造成的一个难以绕越的阶段。在这种境界里,旧的开始破碎,新的还没有长全,置身其间的人们既无所依傍,又两受缠绕,恰恰会变得极易浮嚣。现成的例子便是充作嫁妆的毕业文凭:“其送妆时,以一亭置其毕业文凭,舁而过市,人有视之者,则一初等女小学堂之文凭也”。女学生的本意是炫耀新知以区别于流俗妇女的旧态,但这种特有的排场却是从传统中借来的,它在外观上更容易使人想到童生进学和举子中式之后惯见的喧闹。自觉的意识和不自觉的下意识,表现了新旧两不协调,结果只呈现为浮露矜器。

汪康年收罗的时间中还有一个故事,叙写了“豫西群盗之首”王天从的押寨夫人。她是另一种类型的女学生:

天从无所顾忌,其势复振,立寨于嵩县山中,党羽布全邑。其妻乃上海女学生,天从假名候补道,持印札赴沪办军火时诱娶之。至河南,女始知其为盗也。然女有智谋,劝勿显与官吏为难,设学塾山中,聘汴中师范生教之。天从且立公堂,三、八放告,集听讼狱,附山之民听其指令勿敢违。或有通官粮勿纳者,天从出示戒之,则立输于官。嵩县令在其掌握,惴惴惟以结欢为事,幸旦夕之安而已。^①

乱世多民变,也多割据山头的大王。这本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职业。虽然替天行道的团伙里以前也出现过女性,但那种生涯所重视的

^① 《江樵卿笔记》,卷一,记事,《记总兵谢宝胜治盗事》

并不是她们的知识。所以，“群盗之首”选择女学生做内助，正反映了山林草泽之中发生的变迁。欧风美雨东来，不仅改变了世态，也改变了绿林人物的眼光。然而，对于女学生来说，与占山为王者匹配却不是自愿选择的结果，两者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对称。把不对称的两者联结起来只能用骗术。由此产生的婚姻无疑是一种尴尬婚姻。中国旧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说，专门用来譬喻木已成舟之后的尴尬婚姻。它说明：在尴尬转变为不尴尬的过程中，妇女总是被改造的一方。但以此对照做了押寨夫人的“上海女学生”，则旧说已经明显地不能适用。因为在豫西那个绿林王国里，她并不是被改造的一方，而是改造别人的一方。本以打家劫舍为专业的“豫西群盗之首”，后来变得理路清晰，头脑井井有条，其中正有着被知识和“智谋”改造过的痕迹。更能显示女学生本色的，则是“设学塾山中，聘汴中师范生教之”，接受改造者的广度因此而愈见扩大。她聘来“汴中师范生”而不聘三家村塾师，说明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汴中师范生”愿意受聘入山，又说明了其道不孤。当梁启超偏处海外大声鼓吹开民智的时候，这些人在一个非常不同的环境里做着同一件事，她（他）们虽与“群盗”为伍，却比别人更多地保留着一点新学应有的理想主义。

清末中国处新旧摩荡之际。这是一个能够产生伟人的时代。但对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瞻新顾旧又是一种常态。瞻新顾旧于新旧摩荡之际，会造出种种社会相。在可鄙、可笑、可敬的面相背后，自有一种发人深思久想的东西。

新世纪来临之初的 知识分子和文化论争

西潮与回声

蒋梦麟十九岁(1905)中秀才,三十一岁(1917)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十二年里跨过了中西之间漫长的空间。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有心以文化经世的人物之一,也是那个时候名场中的人物之一。四十年代初,国难逼来,山河破碎。他与西南联大的众多师生一起,炮火声中作弦歌,并在满目断垣残壁的边城中追寻往事,寄托将来,写下了五十多年里的见闻和思考,从而有了《西潮》一书。他说:“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的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①这段话以冷峭的笔意写出了一种观世的枪凉。而枪凉溶入叙事,又常常会化作深度。

《西潮》一书半写身世,半写家国,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其中自有许多隽永之言。但更加耐读的却是叙述中带出来的历史细节,它们能使人在作者已经说完的地方继续想下去,产生一点游思和随想。

蒋梦麟那一辈名人,大半有过一段不甘跪伏于礼法的少年期和青年期。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里,梁启超、孙中山、拿破仑、华盛

^① 《西潮》,台湾金枫出版有限公司,2页。以下所引蒋梦麟言论均出自此书。

顿以及立宪、共和、民权、革命、自由、平等、科学、文明等等都是浸灌学界，曾经使人如痴如醉的题目。这些题目汇成了西潮拍岸的涛声，也唤起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激越，使他们圣贤意态越来越少，豪杰意态越来越多。“于是一切习为自由之说，万不复受约束”。后来做了教育部长的蒋梦麟，这个时候却因学潮而上过“黑名单”，是个造反派。西方传来的新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他们用来改造世界了。然而激越常常是与朦胧为表里的。他们用来改造世界的东西未必都是他们已经真知的东西。若干年后，蒋梦麟负笈西行，自船靠旧金山的时候起就明白了这一点。他说：“我上岸时第一个印象是移民局官员和警察所反映的国家权力。美国这个共和政体的国家，她的人民似乎比君主专制的中国人民更少个人自由，这简直弄得我莫名其妙。我们在中国时，天高皇帝远，一向很少感受国家权力的拘束。”在热心谈论了多年共和自由之后，蒋梦麟一下子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太懂共和自由。这种矛盾虽由一个历史细节反映出来，却以足够的深刻性说明了弄潮的中国人与西潮之间非常容易产生的隔膜。以此观照百年新陈代谢中的人和事，往往可以看到：用西学做出了掀天揭地事业的人们，有时会离奇地显露出精神上与西学扞格不通的一面。康有为在《大同书》里说过许多为天下女子争权利的话，并祝之曰：“始于男女平等，终于众生平等，必至是而吾爱愿始毕。”^①这些话中无疑回响着西潮的声音。但康有为又是一个妻妾成群的人。在他留下的一幅照片里，两边环列的众姬犹如拱月的群星一般，以序数编号的“夫人”竟有六个之多。这个壮观的场面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其中既看不到男女平等，也看不到众生平等。在近代中国人当中，康有为是最早用新知表述了理想境界的人物之一，他用这种境界为国人作启蒙，然而他自己的精神仿佛依然留在理想境界之外。与之相类

① 《大同书》，2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的还有吴虞。他以反对家族专制的激烈言论而惊世骇俗,并因之而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名流。但作为家庭中的至尊,吴虞自身又常常再现家族专制。他曾在一封信中斥责女儿“在中华黑暗之社会,(慕)欧美自由之文明”,然后冷森森地警告说:“若再不谨慎笔墨、郑重行止,妄与外人通信,吾若知之,断不能堪。置之死地,不能怪我。”^①显然,他与自己所歌颂的新文化之间,同样有着一重不易化解的隔膜。这些人都是近代百年与西潮相呼应的代表。没有他们,西潮来到中国将“潮打空城寂寞回”。但他们又各自怀抱隔膜,因隔膜而误读,因误读而朦胧;虽有一片激越心声,而对西潮运来的东西却未必尽能食髓知味。

蒋梦麟 1908 年到美国,之后,在彼邦就读九年。相比留美七年的胡适,他似乎资格更老一些。这段时光使他受用了西方那半个世界里的教育、科学、工业、技术;也使他因阅历而得见识,成为西方文化的内行和相知。在细述西潮故事的时候,他间或照自己的理解,把中国的近代化过程称作“西化”,表现了一种明切的认同。然而,作为一个自觉于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又并不喜欢所有西潮裹挟来的人物和事物。由此衍发出来的,有时是疏离,有时是厌薄。疏离与厌薄都表达了思考和见解。时当《西潮》记叙的年代,中国最“西化”的地方莫过于上海。蒋梦麟刻画过上海社会相,毫无赞美之意。他说:“上海有五等人,依次为洋商、买办、中国商人、工人和苦力。洋商“自大、无知、顽固,而且充满种族歧视,就是对于他们自己国内的科学发明和艺术创造也不闻不问,对于正在中国或他们本国发展的新思想和新潮流更无所知。他们唯一的目的是赚钱”。买办“像洋主子一样无知,也像洋主子一样富足”。中国商人则眼巴巴地望着买办,“买办们张嘴巴向洋主子讨肉骨头时,他们的同胞也就流着口水,不胜羡慕地大摇其尾巴”。这种各

① 《吴虞日记》,373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见形相的描绘,用词尖辣酸刻,一点不比普罗作家情感激烈的文字来得逊色。然后,他蔑乎视之而又酣畅淋漓地描画了口岸城市中的商业精神:“这五等人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般人所说的租界心理”。一种崇拜权势、讲究表面的心理。“上海人一天到晚都像蚂蚁觅食一样忙忙碌碌。他们聚敛愈多,也就愈受人敬重。在上海,无论中国文化或西洋文明都是糟糕透顶。中国人误解西方文明,西洋人也误解中国文化,中国人仇恨外国人,外国人也瞧中国人不起,谁都不能说谁没有理由,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之点——同样地没有文化;也有一个共同的谅解——敛财。这两种因素终使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成为金钱上的难兄难弟。”西方人带来了商业精神。但当商业精神笼罩一切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畸态和丑陋。蒋梦麟的言词半含挖苦半是排宣,直露地表达了一个谈论西化的知识分子面对这个世界时所产生的陌生感和异己感。从这些陌生感和异己感中可以读到文化、读到历史、读到新旧嬗递中的曲折世路和复杂心路。

十九世纪的忧时之士曾目睹西方商业精神的逼来而倡“商战”。商战的主旨,是呼唤中国人的商业精神。与梁启超同出一个师门的麦孟华说:“西人之以商弱我非一日矣。侵我利权,增我漏卮,夺我生业,吮我脂膏”,是以“今日立国,首在商战”。他们用民族主义把读书人心目中原本形象猥琐的商人们热心扶起来,然后在这些人的肩头放上救国重任。从那个时候起,岌岌乎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人们怀着一片苦心,比照彼国商人的模样,总想在中国塑造出一个同样的商人群体来。于是,借助于西潮的涌荡冲刷,士与商之间板结的社会界限一点一点变得模糊漫漶。当其潮头高高扬起之际,连状元张謇也半路出家,入市做了“绅商”。这是一个通达之士普遍崇商的时代。

然而这个时代很短。当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过去之后,类似的言论已经很少听到。被唤来救国的商业精神老是摆不正义与利

之间的位置,并老是想把义化为利。“五四”后一年,陈独秀说:“什么觉悟、爱国、利群、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在“算盘声,铜钱臭”的熏化之中都“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底利器”。^① 近代化了的商业行为冷酷地把志士的呐喊变作了利润和金钱,遂使神奇化作腐臭。西潮运来的许多东西到了中国都不容易长大,唯独商业精神却像野草一样在口岸城市蔓延开来,用不着施肥,就生机旺健,蓬蓬勃勃,成为攀缠于百业之中的社会意识。商业精神漫溢出界的地方,既会淹没中国文化,也会淹没西方文化。陈独秀和蒋梦麟是两个具有明显差别的人,但作为同一代知识分子中各见神采的代表,则他们对于口岸城市孜孜逐利的众生相正表现了一种非常相像的轻视和贱视。与上个世纪开新之上弘扬“商战”的激情与浪漫相比,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们显然更自觉于把文化精神与商业精神用一道沟壑划分开来。虽说二十世纪曾有过“实业救国”一说,但以文化自守的人们多半更愿意把自己归入“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一类。于是,士与商之间一度曾经淡化的界限似乎重新成了一种明晰可见的东西。负有时名的知识分子尽管各怀歧见,分道扬镳,但在这一点上却往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相似与相近。如果张謇活到蒋梦麟写《西潮》的年代,恐怕很难从知识分子群体里再找到一个知音了。

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不会比十九世纪的开新之士更无知,不会不知道近代化过程赋予工商社会长足发展的历史合理性。然而商业精神逐利的内在冲动又注定会使商业行为越出度外,以物欲推动进取,以进取传播物欲,并因此而显出它们与良知相悖的一面来。这种矛盾,不能不使二十世纪更富近代精神的知识分子在评估贾道的时候缺乏十九世纪开新之士的那种热情与浪漫。他们的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24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言论更切近于古老的义利之辨。自从西潮拍岸以来,新旧之争常常曳引出利义之争。亘贯于自强、变法、立宪、共和起伏代谢里的,是新党多言利,旧党多言义。义利之辨也随之而被新学家们看作是不值钱的旧货。然而,当昧昧乎固守旧物的声音越来越少之后,接受了更多新知识的人们却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态,时常在追求进化的同时重新思辨义利,就像江流东去的波涛里一定会出现的回澜。而古老的义利之辨历经百年巨变以后仍然牵动人心,触发思绪,又说明了它本身内涵着常新的蕴义。

蒋梦麟以“西潮”立名追叙近代中国的变迁,无疑是想表达自己对这种变迁的理解和解释。但在叙事的过程中,他又常常用实例演示了中国人精神中不为西潮所掩的一面。华北事变之后,驻守东交民巷的日本军队曾以武力胁迫蒋梦麟去大连,并预期着他在刀枪面前的畏惧。蒋梦麟平静地告诉他们,自己并不害怕:“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这句话很短,然而在那样一个场合里却比千言万语更明白地宣述了应该宣述的意思。西潮运来了西方文化中的形而上和形而下,但当危难逼来之际,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中国人却直接地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支撑身心的精神力量。这是一种发人长思久想的现象。蒋梦麟那一代人是由十九世纪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熏陶出来的。古今中西之争曾使他们高筑新旧之界,也使他们终究会看到中国文化里不能以新旧作褒贬的东西。《西潮》一书记录过两个中国人与一个西方人之间的师生对话:“有一个夏天下午,杜威教授、胡适之先生和我三个人在北平西山看到一只屎蛭螂正在推着一个小小的泥团上山坡。它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用前腿。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泥团忽然滚回原地,屎蛭螂紧攀在泥团上翻滚下坡。它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但是结果仍旧遭到同样的失败。它一次接一次地尝试,但是 一次接一次地失败。适之先生和我都说,它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教授却说,它的毅力固

然可嘉,它的愚蠢却实在可怜。”蒋梦麟说完这个故事后慨乎言之曰:“这真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同一东西却有不同的两面。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是道地的西方子弟,他的两位学生却是道地的东方子弟。西方惋叹屎蛇螂之缺乏智慧,东方则赞叹它之富于毅力。”对话和感慨虽从细小的题目说起,而表述出来的则是富有深度的人情物理。智慧和毅力都是美德。但智慧和毅力又是两种不能互相替代的东西。因此,蒋梦麟以实笔重叙这个故事,既自觉地表达了一个中国学生对西方老师的敬重,也自觉地表达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使西潮拍岸的潮声常常会与五千年历史蕴育的心声交汇。于是,潮声和心声在近代百年留下的痕迹都成为论史的题目。

新文化运动：从“美国思想”到“俄国思想”

辛亥革命后一年，黄远庸说：“晚清时代，国之现象，亦惫甚矣。然人心勃勃，犹有莫大之希望。立宪党曰，吾国立宪，则强盛可立致；革命党曰，吾国革命而易共和，则法美不足言。今以革命既成，立宪政体，亦既确定，而种种败象，莫不与往日所祈向者相左。于是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然不知所归，犹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粮糈俱绝，风雨四至，惟日待大命之至。”^① 他以一个记者的观察和体验，写照了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的凄楚与失望。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政局和乱世群生相，同武昌起义之后“咸与维新”所带来过的希望成为一种强烈对比，逼使向往过共和立宪的人们在身与心交困中重究既往。由此形成的思想巨潮，催生了比上一代革命人物更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自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杂志，在声光和激情久已沉寂的舆论界首先以民主（人权）与科学并重立言，预示了行将来临的大海潮音。稍后，胡适、刘半农、易白沙、鲁迅、钱玄同、李大钊、高一涵、吴虞、沈尹默、周作人等先

^① 《远生遗著》，卷一，88～89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增补影印第一版。

后在同一宗旨下聚合于《新青年》，用前所未有的彻底性和猛烈性全面地掙击了以孔学为代表的旧文化。随之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给当时和后来的中国都留下过深刻的影响，但其勃然以兴却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

自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西方人用铁与火铸成的条约制度，把古老的中国社会拖出了旧轨。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西学东渐，使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了与惯见稔熟之物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比较，与中华民族在万般磨难中的苦痛和愤恨交织在一起，但又以资本主义映衬封建主义，显示了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这种矛盾，曾使每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忧时之士在抗拒侵逼的同时又不能不以彼律己，省察自身，于是而有历时久远的古今中西之争和每一代人择取西学的不同命题。四十年代，地主阶级改革派首发“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议论，代表了一个民族在炮口迫视下的久睡初醒；随后，六十年代出现的洋务派着意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撷取与限制的同一，寄托了分化中的地主阶级借“西用”卫“中体”的苦心；七十年代开始露头的早期改良派和后来的维新派们醉心的是“君民共主”；九十年代之后的革命派们取法的是“民主共和”。七十多年里，这些命题的变换和嬗递反映了中国人移接西学的路迹和心迹，其前后相续与由表及里包含着艰难的历史进步。但是，不同的命题所择取的东西虽说有器物与制度之分，却都是直观西方文化的结果，择取的具体性同时又意味着择取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后起的新文化运动则以民主和科学为命题，对西方近代文明作了富有深度的概括。由择取到概括，表现了古今中西之争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飞跃，因此，它们不仅蓄涵了七十年西学东渐的沉重累积，而且能够以一见多，成为一种近代化的评判尺度而直面一切社会现象。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谨陈六义”，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

而非想象的”，正是在古今中西的对待中用这一尺度作出了多面的评判取舍。其后，新文化运动由评判取舍而攬及礼教、文体、文学、家族制度、偶像崇拜，不可阻遏地戳到了旧文化和旧传统的一切方面。“要拥护那德先生(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科学)，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①比之上个世纪那些命题曾经引起过的社会反应和观念变化，民主与科学的广袤内涵必然使它们的传播会成为西学东渐以来最能撼动人心的社会启蒙运动。

就中学(旧学)和西学(新学)所代表的不同时代内容而言，西学东渐过程里产生的每一个命题都曾间接或直接地带来过具有启蒙意义的影响。但启蒙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则开始于维新运动。谭嗣同由一腔愤痛发为激越呼号的“冲决网罗”；严复典雅而富有理致的众多译述与比较中西之论；梁启超在亡命日本期间孜孜矻矻阐发的“新民”说，都是意在抉破封建蒙昧，以新学膺启国人的心血之作。然而，当维新运动在时势的催逼下转向戊戌变法的时候，“君民共主”以及由此派生的政治改革不能不比启蒙更突出地成为吸引多数人注意的中心，而改革在达到高峰之后的迅速失败，则使启蒙在政局的变动中成为没有知音的声调。随后，革命替代改良駁成时潮的中心，在它所带来的—连串武装起义里，由鲜血、枪炮和硝烟表达的排满共和呼啸又不会不以自己巨大的音响淹没笔墨叙写的启蒙议论。这种矛盾并不是那一代志在救国的人们主观抉择的结果，然而由此造成的态势却历史地使社会启蒙的进趋迟缓于政治革命，并使独步一时的政治革命不能穿透社会心理的深厚屏障而扎根于民众。继起于四年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一开始就倾力以社会启蒙为己任，其直接的历史触发点正是目睹社会意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317页。

识对于政治变革的疏离：“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益之感而有所取舍也”。但“立宪政治而不出多数国民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曰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于是，新文化运动便急切地成为一种“唤起吾人最后之觉悟”^①的运动。这个过程承续了上个世纪以来先行者的旧迹，前一代人从西方介绍过来的进化论、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他们曾经最早发抉而又浅尝辄止的“诗界革命”、“新文体”、“崇白话废文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等等主张，作为历史的先声和汇积都为后来者包容吸纳。然而，比之刚刚从旧式士大夫转变过来的上一代志士仁人，新文化运动中的众多群体已经代表着万千出自国内外近代学校的另一辈知识分子了。两代人之间，淀积着中国社会二十年新陈代谢留下的沧桑巨变和饱含苦酸的反思内容。所以，作为另一种时势下的启蒙大潮，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力度表现了远远超迈前人的反传统彻底性，期“以人为之力，冀其迅速蜕演，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②两千多年来久被崇敬的孔学，即使在变法和革命掀动天下的时候也很少有人公然摘疵非议，这个时候却被当作残骸枯骨，第一次在备受猛击中变成了激进的知识界集中批判的目标。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影响，反映了比辛亥革命斩绝君统更为深刻的社会观念变化。

反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题，就其与现实对应的一面来说，正是革命以后旧潮回澜刺戟的结果。时人说：“民国三四年的时候，复古主义披靡一世，什么忠孝节义，什么八德的建议案，连篇累牍地披露出来，到后来便有帝制的结果。可见这种顽固的思想，

① 《青年》杂志，一卷6号。

② 《李大钊文集》，上册，164页、651~65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与恶浊的政治往往相因而至。”^① 当时人深信旧文化和旧政治之间的这种感应是可以由直观而见的。所以，“提倡孔学必掙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非常自然地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潮头健儿当作题中应有之义。在这里，思想文化上的激烈反孔无疑正体现了辛亥革命所代表的政治潮流在民国以后的延伸、补足和深化。但是，反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题，更能牵动人心的一面还在于它以中西文化的比较和观照指出“今”与“古”的截然对立：“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反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人进”。返观中国，则“胥反乎是。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说为之也”^②。今与古的对待，被化约为民主自由、天赋人权与礼教的对待，这种比照，写出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快捷的理路。他们都相信：比之外在的政治专制，礼教的思想影响是一种更具惰力的内在禁锢，它使过去的历史成为一张拖住今世的潜网，器物 and 制度的变革都没有换来一个近代化。吴虞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李大钊说：“以圣人之虚声，劫持吾人之思想自由者，吾人当知其祸，视以皇帝之权威侵害吾人身体为尤烈。”陈独秀说：“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

① 《五四运动文选》，233页，三联书店版。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153页。

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① 他们的言论并非旨在以学理评孔子,其意气激昂正是一种历史特色。虽说与思辨相比,意气是一种缺乏缜密性的东西,但在那一代人激昂的意气中,愤张是与血性连在一起的。他们期望以振聋发聩之吼破启传统结成的厚重禁锢,唤起“多数国民”舍古趋今,“自度度人”。正因为如此,随着猛烈的反孔,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思想解放潮流。尽管这一潮流的最后归宿未必在那一代人的预想之中,然而他们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开闸者。两千多年来,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久成天经地义。思想解放之蔚成潮流,正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人在走出这种天经地义,于是而有后来的百家争鸣。这个过程,产生了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的另一代人。

对于礼教的排击,直接引来了文学革命。所谓“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② 最先向旧文学发难的是胡适经“年来研究”之后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些议论,虽然多半是就文体、形式、风格、语言而发的,因而很少火药气,但在当时却极有针对性地切中了广有影响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弊。同时,以“八不主义”竖看历史,则不能不引出褻渎经典之论:“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③ 以“八不主义”付之实行,则最终导致了白话文替代文言文。因此,胡适称为“改良刍议”的东西,

①、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148、29页。

③ 《新青年》杂志,二卷5号。

陈独秀却名之为“文学革命”，并以淋漓的元气起而呼应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①他在声援之中同时把文学革命由形式推到了内容。就新文学后来实际发展的路向而言，“三大主义”所描画的不过是一种大而化之的空泛构想，其中模糊性实多于确定性。但在新文学的出生期，这一类慷慨议论却以自己的凌厉声势起过极大的助产作用。在他们之后，周作人主张“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并直指新文学为“人的文学”。^②他的见解明显地带有二十世纪初期日本文学潮流影响的痕迹，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却最有深度地从理论上标示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别。因此，当文学新潮初起之时，其主张便与白话文一起成为支配潮流的“中心理论”^③。由民主和科学接引来的新文学所孵生的第一批作品，常常表现出为民主和科学呐喊的自觉。出自鲁迅之手的《狂人日记》，虽是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却在当时和后来久负盛名。因为他以逼人的冷峭写出了礼教吃人的主题；借助于形象思维的描述，封建主义的鬼气森森成为一种须眉毕现的东西。由此产生的感召力，曾比逻辑思维的论说打动过更多的人心。新文学的这一品格，使文学革命的涌起必然会促成新文化运动的渗开和扩大。《文学改良刍议》刊出两年又数月之后，“白话报纸风起云涌，各地学生团体的小报纸，形式略仿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至少有四百种。白话的杂志也出了不少，如《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新

① 《新青年》杂志，二卷6号。

②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219页。

③ 罗常培：《中国新文学的新陈代谢》，见《中国人与中国文》，龙门书店（香港）版。

中国》等。性质与《新青年》有些相近,所登载的文章大都是介绍西洋文化,攻击封建思想。还有许多日报的副刊也都改登白话作品,较为重要的,北方有《晨报副刊》,南方有《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对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①

这是一个思想力量汇聚社会力量的过程。由启蒙所唤起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在民主和科学的导引下本已呼之欲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潮鼓荡和日本的咄咄相逼,终于使他们在国难的刺激下急迫地走向社会。曾经是这个群体一员的恽代英后来说:“有人心、有血性的北京各校学生,因为他们受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思想的影响,亦因为不忍看见中国四万万同胞与他们自己,屈服于日本及甘心卖国的亲日派政府之下,于是在五月四日举行了二千余人的游行示威,这是中国以前不曾有过的伟大运动。”^② 民主和科学与“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在同一代人身上合流,反映了近代中国文化与世运的濡沫相依。在这里,曾经激烈地批判过传统文化的人们同时又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强烈地显示了得自传统文化的经世意识。由是,以启蒙为开端的事业在1919年走向高潮,成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序幕的事业。

二

“五四”爱国运动之后,走向高潮的新文化运动同时又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1919年12月,《新青年》杂志以全体社员“公共意见”的名义发表了《新青年宣言》,其中说:“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③

① 周阳山:《五四与中国》,612页。

② 《五四运动回忆录》(续),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③ 《新青年》杂志,七卷1期

“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分别指述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比照四年以前《敬告青年》一文中热情讴歌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言辞,其前后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不同,深刻地现露了欧战及其结局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现露了由此而来的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观察与认识的变化。据蔡和森说:

十月革命未影响以前,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思想界的势力完全为美国的势力,既[即]美国资本主义的势力统治,换言之,为民主主义(德莫克拉西主义)、实验主义的势力所统治,……我们看一看当时的出版物、校课书的内容,学生的倾向,即可知民主主义、实验主义影响之大及对五四运动的关系了。五四运动虽不是绝对的完全受美国的影响,但成分是很多的。这个影响正有力的时候,全国人民对美国的幻想都是很大的,是希望美[国]来帮助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①

虽说陈独秀在用民主和科学概括欧洲近代文明的时候常常以“法兰西文明”作同义语,但那个时候美国的一派“公理”形象和来自彼邦的实验主义却使国人更容易把民主和科学与它直接对应起来。于是而有1919年5月4日游行学生在烈日暴晒下向美国公使馆陈词,吁请“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②的事实。因此,标举美国思想的影响,适可以测度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在“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中所曾经达到的潮位。就新文化运动的初旨而言,欧西资本主义文化的滚滚东来本是选择和追求的结果,但欧战造成的破败相与苦难相,却使选择和追求过资本主义文明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了:“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

①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6~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版。

② 《晨报》(1919年5月6日)。

义与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了”。“他的黑暗,他的势力和消费量的不平均,他的残酷,‘以人类为牺牲’,以及其他种种罪恶,已经使生活在他底下的大多数的人类,感到极端的痛苦,而想用各种的方法,做各种的运动群起而推翻之了”。^① 因此,置身于潮头的大批对现状“非常不满”而怀抱“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渐渐“都不再相信十八世纪法国式革命能够挽救中国”。^②

从追求资本主义到批评资本主义,表现了新文化运动发展中的矛盾和嬗递。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为新文化运动所裹挟的人们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日益急切地“谋求社会之改造”：“我们处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里头,觉得四周的种种环境,层层空气,没有一样不是黑暗、恶浊、悲观、厌烦,如同掉在九幽十八层地狱里似的。若果常常如此,不加改革,那么还成一种人类的社会吗?所以,我们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不满于现在的社会,想着另创一种新社会”。两者的交相为用,历史地推动着那个时候激进的中国人去追求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合理的社会制度。于是,社会主义思潮澎湃涌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当时人描述说:“大西洋的新潮流,一天一天的由太平洋流到中国来,在东洋文化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什么平民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学说,都印人吾人的脑子里;吾人于此亦恍然大悟,晓得阶级制度,是不可存留的,资本观念,是不可久持的,将从前鄙陋的思想,去了大半。”^③ 社会群体的进趋路向在短时间的变换,明显地反映了新文化运动自身在世界历史翻然巨变中的新陈代谢。几年之后,蔡和森以《新青年》为代表,把这种新陈代谢概述为由“美国思想”到“俄国思想”：“这个刊物开始时的两个口号为：民主和科学。而这个口

① 《解放与改造》，一卷1号；《新社会》11号。

② 《五四期的社团》（一），553页。

③ 《杭州学生联合会报》，三十一期，“五四”号增刊。

号又完全是代表美国的精神,故《新青年》以前也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到了仲甫(陈独秀)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的思想变为俄国的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① 就其本义而言,社会主义应当包含民主和科学,但当它们分别地联接于不同社会形态时,中国人更多地注意和强调的是它们之间的不同。在这里,以“俄国思想”称社会主义,用意在于指出中国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是向俄国学习的结果。同一个意思,毛泽东后来表述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②

但是,在新思潮名义下开始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都是代表“俄国思想”的。其间还有来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不同派别和学说的异流。由此汇成的舛错多态曾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种历史奇观。瞿秋白追叙当日感受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塞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定出流的方向。其间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③ 在“隔着纱窗看晓雾”的朦胧中,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主义、议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等等一起被中国人统称为社会主义而接纳过来。虽说主义与主义之间往往相去很远,但对于“五四”以后为中国寻求出路的人们来说,它们曾经同样有过吸引人心的力量。身历其境者后来回忆说:“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

①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6~7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③ 《瞿秋白文集》(-),23~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①于是,带着浓色的理想主义,成群成群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很短的时间里都成了信仰宽泛的社会主义者。

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思潮迅速地影响了“五四”前后崛起的一代以改造社会为怀抱的人们,这一事实,反射了世界潮流的变动,同时又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方面,古已有之的大同理想成为一种熟识的思想中介,沟通了中国人与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礼记·礼运》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②

这种托名于孔夫子的记述带有明显的空想性质,但它刻画的互爱互助和没有争斗的世景,却长久地延续于中国文化的变迁之中,成为最易唤人向往之情的东西。“五四”前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们多以痛击旧文化而成名,然而他们大半又保留了熟知的大同理想。1919年2月,曾经以《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欢呼十月革命的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诚挚地召唤那个时候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作,那其余的功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

① 《五四运动回忆录》(上),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② 《礼记·礼运》,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288页。

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①他以改造农村立论,但笔下却隐约地透露了古代大同理想的遥远回声。正是这种古已有之的大同理想,使众多中国人面对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因似曾相识而心驰神往。所以,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者常常以此度彼,非常自然地相信“‘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几句话确可以代表社会主义底神髓”。^②当然,比之近代社会主义的各个流派,原始大同理想毕竟是一种空泛而缺乏内在规定性的东西。但空泛的东西恰恰正提供了多方面理解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由此产生的古今中外兼容并蓄曾是那个时候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特有的景象: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砾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③

另一方面,从甲午中日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资本主义(包括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和外来资本)在中国缓慢而持续的发展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流入准备了现实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的生长,曾经促成了十九世纪末的维新变法和二十世纪初的武装革命,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又无情地造成“机器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且因资本生产制造成物价昂贵的结果,中产社会渐渐都沦为无产者而且是失业者”。张目四顾,“社会上困苦的失业者已普遍都会与乡间了”。人们因久睹这些事实而不

① 《李大钊文集》,上册,264页、651~65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70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新青年》杂志,七卷1期。

能不体会到“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① 在西方思想史上，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种种罪恶的道义愤怒，曾是孕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相比之下，始终没有建立起一种完整资本主义制度的近代中国，却更早地显示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忧虑。二十世纪初，致力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孙中山就说过：“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展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即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② 他的话明显地反映了追求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希望限制资本主义那样一种矛盾。虽说怀抱这类见识的人在那个时候并不多，但这种矛盾丛集于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的言论之中，则引人注目地显示了社会主义意识在中国的早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使中国人集中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阴暗一面，由欧洲比照本国，无疑会使种种弊象益见醒目。于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众多先觉的中国人寄托未来的东西了。

然而，各派社会主义合流的新思潮虽以自己的涌来之势汇成过浑然共鸣，它们彼此之间的分异却终究是浑然共鸣所不可淹没的。由此产生的百家争鸣，表现了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以自己的面目来影响社会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努力。比之先秦土生土长的“百家”，它们是外来之物。外来之物可以转化为内在之物，但这个过程的实现是历史选择的结果。群起的社会主义流派在相互牴牾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54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 《民主主义与社会革命》、《提倡民生主义之良义》，均见《孙中山选集》，上册，88、9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中曾显现了一时的多姿多彩,又因自己的理论破绽和设计漏洞而先后色泽褪尽;它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短短的一阵潮头过去之后就波平浪静,了无痕迹了。只有与“俄国思想”同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扎入了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召聚新的阶级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局面掀开了百年新陈代谢的另一页。由杂多的新思潮到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枝独秀,包含着那一代追求真理的人们在求索中付出的比较、尝试、论辩和思考,他们在比较、尝试、论辩和思考之后的选择正体现了历史的选择。

其一,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及其失败。1919年底成立于北京的“工读互助团”,以他们所标张的“工读互助主义”而在那个时候的知识界有过广泛的声誉。组合于其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们“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每日每人必须作工四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他们期望用“平和的经济革命”实现“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并相信“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劳动互助的习惯,所有一切简单规约皆可废止。我们以后的生活便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一政府一于我何有哉!”^① 其宗旨虽以“工读互助”为名称,但包含于其中的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互助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内容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并熔一炉的空想社会主义试验曾经备受时人的注目,并远远地影响过天津、武汉、上海、广州、南京、长沙的学生群体。然而试验一旦开始,实践就会用事实打破空想。被“工读互助主义”所漠视的现存经济关系最先成为不可逾越的难关:“因为现在社会制度的下面,想拿半天劳工所得的工资,万难维持全天的生活费”。所以,“团体发展一步,经济紧急一步;团体存在一天,

^① 《少年中国》,一卷7期。

经济困难一天。由经济紧急而经济困难,由经济困难而经济穷绝。”^①继之而来的是空泛理想导致的团体精神涣散:“我们那时以为,我们的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这种枯燥无味的工作,也都很高兴地去,不感着什么痛苦。直到彼此感情渐渐隔阂,团体精神渐渐涣散,于是对于工作发生极大的变化,顿时感觉没有兴味,……刚刚这时食堂里发生经济危险,万难支持,而其他工作也不能维持生活,……于是就有人主张索性破坏。这个时候,差不多大家对于这个团体都没有十分感情,除出一二人外,都不愿去维持他”。^②在外来的经济压力和内在的精神溃散交作之下,轰动一时的工读互助运动仅仅支撑了半年之久即在山穷水尽中归于沉寂。对于曾经热心其事的那一代人来说,这个结局无疑会带来幻灭的痛苦,然而认识的深化也往往开始于此。从“工读互助团”里走出来的施存统在饱尝苦辛之后说:“(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既然免不掉现实社会的支配,当然要发生许多试验新生活的障碍。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把这些障碍根本打翻。要打翻这些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③比之“工读互助团”初起时的憧憬,这是一种彻悟。在当日曾经信仰过空想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与之相类的由憧憬而彻悟者远不是个别的。就谋求社会“根本改造”的本来含义而言,他们在空想社会主义试验失败之后的转向不会不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生感应。其时,中国人已经知道:

① 《俞秀松致囊世伯的信》,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518页;《时事新报》(1921年2月3日)。

②、③ 《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

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①

对于亲历或目睹过“工读互助团”盛衰兴灭的人们来说,马克思的理论无疑是亲切而极中肯綮的。从空想社会主义试验中所获得的经验虽然只有负面价值,但它却可以转化为一种说教所无法替代的思想基础,促成有志于社会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天翻地覆的世局中走向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

其二,十月革命的成功,以社会制度的剧变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1919年2月,李大钊在北方的《晨报》副刊上载文说:“在这回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突然由俄国冲出一派滚滚的潮流,……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同一年12月,杨匏安在南方《广东中华新报》上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并说:“马氏之言验矣!今日欧美诸国已悟布尔什维克之不能以武力扫除矣。”他们的言论,明白地昭示了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服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众多年辈稍轻的知识分子后来脱颖而出,也是沿着这一轨迹前行的结果。与他们相比,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吴玉章是具有另一种经历的人了,但他晚年自叙往事,同样把十月革命的感召作为求得真知的起点:

1918年我在广州,由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封锁消息,我们还不知道俄国已发生了一个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革命。……后来我就读到了约翰·里德写的《震动全球的十日》,这本书对十月革命的过程描写得很生

^① 《李大钊文集》,下册,37页。

动。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我们北方邻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个劳农政府,伟大的俄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剥削制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从前我在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各种思想流派,深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今天这个理想居然在一个大国内开始实现了,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①

他由此而开始寻找马克思主义,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吴玉章是一个老同盟会员,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已经躬历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多次战役。因此,其思想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巨变,正纪录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曾经有过的沛然莫御之势。戊戌维新效法日本,辛亥革命追躐法美,“五四”以后的中国人则开始“以俄为师”。三十年之间,取法对象的频频变换反映了社会变迁的急速相,俄国人因先得马克思主义而成为中国人的老师,由此形成的权威,又使中国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常常把俄国人的道路当成一种模式。但内在的国情迟早会修正外来的模式,于是而有后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萌蘖于 1915 年的新文化运动因科学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而达到了自己的巅峰。然而,出现于同一时期的种种论争又显示了曾经同道的人们已不再同道。巅峰期的新文化运动因之而走向自己的终结。在它后面顺序而起的,是国民革命的狂飙。

^① 《五四运动回忆录》(上),59、5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历史的矛盾与“社会主义的讨论”

从1920年开始的社会主义讨论表现了中国人对欧战之后世界潮流的回应。作为一场文化运动的延伸,这个过程又与上个世纪以来西学东渐的脉流前后相接。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曾一搥一掌血地猛击资本主义,但当思想运动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运动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却不得不重估中国的资本主义。由此产生的矛盾,显示出理论与国情之间的窒碍。矛盾和窒碍呼唤理论回归国情。于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便成为一个历史命题。

—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已经有人听说过泰西“康密尼人(Communist,共产主义者)”和他们主张的“欧罗巴大同之义”。^①但直至“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才源源流入时论,在四起的回声中蔚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显学。其间,来自欧美和日本的众多流派曾引人注目地各标风采,又在潮起潮落之后相继沉寂。它们被那一代人引入,也被那一代人淘洗。当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武者小路实笃一类人物经簸扬淘洗渐次淡褪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却以

^① 《西国近事汇编》,1877年卷二,1874年卷一。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为样式而在中国获得了夥多的知音,借助于马克思的理论和苏俄的样式,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第一次成为一个可以论证的题目。这个题目具有严肃的学理性,但对别有选择的另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这个题目又以学理挟风雷,显露出鲜明的党派性。由此触发的异议导致了以社会主义为对象的论辩。与那个时候专用肆口且诋来对付“过激主义”的粗野不文者相比,论辩显示的则是理性。因此,健于作辩的陈独秀循乎其实地名之为“社会主义的讨论”。

最早怀抱自觉的理论意识向社会主义公开立异的是张东荪。然而他又曾经是新文化运动中宣传社会主义的颇负时誉者。由于这种名声,代表第三国际的维经斯基 1920 年来华期间还与他“会谈了好几次”。^①白云须臾变苍狗,在一个多变的时代里,人常常会被自己和别人放错位置。张东荪是从研究系的圈子里走出来的。追溯历史,被称作研究系的知识群落本来发源于晚清的维新派和立宪派。虽说二十多年里世路曲折,人物代谢,但历史渊源会带来一种不易摆脱的惯性。作为近代中国最先出世的新党,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缺乏接纳新知的趣味和度量;作为近代中国资格最老的政治改良派,他们中的多数人又一以贯之地抗拒暴力与革命。两者嵌接在一起,合成了由来已久的群体特色。因此,维经斯基的一片热心决不会吸引张东荪,使他离社会主义更近;只会吓倒张东荪,使他离社会主义更远。几个月之后,张东荪相伴罗素游湖南,写成《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翻然转向,从社会主义者的朋友变成了异己。随后,在同一个论旨下陆续出手的还有数量更多的文字。

张东荪是一个具有哲学素养的人。然而论辩社会主义却不能不从经济起讲。他说:

^① 《包惠僧回忆录》,17 页,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一,社会革命必起于富之分配不均,而不能起于富之一班(般)的缺乏。盖贫乏太甚,则一切举动皆不能实行。譬如直接行动之罢工等,决非十分贫乏之工人所能为。第二,贫乏之可患甚于不均,不均可由重新分配之法于短时间内救正之,而贫乏则非短期所能救济。俄劳农政府之办法对于不均固完全解决矣,而对于贫乏则尚在试办,罗素所不满于彼者或亦在此。盖两相异之问题,不能用一相同之方法为之解决。故吾敢预言中国真正社会主义之起,必在由贫乏而过于不均之时代。

这些话并没有驳诘社会主义学说,所内含的理论和逻辑。它强调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遥远距离。“盖中国民不聊生急有待于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① 因此,“于此之际,苟目睹资本主义兴焉, Bourgeois (资产阶级分子)兴焉,皆当认为当然之阶级,与其拒之不如希其速来”。他认定中国社会的本病在“贫乏”,表病在“无知”、“兵匪”、“外力”,并相信产业资本主义既可以治本病,也可以治表病:一、“实业兴后,虽阶级分明而无求生不得之人,方有讲教育之余地”,于是可以医疗“无知病”;二、“将来必有一天资本主义与武力主义大斗法,而武力主义又必败在资本主义手里”。此起彼伏之间,会自然地消弭“兵匪病”;三、“外货挟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势而来”,久成中国祸殃。但“中国物产不发达,则无丝毫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之力”。所以,“开发实业以增加物产”,正是用国内的资本主义排拒国外的资本主义,以中华物力逼退“外力病”的一种路径。^②张东荪的手里有许多具体性。他用这些道理来说中国的资本主义,意在映衬社会主义者的“好高务远”。^③ 然而他从经济人

①、② 《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史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下册,151页,14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 《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5日)。

手解说中国社会的现状与出路,又折射了社会主义学派影响下一时风气变趋的痕迹。这些道理兼有实测和臆说两个方面。实测和臆说,都是尚未在中国走完行程的资本主义为自己张扬历史的合理性。稍后,梁启超作《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与之桴鼓相应。若仅以旨趣衡量,其论说并不多见驾张东荪而上之的地方,但他文辞明丽畅达,意绪曲折多致,感染力则远远过于张东荪。因此,在当时和后来,他们都被看做是社会主义讨论中左袒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中国知识分子多自觉于天下国家之责,怀抱天下国家之责的知识分子又常常人以群分。张东荪以“救国”立议论;梁启超以“国家元气”为警句,时人称之为“爱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①他们那些意在劝退社会主义的论述中未必没有修辞立其诚的自信,然而在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爱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已经在更新的潮流面前变作了陈词。

上个世纪以维新自命的知识分子群体曾是近代百年最早全面宣传资本主义的人物。他们憬慕资本主义,是在“强邻四迫”的愤痛之下审量彼己,相信资本主义可以致富致强的结果。天演论东来,最能影响人心的一面是物竞天择的严酷无情。所以,在那一代人身上,民族主义归结为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倚傍于资本主义。自此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这种观念贯连革命和改良,成为新陈代谢中的主流。但时至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人的眼界与心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民主和科学引导下走向社会的另一代知识分子曾直面日本的虎视鹰瞵联袂群起,他们汇成的爱国巨潮表现了与上一代人同样炽烈的民族主义情感。然而,这一潮流向前延展,却以“谋社会改造”为主题,极其分明地表达了上一代人没有思考过的另一种观念。与国家主义相比,改造社会具有显然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于是,过去在世人眼中惯见不惊的种种社会弊象,这个时

^①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九卷一号。

候却次第成为时论剥绎研讨、反复探究的东西了。出现在众多刊物上的劳工问题、人力车问题、平民经济问题、平民教育问题、人口问题、自杀问题、无业问题、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游民问题、兵匪问题、面包问题、人生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废娼问题、婚姻问题、服装问题、国语问题、币制问题、学徒解放问题,等等,纷披多态地合成了思想史上前无古人的景观,急速地走出了富国强兵的范围之外。虽说其间曾有过胡适借“问题与主义”别抒怀抱的议论,但这种议论与诸多问题的本来面目是分得开来的。丛聚于国人面前的种种“问题”,触目生哀地写照了中国社会在百病交作之下的“阴气沉沉”和“穷窟齷齪”。其中既有腐熟已久的传统制度留下的旧疾,也有初起未久的资本主义关系造成的新病。所以,十九世纪的通达之士为了致富致强而向资本主义新学执弟子礼;二十世纪的通达之士却在改造社会的宗旨下不仅掙击封建主义,而且笔伐资本主义:

余敢谓现代社会所以发生贫民,由于经济组织不正当,不合理。经济组织之所以不正当,不合理,则资本主义之作祟也。故资本家者社会之虎狼也,平民者犬羊也。犬羊与虎狼遇,乌得免吞噬哉?^①

由此引发出来的思索,对于上一代人以国家主义为特征的信念和理想是一种直白的发问和质疑:“人人能得其所应得,何必再求强国?强国而仍不能得其所应得,强了也有何用?”是以“不平不均,富与强都与平民无益,而且有害”^②。与八十年西学东渐过程里先后出现过的种种思想命题相比,他们富有新意的言论以追求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为标帜而别开一层境界。这种分异醒人眼目地说明:以社会为思考对象的概念已经从上世纪空濛的国家观念中

① 《贫民救济问题》,《曙光》,一卷六号。

② 《邵力子文集》,上册,528、53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分离出来,成为更能影响人心的东西了。社会观念与国家观念的嬗递,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旧有的论题和论域,并在承先启后之交引导了社会思想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的摩荡,一面表现为批判,一面表现为寻求。当批判已经触及到资本主义的时候,寻求一定会超越资本主义。从1920年返视戊戌、辛亥,则二十多年之间,新曲弹奏未久就已成了旧调。这种后浪逐前浪的急速,正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显著特点。张东荪和梁启超为资本主义立说本多驰辩之词,但是,用资本主义来答复正在超越资本主义的思想潮流,却成了一种文不对题的隔膜之论。他们自信言之成理,却又始终被人目为不合时宜,其原因正在于此。然而身在历史时序的变换之中,为资本主义作辩的人们瞻前顾后,也会看到资本主义关系已被剥开的不合理,并因此而发生牴牾趑趄。流质多变的梁启超曾以迂曲的笔路写出过一种苍凉的低首徘徊之叹:

中国之生产事业,倘长此终古,斯亦已矣。若有一线之转机,则主其事者,什九仍属于“将本求利”者流。吾辈若祝祷彼辈之失败耶?则无异自诅咒本国之生产事业,以助外国资本家张目。若祝祷彼辈之成功耶?则是颂扬彼磨牙吮血之资本主义,与吾辈素心大相刺谬,以吾之愚蒙,对于此一问题利害冲突之两方面,积年交战于胸中而不能自决,有生之苦闷,莫过是矣。^①

这些文字留下了一种“意态由来画不成”的迷离。迷离之中含结着那个时候抵御社会主义的人们内心特有的矛盾和复杂,因此。迷离也反映了历史。

二

与张东荪梁启超论辩的那一代社会主义者们多半有过追求资

^①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改造》,三卷六号。

本主义文明的个人历史。然而他们在新学理的旗帜下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却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常显目的高亢和锐利。来自移译的“自由竞争”、“工银制度”、“剩余价值”、“生产过剩”、“经济恐慌”等等语汇和句述在极短的时间里便溶入了他们的论说之中,以一种兼有逻辑和情感的力量剥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这个过程复述了马克思学说中的要义,也掺入中国人的理解和感受。^① 陈独秀说:

我相信生产过剩的弊害资本家终是没法救济,非弄到破裂不止,我更相信军备无限的扩张是资本阶级杀人适以自杀的利器;我相信当初资本阶级是拿殖民政策或国外商场救济了国内生产过剩的危机,我更相信将来资本阶级正因为互相争夺殖民地或商场,酿成国际资本阶级大倾覆的更大危机;我相信欧战结果,国际资本阶级基础已经大大的动摇,我更相信将来再经过一二次美日或英美战争,便到了资本阶级底末日,即国际的崩溃。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底危机必然崩溃的命运。^②

这些话的用意当然在于引发国人思考自己的国运。由于中国土生的资本主义迟迟而起,发育不全,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会在中国显得发育不全。所以,他们从马克思主义中取来的理论未必全部都能够由直观而得到体验。缺乏直观体验的东西本来容易产生隔膜,但那个时候有心改造社会的人们大半相信资本主义的盛衰起落并不是以一种以国度为界的现象。他们常常从战火烧过之后欧洲资本主义的残破衰败想见中国资本主义正在到来的风雨黄昏,并直入地以彼律此:“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哪)能够拿国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91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 同①书,92页。

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① 这种联比用简约性造出了直捷性，在中国人的社会现实与浩荡涌涨的世界新潮之间提供了一种能够榫接的同一，这个过程化掉了许多具体性。从上个世纪开始，倡言革新的舆论家们就乐于引述世界潮流以论证改良和革命。虽说改良和革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世界潮流一词却成为与普遍性和必然性等义的东西，深深地印入了中国人的心中。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以世界潮流为背景来演证中国“资本制度”的“崩溃”，像是后人在思想方法上对于前人的沿用。然而由外观探究内里，则可以看到其间自有种种历史理由。

同宗法关系不无温情的一面相比照，资本主义制度显露出更多赤裸的冷酷无情。由此激生的义愤，曾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人批判资本主义的直接导因之一。但义愤半是情感和意气，它们既不能说明历史，也不能说明未来。以新思潮初起时的激越与朦胧为反衬，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鲜明地表现了一种理性的深邃。它从剖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开始，不仅显露了这个过程里的血污，而且指述了这个过程为社会主义的出现所提供的种种物质前提。于是，资本主义的矛盾成为社会主义的直接催生物。由批判开始的理论脉络以一种法则的形式井然有序地描画出人类社会在进化中的代谢。因此，它不仅能够说明历史，而且能够说明未来。社会主义用进化连接了历史和未来，对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就开始呼吸于进化论氤氲里的中国人来说，进化正是熟闻已久、容易理解的东西。他们常常从这里引发推理和思考。陈独秀说：

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②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92页。

② 《中国近代和文化史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下册，71页。

李大钊说：

我们是立足在演化论和进步论上，我们便会像马克思一样的创造一种经济的历史观了。我们知道这种经济的历史观，系进步的历史观，我们做人当沿着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快快乐乐地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不是在我们背后的，是在前面迎着我们的。^①

以“黄金时代”比称社会主义，无疑是借用形象的色彩写出了进化的理想境界。虽说社会主义来到中国之后，曾以阶级论的出场宣告了进化论时代的终结，但方其初始，由进化论派生的观念和影响却真实地充当过中国人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中介物。由于先行思想形成的中介提供了渡筏，后起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学说才能够富有顺序感地接续近代思想的历史发展，成为有过民主主义经历的激进知识分子们的拳拳服膺之义。在思想与思想的接续中，有着八十年西学东渐的过程为社会主义传来预作铺垫的痕迹。就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立论，这无疑是一种矛盾。然而，在一个自然经济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里，这种矛盾的思想现象又独异地助成过社会主义由外来向内在的转化。

与进化相类的另一个观念是科学。1919年冬，杨匏安作《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一文，赞叹“自马克思倡其唯物的历史观以后，举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②此后，这一类文字日见增多。恩格斯叙述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当这些内容渐次传入中国之后，就形成了倾心于新学理的知识分子们以科学名社会主义的热烈议论。比之社会主义，科学本是更早地渗入和影响近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观念。它以自己的渗入和影响改变了古旧的社会思想，又在这个过程中被多方衍发而成为舆

① 《李大钊文集》，下册，63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上册，2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论界的熟识之物。胡适说过：

这三十年，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

“三十年”是一个约数，其间的高峰应当开始于科学以“赛先生”之名掀动天下的时代里。由于新文化运动扬沙卷沫，浪潮漫溢，被涌举着的科学已駸駸乎越出了声光化电的范围，先后与“国故”、“宗教”、“神道”、“美学”、“小说”、“哲学”、“文学建设”、“美术”、“人生观”、“诗”、“方法论”、“文化运动”、“现今社会”、“革命思潮”、“东西文化”、“实际生活”等等联结为种种富有创意的论题，多方面地为中国人评判是非、真假、善恶。由此发生的广义化，促成了以知识体系为本义的科学向价值体系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里，一方面传统的精神权威因排孔巨潮的撞击而分崩离析；一方面是广义化的科学观念迅速地走入前者留下的思想空隙。在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里，科学几乎成为一种新的权威。近代中国最先倾慕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多半是刚刚接受过“赛先生”洗礼的新文化运动前驱者，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与科学之间既有着时间上的继起性，又有着学理上的并存性。两者的联接，不仅仅移入了一个欧洲传来的现成概念，而且理所当然地包含着新文化运动培育出来的全部体验。他们常常带着这种体验来阐释科学社会主义。陈独秀说：

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

^① 《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上册，2页。

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①

他用以称述马克思的哪些词和句未必具有十足的精确性和切当性,然而他的言论又本色地表现了那个时候初学社会主义的人们崇信马克思与崇信科学的同一。自从中国人向西方追求真理以来,被称为真理的东西曾多少显示过彼此之间的多样性。但时至新文化运动后期,科学已普遍地被世人看做是真理的唯一准尺。准尺的唯一性决定了真理的唯一性。因此,以科学名社会主义虽然自有本来的语义,而更多的中国人则常常会从这里体会到科学观念对于社会主义学说直接的认同和印证。马克思和“赛先生”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由那一代人的具体经历所形成的。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里,思想的传播总是不可逾越地要穿过历史的具体性,并因之而带上历史的具体性,由于科学认同和印证了社会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便非常自然地会从学理中获取高昂的信念,并因高昂的信念而发为磅礴的气概。在他们的言论之中,常常流泻出一种真理在手的锋利和刻直。1921年初,远在法国蒙达尼的蔡和森致书陈独秀说:“闻公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欢迎资本主义,两方驳论未得而见,殊以为憾。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② 可谓字字倔强,摸之有棱。

进化,科学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线相通,显示了西学东渐向前延伸的思想史迹。然而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之中,每一种传来的西学又都是以其直接感应现实的一面而与中国人心心相印的。瞿秋白说: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177页。

② 《蔡和森文集》,7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的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①

在西方,为社会主义行云布雨的常常是阶级矛盾;在中国,最先与社会主义直接感应的则是民族矛盾。以后者比前者,显出来的是——一种历史造成的独特。当欧战还在烽火弥天时候,中国曾经列名于后来战胜的一方。忧国忧时的人们因之而在战争结束之后怀着一腔希望欢呼过“公理战胜强权”。但中国最终得到的并不是公理,而是巴黎和会上列强交易之后的操刀一割。与二十多年前甲午战争失败带来的勒逼相比,这个事实包含着更多直露的强霸性。所谓“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化的况味”,正是直面强霸性所产生的大悟。其中既多愤激,也多透彻。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曾用“俄北瞰、英西睽、法南隣、日东眈”^②来形容西洋和东洋岌岌乎迫来的外患,他们在四顾东西南北的时候还没有找到了一个能够概括俄、英、法、日的东西,其历历而数之的排比,表达的是形象性和具体性。但二十世纪传来的“帝国主义”(也称“军国主义”)一词却以理论思维概括了中华民族与列强之间的矛盾。八十年以来民族创痛凝积出来的愤怒因此而贯注地汇集于帝国主

①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65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16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义。资本主义在超越国界的过程中成为帝国主义,对于久受民族压迫之苦的中国人来说,社会主义学说易于亲近的一面正在于它以资本主义的末路预示了帝国主义的末路。由此产生的是一种可以寄托民族自强的天际曙色。于是,民族自强的耿耿之想便成为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的历史理由之一。李达与梁启超论辩之际,明白地说过:

在稍远的将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必有追踪欧美日本的一日。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想要追踪欧美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①

在相近的时间里,李大钊也表达过同一个意思:

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远走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②

这些言辞富有代表性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理想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在他们身上的交相汇融。作为一个影响过几代人的观念,“追踪欧美日本”之想本是中国人心中久已有之的东西。它催生过变法的康有为,也催生过革命的孙中山。民族矛盾的围箍逼迫,以其沉重的压力和剧烈的痛楚使民族自强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历史主题。在这一点上,后起的社会主义者们与先行的上一代人之间无疑保留着心路相通的一面。然而上一代人选择的是效法

①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71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李大钊文集》,下册,454~45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欧美日本以“追踪欧美日本”，他们沿着这条路朝资本主义急急赶去，但换来的是颠连跌仆，学生老是被先生踩在脚下。后起的社会主义者们多半目睹过这个苦难的历程，因此，当他们继迹于追踪欧美日本之途的时候，他们用社会主义重新诠释了“追踪欧美日本”。1921年，陈独秀在一封信里提到欧美日本，挟着明显的蔑视和诅咒历数其“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然后对比说：“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①比之李达和李大钊，陈独秀把欧美日本与资本主义视作一体的批评里交织着更加强烈的民族积愤。民族自强的内容和意义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在他们的面前，张东荪和梁启超以资本主义立国的言论既是学理上不能相容的，又是情感上不能相容的。社会主义理论化出了一条“兼程并力”的捷路，使落后的中国无须效法欧美日本就能够昂头走到欧美日本的前头去。对于刚刚被巴黎和会血淋淋地撕开了民族创口的中国人来说，它所带来的历史震荡是文辞所无法阻遏的。于是，在反帝爱国运动巨浸接天之后，社会主义便夹着涛声和雷鸣，风起于青萍之末而万窍怒号于天下了。

欧战搅动了西方那半个世界。由战争催发的思潮巨变却越过重洋，把民族自强的旧论题和社会改造的新论题同时推到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眼前与心头。两者本来各有自己的内涵，但在二十年代初期，它们都怀抱着自己的理想劲捷地走向社会主义，并因之而获得了同一。随后，思想潮流急遽地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运动。

三

社会主义论辩初起之际，拥护马克思的人们着力阐扬的是理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52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论内含的普遍真理和直接可行性。但当思想潮流开始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运动之后,理论便会面对国情。最初被简化了的东西,这个时候却不能不成为进一步论说的题中应有之义。1923年9月,瞿秋白作《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以富有思辨色彩的文字写出近代中国社会与欧西比照而显现的不相同:

中国宗法社会的皇帝制度破败之后十二年,方才露出一些民权主义的可能性,然而已经处于世界社会革命的时代;中国“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的国家观念受枪炮、飞机、潜艇、新银行团的恐吓,方才烟消云散,想建立“民族国家”,然而欧美各大民族国家却已显然表露他们是“阶级国家”。中国民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开始,恰好在世界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崩坏的时期。于是中国的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的倾向便有些“徘徊不定”不能自信的状况。实际生活要求民权主义,而思想的先驱却揭橥着社会主义。^①

与社会主义讨论中马克思主义者们简捷高亢的言论相比,瞿秋白解说民权主义的这一段话无疑体现了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一种重估。由此,曾被激烈批判过的东西在审视之后又获得了可以说明的合理性。重估资本主义,有点像是朝着张东荪和梁启超回归。但穿透表象,可以看到的正是理论朝着国情的回归。这个过程带来了更多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也带来了更多的困惑复杂和牵缠纠结:“实际生活要求民权主义”是由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所限定的;“思想的先驱却揭橥着社会主义”又是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被造就出来的。于是,一面是中国人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一面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应有的行程还没有走完,两者各自据有自己的理由,昭示了一种历史作成的矛

^① 《瞿秋白选集》,5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盾。

历史作成了矛盾,然而历史的发展又只有在矛盾的统一中才能够实现。“五四”后三十年,共产党人因此而面临着没有成法可以取用的理论难题和实践难题:一方面,要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开来;另一方面,又要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连起来。前一种制约来自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后一种制约来自革命过程的连续性。在两种制约之间寻求中国革命的致胜之路,不能不是一个从深度上超越社会主义讨论的艰辛历程。但就认识自身的历史递续而言,社会主义讨论所强调过的观念又已为后来的过程留下了既定的思想环境,并常常会被带入后来的过程之中。因此,深化和超越与曲折盘陀相伴相随。

从社会主义讨论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就已经发露出一种易见的急迫:“我们无产阶级早已痛不堪痛(今日由段祺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上去死;明日由曹锟、张作霖下动员令送到那个战场上去死;天灾、人祸、穷困、死亡、日日困着我们,)忍不堪忍了!还论什么革命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①虽说其间不无因时而发的忿激,但细看历史,则这种急迫中蕴结的社会内容比忿激要深沉得多。近代中国久处逼来的剧变之中,又久处进化的迂缓蹭蹬之中。旧的社会形态因剧变而日趋解体,新的社会形态却迟迟没有在剧变中长成。由于两头不到岸,这个过程所产生的阵痛遂不能不长久地绵延郁积,酿发急迫。这种由苦痛酿成的急迫是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一个突出特点。二十世纪初头,相信“吾国立宪,则盛强可立致”的人们与相信“吾国革命而易共和,则法美不足言”^②的人们曾各抱宗旨,作旷日持久之辩。然而“盛强可立致”和“法美不足言”又非常相像地表达了近代中国特有的历史环

① 《蔡和森文集》,7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远生遗著》,上册,卷一,88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境营造出来的急迫。后起的社会主义者沿接了八十年来的新陈代谢,他们也会再现同一个历史环境营造出来的急迫。曾经以理性的思辨分析过中国社会具体状貌的瞿秋白,在后来的岁月中同样受此感染,愤怒地以意志召唤革命的大波。他用自己的起伏的思想轨迹,反映了创造历史的人们同时又受到历史支配的事实。但是,再现于社会主义者身上的急迫已经不是一种率意直露之物了。它们常常与理论和模式交织在一起,并因此形成了明显的特色。从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苏俄便是这个学说唯一的一个可供观摩的对象。在一个新潮初起的时代里,传播社会主义的人们不能不从强调理论的普遍性开头;又不能不借助于苏俄的具体性来领会理论的普遍性。他们沿着这条路而入门,然而这条路也养成了一种用俄国人的方式思考中国问题的惯性。这种惯性带来了理论的模式化;也使成功的榜样引发见贤思齐之想,催人不知不觉地总想跨过脚下的崎岖和漫长。当大革命的波涛在血泊中落潮之后,共产党人面临的是不断逼来的屠戮围剿,于是,由历史环境作育出来的急迫便在十年内战中接连形成了牵动四面八方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教条主义。这个过程日益强烈地表现出直接取法苏俄的意向;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事物和政策被模式化的理论推动着,匆忙地进入民主革命的行程之中;又在失败后留下了一片茫然。从社会历史中产生的急迫依附于理论和模式超越了国情,但是,被急迫所放大的理论和模式却因此而变得偏枯。其结果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既分不开来,也接不起来。从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一般性、共性开始的人们在实践的颠簸起落中经历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具体性、个性,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便成为新陈代谢中的一个历史命题。

虽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迹并不直接地发端于社会主义讨论,但它所回答的问题却解开了社会主义讨论没有解开的一个结。从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中期,出现过中国社会性质问

题的论战。它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拓开的则是一种切近历史和现状的理论深度。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在概括社会历史环境的时候具有作始意义地表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意思。但溯其由来,这种概括和表达本是共产国际与列宁启导的结果。来自启导的东西需要消化,而随后开始的国民革命则使人们还来不及消化就走入了热浪滚滚的时代洪波。因此,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正是以迟来的反刍补足了思想自身在历史发展和逻辑发展中应有的一个环节。这个过程既多论争,也多探求。身当其间而以文化事业为分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为了廓清误说而多方面地涉及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历史;由此产生的论述不仅是对列宁的解说,而且包含着多量具体思考之后的具体心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说因之而变得内涵丰富,有血有肉,并对众多的中国人发生了久远的影响。与社会主义讨论相比,迟起的社会性质论战无疑更专注于说明中国本身的实貌。围绕这个题目的理论阐述,已经淡化了二十年代初期曾经有过的那种生涩和抽象。稍后,连类而起的还有社会史论战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它们的集中出现和相互汇流,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内在化。在同一个时间里,转战于南方农村的共产党人则沿着武装斗争的艰难路途而贴近国情。他们是理论的实践者,并常常在实践的起落里付出自己的鲜血。因此,他们能够比其他人更直接地倾听实践的呼声。革命在内战中寻求发展,内战又以其不可回避的激烈性和残酷性验测了理论和国情之间的关系。由此产生的成功和失败,系结着生死存亡的沉重压力,比之读来的文章,它们给人的感受当然要深刻得多,也强烈得多。亲历武装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会积累体验,也会引发思索,使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们不能不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去咀嚼来自理论的蕴义,并透过章句绎取谛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著述富有创见地汇融了中国革命中的一般与具体、普遍与特殊、共性与

个性。它们和另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性质论战中的言论表现了历史的共鸣和呼应,但又更加鲜明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这种自觉贯注于理论的再创造。毛泽东说:

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①

由中国人所创造的“新的东西”,是“拿中国做中心”^②而获得的一种真知。它们产生于国情对于成说和范式的修正与丰富之中。于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里派生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在社会主义讨论过去了长长的岁月之后,这个学说第一次完整地叙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提和时序。

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明白地指显了自己与“五四”前八十年历史在同一个主题之下的连续。但新民主主义革命又以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的的未来前途为元本,同样明白地指显了自己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时代变迁中的代谢。“赋予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以社会主义的未来前途,承认了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同时又压抑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由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面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一面又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导。”^③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既被分了开来,又被连了起来,由近代中国社会历史作成的独特矛盾因之而获得了理论上的统一。

历史现象常常是在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才会显得清晰。以新民主主义学说反观社会主义讨论,可以看到:初学马克思主义的人们

①、②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10、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③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4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与张东荪、梁启超之间的分异,是一种只能用辩证思维才能解决的对立。但辩证思维的成熟却是后来认识深化的结果。因此,当日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李达在三十年后重提旧时文章,自认“现在看来,是十分幼稚的”。^①当然,幼稚并不是丑陋。它记录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初起时的真实痕迹。后来超越了这个阶段的人们多半是以此为起点的。

^① 《党史研究资料》(二),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